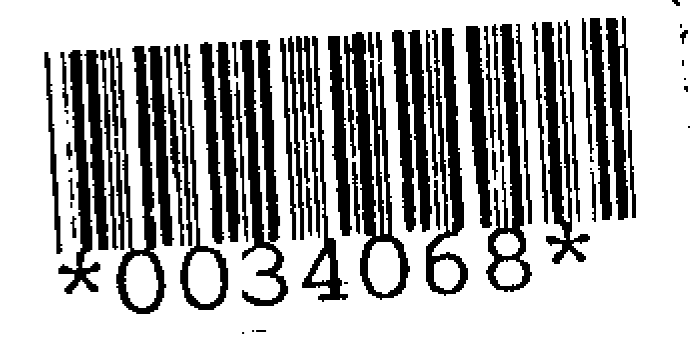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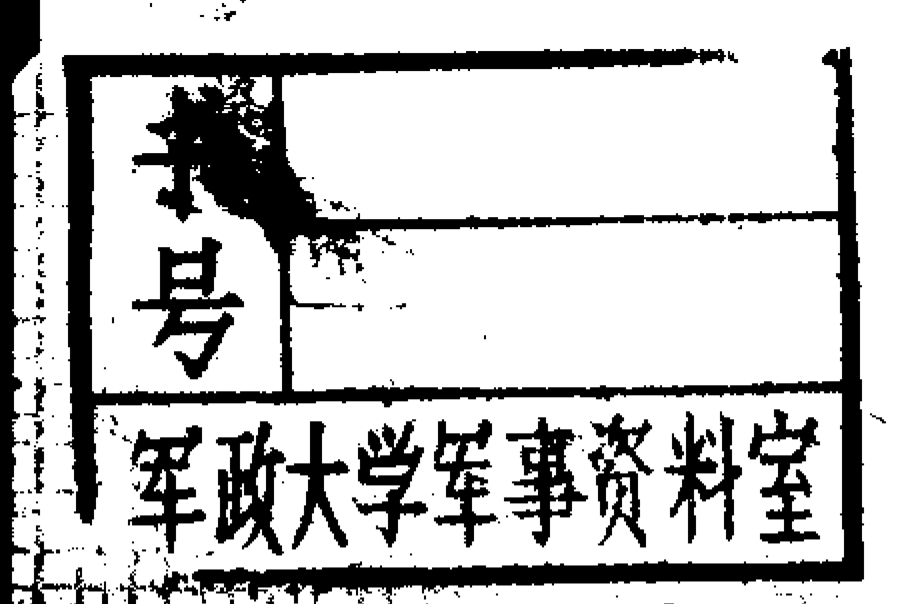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简史

上 册

〔澳〕曼宁·克拉克著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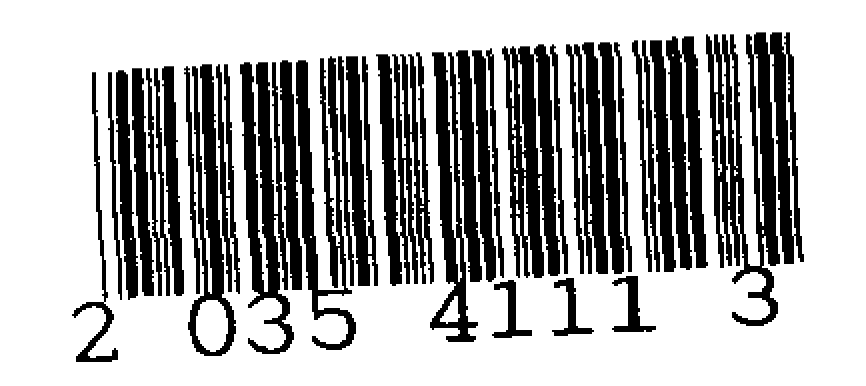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简史

下 册

〔澳〕曼宁·克拉克著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澳大利亚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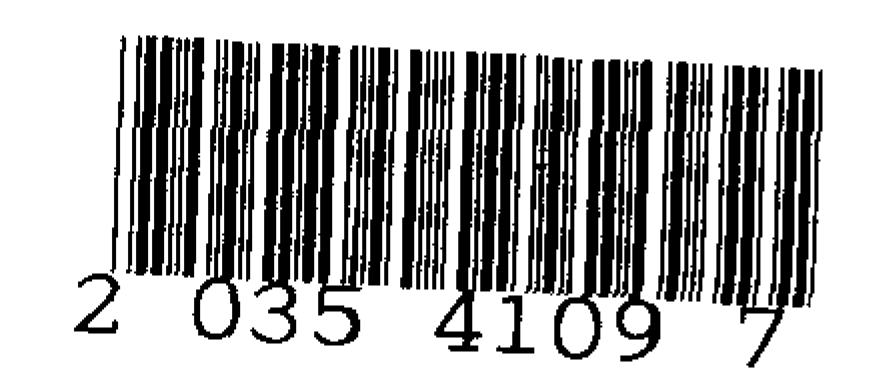
上册

〔澳〕曼宁·克拉克著

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大利亚简史

下册

〔澳〕曼宁·克拉克著

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Manning Clark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Johannesburg Aucklan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64
New Edition 1969

根据伦敦海纳曼书店1969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澳 大 利 亚 简 史

（上、下 册）

〔澳〕曼宁·克拉克著
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11·10 定价 1.60元

出 版 说 明

澳大利亚联邦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它的领土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面积为七百七十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多万。早在十七世纪前，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就分布于澳大利亚全境。1770年英国的航海者来这里“探测”后，先后建立了一些殖民区。1901年，根据英国议会通过的澳大利亚联邦法及不列颠自治领条例，原来分散的殖民区改称州，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现为英联邦成员国。1972年12月22日我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本书作者 C·曼宁·H·克拉克是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史学家，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史，从1949年起担任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澳大利亚史文献选辑》(两卷集)、《澳大利亚史史料》和多卷本的《澳大利亚史》等。1963

年，作者根据他为写作多卷本«澳大利亚史»而搜集的资料写成这本«澳大利亚简史»，1969 年修订再版。

在本书中，作者写了从远古到 1969 年的澳大利亚历史，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叙述了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和屠杀、迫害土著居民的经过，叙述了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教育、宗教、文艺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扼要的介绍。关于二十世纪澳大利亚历史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对各主要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有所分析。本书提供的材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现根据1969年修订版翻译出版，以供使用。

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在书中有明显的表现。他掩盖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美化澳大利亚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多次歪曲和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帝在澳大利亚的罪恶活动则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书中否认了土著居民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有一些污蔑中国的字句。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书中所用典故和基督教名词较多，还有不少

澳大利亚方言俚语。为了帮助阅读，我们除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外，并编了本书所见澳大利亚俚语和特殊词汇表、本书所用部分基督教名词简释和澳大利亚联邦历任总理表，附在书末。凡收入词汇表中的词第一次在书中出现时，都用方括号标出相应号码，以便查对。书中凡由译者加添的字句均加方括号。原书无附图，我们从作者所著《澳大利亚史》第一卷及其他书籍选入地图四幅、插图十幅，以供参考。

1973年2月

目　录

插　图

地 图

序

本书是根据为出版历史文献集和正在为墨尔本大学出版社编写的比较详细的历史而搜集的资料写成的。我要向三位作者表示谢意，他们的著作给我帮助很大。这些著作是：凯思林·菲茨帕特里克关于澳大利亚探险家的著作；芬·克里斯普的«本·奇夫利»和道格拉斯·派克的«不从英国国教者的乐园»。

我还要对帕特·罗曼斯替我的手稿打字和对巴巴拉·佩纳的全部工作致以谢意。

1969年版序

这次对 1963 年版本的内容作了一些修订，并增加了一节，包括的时期是从 1963 年至 1969 年。另外，对参考书目也作了一些增补。我要对丁费纳·克拉克和德尔德雷·莫里斯的帮助表示感谢。

曼宁·克拉克

一、土著居民和白人的到来 1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土著居民的文化，另一种是欧洲人的文化。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很可能到最后一次冰河期才有与以前种属不同的真人首先移殖到来。碳含量测验证实三万年前在澳洲大陆已经有这种人类居住。同类测验表明，现代体质的人恐怕要到很晚才在塔斯马尼亚开始活动。

理由很简单。当土著居民最初移殖到澳大利亚时，可能有一道冰带横亘在大陆东南部即现在斯诺伊山脉所在的地方，使人类不能在这里居住。从三万年前土著居民到来直到1788年白人到来这段期间，由气候变迁引起的澳大利亚面貌的变化可能比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变化为大。因为除了火，除了用于狩猎和食物采集的石器以及描绘他

们对于世界的幻想的岩穴图画① 以外，土著居民就没有其他纪念物留给后代，以记录他们在这块从远古以来就已居住的、奇异而未开化的地方的遭遇了。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某个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冰从这个大陆南部消退了，这就使人类有可
2 能移殖到巴斯海峡各岛屿和塔斯马尼亚。那些在气候变迁后还活着的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但还说不上文明。他们的人数依然少：在大陆上约有三十万，在塔斯马尼亚则在四千至七千之间。当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和从苏门答腊到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的居民逐渐从野蛮进到文明的时候，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然保留他们原始的石器文化。虽然他们的宇宙观也是阻碍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缺乏生产种子的植物和适宜驯养的动物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缺乏足以抵御侵略者的物质力量。

---

① 岩穴图画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祖先在洞穴中绘制的艺术品。其中以西澳大利亚金伯利地区北部恩格灵因那部落所保存者最有名，它用红、黄、黑、蓝各色赭石描绘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和象征虹霓的巨蛇等形象。——译者

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起来保卫自己。在其他民族从野蛮向文明过渡当中，幸运保护了澳洲土著居民，使他们免受这些民族的侵略。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些民族渐渐朝澳大利亚大陆的方向迁移。马来人可能在基督诞生前二千年就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第一次入侵，但他们并没有到达澳大利亚。公元一世纪时，南印度信奉印度教和佛教的居民渐渐移殖到印度尼西亚各岛，找寻黄金和香料，也找寻一些愿意皈依他们宗教的人。他们的扩张没有达到龙目岛以东和以南，这不是由于缺乏刺激，而是由于他们的母国印度发生了由穆斯林入侵引起的危机。穆斯林于十五世纪侵入北印度，并在十五、六世纪中摧毁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印度教诸小国。类似的原因也使早从九世纪开始的中国对群岛的殖民归于中断。到十五世纪初，中国人和苏门答腊、爪哇、帝汶岛以及西里伯① 的望加锡等处进行贸易。他们对在北京可卖高价的海参和极乐鸟很感兴趣，这促使他们利用来自望加锡的布吉海员

① 西里伯是苏拉威西岛的旧名。——译者

转运这些产品。望加锡附近海参捞捕场的耗竭使布吉人①逐渐远到澳大利亚北岸捞捕。他们把该地叫做马雷加，即“海参地”。

在1432年北京的一次宫廷政变②中，反对海外贸易和探险的集团得到了权力。这件事结束了
3 中国人向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直到十九世纪方才恢复。来自印度西海岸和波斯的霍尔木兹港的穆斯林商人暂时继承了这种贸易，同时也一起继承了印度人和中国人从前充当的文明开导者的角色。直到十六世纪初期欧洲人的东来才停止了穆斯林向东方和不为人所知的南方的扩张。

这样，印度人、中国人和穆斯林三者的扩张，都在他们到达帝汶岛和马鲁古群岛之间那条地图上看不见的界线亦即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的时候，就逐渐停止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两三个世纪，偶然事件可能就这样阻止了文明传入澳大利亚。可是，亚洲人在这个地区的移殖史影响了欧

① 苏拉威西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的一个民族，以善于航海著名。——译者

② 按1432年即明宣宗宣德七年。据中国史籍，该年并未发生宫廷政变。——译者

洲人。印度人杜撰了爪哇以南和以东有黄金岛屿的故事；欧洲人就是在找寻这些黄金岛屿的时候闯进了澳洲北岸。印度人、中国人和穆斯林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王国的物质力量都是薄弱的，这就为欧洲人的进入提供了可能性。这三种人都杜撰出种种故事，使他们的海员不敢驶入爪哇南方和东南方未知的海洋，因为他们的船舶、航海仪器和对世界形状的观念限制了他们的海员，使他们只敢靠岸行驶。造船技术的进步，对航海事业的补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制图学的发展，这一切使欧洲人有可能嘲笑这类故事是迷信、无知和物质力量软弱的产物。印度人由于害怕被吸入波森吉的大漩涡①，中国人由于听到女人国和尾闾②的故事，穆斯林则由于听到关于反基督王国

---

① 中世纪爪哇岛一带的印度人传说，爪哇南面大海中有棵大树名叫波森吉，树上栖金翅鸟，树下海水旋流成大漩涡，海船如误入漩涡，即不能逃脱。——译者

②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说："闍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尾闾传说，中国古已有之。《庄子·秋水》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尾闾，意即海中排水的大洞。——译者

的种种传闻①，都望洋兴叹，畏缩不前。而欧洲人则除了同印度人、中国人和穆斯林一样为物质财富的贪欲和宗教热忱所驱使以外，还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自信，所以能够勇往直前。

同亚洲人一样，欧洲人也为香料群岛的财富所吸引，并且相信，劝导不信宗教者和异教徒皈依真正的宗教可得“无量功德”。欧洲人从一开始还希望发现未知的南方陆地②。从希腊时代到十八
4 世纪，许多地理学家和海员们都曾受到这种希望的吸引，仅仅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有过短期的间断，因为当时的教会辩护人都相信《旧约全书》中所讲的大地形状。但是，香料群岛的财富毕竟是实在的东西，和它比起来，未知的南方大陆的设想不过是依稀幻影罢了。到1520年，欧洲人发现了到达东方财富之区的两条海路。第一条是：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航，绕过好望角，北溯非洲东海岸到达马

① 十五世纪前，穆斯林水手传说爪哇东南有由魔王（反基督）统治的狄季达尔国。——译者

② 从希腊罗马时代起，许多地理学家都相信有南方大陆存在。在一些古地图上，这块土地被标明为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即“未知的南方陆地”的意思（拉丁文）。以后澳大利亚（Australia）即由此得名。——译者

林迪，向东驶往印度的古吉拉特海岸，最后抵达马六甲、雅加达和香料群岛。第二条是麦哲伦和德尔卡诺在1519至1521年的不朽航行中所发现的，那就是横渡大西洋，沿南美洲东岸而下，通过麦哲伦海峡，然后由北路横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或香料群岛。许多人曾试图在通过麦哲伦海峡后向西航行以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但都遇上了南太平洋环流和温带盛行的西风，而且又没有岛屿可供停泊，结果只得向北航行。这样，在麦哲伦的“维多利亚号”第一次驶入太平洋，而他的黑眼淌着眼泪之后二百五十多年间，命运（或者说事物的本性）使澳大利亚东海岸没有承受征服者的蹂躏和礼物。

从1515到1607年，天主教国家的海员为了找寻神秘的黄金岛屿，也为了找寻未知的南方陆地，曾不时到达爪哇的南方和东方。葡萄牙人曾从马六甲、雅加达和马鲁古群岛派出过探险队。按照葡萄牙史学家的记载，他们在航程中发现了澳大利亚。但是，不管葡萄牙诗人卡摩恩斯怎样骄傲自夸，说什么如果这个区域有其他陆地，葡萄牙人早已会发现它们，可是现在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可

以证明他们的海员见过澳洲的任何海岸。十六世纪后半期，新西班牙①的几个西班牙人，由于受到黄金梦的刺激，并且在西班牙天主教改革运动的精华即高尚的传道精神的鼓舞下，从秘鲁的卡亚俄派出探险队去找寻未知的南方陆地。门达纳于1565年和1595年先后作了两次航行。基罗斯和他的副手托雷斯于1606年远航至新赫布里底群岛。托雷斯在从新赫布里底群岛经由马鲁古群岛前往马尼拉途中，通过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但他在纪述航程的书信里，没有提到他见过南方陆地。他从新几内亚岛西南岸的伊斯兰教徒居民口中得知荷兰的船只曾驶进过这个海峡。这样看来，到1607年，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来到了澳大利亚的北方门口。然而，这就是伊斯兰教徒扩张的极限，而且至少暂时也是天主教徒对探索未知的南方陆地所作贡献的极限。虽然他们未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曾经鼓舞过他们的种种思想却可能影响他们的最远的后代。

①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拉丁美洲，1535年在墨西哥城设总督管辖墨西哥等处殖民地，名曰新西班牙总督。——译者

在扑灭"可怕的马福梅德教派"① 的一股狂热中，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给欧洲人遗下了一个名声，即：对印度尼西亚群岛居民不老实、野蛮和残忍。基罗斯怀着把一块陆地献给圣灵的理想，他表明并非所有找寻南方陆地的人们都是财神的奴仆。所以，在一个别的方面都重视物质生活的时代，那个地方有些居民却也逐渐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在十七世纪初年，南太平洋地区文明的前途看来是落在新教徒身上了。

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荷兰人也在南太平洋找寻黄金岛屿和未知的南方陆地。荷兰船只于1596年首次来到雅加达。1606年，威廉·扬茨船长乘"杜夫根号"船从班达启程东航，找寻黄金岛屿。他先沿新几内亚南部海岸航行，横渡托雷斯海峡，在基尔威尔角到达约克角半岛的西部海岸，然后返航。根据后来的纪载，他发现"那里没有什么有益的事可做！"这可能是一位欧洲人对澳大利亚的态度的最早纪述。十七年后，即1623年，荷兰海员再次驶入卡奔塔利亚湾找寻黄金和香料

① 马福梅德教派，指伊斯兰教。"马福梅德"(Mafomade)是穆罕默德的讹音。——译者

方面的非常厚利，并为喀尔文教派的耶和华寻找信徒。但是他们只发现一块居住着漆黑的野蛮生番的土地，使他们大为失望。

与此同时，荷兰海员们也闯进了澳大利亚大陆的西海岸。1616年，德克·哈托格按照由好望角到爪哇的新航向①航行，到了澳大利亚西岸沙克湾入口外面的一个岛屿。从1616到1640年间，还有一些荷兰海员到过这条西海岸的一些地方。
6 其中有个彼得·瑙依兹，被风刮得远离航线，到达了大澳大利亚湾东端的彼得岛和保罗岛。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会作出决定，认为发现地球南方未知部分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因为他们相信那里有很多肥沃的地区，有很多贵金属和其他金属的丰富矿藏，还有其他财宝。

他们选拔艾贝尔·塔斯曼任探险队队长。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有经验的海员，但是他的天赋才能并不足以完成这项甚至世界上的伟大

①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6年8月指令该公司所属船只从好望角驶往爪哇时采用新的航路，充分利用季候风，即从好望角出发后，首先向正东航行四千哩左右，然后向北航行。这就比沿非洲东岸北航的旧航向快一些到达。——译者

人物也可能难以胜任的工作。公司想要得到的东西很多，而且又要得很急。塔斯曼于1642至1643年和1644年作了两次航行。在第一次航行中，他发现了现在称为塔斯马尼亚的岛屿，并给它命名为范迪门地区。他还发现了新西兰南、北两岛的西海岸，把新西兰命名为国家土地。在第二次航行中，他把从约克角半岛以西直到澳大利亚西岸中部的威廉斯河这一带海岸都绘入海图。于是，到塔斯曼两次航行结束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对从约克角向西再向南直到大澳大利亚湾末端和塔斯马尼亚南部这一段澳大利亚海岸绘制了海图。他们原先希望能碰上一些金银矿，使公司一般股东得到安慰，又使首先发现的人们得到非常的荣誉，可是却只遇见裸体的、在海边流浪的可怜人，他们没有谷物，非常贫穷，而且生性凶恶。“凡是以弄清一块土地出产什么为自己的职责的人都必须亲自踏上这块土地进行探查”，巴达维亚①的公司理事会成员在1644年也许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辽阔的地方而竟不能得到任何利益，这是

① 巴达维亚是雅加达的旧名。——译者

难以设想的。但是他们却准备把这项发现留给别人，而他们自己仍然急于追求“非常厚利”，开始向别处另寻矿产丰富的地区去了。

四十年后，一个目光敏锐而充满热情的英国流浪者威廉·丹皮尔在沙克湾停泊。和荷兰人一样，他也感到了惶惑。这里的土地干燥、多沙缺水，而且树木也不结水果或浆果。至于居民，则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们除具有人形
7 以外，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丹皮尔在1688年第一次航行和在1698年重访澳大利亚西海岸以后，都发表过这样的观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宣传了他对新荷兰①和土著居民的看法。这些著作影响了英国关于南太平洋地区原始民族的著述，直到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到那个时候，关于“高尚的野蛮人”的神话把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变成为一个发现了人类幸福奥秘的民族。

这种思想上的突变是随着詹姆斯·库克船长的几次航行而起的。1768年，英国海军部委派库

① 新荷兰是荷兰人早期给澳大利亚的名称。在丹皮尔发表《新荷兰航行记》（1699年）以后，英国人在一段时间内也使用过这个名称。——译者

克前往塔希提岛，对金星凌日进行观测，然后探寻未知的南方大陆。在航程中，库克和他的军官们在塔希提岛发现了高尚的野蛮人，环航了新西兰的南、北两岛，然后，出于偶然，他们选择了经由新荷兰东岸、爪哇和好望角返回到英国的航路。历史学家必须以这种偶然的机遇来说明白人来到澳大利亚。1770 年 4 月，库克在悉尼附近的植物湾登陆，接着又在东海岸登陆三次，然后他在领地岛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占领了这个地方，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发现东边并不象“丹皮尔和别的人所描写过的西边那样荒凉可怜。……在这块广阔的地方，毫无疑义，大多数谷类、各种果类和根菜类等等，都一定能够生长茂盛……而且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饲料，足以饲养能够运入的所有牲口而有余”。

至于新荷兰的土人，他写道：

> 在某些人看来，他们可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可是实际上他们却远比我们欧洲人幸福。他们完全不懂在欧洲那么迫切追求的那些奢侈的乃至必需的便利品，因而他们也乐于不知道它们的用途。他们生活于不受

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状态中：陆地和海洋
自动供应了他们生活上必需的一切；他们不
羡慕高楼大厦、家具等等；他们生活于温暖良
8 好的气候中，享受非常新鲜的空气，因此他
们很少需要衣服。这一点他们似乎充分地意
识到了，因为当我们把布料等等送给他们
时，很多人都把它当做无用的东西，随便丢
在海滩上和树林里。总之，他们似乎毫不重
视我们送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也不会舍弃他
们自己的任何东西来换取我们能给他们的任
何物品。在我看来，这件事表明他们认为自
己拥有一切生活的必需品，同时表明他们没
有什么奢侈品。

但是，当库克于1771年回到伦敦的时候，咖啡店才子们和以嘲弄他人为乐的人们却挖苦他对高尚的野蛮人所抱的热情。约翰逊博士对博斯韦尔武断地肯定，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优越。库克谦虚地向海军部报告了他找寻南方陆地的失败，还特意补充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块陆地。海军部并不信以为真。1774年，他们又派他带领“发现号”和“决心号”再次出发找寻。南太平洋高

纬度地区的陆地和海洋长年冰封雪冻。库克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苦之后，于1776年回到英国，他确信地理学家所谓的未知的南方大陆并不存在。到了这一年，以前印度人、中国人、穆斯林、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有启蒙思想的人如库克等等长期劳心致力的唯一结果，似乎只能证明：黄金岛屿的故事是一个谎话，未知的南方陆地并不存在，而已知的南方大陆要不是一片荒地，就是一块只能引起找寻财富的人们的空想而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的地方。

三年后，即1779年，曾经随同库克乘“努力号”作过第一次航行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告诉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政府应该在植物湾建立一个殖民地。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梦想把文明移植到南太平洋去的地理学家、航海家、海员、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竟然谁都没有考虑过使班克斯发生兴趣的这个办法。班克斯建议设立一个窃匪的殖民地，以此作为解决不列颠群岛处理流放犯问题的方法。从1717到1776年，英国政府曾把这种犯人卖给航运承包人，由后者运往北美的南方殖民地，卖给农场主作工人。1776年的北美 9

殖民地革命结束了这种流放的方法。英国政府象大多数特权阶级一样，自大自满，曾一心指望不久就能够迫使美洲人屈服，因而只采用船上监狱一类的临时性措施。可是，到 1783 年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后，他们就要另外找寻遣送流放犯的地方了。

和皮特政府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罪犯问题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重大的问题是：美洲战败的后果、英领印度地区的统治问题、威尔士亲王的债务、废除奴隶制运动、欧洲的动乱所引起的巨浪。当时欧洲的动乱在一些人看来含有人类进步的希望，而在别一些人看来则有如文明心脏中的毒瘤。皮特政府不时接到船上监狱囚犯暴动的警报，又害怕各种传染病从拥挤的监狱蔓延到农村，因而不得不对罪犯问题作出决定。内务大臣悉尼勋爵于 1786 年 8 月宣布，英王陛下认为把植物湾定为罪犯流放地是适当的。他指示海军部供应相当数目的船只，把七百五十名罪犯以及他们到达新的地点后所需的粮食、必需品和农具运往植物湾。

伦敦的才子们嘲笑这种窃匪殖民地的想法。

他们讥议政府官员由于高高在上，头脑发晕，想出了这种疯狂计划。一个住在苏格兰的人士听说这个计划耗费巨大，深为苦恼，说它是古往今来令人心醉的最荒谬、最浪费而又最行不通的幻想。有些罪犯面对着永远流放，在野蛮的国土上受专制统治，在苦役中过更悲惨的生活的前景，不禁唉声叹气。一位自称代表社会上头脑清醒的人们的作家，相信植物湾的殖民区会增进生活上的舒适，并
为文明社会增光，并且势将增进人类的普遍幸福， 10
增进把这个发现留给他们一代的上帝的荣光。较为谨慎的人士则表示赞成把植物湾作为解决监狱过分拥挤的方法，或者贪婪地盘算亚洲贸易的增加对英国本土的利益。富有想象力的人士则想象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窃匪们会得到改造，成为体面的人物。

英国政府任命阿瑟·菲利普为殖民地第一任总督。他是英、德混血种，海军退役军官，领取半薪，在英国南部经营农业。1786 年，他接受任命时，年仅四十八岁。他曾在英国海军和葡萄牙海军中服务，成绩虽然不算优异，却也是出众的。在很多方面，他都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一个代表人

物，凭常识和理智办事而轻视宗教的慰藉，可是又相信英国国教是促使下层阶级服从的手段。他认为，上层阶级分子要培养罗马人的美德，如自觉遵守纪律、自制和忍耐力等。从菲利普遗像的面貌可以看出，他和其他崇拜“冷静理性”的人一样，也受到阴郁感情的驱使，可是他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庄严态度和高尚品格提供了雄辩的证据，证明他不但思想高尚，而且还善于把阴郁的感情引导上转化的道路。

他被任命为总督兼驻军司令官，管辖新南威尔士整个地区，从约克角到南纬43度39分，西至东经135度，包括所有邻近的太平洋岛屿。他奉命在植物湾建立殖民地；着手开垦土地，按最适合于获得谷物和食用根茎的办法分派罪犯从事耕作；勘查海岸；着手与土人交往，培养他们的好感，并且告诫所属同他们友好相处；在居民中推行正当
11 的宗教仪式和良好秩序；从〔太平洋〕岛屿中引进妇女以抵销男、女犯人数目的悬殊。任何罪犯，如果操行良好，工作勤奋，值得赐予恩惠的，总督得予以释放，免除他们的劳役，男子每人授予土地三十英亩，已婚男子则加授二十英亩，如有子女居留

在殖民地的每名加授十英亩。此外，还由公家仓库发给他们十二个月的粮食，以及从殖民地总储备中发给能匀出的工具、种子、牛、羊、猪等等。为了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应分别成立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前者由一名军法官和六名军官主持，后者由军法官和总督任命的两名官员组成。这是一种凭借恐怖以保证法治、秩序与服从的政体，是一种为服劳役的人设立而不是为自由人设立的政体。

其他文武官员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具有这位总督的才能和高尚品格。他们和他一样都具有从生活经验得来的判断力，同样轻视宗教的慰藉，也同样认为新教和英国制度是人类智慧在促进自由和高度物质文明方面的最卓越的成就。这些特征把欧洲的新教各国同天主教各国分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天主教国家都是处在专制政权和崇拜偶像的宗教的奴役之下的。因此，他们暗中嘲笑他们的宗教是虚假的神话，但在公开场合则因它对社会有用而仍给予支持。

不难理解，第一任殖民地随军牧师理查德·约翰逊是不抱这种见解的。他是英国福音派宗教复兴运动的产儿，曾在剑桥大学马达楞学院受过教

育。不信宗教的人嘲笑这个学院是“卫理公会信
徒的巢穴”，是一个使茶叶渣而不是使酒渣浮在
剑河水面的地方①。福音派基督教在整个十九世
纪支配了澳大利亚新教徒的宗教生活。这是一群
牧师努力的结果，而约翰逊就是其中的头一个人。
在罪犯的社会中，福音派基督教具有明显的社会
效用，因为它宣传服从，反对酗酒、卖淫和赌博。
12 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福音派牧师在当权者
眼中成了天然的社会道德警察。但是，牧师却又
信仰他的上帝，因此他就不得不过苦恼的日子，这
一面是由于当权人物虽然认可他在道德上的作
用，却漠不关心他的宗教热情，一面又是由于他不
能把福音传给所辖教区的群众。福音派牧师们在
痛苦中度日，在公开场合把传教的失败归咎于教
区群众的腐败堕落，但在私室里则暗中以他们不
配为上帝服务而痛自引咎。他们作为道德警察所
作的工作，使他们在世人的心目中就等于一个特
殊的社会阶级，这就使人们认为：他们告诫会众要
接受神恩，显然只是最恶劣的伪善。他们被所有
不赞同他们信仰的人叫做披着教士服装的官吏，

① 英国卫理公会主张禁酒。——译者

这就是他们为英国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效劳所付的代价了。

七百五十多名罪犯搭乘第一次船队开往植物湾。他们都是因犯罪而被判处流刑的，刑期有的七年，有的十四年，有的是终身流放，在流放期间都要强迫劳动。刑罚的目的是要防止犯罪、改造犯人并为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十八世纪末年，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由于极端的不平等和民众的日益贫困，犯罪流行。在这样的社会里，刑法成为保护生命和财产的一种残酷无情的工具。可判死刑的罪多至一百六十种以上。在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都柏林，都有一部分工人以犯罪来维持生活。十八世纪末，伦敦的窃匪集团是由厌恶劳动的男女组成的。据目击者说，他们因懒惰而致沈湎于赌博和荒淫放荡的生活。他又说，此外还有“从犯罪中追求快乐的败家子、浪子、轻薄少年。……还有放荡纵欲的角色，自甘堕落，天天引诱别人淫乱、赌博、放纵无度……还有游荡的歌手、民谣歌唱者、马戏团老板、喇叭手和吉卜赛人①”。

① 吉卜赛人，原出于印度的一种亚洲流浪民族，现散居欧洲各地。他们乘马拉的篷车，以贩马、补锅、制篮等为生。——译者

随军牧师约翰逊谈到第一批罪犯时说：他们整天
13 游手好闲，进行极为渎神、极为污秽的谈话，干出不堪笔述的丑恶可厌的勾当。

在妇女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娼妓，她们把勾引来的男子灌醉，掏他们的钱包，而把夜间所得送给龟鸨。1788年萨拉·索菲娅·安·布朗在申辩时说："阁下，我住在福伊夫人家里，我是个姑娘，是个倒霉的姑娘。"男子们有时把他们的堕落归咎于喝酒。1788年，弗朗西斯·弗莱克斯莫尔在伦敦被控盗窃两副包金的鞋扣，他辩护说，当时他喝醉了。他被判处流放七年。有些人则以贫穷为借口。1788年，克里斯琴·克伦克以夜入人家盗窃罪在伦敦受审。他辩护说，他非常贫困，得不到任何粮食，见到这些东西就情不自禁。他也被判处流放七年。可是，大多数罪犯可能是职业犯，或者是深恶劳动而以劫掠同胞为生的男女。此外，还有一群偶犯（即因生活困难而犯罪的人），有一群因犯伪造文书罪或盗用公款罪等而被判刑的中等阶级罪犯，还有一群陆海军人，是因违犯军纪而被判刑的。

1787年初，文武官员、罪犯和一小支队的海

军陆战队在朴次茅斯集合。为着运送他们前往植物湾，内务部与一些船主立约，由后者供应运输船六艘，而海军部则供应几艘运输补给船和一艘海军供应舰“赛里乌斯号”。起初，准备工作混乱得难以形容：粮食供应不足，女犯没有衣服，船上大炮没有弹药，没有药物供应，没有供陆战队员饮用的酒[35]。凭着耐心和辛勤，菲利普和官员们在船队开行前得到了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包括酒在内的一些慰藉品。

178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天早上，第一批船队沿英吉利海峡南下，进入公海。自从新年初犯人抵
达朴次茅斯以来，那一天，商店的百叶窗第一次打 14
开了。同时，还有一位牧师跪在岸上，求神原宥他们全体。在船上，罪犯们在遭受流放、离乡背井的时刻，倒没有流露忧伤的神色。约翰逊牧师只想向他的上帝倾吐自己的心意，可是菲利普却为自己的任务而感到忧虑不安。他的心里仍然想着他出发前在朴次茅斯的阴暗日子里开始想到的想法。当时他曾写道，他不希望用罪犯奠定一个帝国的基础，因而他们一定要同驻军和其他移民隔离开来，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地方不能有奴隶制，从

而也就不能有奴隶。可是，当船队于8月7日抵达里约热内卢时，他们却听到并且看到罪犯的劳动怎样被用来奠定新大陆文明的物质基础。在他们从第二个寄泊港口启航的当天晚上，这些心情沉重的人们又在思考他们与文明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离开文明的国土驶向一个野蛮的地方，同时，似乎为要把这个想法更深刻地铭记心里，他们遇到一艘标有“伦敦”字样的船，并和它联络。

1788年1月20日，所有船只都安全抵达植物湾。当时，周围可怕的萧条景象，甚至使最乐观的人也感到绝望。库克和他的同伴说过，这里有的是草地，只要凭着人类双手的辛勤劳动就会得到丰收，可是现在他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草地。菲利普和一小队官员乘一只小船往北行驶，发现了他们誉为“世界上最良好的港口”，可容一千艘主力舰完全安全停泊，感到高兴。有人建议这个港口应该叫做阿尔比恩港；菲利普婉辞谢绝了这个建议，并给它定名为悉尼湾。他立即决定把殖民地从植物湾迁到杰克逊港的悉尼湾来。1月26日，正当罪犯运输船转到新地点的时候，海岸上有一小

撮土著居民发出了可怕的叫喊，并且拿着棍棒和石头，摆出愤怒的姿势，表示不要白种人到来。那天晚上，罪犯登陆以后，英国国旗在悉尼湾迎风招展，同时还鸣炮、祝酒。从此以后，这一天就一直成为欧洲文明在澳大利亚开始的节日。

2月6日晚上，女犯登陆。船上海员们还领 15
到了额外的兰姆酒，他们一会儿就喝得兴高采烈，直到一场暴风雨把酗酒的人淋得湿透才收了场。第二天，罪犯们被带到一片空地上。在军乐队的伴奏下，他们听了菲利普宣誓就任新南威尔士总督兼驻军司令官，也听了军法官宣读发给菲利普的军职任命状和冗长无味的训令。菲利普把手按在他所不信的圣经上面，宣誓说，他决不想使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重登英国王位。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查尔斯·斯图尔特已在约一星期之前因酒精中毒在罗马死亡了。那一天，悉尼天气潮湿闷热，人们宿酒未醒，犹有余醉。菲利普好象要增加他们的痛苦一样，对他们大声演说，指出男女乱交的种种罪恶，说明结婚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并且恫吓说，如发现任何罪犯在夜间进入妇女居住区时，将以大型子弹射击其臀部。

人们都被派了工作，耕种土地，建筑茅屋，搭盖帐篷。大概就在第一个星期天，理查德·约翰逊牧师把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集合在大树底下，向上帝祷告，感谢他的鸿恩。一星期后，他在一个官员的帐篷里举行圣餐式，另一个热情洋溢的官员拉尔夫·克拉克请求保管在殖民地第一次举行圣餐式使用的桌子。在开头几个星期里，犯人们曾公然无忌，盗窃粮食，菲利普决定鞭打他们，借以警告欧洲人和土著居民，表示他决心保护财产。当鞭打不能制止犯罪时，菲利普同意采用死刑，将一名盗窃犯绞死。白人已经来到澳大利亚了。

二、罪犯和移民 16

(1788—1809年)

有一个目击者写道:“现在,每个人都担负着沉重的劳动。在一个冷静而又有点空闲的旁观者看来,这种景象将是一幅生动有趣的画面。”在一个地方,一班人在砍伐林木;第二班人在修建一座铁工场;第三班人拉着一车石头或粮食向前走;第四班人同一小分队的士兵一起在张盖一个大营帐。不久之后,忙乱就转化成了秩序。于是真正的事业开始了:利用犯人的劳动,给殖民地打粮食,同时也对他们的罪行给以惩罚。

这并不是容易的工作。土地拗弯了铁锹,木材扭歪了斧刃;暑热逼人,大蚁咬人。他们对土著居民表示亲切和友好,但土著居民并不欢迎。欧洲人把文明的珍贵礼物送给土著居民,换取利用他们的土地财富的权利,并且希望他们会领会文明的好处,抛弃野蛮人的生活,成为欧洲社会阶梯

底层的劳动者。但是，开始的时候，一切试图接近土著居民的办法，都遭到土著居民的抗拒。因此，生产粮食和供应住所，都只有依靠男女犯人的劳动。可是这些人恰恰就是由于厌恶劳动才干起罪恶勾当。鞭子的威吓，获得解放的希望，各种特殊的恩惠，全都不能克服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劳动的厌恶。

难怪最初几次粮食收成都是不好的。殖民者不得不求助于从英国运来的储备。他们曾企图从
17 海外寻求救济，却遇到了灾难。1790年3月，仅存的一艘粮食补给船“赛里乌斯号”在诺福克岛触礁失事，增加了他们的困难。第二支船队延期从英格兰启航，“守护号”又在好望角海面遇难沉没，使本国救济品迟迟未能到达。到1790年初，殖民地受到了饥饿的威胁。自1789年10月开始削减每周粮食配给量，到1790年4月削减为每周配给面粉四磅、咸猪肉二磅半、大米一磅半。有一个老人在等候领取粮食配给时昏倒死亡；军医解剖他的尸体，发现他的胃完全空空如也。

1790年6月3日，人们望见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大船在海港进口处徐徐驶入，就派一只小舟

去护卫它。当小舟上的人们看到大船船尾的“伦敦”这两个字时，他们大叫起来：“万岁，可以饱餐一顿了，朋友的音信到了。”这艘船是“朱莉安娜夫人号”，它的到来标志着生存斗争的结束。他们第一次听到了英国乔治三世的患病和康复；他们也听到法国革命这个重大事件，有些人听了觉得“惊异和意外”，另一些人却想到他们生活在英国宪法庇荫下的巨大幸福。

到这个时候，菲利普已经坚信：如果殖民地只是依靠犯人在政府农场、公路和公共建筑物上编队劳动来生产财富，它就不会前进一步。他得出结论，认为殖民地将来的发展有赖于采取下列措施：吸引自由移民到新南威尔士来，把罪犯指派给他们当工人；把土地授予官员们，由罪犯来耕种；把土地赐给那些劳动勤奋、品行端正、值得接受这种恩惠的前犯人。他曾把土地授予前犯人J·鲁斯，鲁斯在领受土地一年之内，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以及从前在英格兰所学到的农业知识，竟能维持一家的生活，无须倚赖公共仓库。可惜菲利普在殖民地呆得不长，来不及看到他的政策开花结果。在远方环境里，在一个他认为其中十有九人 18

都不值得活下去的社会中，他给艰难困苦的生存斗争弄得精疲力竭，终于因为慢性胃病治疗无效而申请回国。当时他深知殖民地所有的人都敬爱他，也深知他在完成艰巨任务中的表现得到英王的嘉许。他就怀着这种心情，于1792年12月浮海回国。

菲利普走后，殖民地由年资最高的军官弗朗西斯·格罗斯少校管理。他缺乏菲利普的威严与才干。但是，由于历史的一种讽刺——人的命运有时不受大人物的影响反而受了小人物的影响，格罗斯所作出的两项决定，以后五十多年间在澳大利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把土地授予官员们，并劝他们使用罪犯劳动来耕种，而把剩余产品出售给政府仓库。为了鼓励犯人在规定为政府服役的时间干完活后再到官员们的土地上干活，允许他们得到兰姆酒作为额外劳动的报酬。他还鼓励官员们做买卖，向进口的船舶批购货物，按自定价格零售。

殖民地的货物销售量迅速增加。消息逐渐传开了，说是在悉尼湾出售整船的货物也有利可图。从英美两国来的捕鲸船，都载来货物，卖给这些官

员，然后再开往南方去，猎捕鲸鱼和海豹，因为在新南威尔士海上，在范迪门地区东海岸，在新南威尔士与范迪门地区之间的巴斯海峡中的各岛，在远到新西兰南岛南端的杜斯基湾一带，都盛产鲸鱼和海豹。从悉尼湾也有船只开往太平洋各岛，收集腌肉等货物卖给悉尼的官员和政府仓库，或者收集檀香、海参等货物运往中国出售。1798年，加尔各答商号坎贝尔—克拉克公司的代表罗伯特·坎贝尔试运了一船货物往悉尼，但这艘船在巴斯海峡沉没了。他本人乘另一艘船前往悉尼湾，创办了坎贝尔公司。不久他就证明，这一块窃匪殖民地除了原来用于惩罚和改造英国罪犯的目 19
的以外，在那里经营企业也大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有些前犯人渐渐富裕起来了，甚至成为头面人物。西米恩·洛德于1790年因盗窃每码值六便士的薄棉纱布一百码和每码值四便士的白洋布一百码，被处流刑七年，1791年到达悉尼，1798年获得自由。他开始把储蓄投资于捕海豹业、捕鲸业以及太平洋岛屿上的腌肉贸易。詹姆斯·拉腊是一个法籍的犹太人，1790年由于窝赃被伦敦警察逮捕，释放后领有土地，后来又投资

经营利润丰厚的贩酒事业，并且兼营一种比较文明的业务，即在帕拉马塔开设酒馆，用法国饭菜款待旅客。还有一些前犯人也领了土地。一个叫作查尔斯·威廉斯的，在帕拉马塔附近得到三十英亩土地，耕种了几年，后来因为他出卖了一个同党，遭到了他的同犯和其他前犯人的唾弃。于是他开始纵情饮酒。他的妻子也和他一样狂饮，在悉尼一次酗酒狂饮中淹死了。此后，人们常常看见他把一杯兰姆酒倒进口里，另把一杯倒在他妻子的墓上，一边还对过路的人说，她在世时候那么爱酒，现在可能还是喜欢喝的。威廉斯对兰姆酒的嗜好压倒了一切，后来他索性把土地卖给一位官员，拿了钱去过他的酒瘾。据当时的纪述者说，他变成了他原有那块土地上的雇工，却恬然不以为耻。

这样一来，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财富日益集中在文武官员的手里。其中有些人通过扩充地产和出卖货物迅速积累了财富。1800 年以前，官员们就已经垄断了商品的销售。据敌视他们的见证人说，他们在买进卖出之间获取了十倍的利润。但是，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人则说，他们实行垄断

的目的在于保护无依无靠的罪犯、前犯人、捕鲸者和同僚们，抵制那些不受上流社会礼法约束的人 20
的贪婪。到1800年，这些官员们已经开始具有一个排他集团的某些特征：他们对本集团以外的人傲慢自大，要求人家向他们脱帽致敬、奉承恭维。有谁企图损害他们的财源，他们都要加以无情打击和惩罚。

有一个官员，他在家庭生活中非常和蔼可亲，很有才干，雄心勃勃，有摧毁前进道路上一切障碍的魄力。他就是约翰·麦克阿瑟。他是新南威尔士保卫队①的军官，于1791年携带妻子伊丽莎白和一个幼儿来到澳大利亚。麦克阿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当别人闲坐聊天或者狂饮烂醉的时候，他却进行各种改良殖民地农业的实验。到1800年，他在帕拉马塔的农庄（伊丽莎白农庄）拥有土地二百五十英亩，其中耕种面积一百英亩，成了整个殖民地的模范，种有葡萄、果树、蔬菜和谷物，养

① 新南威尔士保卫队，于1789年成立。由于随第一支船队到新南威尔士的海军陆战队官兵不愿久留，英国政府乃在英国另行组织新南威尔士保卫队。这支队伍到新南威尔士后，其中官员权势渐大，操纵商业，贩酒图利，恃势横行，总督难以控制。到1809年麦夸里总督就任时，撤销了新南威尔士保卫队。——译者

了猪、牛和家禽。1795年，他把第一把铁犁引进了殖民地。接着，他又认真钻研在新南威尔士生产优质羊毛的可行办法。他又是雇用犯人劳动的模范雇主，为人严厉、严格、正直、公正。从来没有涉及他的私生活的丑闻，也没有关于他虐待罪犯仆役的议论。

但是，正当他的雄心和才干引导他沿着物质上成功的道路前进时，他的致命缺点却渐渐使他失去了同僚的敬爱，使他晚年陷入了孤独狂。他总想彻底摧毁一切挡住他道路的人。例如，他搭乘犯人船前往澳大利亚时，只是为了摆在他妻子舱房外面的污水桶发出的臭气，他就和一位船员吵架，终至展开一场决斗。前后十七年间，每当问题涉及他的利益和荣誉时，这种暴躁脾气使他同新南威尔士的每个总督（由亨特到布莱）都发生争吵。

在他一生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中，他能够"把坚硬的礁石变为平静的水"①。1802年他不体面地被金总督送回英国交军事法庭审判，但他却抓住这
21 个机会说服国务大臣卡姆登伯爵，使他相信在新

① "把坚硬的礁石变为平静的水"一语，出处未详，按文义是"化险为夷"的意思。——译者

南威尔士生产细羊毛可获大利。麦克阿瑟回到悉尼，带有卡姆登给金总督的一道命令，要他在悉尼西南四十哩的老牧场授予麦克阿瑟一万英亩土地。这个牧场后来被命名为卡姆登。要是别人，这种虚荣和骄傲可以导致自身的毁灭，麦克阿瑟却不然。他不久就证明，用他那一片土地上的牧草喂养美利奴绵羊，生产的羊毛在质量和价格上都可以同西班牙和日耳曼各邦出产的羊毛竞争。在后来的十五年间，他看出使用罪犯可以达到双重目的：既可以通过改造和惩戒罪犯来为英国利益服务，又可以利用罪犯的劳动来增进殖民地的利益。麦克阿瑟可以算是首先看出怎样才能使新南威尔士天然富源的开发与英国经济利益协调一致的先驱者之一。

1810年以前，罪犯流放制度还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犯人被分配给政府、文武官员和移民，政府有权优先挑选。直到1810年，在农场劳动、筑路、公共建筑等方面，政府都十分需要罪犯。在政府服役和在指派制①下工作的犯人每周从星期一

① 指派制即指派罪犯为私人雇主工作的制度，于1789年开始试行，到1804年成为一种明文规定的制度。罪犯被指派工作后，即不直接受政府管制。——译者

到星期五每日工作九小时，星期六工作五小时，每日早、午餐都有休息的时间。在规定工作时间以外，罪犯可以另找雇主出卖劳动力，赚得工资。为政府服役的犯人由政府供给粮食和衣服，在指派制下工作的犯人则由主人负责供给。为政府服役的女犯从事修补衣服、洗衣以及纺织亚麻布。有些犯人被指派充当家庭仆役，从1798年起，这些犯人的衣、食、住都由主人负责。犯人的劳动队伍还从自由工人得到补充。自由工人包括服刑期满的男子和妇女、犯人的子女以及一些前犯人。后者本已领受了土地，但或因贪酒，或因懒惰成性，或因意外事故和情况而出卖了土地。

对于勤劳和品行良好、值得开恩的犯人，政府
22 可以发给假释证，免除他们的强制劳动，许可他们在所属的警区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在法庭上没有法律权利，不得充当原告或被告，法律还禁止他们拥有土地，这样就保证他们在服刑期满前继续处于屈辱地位。政府也可以发给有条件的或绝对的赦免状，恢复罪犯因犯重罪①而丧失的全部合

① 按英国的习惯法，罪分重罪（felony）和轻罪（misdemeanour）两类。例如谋杀、武装抢劫、放火等都是重罪，其他罪情较轻者则为轻罪。——译者

法权利，但有一条限制，那就是凡持有有条件赦免状的人，在原判刑期未满之前，不得回到不列颠群岛的任何地方。

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防止犯人再度犯罪，采取了惩罚的手段。犯人如玩忽工作、不服从命令、旷工、酗酒或对主人（政府监工或移民）态度傲慢时，就被带到知事处受审，被判处踏车、参加筑路队、鞭挞或流放充军地等刑。对不同的罪行，可以判处鞭挞五十鞭到一千鞭不等。有少数挨了一千鞭还能活着的犯人，在街头蹒跚而行，挺不起腰来。政府官员和移民喜欢用鞭打作为一种惩罚，部分是由于劳动时间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部分也由于犯人害怕身体上的极端痛苦和因此而引起自尊心的丧失。未受过鞭打的人相信自己还有前途；而受过鞭打的人一般都陷于悲观失望，过了一难又一难，直到最后在"绞刑仪式"中了此一生，或则窜身丛莽〔13〕，过着野人的生活。惩罚的意图原在于防止颓废和堕落，结果却适得其反。

殖民地当局曾定出一些规章以防止流刑制度产生各种流弊：防止主人受犯人欺骗而允许他们出卖劳动力；禁止主人出租犯人赚钱；禁止主人用

马鞭鞭打犯人；禁止犯人贿赂政府下层机构职员把他们的服役期限从终身改为短期。移民们抱怨说，对犯人惩戒偏宽已经引起了非常不幸的后果。到1810年，他们还愚蠢地向往从前峻法严刑的美
23 好日子，那时候许多人背上血迹斑斑，个个卑躬屈膝。有些犯人因痛苦和受到残忍待遇而发出呻吟。只是由于犯人的痛苦、恐怖、苦恼和劳累，悉尼湾和帕拉马塔的街头才渐渐出现众目共见的、文明的迹象：教堂、学校、法院和政府官署都成了犯人痛苦和劳动的纪念物了。

与此同时，悉尼和帕拉马塔的殖民区也开始扩张。在白人来到悉尼湾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占领了诺福克岛。有些释放犯[31]在肥美的豪克斯布里河流域沼泽地区领受了土地。1795年，在一个起初叫做煤河后来改名纽卡斯尔的地方发现了煤矿。海军军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开始测绘悉尼以南海岸的海图。1798年他们乘海军单桅船“诺福克号”进行探查，终于证明前人所见的不断冲击范迪门地区西北海岸的大海，原来只是范迪门地区和新南威尔士之间的海峡的一部分。在这次航行中，他们环航了范迪门地区并绘制了海岸

图。1802至1803年，弗林德斯环航了澳大利亚，终于证明新荷兰与新南威尔士之间并没有什么海把它们分隔开来。

十九世纪初，英国官员和新南威尔士官员们对法国探查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感到惊慌。为了要争先采取行动，防止法国开创殖民地，也为了利用时机开展海豹皮和鲸鱼油贸易，英国政府于1803年派出一个由犯人、士兵和移民组成的小规模探险队，在科林斯上尉率领下，占领菲利普港。与此同时，为着同样的原因（还加上新南威尔士当局希望把死不改悔的犯人调离该殖民区），金总督也派了一个由犯人、士兵和移民组成的小规模探险队到范迪门地区南部海岸德尔温特河畔建立殖民区。几个月后，他又派遣佩特森上校率领一支类似的探险队占领了范迪门地区北部海岸的达尔林普尔港。在菲利普港呆了几个月以后，科林斯于1804年初决定带领他的队伍迁往德尔温特，从鲍恩手里接下指挥权，选定了殖民区的地点并给它命名为霍巴特镇。就象多年前在悉尼湾的时候一样，
粮食不足，工具恶劣，犯人和士兵难以驾驭，土著 24
居民对白人窃据土地进行报复，这一切带来了不

少艰难困苦，不过还没有出现过当年悉尼湾第一次生存斗争的那种悲壮情景。在悉尼湾的初期斗争中，理查德·约翰逊牧师曾不辞劳瘁，力图拯救罪犯，使他们免受永恒的惩罚，但霍巴特镇的随军牧师罗伯特·诺普伍德却寻欢作乐，逐猎袋鼠[44]，和官员们饮酒；如果天气有一点点不佳，就索性取消礼拜仪式。在悉尼湾从没有过涉及菲利普的流言蜚语，而科林斯在霍巴特镇则经常和女犯混在一起。因此当他于1810年突然死去时，有道德的人士相信他作恶多端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同时都奇怪上帝为什么放过了另一个声名狼藉的坏蛋——那个牧师。

这个时候，新南威尔士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澳大利亚文明的结构具有深远的影响。1791年9月，第一批爱尔兰犯人乘罪犯运输船“皇后号”来到该殖民区。到1800年10月，悉尼湾和帕拉马塔共有爱尔兰流放犯一千二百零七人。这是天主教传入澳大利亚的开始。在爱尔兰，天主教教士由于生存的需要，也由于道德信念，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长期流血战争中，一直站在农民一边。在澳大利亚，爱尔兰教士们和下层阶级的这种联

系保持了下来，因为不自由的〔罪犯〕和自由的〔教士〕双方都有继续留在社会阶梯底层的趋势。

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不论教士和俗人都过分拘守礼仪。加之，除了受过欧洲社会贵族传统教养的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浸淫于轻信和迷信之中，这就使得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和受了启蒙思想作家影响，认为宗教妨碍人类进步的少数人都觉得讨厌。新教徒不能理解爱尔兰人心灵深处的那些感情，因为那些感情都是超出启蒙时代人们的思想范围之外的。尽管爱尔兰人惊人地肮脏，尽管他们的教士向他们宣扬迷信习惯，尽管他们愚昧无知地准备迎接“天国降临后的生活”，但是爱尔兰
人却保存了活生生的基督形象。爱尔兰人的宗教 25
教导他们为什么现世财富不属于聪明人，并且向他们保证，纵然新教徒这批家伙赢得了白天，他们决不会再赢得黑夜①。

新教徒所见的天主教徒却与此大不相同。在他们看来，爱尔兰人的迷信和肮脏可以证明新教

① 新教徒赢得白天，不会再赢得黑夜，是爱尔兰民歌中的句子，大意是说新教徒在现世占得上风，但并不长久，终有这样一天到来：强者失去宝座，富者空手而回。——译者

徒世界观中的一个一贯看法，那就是新教和英国的各种制度保护了自由和高标准的物质文明，而天主教则支持专制政治和助长物质上的肮脏。所以，当爱尔兰犯人开始大量到达悉尼湾时，新教徒的教会组织大感惊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威胁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不忠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从宗教和生活方式上威胁“高等文明”的民族。从一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就着意提防他们所谓的“受了哄骗而又昏头昏脑”的民族的威胁。

新教徒教会组织的惊慌并非毫无根据。1798年4月，有一个在通加比编队劳动的爱尔兰犯人突然扔下铁锹，三呼自由万岁。他被押到知事那里，然后又给绑在他的妄念发作的场地上，用鞭子抽打，好让他的爱尔兰同胞们考虑考虑向英国主权挑战的后果。1800年9月，亨特（他于1795年继格罗斯任总督）认为爱尔兰犯人组织图谋叛乱的集会，进行了一次审问。知事们把被怀疑为谋叛首犯的几个人判处鞭挞，要打到他们供出密谋为止。有一个人先被鞭打背部，打到背部皮开肉绽之后，又被鞭打臀部。最后知事（新教徒）只得

断定，爱尔兰人宁死也不肯把一个同胞出卖给他的民族和宗教的敌人。

1804年3月，爱尔兰犯人威廉·约翰斯顿在卡斯尔山集合了一批爱尔兰同胞，他连骗带吓，声称要把他们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用棍棒、铁锹和几支步枪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率领他们，向豪克斯布里进军，预备夺取悉尼。但是有一个人及时向金总督告密（金是于1800年末接替亨特的），因此，在暴动者的队伍还未能壮大起来之前，他们就被一小队士兵击溃了。后来暴 26
动的首领们被处绞刑；接近首领的人被处鞭刑，有的多达一千鞭，并被流放到纽卡斯尔充军地。他们平日在充军地挖煤，星期日则由当地军队指挥官奉新南威尔士总督的命令向他们宣读英国国教祈祷文，让他们听到神爱的抚慰。参加起事的一般成员算是受骗盲从，尚非坏人，得到了赦免。这样，爱尔兰人被慑服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珍贵信仰，因为这一信仰仍然是他们的世界观，这和那种确认新教徒优势地位的世界观截然不同。这样，他们在爱尔兰的伤心史外，又开始添上了他们在新南威尔士遭受迫害的新的一页。

但是，新南威尔士文明的主调起初是由新教徒定出的。福音宣教师们通过布道坛提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1803年一个前犯人创办了《悉尼新闻》以后，他们也通过新闻出版物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把酗酒、乱交、赌博等罪恶描绘成种种恐怖的画图，说这些罪恶会使一个人在现世丧失体面，在来世遭受永恒的炮烙与折磨。在政治方面，他们宣讲政教合一的简单教训，他们又警告大家要提防给恶人安排的大陷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他们提醒会众和读者说，在上帝的圣殿里人们可以理解地位和财富等级的意义，上帝运用无边的智慧创造了这些等级，正是为人们自己的幸福着想。穷人从圣经中可以学到，要抬起眼睛仰望那些幸福的景象，他们越是接近坟墓，这些景象也就越加光明，越加令人心醉。同样，从圣经里富人也会得到严峻的启示，认识富人到达天国是多么困难。

牧师们和《悉尼新闻》孜孜不倦地提醒人们注意上帝赐给英国国教信徒的一切幸福。对比起来，他们认为所有其他教派的信徒都彷徨于极度黑暗之中：亚洲人习于使人讨厌的迷信；天主教徒

想奴役人类；犹太人处在新教徒天堂与天主教徒 27
地狱的中间地带①；信奉世俗信条的人受到布道坛和新闻界的辱骂和迫害；对不信宗教的人要促使他们想到自己在法庭上证词不甚受人听信的不利条件，而当他们来到最后审判的神座面前时，甚至还要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牧师们和《悉尼新闻》又极力主张教育青年，挽救他们免受父母的不良影响，并且使他们为永远得救作好准备。在牧师们看来，读书识字的目的就在于认清到达永远光荣的道路。要鼓励把知识作为不道德行为的敌人，而不是首先作为学习一门手艺的手段。在菲利普任总督时，理查德·约翰逊牧师就已经开始设立学校。随着殖民区的扩展，教会和政府设法在每个教堂办一所教区学校，教儿童学习朗读和算术，阅读圣经，学习英国教会所订的教义问答。这些学校是不道德行为和邪恶举动的敌人，同时也是劝诱人们改信英国国教的中心。天主教徒为此感到伤心；长老会教友和不从英国国教者则接

① 地狱的中间地带，旧译作“地狱的边缘”，是基督教用语，说凡是未受洗礼的儿童、邪教徒、白痴者等死后灵魂到这个地方，是处于天国与地狱之间。——译者

受了世俗的启蒙思想。

正是由于新教徒对他们自己的文明抱有这种无条件的和不加批判的信念，他们和土著居民的关系才增加了悲哀的成分和悲剧的情调。他们期望土著居民会感谢“高等文明”的珍贵礼物；只要土著居民表示准备接受这种礼物，殖民者就打算遵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对他们采取友好亲切的态度。然而，当土著居民一旦知道白人要在这里长期呆下去，并且眼看着白人不断侵占他们最好的粮食采集地区，把他们赶到荒芜的地点，同时还亵渎他们全族自古以来一直奉为神圣的那些树木和动物，他们就开始发动一场持久的、力量悬殊的战斗，抗击白人。他们刺杀白人的牲口，焚毁他们的庄稼和房屋，并且杀害白人。1788年5月30日，有两个割灯心草的白人被土著居民杀死了，尸体也被砍碎，血肉模糊。土著居民对白人文明的某些特征也逐渐表示厌恶和憎恨。1791年，有一名犯
28 人盗窃了土著居民妇女的用具，被发觉了。菲利普决定在土著居民的面前鞭打这个犯人，借以证明白人的法律对黑人和白人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所有在场的土著居民都对这种惩罚表示了强

烈的厌恶，反而同情受难者。他们掉了眼泪，有一个土著居民还捡起一根棍棒吓唬执刑人。

同时，欧洲人对土著居民了解得多了，他们心目中的友好亲切的观念也就淡薄起来了。土著居民的本身习惯，以及他们周身的污秽、苍蝇和臭气，都教欧洲人感到厌恶。土著居民懒惰，既没有能力也不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摆脱物质上的肮脏处境，这也教欧洲人感到恼怒。土著居民对于和白人一起的同族，都给以残酷无情的惩罚，使欧洲人也感到震惊。1796 年，有一个土著居民的少女在欧洲人家里当女仆，竟被她的同族人诱到森林里砍成碎块。

欧洲人对文明在土人身上产生了悲惨的效果也觉得吃惊。很多土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酒鬼。为了搞到一瓶兰姆酒，得到暂时的满足，他们可以相互搏斗、跳舞，什么都干。库克曾以那样的热情来描述的高贵的野蛮人，在市镇里已经堕落为乞求烟酒[8]的叫化子。在乡村中，他们变成了纵火犯和杀人凶手。因此，白人也开始采取报复手段。一次，一些土著居民在豪克斯布里河岸焚烧了白人移民的房屋，杀死几个移民；其他移民就把两个土

著居民抓起来，用绑狗的绳索把他们绑在树上枪毙了。这是 1800 年的事。到了1806年，哪里发生了暴行，总督就派士兵去到那里把土著居民赶走，这已经成为常例了。霍巴特镇和达尔林普尔港的移民对土著居民在市镇酗酒堕落，在乡村杀人抢劫也有同样的经验。因此，特别是移民，其次是官员，大家都不再谈什么友好亲切，而是越来越多地谈论天赋的种族特性了。《新约全书》的教导已为《旧约全书》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条较为原始的摩西律所代替。前者鼓吹要怜悯一切人，
29 后者说，在报复行动中，不应该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正在被歼灭中的那些人。

到 1804 年末，爱尔兰人被镇压下去了；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土著居民使用石器时代的武器对抗刀枪大炮，进行绝望的搏斗；犯人们平静无事；法国人也无力威胁英国文明在澳大利亚的前途。可是，1808 年 1 月，悉尼湾这个小小的殖民区却突然由于内乱而发生震动，总督被解职。这个被解职的人就是威廉·布莱上校。布莱于 1806 年继金总督后就任总督兼驻军司令官。他是一个留意人生大事的人，但是无比的愚蠢使

他丧失了荣誉和光荣。有人把他写成小农场主的支持者，特别是支持豪克斯布里流域的释放犯农场主，反对大地主。也有人认为他企图禁止以兰姆酒为交易媒介，为了这个光明正大的企图，他付出了代价。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双方都有自己的代表：商人罗伯特·坎贝尔支持布莱，而商人西米恩·洛德却支持造反派；有些地主支持布莱，有些却支持造反派；有两个文官仍然忠于布莱，其他却参加了造反派的活动。

引起激变的关键在于布莱的个性。他是英国海军军官，在库克于1776至1779年第三次航行中，他曾在库克领导下工作。当他指挥“邦特号”前往塔希提岛采集面包树果实时，一部分水手曾被他的天大怒火迫得铤而走险，在塔希提附近海域发动叛变，把他和其他几个人放在一只舢板上。布莱一辈子都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由于这个盲目性，他竟把这次叛变归因于发动叛变那些人的肉欲。这种他自己不能控制的怒火就是他在新南威尔士被迫解职的原因。在新南威尔士，他又象在“邦特号”船上那样，再一次愚蠢地激怒了那些睚眦必报的人。他对麦克阿瑟发怒；他把西米恩·洛

德降级，宣判他回复到重罪犯人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乃是他献出了所有才干和勤劳力图永远摆脱的；他用粗俗、猥亵的语言向官员们训话。他就职还不上一年，就被称为加力久拉①。就在那个时候，他对待反对派的傲慢已经使他们开始谈论他
30 的暴政了。从1807年11月到1808年1月之间，他曾吓唬殖民地六名高级军官，说要逮捕他们并控告他们犯叛国罪，这样他就使形势更对敌人有利。

1808年1月26日照例是军队开怀畅饮庆祝殖民地成立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约翰·麦克阿瑟诉请高级军官陆军少校约翰斯顿在总督官邸逮捕了布莱。就在这一座总督官邸里，他曾沉醉于他所酷爱的浮华虚饰，这天晚上他却成了阶下囚。布莱暴跳如雷，但没有一个人肯去救他。然后，他以无比愚蠢的行动开始把那些可能帮助他的人一个个疏远起来，首先是矮胖的福沃，其次是易得痛风病的佩特森，最后是范迪门地区的副总督戴维·

① 加力久拉是公元37—41年的罗马皇帝盖约·凯撒的绰号，是“小靴”的意思。他以奢侈、残酷、任性著称，结果被暗杀。——译者

科林斯。布莱讨好科林斯的方法竟然是把一个支持他自己的人缚在德尔温特河口“波尔波伊斯号”的起重架上，加以鞭打。1811年，英国军事法庭对叛乱者从宽处理，约翰斯顿被开除军职，对麦克阿瑟实行强制流放。从这里可以看出，甚至那些不惜以在欧洲和国内所有的一切为赌注，力争维护现行秩序的人也觉察到布莱的致命缺点，这一缺点之严重，使那么多的人对一个勇敢而有才干的人绝不宽容。

从布莱被迫解职到麦夸里到任这段期间，由三个代理行政长官——约翰斯顿、福沃和佩特森——的举动可以迅速看出造反派是不懂策略的。尽管他们作出了要给支持者授予官职和土地作为报酬的样子，但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象布莱后来控告他们那样，即大慷公家之慨，不负责任。布莱对于新南威尔士社会也没有经久的影响，因为他除了鼓励发展农业和以吵吵闹闹的方式（并且有点不合理地）反对贸易和饲养绵羊之外，并没有创造者的天才。在他在职期间和去职后青黄不接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悉尼和帕拉马塔社会上层分裂为敌对的派别。布莱的继任者奉命结

束这种分裂，但新南威尔士的派别不是任何人力所能消除的，因为它是从人心的黑暗面发展起来的。

三、麦夸里时代 31

（1810—1821年）

为了调和这些派别，端正移民们的品行，彻底消除以兰姆酒为交易媒介的祸害，以及恢复殖民地的平静状态，英国政府于 1809 年任命拉克伦·麦夸里为新南威尔士及其属地的总督兼驻军司令官。当时他四十八岁，是英国陆军中校，曾在世界上四大洲服役。他对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文明的观察，使他坚信英国制度和新教的优越性。在智力和勇气方面，他都有非凡的天赋，尤其是他生来有个倾向：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把它看作十分重要的工作；他所建树的全部功业，不单表现他的勤劳，同时也是虚荣心的纪录。他生来就有热情和高尚品格，所以由他来打扫新南威尔士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 是最适宜的。

①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没有打扫，后来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指极肮脏、极污臭的地方。——译者

1810年1月宣誓就职之后，麦夸里“精力充沛地、生气勃勃地”说明了他要坚持严正不阿。他希望一切纷争和猜忌永远终止。他号召上层阶级在行动上要遵守礼节，公平正直，下层阶级不要酗酒。他劝告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宗教义务，星期日经常守礼拜。他号召知事们要防止一切恶习和不道德行为，并且告诫大家不要作弄土著居民。最后他说，忠实的、稳重的、勤勉的居民终会“发现他
32 是朋友和保护者”。群众报以三声欢呼，然后乐队奏«主佑我王»①。

在几个星期内，他就采取了一些端正居民品行的初步措施：禁止亵渎安息日，规定酒馆在礼拜时间停止营业；削减领有执照的酒馆的数目，借以减少放荡、浪费和懒惰。他发布告示，禁止当时正在殖民地泛滥的伤风败俗的姘居丑行。他采取各项措施减少酒类贸易并削减下层社会对酒的消费。他在悉尼和外围各定居区增设学校，用他信

① «主佑我王»是英国国歌。澳大利亚一直沿用«主佑我王»作为国歌。1973年1月26日，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在庆祝澳大利亚国庆节的广播讲话中宣布，将用一首澳大利亚新国歌来代替英国国歌«主佑我王»。——译者

奉的原则教育年青一代——他相信只有这些原则才能使青年一代孝顺父母，正直忠实，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和良好的基督教徒。

出于同样高尚的道德意图，他开始大搞公共工程。他着手筹建一所新的医院，办法是由一个集团①承担一切费用，允许他们享有三年兰姆酒进口专利权作为报酬。他盖了一座新兵营，修建了不少道路和桥梁。一方面由于讲究美丽堂皇，另一方面也由于相信清洁整齐可以端正下层阶级的品行，他下令制订悉尼的新城市规划。为了把文明的外观推广到外围各定居区，他命令每个地方都要划定城市规划区[73]，每个城市规划区要有教堂、学校、法院各一所，以便把那个地方从野蛮提高到文明。

为了促进罪犯和前犯人改变生活方式，他抓紧时机向他们表明：正直和经过长期考验的善良行为可使释放犯恢复因犯罪而丧失的社会地位。他十分体贴地邀请四名释放犯到总督官邸和他一同进餐，他任命释放犯安德鲁·汤普森为豪克斯布

① 按指西米恩·洛德、达西·温特沃思和加纳姆·布拉克塞尔等三人。——译者

里的治安推事兼知事，他宣布准备一有空缺就任命释放犯富商西米恩·洛德为知事。3月31日，他
33 在《悉尼新闻》宣布任命马斯登牧师、西米恩·洛德和安德鲁·汤普森为由悉尼到豪克斯布里的税道公路的管理委员和监督官。马斯登牧师相信英国上司不会同意自己与前犯人共事，特别是象汤普森和洛德这样以女犯为妾的人。他两次会见麦夸里，坚决拒绝接受这项任命。在第二次会见中，麦夸里大发脾气，他叫喊说，马斯登幸亏是一个文职人员，否则早就要以不服从罪被送交军事法庭了。马斯登认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一定要服从上帝的命令；而麦夸里则认为在殖民地的每个人都要服从他。这样，麦夸里在他的高尚品格得到充分表现的同时，也暴露出会使他走向毁灭的弱点。

在1811年和1812年两年间，麦夸里的努力似乎正在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英国，出版界、议会和政府机关都有关于赞扬殖民地宗教生活、道德和教育各方面获得进步的报道。下议院一个关于流放问题的委员会对他的工作做了如下的总结：“……新南威尔士殖民区……据他们看来，完全可以符合殖民区创立时所提出的目的”。同时在这

个殖民区也洋溢着同样的乐观情绪和狂热气氛。1813年1月，在庆祝殖民区成立和他就职的周年纪念的宴会上，人们举着满杯向麦夸里总督祝酒："愿他就任总督的周年纪念永远受到崇敬，直到我们遥远的后代！"那时正是他在新南威尔士执政的太平年代。

就在这一年，布拉克斯兰、温特沃思和劳森三
人确信一定会发现新牧场来适应牛羊数目日益增
长的需要，他们探出了一条越过悉尼湾定居区西
边蓝山山脉的通路。他们于1813年出发，一直沿
着山脊前进，直至到达布拉克斯兰山峰。据他们
中间一个人的记载，他们在山峰上突然看到了一
望无际的平原，就象狂喜的以色列人当年看到迦
南①时一样。于是，他们回到悉尼，报告了行程经
过。同年年底，麦夸里又派伊万斯越过蓝山山脉
做了一次更深入的勘查，然后在第二年就开始修 34
筑一条越过山脉的公路。1815年5月他亲自视察
这个新地方，选定了建设新市镇的地点，并用伦敦

① 迦南是希伯来人对巴勒斯坦所用的名称。以色列人看到迦南的典故，见于《旧约全书·民数记》第13章。书中说摩西打发去窥探迦南的人回报，"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里借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发现美好地方时喜悦的心情。——译者

殖民大臣巴瑟斯特的名字作为它的地名。他立刻看到，这个新地方的发现，为未来一百年间人口增加提供了出路，因为当上层阶级绅士们在牧草丰盛的地区取得广大的赐地的时候，那些稳重、勤勉的中间阶级人物也可以在这里取得每人一百英亩的土地。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块新地区的情况，他于1817年派遣约翰·奥克斯利作一次顺拉克伦河而下的航行，但结果却使奥克斯利大失所望。奥克斯利发现那里是一片干燥坚硬的土地，无从建立哪怕是最初步的文明。他对于能否找到那些内陆河流的河口，也同样感到失望(一些乐观主义者曾经希望这些河流是注入一个内海的，要是那样，就可以为勤劳严肃的英国文明的子子孙孙提供财富)。看来拉克伦河的终点，在雨水充足年份是湿地和沼泽，而在旱年则是干涸的河床。但是在归途中，他却在巴瑟斯特附近的麦夸里河流域发现了有发展前途的牧地。①

1818年，奥克斯利再次出发，沿麦夸里河前行，企图找到河口，但他见到的还是沼泽或干燥的

① 参见本书第88—89页地图3。——译者

平原，并没有找到内海。在他向海岸的归程中，他看到了肥沃的哈斯廷斯河谷，感到满怀喜悦；而到旅途结束时，又见到麦夸里港的美丽的环境，有热带植物和深蓝海水，同样使他心旷神怡。1817 年至 1819 年间，思罗斯比、怀尔德和年轻的汉密尔顿·休姆探查了卡姆登西南直到雅斯—堪培拉的马兰比季河和南海岸的杰尔维斯湾等地方。到 1819年，已经有充分机会来扩展巴瑟斯特的定居区，例如沿亨特河谷到达帕特里克平原和瓦利斯平原，或在莫斯—维尔、古尔本和堪培拉等地区，或沿南海岸由伊拉瓦腊到杰尔维斯湾。

当时麦夸里继续致力于把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从野蛮状态提高到文明水平。1814 年末和 1815 年初，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解决开化土著居民的问题。他的目的不仅要保护他们免受白人的侵 35
犯，而且要教育他们养成勤劳和讲究礼貌的习惯，好使他们抛弃他们生活方式中的懒惰和肮脏，并且加入两个殖民区的劳动者的行列。他决定在帕拉马塔开设一所教育土人子女的学校，并在杰克逊港海岸设立一个成年土人的农场。但是六个男孩和六个女孩的父母企图诱使他们的子女离开帕

拉马塔学校，因为他们仍旧和从前一样强烈反对文明人的生活方式。1815年以后，麦夸里每年都出席庆祝土人学校成立的纪念仪式，这时学童就表演他们在朗诵和书法方面取得的进步。人们向麦夸里欢呼，土著居民则得到丰富的牛肉、马铃薯和酒的款待。土著居民的首领们突然大笑起来，一下子跳到半天高，并作出其他种种狂野的动作，——《悉尼新闻》说这是“粗野本性的自然流露”。到了1818年，《悉尼新闻》差不多以救世主的心情预言土著居民终有一天会不只是充当白人的厨役。但事实的发展却与此相反。在帕拉马塔的学校里，在学的人数从来未超过二十人。在市镇里，土著居民始终是学童和成年人开无情玩笑的对象。在悉尼、帕拉马塔和霍巴特镇有一种很流行的娱乐，那就是怂恿喝醉了的黑人互相砍杀，以供白人旁观者取乐。在乡村地方，土著居民对于侵占他们土地的人用尽办法报仇雪恨，而白人则反过来进行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麦夸里在增进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欧籍居民精神上的幸福方面有较大的成功。在1811年到1816年间，他在利物浦、温泽、里奇蒙德和威

尔伯福斯建筑校舍，以保证把宗教教义灌输到青年一代的心里。1815年，他着手推动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①的工作，因为他和协会的创办人同样确信圣经的神圣教导能够改变最野蛮的习惯并增进世间的幸福。为着同样的原因，他推动主日学校运动②的工作。这样，在麦夸里的影响下，在殖民大臣巴瑟斯特的全力支持下，福音派在新南威尔 36
士社会取得了优势。总督、首席随军牧师塞缪尔·马斯登、军法官E·本特、J·怀尔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全是善良的福音派。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并且由于F·H·格林韦的才能，利物浦和温泽的教堂建筑起来了。格林韦是犯人建筑师，他吸收了摄政时期巴斯城建筑③的气派，所设计的教堂体现了福音派新教徒世界观的真正精神。教堂的大

① 圣经协会是新教徒出版和分派新旧约圣经的组织。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创始于1804年。——译者

② 主日学校是礼拜日教青少年和其他人学习圣经的学校。英国主日学校运动是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发起的。——译者

③ 巴斯城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城之东。十八世纪英国建筑师约翰·伍德等在此城设计了许多建筑物，其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十九世纪初的摄政时期。——译者

圆顶、陈设简朴的内殿和古典式的外部匀称比例，在在都引起礼拜者沉思上帝的伟大和全能，免除了天主教徒认为对崇拜有适当帮助的许多附属物，如雕像、华丽的祭袍、悦耳的音乐、烧香和祈祷时的姿势等等。他们的文明更明确地带上了新教徒和福音派的调子，这从布道坛、学校、出版界以及教会建筑物都在在表现出来。

正当麦夸里功业的永久纪念碑逐渐建成的时候，命运和他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使他在殖民地的最后几年闹了别扭。他越确信自己的态度公正，他就越爱对别人的弱点吹毛求疵。陆军中校托马斯·戴维是1810年戴维·科林斯去世后范迪门地区的副总督，他费了不少精力来对付丛林土匪[16]和土著居民的劫掠，并且为部队准备了足够的营房，为富人盖了一所医院。但戴维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本地人叫他做“疯狂的托姆”。他经常在阿盖尔街的“到手鸟”酒吧和犯人饮酒过量，不穿外衣在街上行走，用教名叫所有的人，还公然与女犯人同居，使他的善于忍耐的妻子也深感痛苦，并在霍巴特镇少数有体面的家庭中引起了公愤。当麦夸里听到戴维浪费许多时间同最下

贱的人一道喝酒并干出种种堕落腐化的勾当时，建议罢免戴维；在他与巴瑟斯特关于戴维的前程的所有通信中，只字不提戴维的功绩。

当悉尼上层人物反对麦夸里偏袒释放犯的政策时，麦夸里觉得不能承认他们这种做法和他自 37
己保护释放犯一样，都是出于高尚的动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行动是激于义愤的，而他的反对派却都抱着卑鄙无耻的动机。他说，他自觉有宽厚精神，这使他鄙视他们的褊狭心肠。他不健康地只注意到一切反对释放犯的人在品性上的缺点，但对于支持他的人在品性上的缺点则毫无所见。有一名释放犯是一个伪君子，无耻地伪装虔敬以提高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但是在麦夸里的眼中，他竟然成了一个例子，证明对品行良好、经受考验的人，恢复他们因犯罪而丧失了的社会地位是明智之举。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义的，而反对派是非正义的或者是恶意的，这个致命的弱点使他与殖民地的高级文武官员极不得体地争吵起来。

军法官埃利斯·本特告诉麦夸里说，不应该不顾社会上头面人物的反对，硬要释放犯充任官职或进入上流社会，而任命一个道德和社会地位

可疑的人物——例如西米恩·洛德——充当知事，那是贬低了知事的身分。麦夸里认为本特的立场是卑鄙的忘恩负义，辜负了自己对他一向的礼遇和恩惠。但是本特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麦夸里要军法官自甘扮演一个属僚或一个无关重要的角色；他却认为司法官应该独立于政府行政机关之外。联队的官员们往往在吃饭时嘲笑麦夸里的释放犯政策，有一名官员在守卫室墙上钉了一幅漫画，对麦夸里进行污辱。官员们谢绝到总督官邸赴宴。他们拒绝同身分卑微的人待在一起，并明白表示以此自豪，甚至希望离开这个与军人感情格格不入的地区。这一切激怒了麦夸里——这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军官们在社交原则上骄傲自大，而是由于他们对麦夸里本人拒不服从。

当马斯登在释放犯政策方面拒绝合作时，麦夸里把他形容为一个用人道和伪善的宗教外衣打
38 扮起来的心怀恶意的人，并且把马斯登的反对看作冒犯他自己的权威。1818年初，麦夸里把马斯登召到总督官邸，他提醒这位随军牧师说，总督无可推诿的职责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崇高身分，维护他的权威和地方安宁。之后，他命令马斯登以后

非有公务不得足踏总督官邸。

早在两年前，殖民区中那些自认为受了麦夸里欺压的人们就写过一份请愿书，交由维尔牧师转呈英国下议院。他们控诉麦夸里任意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未经知事下令径行鞭打自由人，出卖赦免证，破坏婚姻，干涉法院。麦夸里曾经严厉指斥这个行动，认为这是卑劣的派别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事情也确是如此。比较聪明的人也许会适可而止，不再计较了，但是麦夸里却不是这样。他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害，因而他从那时起就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声誉辩护。

正当他可以在殖民地事业上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充沛精力和热情的时候，他却全神贯注在个人的荣誉和权力上面。1817至1819年间，因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海运畅通，同时不列颠群岛又出现了战后的社会动乱，从而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的罪犯人数急剧增加了。仅在1818年5月一个月内，就有五艘罪犯船到达悉尼。麦夸里相信移民们不愿意雇用犯人，因而认为政府不得不养活和雇用他们。在悉尼，罪犯们被派建造一所犯人营房和一座最高法院法官的住宅；在温泽

和利物浦他们则被派建造新教堂。这样，政府的开支就大大增加了。后来的澳大利亚人承受了格林韦设计的温泽和利物浦教堂的光荣和荣誉，可是麦夸里当时只想到，在悉尼新建的犯人营房由于防止了夜间抢劫、盗窃及其他劫掠行为将会如何端正犯人的品行。

同时，随着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经济的
39 发展，它们离开原来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它们原来是作为惩戒和改造英国罪犯的大监狱而设立的）。1817 年，商人和较富有的移民联合创办了新南威尔士银行。两个殖民区的贸易都增加了；羊毛源源不断地由悉尼输往英国；鲸鱼油和海豹皮也都是成功的输出品；腌猪肉、檀香和海参的贸易获利越来越大。新南威尔士的移民在亨特河地区，在巴瑟斯特地方，在卡姆登西南朝向莫斯一维尔地方，并沿着南部海岸由伊拉瓦腊至杰尔维斯湾从事耕作。在范迪门地区，定居区由霍巴特镇沿着德尔温特河谷扩展，人们还计划利用该岛西南海岸的麦夸里港盛产的澳洲泪杉[41]。到了1819 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是二万六千零二十六人，其中犯人占九千九百八十六人，即 38.3%；同

年，范迪门地区的人口是四千二百七十人，其中犯人占二千一百九十人，即47.1%。据当时的一些估计，在这两个殖民区的居民中，犯人及其子女共占四分之三以上。

1819年1月和2月，悉尼商人在约翰·贾米森爵士的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他们自己和殖民区的前途问题。他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请求废除殖民地政府中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殖民地起源于罪犯流放地而产生的）。他们公然抨击军法官法庭，说他们违反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一切习惯、感情和主张。他们要求设立陪审制；他们认为，如果印度人、霍屯督人①和黑奴都能享有这种权利，那么他们作为英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孙，当然也配享受这种权利。他们在请愿书里面用了大部分篇幅集中谈到了一个问题，即为了积聚更多的财富应该采取哪些手段；他们需要市场以销售谷物，他们希望撤销禁

① 霍屯督人是南非洲的原始民族，包括两个主要部族，即科伊科伊族（Khoikhoi）和布西门族（Bushmen）。据说这两个部族在语言方面都有共同的刺耳的和吸气时的发音，因此早期的荷兰殖民者叫他们做霍屯督人，即“急促而含糊的说话者”的意思。——译者

止载重三百五十吨以下的船只往来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法规，也希望废除征收诸如羊毛和鲸油等殖民地货物输入英国的关税。他们希望英国承认，
40 人数众多并迅速增加的殖民地居民在生活习惯上和母国人民一样良善，一样严肃。同时麦夸里本人也向英国政府建议，接受原来弗林德斯的主张，把整个大陆叫做澳大利亚。

来自英国的观察家注意到本地出生居民在外貌和语言方面渐渐和移民有所不同。土生小伙子[25]个子高，四肢细长，肤色洁白。他们能够胜任笨重的体力劳动，但多少有些迟钝。在气质上，他们虽然不会记仇，但容易发怒。在语言方面，他们大多数都模仿他们犯人父母讲的下流社会粗言隐语，并且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发音。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既然澳大利亚是一个罪犯殖民地，这里的财富和文明又是流放罪犯劳动创造的，那么，它就应该归流放罪犯和他们的子孙所有，那些移民和移入的自由劳动者都是他×的外国佬。本地出生居民的这种仇外情绪是后来长期出现独占所有权主张的最初的一种，也是后来“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或“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等口号的先声。

狂热的爱国主义助长了这种情绪；后来，一种憧憬——以为本地出生居民在一个没有承袭旧世界的社会阶级、战争和贫困等等罪恶的国度里可以大有建树的憧憬——也助长了这种情绪。正是犯人子孙的这种仇外传统后来使澳大利亚的世俗人道主义具有一些特殊的偏向。

可是在麦夸里时代，文明的调子仍然是由福
音派来定的。出版界和布道坛发出警告说，醉汉、
调戏妇女者、赌徒和懒汉在现世得不到富裕和社
会地位的奖赏，而在来世，懊悔将成为他们的惩
罚，永劫将成为他们的恐怖。本地出生居民闭口
不谈他们对不列颠群岛的继承关系，而那些为新
教徒优势地位辩护的人们却以身为英国人自满自
夸。«悉尼新闻»在赞美他们是英国人时写道："伟
大而不可思议的神啊！一切幸福的主宰啊！我们
多么感激您拯救世界的神力啊！"本地出生居民渐
渐对他们的自然环境感到自豪，并且以一个爱慕 41
者的眼光而不是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它，
而那些为新教徒优势地位辩护的人们却依照早期
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传统，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一块
极端荒芜的土地。曾任最高法院第二任推事的澳

大利亚早期诗人巴伦·菲尔德①说

……出现在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当时这块地方就受到神的诅咒；——

一片不结果实的树林啊！

到麦夸里时代将近结束的时候，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渐渐公开听到了对澳大利亚文明发展有影响的另一种世界观的声音。1820年5月，J·J·特里和P·康诺利两位神父从爱尔兰来到这两个殖民区，主持天主教会的工作。他们不是最早来到这个次大陆的神父，因为在1798年爱尔兰动乱时期，已经先有三名神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17年，奥弗林神父来到新南威尔士，因为没有国务大臣的正式证明文件，立即被麦夸里赶走。他所以触怒麦夸里，除因没有证明文件之外，还因为他对新教牧师粗野无礼，而且主张圣餐面包具有神秘的力量。特里和康诺利的到来，保证了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继

---

① 巴伦·菲尔德（1786—1846），律师，1817年2月来到澳大利亚，任最高法院推事。他对文学也很有兴趣，是一个戏剧评论家，又是诗人。这里引用的诗句，见他所写的《袋鼠》一诗。——译者

续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教育，这些人在进行关于仁慈、怜悯、敬事上帝和保持神圣信仰的教导中，不时把这些理想和他们的尘世愿望混淆起来，正如新教徒信仰创造天地的上帝这种宗教感情也不时和英国人的尘世感情混淆起来一样。新教徒嘲笑天主教徒生活标准低，对神父俯首听命，迷信，在礼拜祈祷时追求庸俗的华丽装饰。天主教徒认为新教徒使基督教世界陷于分裂，新教徒举行的宗教仪式和天主教的富丽仪式比较起来黯淡无光，并且好象要把一部分上帝子女判处永远低下的社会地位，他们为此感到悲伤。因此到麦夸里时代末期，澳大利亚在对待人及其命运这个问题上存 42
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彼此对立。

当时关于殖民地情况的各种荒唐传说也开始在英国传播开来。对麦夸里不满的人尽力使伦敦抱有相似见解的人们相信，这个总督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暴君。比较负责的官员担心不列颠群岛犯罪人数的增加，也怀疑流刑制度在防止犯罪上的功效。为要了解确实情况，1819年下议院任命了一个调查监狱状况的委员会。殖民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凡要

求离开本国的人们都希望获准移居新南威尔士。

那么流刑还怎么能够成为联合王国罪犯畏惧的对象？它不是已经丧失了作为一种刑罚的功效吗？1819年，巴瑟斯特任命约翰·托马斯·比格为调查委员，对流刑作为一种刑罚是否失效提出报告。他还奉命提出关于殖民地全部官员情况的报告，包括职位最高的文武官员和圣职人员。他还要就下列事项提出报告：主张恢复严刑的理由；改良宗教和教育的可能性；在殖民地发展农业和商业的种种利益；允许原犯人进入上流社会是否适当。实际上，这是要求比格提出关于澳大利亚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主要作为惩罚和改造英国罪犯的监狱呢，还是作为利用犯人劳力开发富源的殖民地。比格当时三十九岁，是学校出身的律师，唯一的经历是做过几年特立尼达的审判长；他赞同用奴隶和犯人来为农场主创造财富，很可能就是受到这种经历的影响。麦夸里当时五十九岁，已经在世界四个地区为英王服务了三十年以上。从1819年10月比格到达悉尼时起，由于两人年龄和经历的差异，麦夸里就和比格开始发生重大的分歧并使他抱恨终生。

1819年10月至1821年2月间，比格在周游新 43
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期间，从两个殖民区的居民中搜集了许多口头的和书面的证明材料。他几乎一到澳大利亚就听到许多人谈论麦夸里如何挥霍无度，对待释放犯的政策如何失当，以及麦夸里如何因性情怪僻以致与新南威尔士高级官员经常产生矛盾。比格有小说家的天才，在他与巴瑟斯特的私人通讯中，他以广阔的理解力和对各种观点的同情心，把殖民地社会的一些人物勾勒下来。他听得最多的是移民的叫嚷，要求得到更多的罪犯。马斯登牧师告诉他说，如果政府把最有经验和最好品质的犯人供给牧场主，绵羊就会成为国家财富的无限泉源。据另一个移民告诉比格，在麦夸里的体制下，情况却与此相反，大部分罪犯被留供政府使用，耗费了巨额的公款。

麦克阿瑟向比格说明，英国关心犯人的改造，而移民们则对罪犯的劳动力感到兴趣，这两方面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就是饲养牛羊所需的劳动也可以达到改正坏习惯的目的。牧人孤独地在乡野中度日，这样他就有时间沉思反省，从而走上改造生活方式的道路，并且不会再象在市镇里那样，看

见眩目的情景，听到诱人的声音。他向比格提议，英国政府应该对拥有资金的人授予每人不少于一万英亩的土地，使他们成为有势力的贵族。这个建议与当时的民主情绪成了对照。他断言，由于麦夸里总督采取了荒唐有害的政策，这种民主情绪已在殖民地根深蒂固。按照麦克阿瑟的办法，犯人将为移民生产羊毛；英国制造商会购买这些羊毛；犯人会得到改造；而新南威尔士就会发展成为种植园类型的社会。

从比较富有的释放犯方面，比格听到了关于他们在法律上的苦痛，关于他们对新南威尔士财富的贡献，并听取了他们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
44 犯人殖民地，它的发展前途和所有权应归他们掌
握。比格还听到殖民地流传的各种闲话、个人仇怨、彼此倾轧，以及疯狂的托马斯·戴维对正直而吹毛求疵的麦夸里不满的各种原因——总之，他听到了两个社会中一切琐屑的争论。他耐心而郑重地倾听一切。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一心注意新南威尔士这个殖民区的主要问题。

他返抵英国后，在 1822 年和 1823 年发表的三个报告中，再三强调这些问题。他建议说，用犯

人牧羊，对于一切犯人（最顽固的犯人除外）的进步和改造都会有很大帮助；那些最顽固的犯人应该流放到莫尔顿湾、克提斯港和博恩港去。对其他犯人，他建议废除麦夸里实施的罪犯制度的主要特征。他建议刑罚宁严勿宽，限制假释证持有者的特权，并废止将土地授予释放犯的办法。他建议结束麦夸里任命释放犯担任机要负责职务的政策。在比格看来，麦夸里受了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比格自己则关心社会安定；他不能不认为，提拔一个象西米恩·洛德那样家庭生活声名狼藉的市侩，只能使那些对法律的威力与尊严早已无所感觉的人们更加轻视知事的身分。

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将来制度问题上，比格也是一样保守的。释放犯吵吵闹闹要求设立陪审制，并要求有一个立法会议，他们的理由是：这些都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自由制度对他们的物质财富有所帮助。他们还坚持说，他们的财富和行为早已值得使他们取得有用的和可敬的公民身分了。可是比格却只重视他们要求在得到解放后恢复自由人法律上的权利的理由。至于陪审问题，他认为把自由人的生命或财产交

由前犯人组成的陪审团审理，那是很不适当的，而
45 且也是危险的；罪犯的子女要先受过教育，然后才能作为英国人享受他们的天赋权利。他认为殖民地司法制度必须修改，但是不须根本改革。不过，他也确曾建议允许范迪门地区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

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麦夸里的继任者布里斯班奉命废除旧的罪犯制度的多数特征，并尽力使犯人和大部分居民分离开来。1823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改善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司法条例，规定成立立法会议，成员五人至七人，均由英王任命。根据这个条例，创制权仍由总督掌握，总督也可以不经立法会议同意自行公布法令，但是要用书面说明理由。总督要把每项法案提交审判长，由审判长核定它是否同联合王国的法律相抵触。为了保持联合王国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条例规定在任何法令制定后三年内，英王有权加以驳回。审判刑事案件要经过总检察长起诉，一切事实问题要提交七名受委任的海军或陆军军官组成的陪审团。总督有权颁发赦免状，恢复被褫夺公权的重罪犯所丧失的全部法律上的

权利。国王受权在范迪门地区成立与新南威尔士分开的殖民区。根据这一系列的行政决定和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政府宣布过去一直被视为犯人收容所的新南威尔士，将从 1823 年起，获得英国殖民地的待遇。

殖民地的舆论热烈欢迎条例中所许诺的改革。麦克阿瑟感到高兴，认为这些改革已使他在英国的儿子非常愉快，使他本人得到很多土地。马斯登牧师感到高兴，因为象他写下来的那样：上帝已经“把他的篮子装得满满了”①。当时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年轻的温特沃思在一首诗里预言会有这么一天，这时罪犯的污点被忘记了，而澳大利亚也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新不列颠。只有一个人极为痛苦，那就是麦夸里。由于人生中的一个讽刺，
这个在澳大利亚从监狱向殖民地过渡期间主持政 46
务的人，这时候他关心为自己的声誉辩护却比关心新南威尔士的前途为重。象多数人一样，他不能得到他最迫切追求的东西；他在忧伤抑郁中去

① 装满篮子的神话，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5 章。该书说几个饼、几条鱼给几千人吃饱后，剩下来的零碎还装满许多个篮子。其中寓“受惠无穷无尽”之意。——译者

世，却并不知道后代会奉献给他一件比敌人的咒骂更为经久的礼物——澳大利亚之父的称号。

四、过　渡 47

（1821—1831年）

比格建议废除旧的罪犯制度，用牧农来代替，牧农把罪犯的劳动所得据为己有，作为对指派给他们当仆役的罪犯进行改造的报酬。正如社会发展往后形成的格局往往为创始者始料所不及，从旧的罪犯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也并不都照比格的建议进行。在1821年到1831年间，殖民地的经济权力为移民大亨和商人所掌握，而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政治、社会权力也逐渐落到他们手里。但是，这一切事情都是在混乱状态中出现的，而且受到了吵吵闹闹的派系斗争和私人纠纷的干扰，因而大家很容易认为这场转变是出于偶然而不是人们的意图。

过渡是从罪犯制度的彻底改革开始的。布里斯班于1821年12月继麦夸里任总督，他奉令把所有可能改造的罪犯从市镇迁往乡村，将他们分

派给移民，在那里他们将可以摆脱一切邪恶的诱惑和污染。同时政府也得以省掉供应犯人衣、食、住的全部开支。不堪改造的罪犯则被遣送到纽卡斯尔以北的麦夸里港或莫尔顿湾（即现在布里斯班市所在地）。随后，由于发现莫尔顿湾不适宜用作罪犯流放地，布里斯班总督又奉令重新占领了诺福克岛。

同时，引起罪犯制度改革的各种因素消除了，把土地授予释放犯和服刑期满者的办法废止了。
48 有人警告布里斯班说，如果他不把释放犯与移民区别对待，他就可能引起自由居民的强烈不满。又有人劝告他说，他应该使释放犯充任公职同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困难。这样一来，释放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上进道路都被堵塞了。英国政府决心不让新南威尔士社会为派系斗争所动摇（这些派系斗争是由于新南威尔士的前身不幸是一个罪犯流放地这一偶然事件而引起的），于是决心不让所有象西米恩·洛德、雷德芬或塞缪尔·特里① 一类人物将来有立论的根据。对充军地的

① 西米恩·洛德，见本书第二章。

威廉·雷德芬是外科医生，1801 年被判终身流放罪来到澳

犯人不容过于宽纵，其生活水平不应超过联合王国的罪犯待遇。他们希望社会不为释放犯与移民之间的怨恨、恐惧和猜疑所扰乱，但却没有考虑到下列因素：如一些释放犯活得很长；他们的儿女的家族感情；移民对释放犯及其子孙表现骄傲自大等等。这些都是使殖民地的每一个社会问题受到罪犯问题干扰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范迪门地区，释放犯拥有的财富数量还不足以引起移民的恐惧。罪犯劳动力的供应也较能满足政府和移民的需求。在新南威尔士，移民吵着要求得到更多的罪犯劳动力。为着应付这种需要，并进一步削减政府养活犯人的开支，1825年，继布里斯班任总督的达令封闭了新南威尔士的大部分政府农场，把罪犯分派给移民。但是移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主要因为到二十年

大利亚，后被赦免，很得金、麦夸里等总督的器重，曾任新南威尔士银行董事等职。

塞缪尔·特里，1801年因犯盗窃罪被流放到悉尼，后以贩酒致富。

以上三人都曾积极参加争取释放犯政治权利运动。1821年1月，在释放犯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呈文，三人都是向总督递送呈文的大会代表。——译者

代末，移民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

早在1820年，英国新闻界就已经挑出新南威尔士，把它看作有钱人移殖的合适地方。随着罪犯政策的改变，英国政府开始鼓励那些拥有资金、出身良好的人们移殖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
49 这样，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稍后还有维多利亚西部地区）都成了大有作为的地方，英国的乡下佬、苏格兰的佃农以及爱尔兰的农民都在这里变成了拥有土地的绅士，而联合王国的那些破落绅士也得以免于在本国沦为乡下佬的命运。有个詹姆斯·亨蒂，是肯特郡沃信地方的商人和银行经理，他的家族历史可以上溯到《英格兰土地纪录书》①时期。他于1828年写信给兄弟威廉谈到移居新南威尔士的好处，他说：

> 我已经得出结论，新南威尔士会给我们家庭的好处要比英格兰已给的更多……如果以为他②在今后多年里，还能靠每年不到二百镑的收入继续维持象我们大家从前度过的

① 《英格兰土地纪录书》是1086年勘查英格兰土地所有权之后英王威廉一世下令编成的。——译者

② 指他的兄弟查尔斯。——作者注

那种生活，那是愚蠢的，除非我们真的愿意在社会阶梯上降低很多级。这在我们感情上是受不了的，何况目前我们在新南威尔士，在英国管辖和良好的气候之下，就有机会可以过得一样好或者过得更好。……如果我们在新南威尔士住上十年，我们每个人还挣不到那个数额的双倍①，那我将会非常失望。……我们的乐趣将是经营和改进我们的产业，而我们的业务将是生产优质羊毛和繁殖纯种马匹，因为两者都有良好的市场。

还有别的人也象亨蒂兄弟一样，从殖民部领到一封写给新南威尔士总督或范迪门地区副总督的信，通知他按持信人资金多寡授予相应数量的土地，并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予以各种帮助，使持信人能够安住下来。这样，绅士家庭出身的小农场主、退职海陆军军官和落泊的冒险家们就参加到殖民地社会的最高阶层中去了。这意味着在殖民地出生的人们获得良好土地的机会减少了，从而他们对移民的仇视也加深了。释放犯和移民之间，由于后者排斥异己，原来早已开始发生的派系

① 即每年440—500镑。——作者注

50 斗争，更发展为对新南威尔士土地财富的争夺，包括释放犯为他们子女争取继承权的斗争。

1825 年，英国政府给澳大利亚农业公司发了特许状，这就更加深了释放犯的恐惧和怀疑。政府在新南威尔士东海岸纽卡斯尔北面斯蒂芬斯港后方地区，授予该公司土地一百万英亩；而作为报答，公司发起人则答应在该地区牧养品种最纯的绵羊，把大量资金和农业技术引进殖民区，增加优质羊毛出口额，并尽量雇用犯人以减少政府的开支。公司发起人还答应以便于惩戒和改造犯人的方式雇用他们。释放犯大叫大喊地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公司经理们会攫取他们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土地。当时传说，这个计划在伦敦方面的主要发起人就是因歧视和排斥一切释放犯而恶名远扬的麦克阿瑟家族的成员，于是释放犯的忧虑就更深了。与此同时，在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以及在利用犯人劳动方面，各种法规对拥有资金的移民都比对成功的释放犯更为有利。所以释放犯终于相信英国政府正在把属于本地出生居民及其后代的土地交给移民。在新南威尔士的经验势必促使释放犯成为激进派和憎英派，而同时则促使移

民成为保守派和亲英派。对比起来，1825年范迪门地区公司取得特许状，却没有引起该地区移民的高兴和释放犯的不满。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两地社会差异的程度了。

当时移民人数的增加引起了新南威尔士定居地区的扩大。移入的绅士们和释放犯一同在亨特河流域的帕特里克平原和瓦利斯平原领受土地，移民领到了大的地段，而释放犯则只领到面积较小的地段。丹加尔家族①的创业人曾在达令总督手下工作，这个家族和杜马雷斯克家族②一样，都 51
是用通过牺牲土著居民、罪犯乃至牺牲土地的办法在上述地区取得土地，建立家族的小朝廷。巴瑟斯特地方和肥沃的麦夸里河流域的移民人数也增加了。在古尔本—堪培拉地区出现了同样格式的定居地区的扩大。总督在这个地区将二万英亩土地授予罗伯特·坎贝尔，以补偿他在早期所受的

① 亨利·丹加尔是丹加尔家族的创业人，他在亨特河流域等处共占土地达三十万英亩，后来参加澳大利亚农业公司。——译者

② 杜马雷斯克家族的创业者是威廉、爱德华、亨利兄弟三人，凭着和达令总督的亲戚关系担任公职，都占有很多土地。——译者

损失。在这里取得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的阶梯，和其他欧洲社会并无不同：家族的创业人先从商业捞了一笔钱，然后取得了土地，从而拥有了光靠有钱不能得到的社会威望。当时，范迪门地区的移民则以不那么强横的方式在霍巴特镇以上的德尔温特河上游和从达尔林普尔港起的埃斯克河流域占用土地。

为了发现更多的土地以便分给后来的移民，也为了弄清内陆河流神秘的流向和河口，新南威尔士政府提倡勘探旅行。1824年，布里斯班指派休姆和霍维尔两人步行前往南澳大利亚的斯潘塞湾。他们只步行到菲利普港的科里奥湾为止。在旅程中，他们发现一条河流，取名为休姆河。但后来另一个探险家查尔斯·斯特尔特又把它叫做墨累河，无意中使休姆失去了最初发现者的荣誉。渡过这条河后，他们到了一块地方，其土地之肥美，气候与英国之相似，为向来所未见。这里有个极好的港口和一条不比殖民地任何已知河流为小的河。当他们回到悉尼报告他们的发现时，新闻界对于广阔惊人的牧场，扩展贸易和农业的可能性，以及在西港设立殖民区的种种利益，都表示热心。

休姆和霍维尔也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港，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菲利普港西岸露营。

在某些方面看来，他们旅行最重要的结果只是休姆和霍维尔发生了争执，两人为了争夺发起者、领导人和主要发现者的光荣与荣誉而不象样地吵了起来。休姆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新南威尔士一个有点轻佻的罪犯监工的儿子，喜欢夸耀自己作为一个“土生小伙子”的成就，而霍维尔则是一个出身于绅士家庭的移民。休姆说，这次探险的
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如果没有他的毅力和才能，探 52
险的目的将永远不能达到。他还说，霍维尔在丛林生活的能力既差，而且对澳大利亚内陆情况也懂得很少。过了一段时间，休姆对霍维尔的无能的责难就转变为对他的怯懦的恶意嘲弄。

由此看来，本地出生居民在争取承认的长期痛苦斗争中，并不象人类堕落以前在地上流浪的无罪的人那样，而一直都是气势汹汹、剑拔弩张的。霍维尔耐心而庄严地忍受了所有这些攻击，虽然他毫不知道他不过是当时释放犯和移民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的牺牲品。霍维尔自命是从悉尼步行到西港的第一个人，而他走过的、在墨累河以

南的一片地方是“极其美丽的，牧草葱葱，小山和低地都长着茂密的树林”。植物学家艾伦·坎宁安在两次旅行中对远在悉尼北方的地区也做了同样的探察。在1827年第一次旅行中，他发现了适于畜牧的广阔地区，这个地方后来以总督的名字命名为达令丘原。第二年他又发现了从达令丘原通往莫尔顿湾的一条小路。

查尔斯·斯特尔特于1795年出生在印度的孟加拉，是一个英国法官的儿子。他于1828年出发探险，沿麦夸里河探查该河河口。他发现一条大河，并命名为达令河。他相信这条河流将使遥远的澳大利亚内陆获得新的重要性，因为它显然是从东海岸把水引向西流的主要水道。斯特尔特不久就把弄清这条河的流向当作他的主要目标。他还相信，某种比人的先见或远虑更强大的力量，使他和同伴们得以避开沿途经常威胁他们的各种灾难和危险。他永远深信仁慈而全知的上帝的庇佑，并且委身于上帝的照顾之下。

为了弄清马兰比季河和达令河河口的秘密，
53 斯特尔特于1829年11月10日再次从悉尼出发前往马兰比季河地区，谦卑地把他本人和同伴们的

安全委于上帝保护之下。探险队有载重马车和马，沿马兰比季河岸前进，经过一片使人忧闷的地方，到1830年1月为沼泽所阻。于是，斯特尔特带同一小队人乘捕鲸船继续前进，通过沉闷的平原，来到一条宽广、美丽的河流旁边。斯特尔特以当时殖民大臣的名字称之为墨累河，并没有觉察这就是休姆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那条河。又一次，偶然事件而不是恶意或怨恨使本地出生居民丧失不朽声名，而将之授予一个英国官员。

在沿墨累河下驶途中，斯特尔特一行人曾受到土人威胁，但后来脱险了。斯特尔特说这应该感谢上帝作了神迹般的干预。斯特尔特的宗教信仰很坚强，所以不会把他们脱险归因于偶然机会；他又很谦虚，所以不会把脱险的原因归于他自己的天赋领导才能或是土著居民初次遇到火药时的恐怖。正和比他们先到内陆的其他探查者一样，斯特尔特一行人也发现梅毒在土人部落中的传染是真正令人厌恶的：许多人烂掉了鼻子，身体上有腺的部分都受到严重的侵袭。1月23日，他们发现了墨累河和达令河的汇合点，然后开始通过一个无可利用的、荒凉的地区。人们开始诉说眼痛；口粮

已削减为一点面粉，此外就要依靠猎枪和钓钩所得了，因为剩下的一点肉要留给他们带来的狗吃。

1830年2月9日，他们到达一个美丽的湖，斯特尔特把它叫作亚历山大里纳水库，墨累河就从这里入海。他们从小山上望见白浪冲击远处的海岬。从奥克斯利到斯特尔特，迷惑了所有内陆探险家的河流之谜现在解开了。接着，他们又面临新的困难：他们要划船逆流上驶，所经的地区十分荒凉，而全队人员由于体力消耗过多和食物质量不好都已虚弱不堪。这一切困难，他们都克服了，因为斯特尔特的宗教信念使他具有忍耐的能力和对一切人的热情。①

休姆和霍维尔、坎宁安和斯特尔特等人的探险旅行打通了南至维多利亚、北至昆士兰、西南至
54 南澳大利亚扩展定居地区的道路。

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国内对新荷兰和新南威尔士的使用问题曾进行讨论，讨论的焦点是：英国要夺取对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和夺取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这些地方能从中

① 关于斯特尔特探测路线，参见本书第202—203页地图4。——译者

起什么作用？它们作为太平洋海军作战基地又能起什么作用？为了抢在法国人前面，英国政府于1803年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殖民区，但后来放弃了，1804年又在霍巴特镇和达尔林普尔港建立了永久殖民区。由于害怕法国人在新荷兰和新南威尔士南部海岸殖民，英国人又于1826年先后派兵到西澳大利亚南海岸的英王乔治海湾和维多利亚南海岸的西港建立据点，并且派送罪犯前往劳动。英国人又作了一次不切实际、徒劳无功的尝试，想把贸易从荷兰商人的手中吸引到英商这边来。他们在澳大利亚北部海面的梅尔维尔岛上建立殖民区，官员、士兵和犯人在那里白白地消磨掉他们的生命，为英国人的贪婪和欺骗效劳，因为1815年英国人已经一本正经地把爪哇交还荷兰了。可是，在伦敦“东方利益集团”分子的心中，仍然存着幻想，打算把新荷兰作为踏脚石，以便登上黄金岛屿并取得马鲁古群岛的香料。

这种幻想在1829年决定在斯旺河畔设立殖民区方面起了作用。1828年7月，詹姆斯·斯特林上尉已经把斯旺河地区的气候、土壤和水源等情况热心地向殖民部作了报告。伦敦的官方意见依

然受到要抢在法国人前头这种愿望的影响，而“东方利益集团”则试图抓住又一个机会来开发东印度群岛的富源。悉尼有一个释放犯商人索洛蒙·利维准备向新荷兰西南海岸的殖民区投资，他还与伦敦的托马斯·皮尔合伙。可是，当英国政府接受投资者的条件，准备促进斯旺河畔殖民区的创立时，它却自相矛盾地不让罪犯进入殖民区，并且规定应按投资多寡的比例将土地分别授给移民。英国政府任命斯特林为第一任副总督，训令他在
55 占领新荷兰时改称该地为西澳大利亚。1829 年 6 月 18 日，移民、工人、官员和一小队士兵登陆，并且正式宣布殖民区的成立。象菲利普于 1788 年所做的一样，斯特林宣誓保证决不作使斯图尔特王族成员在大不列颠复辟的尝试，并且宣誓要维持新教徒的优势地位。

但是，在西澳大利亚的初期历史中，既没有实现维持新教徒优势地位的崇高目标，也没有达到殖民区创立人的较平凡愿望。开始时，殖民区就濒于破产，这与其说是由于土地使用制度不健全或移民的愚蠢和贪婪，不如说是由于土壤和植物生长的不足。梦想开发亚洲财富的人们立即碰上

了生存斗争。伦敦的殖民地改革家并不知道早期移民的痛苦和生活艰苦的真正原因，把失败归咎于土地法起草人的愚蠢。这不但是中伤而且还是侮辱。殖民部接受了这种批评，并且决定按最低价格出售澳大利亚所有殖民区的皇家土地，并把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作支付移民路费的基金。可是这里的土地出售几乎停止了，因此移民基金也就没有了。西澳大利亚的一些移民搬到东部各殖民区去了，而留下的人们则苦于长期缺乏劳动力。1846年，移民们在绝望中请求英国政府决定并宣布把这个殖民区办成“大规模流放罪犯的地方”。因此，原先有过宏伟的设想，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社会，将这个地区纳入世界的范围之内，把澳大利亚和欧、亚两洲的文明联接起来；可是，现在这个根据原先设想建立起来的社会，却由于土地贫瘠和人们的过失，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终日孜孜于食住问题和工人倚赖雇主的社会了。欧洲人又一次遗憾地发现，移植文明必须使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劳动力来奠定它的基础。

与此相反，新南威尔士母殖民区由于使用罪犯劳动却引起了政治的动荡不安。释放犯和移民

之间的猜疑和恶感使政治带上了派系斗争的色
56 彩，而诬告和毁谤在公共生活中已成风气。属于移民派的塞缪尔·马斯登牧师控告同情释放犯的道格拉斯医生，说他酗酒并出于最下流的目的脱掉罪犯少女们的裙子。总督布里斯班指责马斯登一心只管自己繁多的俗务，却忽视了教区中的日常宗教工作。尼皮恩河畔的移民大亨约翰·贾米森爵士谴责麦克阿瑟家族扰乱殖民区的安宁达三十年之久，大搞阴谋诡计，十分阴险恶毒。总督布里斯班同情释放犯，贾米森也指责他鼓励鸸鹋[32]平原的女犯卖淫。这就使想从这个时期政治斗争中找出一个简单公式的观察者更感混乱。1824年1月，布里斯班指责最高法院法官巴伦·菲尔德不能保持他的法院免于派性的影响。菲尔德已有两年不曾去过总督官邸了。

1825年，当达令继布里斯班担任总督时，移民集团中的排斥论派[33]已经声名扫地了。侦询法院宣告被控酗酒和私通未婚少女的道格拉斯医生无罪。达令执行巴瑟斯特勋爵的指令，派人把马斯登叫来，加以谴责，指出他结党徇私和纵酒无度都是和他的年龄和神圣职业不相称的。这是马斯登

在新南威尔士政治经历的结局，也是他真诚地而往往是悲剧性地试图同时满足上帝和财神① 的结局。他既得不到身居高位者的恩宠，也得不到同辈的尊敬。从这时起，常见他嘴唇微动，喃喃祈祷，转而追求他从幼年时代起就曾竭力求取的上帝恩惠。

麦克阿瑟的公务生涯看来也完结了。他开始不出席立法会议，不到总督官邸去。他私下谈论扩大澳大利亚农业公司的计划；有时又谈论他计划访问中国；他还不时谈到计划访问南美洲，研究驴子繁殖。他的举止渐渐象一个任性的孩子，耗费那么多时间坐在家里沉思，喃喃自语，以致使人
怀疑他是否神智清醒。他早年曾对殖民区的繁荣 57
作过重大的贡献，本应得到财富、荣誉和爱情等报酬，但是正当这个时候，他却由于自己的排斥释放犯的政策而不得不忍受反对者的怨恨和愤怒。1823年接任新南威尔士副会督的托马斯·霍布斯·斯科特，也因为同麦克阿瑟派往来太密而成

① 财神或贪欲之神，音译作“玛门”（Mammon），原来是“财利”的意思，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及«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6章。两处都说，“你们不能又奉事神（上帝），又奉事玛门”。意思是说二者不可得兼。——译者

为另一派谩骂的对象。排斥论派另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鲍曼是一个毫无足取的人，仅是由于与麦克阿瑟家族的姻亲关系而获得公职。排斥论派人物变成了他们自己谄上骄下的牺牲品，他们都成了一些受自己过去邪恶所苦恼的人，只从宗教和家庭生活中找寻安慰，而对新南威尔士的将来却漠不关心。

反之，解放论派[31]因为对自己斗争目标的正义性抱有信心，并且因为有一群能干的青年热心与他们合作而得到了鼓舞。这些青年人的首领是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思。他抱负不凡，而自尊心却受到伤害，这成了驱使他发挥才干的动力。他出生于1790年，是外科医生达西·温特沃思和被流放到诺福克岛的女犯凯瑟琳·克劳利的儿子。他以为自己出生于在英国和爱尔兰有悠久历史的世族，他就是在这种信念中成长起来的。他到英国接受早期教育后回到殖民区，于1813年参加首先越过蓝山山脉的探险队，然后又去英国休养并继续读书。当时，他除关心自己前途和对父亲抱有深厚爱情以外，生活中的另一个热望是能与麦克阿瑟家族中的一位女子结婚，这样既可满足

爱情的要求又可增加他的财产。那时，他受到了
突然的打击。他读了H·G·贝内特在伦敦写的
一本小册子，书中提到达西·温特沃思曾经是流
放罪犯。他立即决定要洗雪他父亲在恶意诽谤下
所受的耻辱，并决心创立自己的光荣事业，借以显
扬自己家庭的声誉。这样，新南威尔士的光荣就
和他个人的建功立业混淆在一起了。与此同时，
他听说麦克阿瑟家族坚决反对他的婚事。于是，
感情上的隐痛告诉他要争取什么，而爱情上所受 58
的创伤则帮助他决定要反对什么。

他回到新南威尔士后不久，就主持庆祝殖民区成立纪念日的宴会。会上他发表了愤怒的而有攻击性的演说，把传统的欢宴变成了对解放论派的一次政治动员。该派诗人M·M·鲁宾逊在酒后表示赞同的呼喊声中朗诵诗句："在故乡生来就享有的权利在这里就是继承！"他们热情地祝酒，为"朋友们，我们居住的土地"干杯，因为释放犯最大的梦想就是土地归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所有而不属于移民。为了起草一份送呈布里斯班总督的请愿书，他们召集了一次公开会议，温特沃思在会上以无情的语言把排斥论派描写为"殖民区的黄色毒

蛇”，应由解放论派把它们的毒液和毒牙除掉。使用这种语言有损于他自己的声望，也损害了他所拥护的事业的声誉。他要求立即把英国宪法中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殖民区确定下来，即实行陪审制和成立下议院。他认为，居民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们在德行良好这个重要特点上胜过英国其他一切社会；悉尼秩序安定；一个自由的民族有享受他们古代自由制度的权利。只有“黄色毒蛇”亦即拥有地位和财富的移民才敌视在新南威尔士建立英国的政治制度。

1825 年，他们似乎可以达到目的了。新任总督达令正在小心地行事。许多能干的青年人都为释放犯的事业效劳。其中有沃德尔，是一个律师，与温特沃思共同编辑《澳大利亚人》。有霍尔，前福音传道师，于 1826 年任《箴言》的编辑。还有 R·豪，是《悉尼新闻》的编辑。到 1826 年，《澳大利亚人》和《箴言》都是替释放犯作宣传的报刊。副主教下令禁止教士参加政治活动。所以在影响舆论的三种势力中，新闻界和公众集会都在解放论派一边，而新教牧师的布道坛则是中立的。如果天主教会的教士利用布道坛进行政治宣传，他们

将被驱逐出境。

到1827年末，解放论派把他们的有利条件浪
费掉了。《箴言》和《澳大利亚人》发表了诽谤性和 59
煽动性都很强烈的政治评论，使达令担心爱尔兰人和罪犯会被煽动起来，破坏一切法律与秩序。士兵萨德斯和汤普森二人因不愿当兵，故意犯法，企图达到被开除军籍的目的，可是达令却判处他们苦工七年。这时事态就发展到了沸点。两个人都被扣上铁项圈和镣铐，在士兵们击鼓声中被从联队赶出去。过后不久萨德斯死了。《澳大利亚人》报不公正和不负责任地说他的死亡是因为被扣上“折磨的刑具”。达令见到有人利用这一事件来达到政治目的，大为愤怒。温特沃思私下谈到他准备检举达令的残暴和专制。达令从这一切断定：温特沃思是一个粗俗的、缺乏教养的家伙，他全不知道一个高尚的人对人的应有礼仪。达令还断言温特沃思是一个煽动家，说他企图领导释放犯以达到增加自己势位和财富的目的。为了保护他属下的高级军官免遭恶意的诽谤，也为了保护下层阶级不受煽动，达令曾两次企图实行新闻管制，但福布斯审判长拒绝证明这两项法案与英国法律

没有抵触。解放论派高兴得叫起来，因为达令对管制新闻的热心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即达令政府是独裁的专制统治，而他们这一派只是请求得到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 1827 年整整一年内，达令被解放论派弄得苦恼不堪。11 月温特沃思在图尔夫俱乐部宴会上的演说又越过了礼节的界限，而沃德尔因烈性饮料和晚会气氛而失去理智，以致在正式为总督健康祝酒之后他还大声呼喊叫乐队奏起《越过重山到远方》①的歌曲。当达令听到这次新的侮辱时，他立即把政府中公开支持温特沃思极端派集团的官员免职。解放论派中那些只求保住职位就顾不上政治原则的胆小鬼和那些不象温特沃思那样感情冲动的人都害怕起来了。在1828年 1 月庆祝殖民

① 《越过重山到远方》是十七、八世纪英国文学中多次被使用的句子。作家乔治·法夸尔（1677—1707）在所著《越过重山到远方》第二幕第三场中写道：

我们的学徒托姆现在可以拒绝
　替他那个恶棍师傅擦鞋，
因为现在可以自由歌唱和弹奏
　《越过重山到远方》。

这首曲子有自由不受欺压的含意，因此达令总督把弹奏这首曲子认为是对他的侮辱。——译者

区成立纪念日的宴会上，当听到温特沃思的名字时，向来同情解放论派的人都不自然地保持沉默。

同时达令已经腾出手来把他对殖民区未来政治制度的想法写成文字。他认为：人民对设立议院是没有准备的；社会上深思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而人民一般是不关心的；受温特沃思的煽动性演说和《箴言》与《澳大利亚人》的过激文章影响的人，只是少数。达令相信，如果接受朋友们的指导，殖民者就不须以大大扩展他们的特权而自豪；假如竟是这样，那就好得多了。就他来说，他建议英国政府不要对解放论派中温特沃思一伙关于实行陪审制和设立下议院的要求让步。实际上，他的建议和麦克阿瑟提交殖民部的意见是一样的。麦克阿瑟告诉殖民部说，解放论派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社会上有道德、有名望的人们，这些人们事实上都渴望拒绝酒店老板、面包师、高利贷者以及其他平民的横蛮无理的要求。 60

英国议会于1828年通过的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司法条例采纳了达令和麦克阿瑟的意见。条例规定，立法会议的成员应由总督提名，由国务大臣任命。议员名额规定为十至十五人，除

政府官员外，应从殖民区的大地主、大商人中选定。创制权仍然归于总督，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非经立法会议大多数同意，不得通过任何法律。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在总督同意后三年之内，英国议会有权驳回。新法案在立法会议中提出讨论前八天，应在报刊上摘要公布。不得强迫立法会议成员宣誓保密。最高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如两造均提出要求，可以采用陪审制。审理刑事案件时，政府有权在它认为适当时采用陪审制。于是，解放论派在达令眼中堕落成为一群酗酒的、不负责任的暴徒，这一点就为拥有经济权力的人们
61 操纵新南威尔士政治机构的局面铺平了道路。新南威尔士的畜牧业时代开始了。

在同一时期内，范迪门地区的移民与释放犯之间没有发生足以使政治生活活跃起来的派系斗争。在这个殖民区里，犯人劳动力的供应经常足以应付政府和移民的需求。没有发生富有的释放犯集团与移民争夺土地的现象。也没有哪部分官员或移民组成排外的小圈子。但是，和新南威尔士一样，范迪门地区的公务受到副总督的性格和道德标准的影响。1824年，乔治·阿瑟上校接替威

廉·索雷尔任副总督。他当时刚刚四十岁，是一个有声誉的军人、组织者和行政长官。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属于福音派，和福音派教徒一样认为罗马天主教会破坏自由并使教徒陷于贫困。虽然和他一起喝酒的少数人在喝干第二瓶钵酒后会惊奇地发现他富有感情，可是他同大多数清教徒一样，待人是冷冰冰的，讲究形式上的礼节。在公开的场合，他对人完全采用强者对待弱者那种毫不容情的严峻态度。他对说谎者、醉汉和奸夫是鄙视和厌恶的。他以福音派信徒的高度严肃性和高尚品格，利用国家的强大权力和牧师的说教，减少了范迪门地区的酗酒、赌博、卖淫以及其他不正当行为。

英国政府于1825年接纳了让范迪门地区脱离新南威尔士独立的请求，这使霍巴特镇和达尔林普尔港的自由居民大为高兴。在隆重鸣炮以后，达令总督正式宣布范迪门地区独立，并宣告它将有一个和新南威尔士相似的宪法，设副总督一人，并成立由三至五人组成的立法会议。当天晚上，最忠诚的、热心公益的居民家家灯火辉煌。人们在宴席上祝酒，多次干杯，共祝这个和母国远隔天涯的

殖民区繁荣昌盛。

第二天，琐屑的日常事务重新开始，各种困难
62 问题又来纠缠殖民者了。他们一直抱怨新南威尔士政府经常把不可救药的罪犯遣送到范迪门地区来，担心他们这个可爱的岛屿会变成澳洲的兀鹰笼①。为了抵制这种倾向，并表示他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如何深恶痛绝，副总督阿瑟向英国政府请求不要把爱尔兰犯人送到范迪门地区来，以免塔斯马尼亚社会及其未来的文化、精神生活都陷于贫困。新南威尔士的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徒的正直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基督形象这两种概念相对抗的结果，而且也由于这种对抗而丰富起来，可是，范迪门地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人数方面从来没有足够强大，或在社会形态方面有充分的特殊性，足使他们从受压迫和受贬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②的心理状态下解放出来。

移民经常受到丛林土匪的围攻。丛林土匪

① 兀鹰指乘人不幸而获利的贪婪者，在这里指的是被遣送来岛的罪犯。兀鹰笼指容纳罪犯的范迪门地区。——译者

② 原文ghetto是意大利语，本来是指从前某些国家城市中的犹太人聚居区。——译者

大部分是逃亡的爱尔兰犯人。他们逃到丛林中去，以掠夺为生。他们觉得自己是历史上一次民族虐待的牺牲品，所以他们对新教徒移民的掠夺就不但野蛮而且还有复仇的色彩。移民又时时受到土著居民的围攻，土著居民行动时以百人左右为一群，人数众多，可补原始武器的不足。他们包围住宅，然后，在使人战栗的呼喊声中和袋鼠猎狗[45]的狂吠声中，用棍棒打死移民和牲畜看守人。移民要求报复，他们在愤怒中忘记了他们的文明给土著居民带来了多大灾祸。当1804年白人在岛上建立最初殖民区时，估计土著居民有三千到七千人，到1830年只剩下约三百人。在霍巴特和达尔林普尔港等市镇中，有少数品格高尚的人认识到欧洲人猎取袋鼠和负鼠[53]给土著居民带来了饥荒；另外有一些人对土著居民与文明接触后引起的悲惨后果觉得难以理解，他们看到“高等文明”的礼物使土著居民堕落为乞求烟酒的可怜的叫化子，深感痛苦。阿瑟仍然认为必须以仁慈和怜悯对待土著居民。当一群土著居民来到
霍巴特镇时，他命令军需官供给他们衣食，并命令 63
警察保护他们免受侮辱。但是别的品格不大高尚

的人却拿酒给他们喝，挑拨他们格斗，而当他们彼此互相砍杀的时候，这些人就哈哈大笑。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福音传道师们确信他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改变和教化自己的人。在阿瑟任副总督期间，可以更经常、更有力地听到他们虔诚的声音，那时英国国教的牧师们、卫理公会信徒、长老会教友和天主教教士，最低限度一致承认牧师有责任充当国家的道德警察。除天主教徒有不同看法外，所有新教各教派的福音传教师又都认为大不列颠是世界上著名的、深蒙上帝恩惠的卓越国家。当福音传道师回顾澳大利亚各殖民区最初二十七年中的物质成就时，他对这种了不起的创造表示惊异。一个虔诚的福音传道师对他的会众说："不列颠，而且只有不列颠才能够完成这样奇异的功业，这是一个拥有惊人毅力的强大民族的不朽成就。"

与此同时，人们对新南威尔士的教育和宗教也正在进行改造，使它们能为一个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在官员、大地主、大富商手中的社会服务。1823 年，巴瑟斯特请托马斯·霍布斯·斯科特就未来学校教育提出建议。斯科特后来成为新南威

尔士第一任副会督，当时他建议每个教区的教堂附设一所学校，开设朗读、习字、算术和英国国教教义问答等课程。另外，斯科特建议设一所自费入学的中等学校，而对于家贫但有才能的学生则发给奖学金，因为斯科特内心虽然是个保守派，但认为事业应向有才能的人开门。他又建议将来设立一所大学；而在此之前，他赞成实行奖学金制度，使有才能的人得以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取得学位，从而加强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斯科特为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所鼓舞，但是，他在新南威尔士企图劝人改信他的主义，这一点
却失败了，他所播的种子落到了殖民地实利主义 64
的石田中去，或者被他的自尊心和对职务尊严的关心这些杂草所窒息，长不起来。随着1825年教会和学校联合会的成立，新南威尔士政府最低限度已经把初等教育的垄断权交给英国国教的牧师们了。

因此，长老会、卫理公会和天主教徒被迫成立权宜的同盟来破坏英国国教对教育的垄断。在这个背景中，一位长老会教士在新南威尔士开始了狂热的宗教生涯。这就是J·邓莫尔·兰牧师。他

于1799年出生于苏格兰，在对天主教及其一切事业都感到害怕的长老会典型传统中受到教育，在教育问题上他接受了“自立派”的观点。关于上帝选民的种种快乐和被判堕入地狱者的永久痛苦，他从老师们口中获得生动的印象。他于1823年来到悉尼。他的气质使他鲁莽地而且往往倔强地支持弱者和下级，这倒不全是出于对卑贱恭顺者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以挫伤骄傲者为快。所以，他的信念和意向都同样驱使他反对和挫辱新南威尔士的英国国教徒。他随身带到新南威尔士的，是一种喀尔文主义和人权相结合的思想，是一种调和基督教教义与人类皆兄弟理想的梦想，是一种对神虽创造了天上乐园而人是否有能力创造世上乐土的怀疑。

为了打败英国国教徒，兰牧师竟准备和天主教徒合作，这使悉尼和帕拉马塔的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感到惊奇和厌恶。悉尼的英国国教信徒认为爱尔兰天主教徒是那样愚昧，失尽人类心灵应有的优点，结果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徒和土著居民不同之点只是他们皮肤的颜色。下列事实似乎证明了这种看法：生活过得肮脏惊人的天主教徒

竟以巨大的费用在悉尼建筑一座教堂，装饰得金碧辉煌。

反之，英国国教的牧师们则以高等文明和真正宗教的监护人自命。新教徒心目中的上帝并不是代表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而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等级与秩序的创造者，正如莎士比亚的 65
《特罗伊勒斯和克蕾雪达》一剧中尤利塞斯①所描述的一样。圣经、英国国教祈祷文和莎士比亚是这些新教徒的教师。他们保卫着社会免受无政府状态、异教徒的无神论、邪说、异端和教会分裂等等的侵害。为了保卫社会秩序，他们在教堂里为他们的君主祈祷平安。1827年9月6日，有一位教士在圣詹姆斯教堂劝告听众说："愿英国国王头上永远闪耀着新教徒的王冠。让我们国家的教士们，让英国教会中的每个教友，让王国的每个臣民，让各地讲求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每个朋友都齐声祝愿'阿门'②！"新教牧师们劝告人们要严守安

① 《特罗伊勒斯和克蕾雪达》是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家，1564—1616）所写悲剧之一。尤利塞斯是剧中人物，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赛。尤利塞斯提到自然界和人世间的等级和秩序的一段话，见该剧第一幕第三场。——译者

② "阿门"，原来是希伯来语，祈祷或颂诗终了时所用，是"诚心所愿"或"心愿如此"的意思。——译者

息日，这样既尽了义务，又能得到利益。他们又力劝信徒们祈祷时要虔诚地跪下来，劝他们要极力避免偷盗、诅咒、酢酒、说谎、私通、通奸等罪恶。他们相信，通过从布道坛宣讲教义，通过精读圣经及其他宗教著作，就能够造就忠实、正直的信徒。他们还特别教导青年们要阅读圣经，要把它看作是指导方向和生活的准则，这样，就可能在上帝赐福下得到永生。有一个牧师认为："他们将安分守己，具有文雅和家庭和睦等德行；那样，曙光将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将要到来的光荣日子里，青年人得在尽善尽美中成长，而老年人愉快地走完他们的路程，和平地安眠于坟墓之中。"

圣公会仍然怀着希望，企图用教育的方法把土著居民从野蛮提高到文明状态。他们仍然希望，如果以有用的知识开拓土著居民的心胸，通过道德教育使他们的感情纯洁化，如果能象新教徒说的，"教会他们和我们一样地思考，一样地感觉，一样地生活，那末土著居民就将和一般居民融为一体"。他们认为，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慈善心，他们不得不力图把土著居民从悲惨和不幸中拯救出来。他们也主张对夺去土著居民的土地一

事进行某种赔偿，而在他们看来，最好的赔偿就是教会土著居民欣赏基督教文明的各种优越性。困难的是，首先土著居民毫不理睬这种礼物；其次，
土著居民喝醉后的互相叫骂和格斗是当时最能吸 66
引观众的节目。

在内地各处，土著居民（他们被称为黑人）仍然是移民要对付的最可怕的敌人。移民们认为，对黑人讲人道和容忍是彻底的愚蠢，因为决不能说服黑人对白人和睦，决不能赢得他们的友谊，决不能使他们丢掉背信的习惯。移民们劝告说：当黑人反抗的时候，就要打死他们；要使黑人心惊胆寒，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就和野兽一样。他们相信黑人一定要作为公开敌人来对待，因为，对白人移民说来，黑人开展敌对行动将带来流血、残杀和一片荒芜。这种策略在移民中常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土著居民被驱逐出白人移民地区，人数也不断减少，但是土著居民在大陆上所受的灾祸较轻一些，因为澳大利亚内陆非常广阔，使他们得以免于完全灭绝。

白人的行为和价值标准，除了受到他们过去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无论是新教徒的、天主教徒

的、还是接受启蒙思想的经历）的影响之外，也渐渐受到当地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特殊结构的影响。在1830年以前，悉尼的观察家们就开始推测气候和景色单调会引起什么后果。他们预言它将产生温顺软弱的性格，使居民少写诗或不写诗，并且缺乏从道德的尺度上提高的推动力。他们指出，新南威尔士没有漫长的夏日或冬夜，没有落叶，没有繁花怒放的春天，没有鸟的歌声，没有持续的黄昏，没有短时间的完全阴暗。代替这一切的是平淡和单调。英国诗中的比喻，新南威尔士的孩子们是不懂得的。在英国写诗的那种环境，在新南威尔士并不存在。他们问道：哪里有蓝色花脉的紫罗兰、山小菜、金凤花、雏菊、柔软如丝的樱草和开山楂花的石南呢？又哪里有狮子、老虎、大象、河马、骆驼和其他珍奇的四足兽呢？幽静的溪谷，潺潺的流水，积雪的高山，峭拔的悬崖，倾泻的飞瀑，这一切壮丽的景色又在哪里？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新南威尔士是平淡的，单调的，阴沉的。

67 在新南威尔士的社会里，同样是一片平淡和阴沉。人们不是在艺术、文学或宗教方面寻求娱乐和慰藉，而是追求吃、喝、发财。其余沉闷无聊

的时间则消磨于散布流言蜚语之中。用一位喜欢挑剔的观察家的话来说，这种专事诽谤的风气已经成为“没有经过蒸馏的毒酒，比喝进口里的酒损害了更多人的人生乐趣”。毁谤已经使每个人都不信任他的邻居。又有许多人不能较好地利用他们的闲暇，而把很多时间耗费于与仆役为难。在悉尼，家庭仆役被说成“天下最坏的一类人”。用犯人干农活和做家务的乡居移民害怕花时间在市镇里搞社交活动，因为土著居民或当仆役的罪犯会盗窃或破坏他的财物。渴望过社交生活的妇女们坚决声明，骑马穿过一行行的桉树〔38〕或是巡视玉米秆〔22〕并不合她们的口味。1823年，有一位妇女写信给《悉尼新闻》说：“至于交谈，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更使人羞怯的了。年轻的阿拉贝尔自从开始放牧以来，就神不守舍。跟年轻的霍尔塞尔①谈到音乐，请他唱个歌，他就拿起一张发票唱起来：‘金钱是你的朋友，不是吗！’。”

① 阿拉贝尔原文为 Arable，是“可耕的（土地）”的意思。霍尔塞尔原文为 Wholesale，是“批发”的意思。英文查无此姓，可能原来有两个人名叫阿拉贝拉（Arabella，女）和霍雷秀（Horatio，男），这个妇女故意写讹，取其双关字义。——译者

悉尼和霍巴特镇官邸名流的生活，是一片浮华和死板，充满繁文缛节，而下层社会的生活则完全是放荡、狂欢和纵饮。有些观察家把这种行为归因于男女两性人数上的差异。1828年，在新南威尔士总人口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八人中，有男犯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女犯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在范迪门地区总人口二万零二百六十五人中，有男犯六千七百二十四人，女犯七百二十五人。在一切殖民地社会的初期历史中，在两性关系上都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在合众国，一些成对的男女打算结婚，但是由于经济或社会的原因未能达到目的，就采用了“和衣同睡”①的秘诀。在南非洲，荷兰移民面临着男性过多和所谓“自然首要法则”的问题，和土著居民通婚了。没有类似的解决办法可供澳大利亚的犯人、释放犯和他们的子女采用。他们被那种谄上骄下的风气和排外政策所排斥，不让他们与上层阶级有任何社交，这种政
68 策就是移民与释放犯之间关系紧张的社会原因。在殖民地成立初期，有人谈论从太平洋岛屿或甚

① “和衣同睡”是新英格兰用语。早时英美有些社区在男子向女子求爱期间未婚夫妇有这种习惯。——译者

至从中国输入妇女，以便在植物湾产生一代“象征社交亲善”的人。

犯人和释放犯迅速地找到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鼓励女犯当娼。本来她们就多是由于当娼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来的。牧师们严厉斥责这一类邪恶行为，指斥男人们相互进行鸡奸，并且为了引起他们对结婚的兴趣而提醒他们说，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说过：“孤零零地一个人是不好的。”教士们接着说，上帝的愿望是人应该子孙众多，遍布大地并将大地征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对其他问题一样，犯人对劝告置若罔闻，他们不愿意恪守本分而宁愿任性胡为，结果犯人和土著居民一样，差不多变成一个逐渐消灭的种族。殖民地得到了他们劳动的利益，而没有把一个无正当权利的阶级的问题留给后代。然而，1831年，伦敦当局作出了帮助自由劳工移居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决定，新南威尔士社会中罪犯占人口多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较小程度上也见于范迪门地区）就为时不多了。

69

五、移民和牧地借用人[65]

（1831—1842年）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特别是爱尔兰，经常有一些地区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人们也经常议论，北美、好望角、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英国殖民地拥有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可以无限量地容纳并养活不列颠群岛的过剩人口。许多殖民区，例如新南威尔士，就长期缺少劳动力。问题在于如何把工人从劳动力过剩地区转移到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去。

1829年，伦敦《纪事晨报》发表了两篇连载文章：一篇是罗伯特·高杰写的《关于在澳大拉西亚①殖民的建议》；另一篇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写的《悉尼来信》。二者都建议出售殖民地的土地，其价格应足以防止劳工过快地成为土地

① 澳大拉西亚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邻近岛屿。——译者

所有者，并防止定居分散，而出售土地的收入，则用来支付经过挑选的移民的旅费。与此同时，有消息传到伦敦，说查尔斯·斯特尔特发现了“从圣维森提角入海的一条壮丽河流”。这时，高杰和韦克菲尔德的追随者已被通称为有计划的殖民者，他们立即建议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区，因为他们认为，只要遵守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法则，移民们就能在那里获得最大的幸福。另一些人坚决认为这个地区给“老城”①人士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但是有钱人却要等殖民部批准了那里的殖民计划才 70
准备投资。还有一些人给建立新殖民区提出了堂皇的理由，如乔治·法伊夫·安加斯曾说：

我所追求的伟大目的首先在于给大不列颠虔诚的不从国教者提供一个栖身的地方，使他们在新居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履行公民和宗教的职责，在上帝面前披露自己的良心；其次是使笃实农民的子女能在那里得到田地，以便安居乐业，赡养家庭；最后，我也可以稍效微力，为较贫苦的移民奠定一个良好

① “老城”是伦敦的金融区。——译者

的一般教育和宗教教育制度的基础。

到了1831年，韦克菲尔德已经提出了关于建立新殖民区的完整的论证。那里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多，有煤、木材、树皮、树胶、食盐、咸鱼、海豹以及抹香鲸和黑鲸的制品。其他澳大利亚殖民区都感劳动力不足；在新殖民区，人口的集中可以保证劳动力不分散。法律将防止定居分散，这样就不致于象新南威尔士那样受到定居分散的害处。由于教区资助贫民移居国外时，往往把救济院中最差的人推到新南威尔士，因而新南威尔士拥有一群懒汉和坏蛋，他们几乎全部都不熟悉农事，这也曾使新南威尔士大受其害。新南威尔士还吃了男女人口比例失当的苦头。韦克菲尔德建议只挑选青年男女，而且双方比例要大致相等。此外，新南威尔士还受到使用罪犯之害，他们的存在也是劳动力不足的一个原因。新殖民区不准备收容流放犯。宗教信徒同意这种主张，倒不是因为流放犯对劳动力供应有什么影响，而是因为流放犯势必助长犯罪。

1832年，一份创办南澳大利亚土地公司的发起书出版了。发起书向投资者保证英国政府愿意

促进该殖民区的建立。土地将按某一最低价格出售，以保证全部售出土地得到适当的垦殖，而移民也能达到最满意的集中。出售土地的净收入将用以移入男女人数大致相等的已婚青年和达到结婚 71
年龄的青年。殖民区将彻底实行自由贸易。殖民区成年男子人口一经达到一万人，即可成立立法大会。立法大会每年选举一次，选举应在充分保证选举自由的安排下进行。

在1832和1833整整两年中，土地公司的代表、有计划的殖民化的赞助人、投机事业家以及向往由虔诚者组成殖民区的未来美景的人们，一再要求殖民部正式批准。1834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令，在南澳大利亚成立一个州。法令的前言说，南澳大利亚有可供殖民的广大无主荒地，有若干拥有巨资的英王陛下臣民准备投资，他们希望有一个处理荒地的统一办法。该法令随后规定了州政府权力的行使，授权三个专员管理拓殖事务，由一位总督维护法律与秩序。地价将得到统一并固定下来；对移民将实行有组织的选拔。殖民区将不收容流放犯。投机事业家、有计划的殖民地开拓者和虔诚的不从国教者，就这样把他

们的殖民理想写上了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

殖民部选拔皇家海军上校约翰·欣德马什为南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据说他是一个热情、和气、谨慎、勇敢和刻苦自励的人。虽然一个具有远见的人士也曾怀疑，他究竟能否用军舰上的那一套办法来统治这些并不打算在南澳大利亚肥美土地上互相损害或互相毁灭的殖民区人民。至于其他官员，政府和专员们则物色那些相信宗教平等和博爱的人士，甚至合于清教徒概念的正直人士来充任。他们选任的官员有些是致力于促进人类道德和知识的人；有些是企图实现个人的雄心壮志的人；也有一些是一再违犯第七诫律①和见酒就醉而且从中寻欢取乐的人。在移民里面，有擅
72 长钻营的人，有已放弃军职的陆军军官，有从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来的土地买主以及城镇商人。根据指示，选拔工人时，应许他们在入境十年内可以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努力，得到一份自己的产业，借以招徕勤劳而不喝酒的工人。对品质恶劣并有不良习惯的人，则决不欢迎。

① 圣经中有所谓"十诫"，其中第七诫是"不可奸淫"。——译者

为了证明他们具有崇高原则，证明他们的动机并不专在于追求物质利益，他们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开化土著居民，从而使他们心悦诚服，自愿皈依基督教。他们认为，不应当阻拦别人和平而按部就班地礼拜上帝。安加斯先垫支了八千英磅给一些来自普鲁士的虔诚的路德会教徒，使他们能够来到可以按自己良心的指引而礼拜上帝的地方，同时又规定要让他们充当他的佃农，为期三十年——博爱和利润经常就是这样愉快地结合起来的。这样一来，德国的路德会教友便开始赞助新教徒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树立优势地位，同时，老实人的数目也增加了。

1836年8月，“布法罗号”由〔英国〕朴次茅斯启航。同年12月，政府官员、驻扎专员、移民和工人齐集圣维森提湾东岸听取欣德马什的就职宣誓。和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区的所有总督一样，他宣誓他要维持在联合王国内保护新教徒优势地位的法律。不过，这一次宣誓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建立这一殖民区的部分原因是要证实新教徒的一种伟大设想，即财富属于明达事理的人，属于上帝的宠儿。几乎刚一登岸，擅长发财致富的人就

和敬畏上帝的虔诚教徒发生了无谓的争论；奉公守法的人和老实人同酒徒、色鬼、说谎者发生了冲突；总督和驻扎专员对未来首府的位置和名称也有争吵。土地投机出现了。总督和驻扎专员的关系由于事权不一而趋于恶化。欣德马什被召回英国，改派了品格高尚的戈勒去恢复早期所抱的幻想。可是光凭理想主义是不够的，结果戈勒也
73 被召回伦敦。1841 年，格雷接任总督兼驻扎专员。他一面实行无情的节约政策，一面精明地运用了一个理财能手的天赋才能，才使殖民区摆脱了财政混乱状况。1842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条例，把总督和驻扎专员的法定权力归一个人掌握，使殖民区摆脱了体制上的混乱。

到了这个时候，南澳大利亚开始转而采用传统的殖民方法，它不再依靠殖民理论家，也不再依靠虔诚者的祈祷和悲伤来得到福利了。1840 年，畜牧业者筹集了一笔探险经费，打算发现一条从南澳大利亚通到西澳大利亚的放牧路线，并选拔埃尔任探险队队长。埃尔说服了出资人，让他先往北部寻找适宜放牧的地方。他于 1840 年 6 月带队出发，队伍中还有土著二人。他们在北方没

有找到可供放牧的水草，于是折回，转而向西寻找横跨大陆的通道。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埃尔和一个土著怀利于1841年7月到达英王乔治海湾。在那里，怀利的同族以"无言的喜悦眼泪"欢迎了他。埃尔喝了一杯和了水的热白兰地酒，洗了一个澡，穿上了一套借来的干净衣服；他说，这一切使他感到较为舒适。他业已探明，把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隔开的滨海地区原来是一片荒漠，并没有什么适于耕、牧的土地。1844年，查尔斯·斯特尔特出发到澳洲内陆，考察那里的自然情况。按照他的设想，那里也是大片大片的荒漠。当他们深入到一个地区，发现那里沙丘起伏，水和饲料两缺时，他的同伴惊呼道："天哪！有谁见过这样的地方！"斯特尔特随即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回到了阿得雷德①。这样一来，南澳大利亚的居民只好将就着利用他们已经知道的地区。

但是其他方面却取得了进展。1843年，伯腊的铜矿已进行开采。同年，J·E·里德利发明了谷物收割机，节约了收割所需的人力。这样，大农

① 关于埃尔和斯特尔特的探查路线，均见本书第202—203页地图4。——译者

场的工资开支也减少了，只是小农仍旧用双手收
74 割。改进耕犁质量的办法也有了。在农村各处也建立了面粉厂，解决了农民的运输问题。这样，南澳大利亚农民就在澳洲农业中起着带头的作用。老殖民区之所以落后，一是由于使用了半奴隶劳动，一是由于把资金和企业力量集中于发展畜牧业。南澳大利亚由于男女人口相等，也没有一般流放犯殖民区的那种社会犯罪。这里是一个农民社会，其中大多数人都关心维护社会现状，因而他们不必害怕公民的政治权利一有扩大，就可能给无产者利用来反对有产者。由于这里有一大群不从国教者，他们在政教关系上受到了政教分离论者的影响，这就为1851年废除政府的宗教津贴准备了社会基础。这样一来，南澳大利亚就在澳洲社会史上的两次大运动中成为先驱：如何做到貌似激进而实则保守；如何做一个清教徒而不用清教的教义。

当伦敦正在讨论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也开始采取步骤，准备在菲利普港地区殖民。汉密尔顿·休姆曾于1824年同霍维尔从悉尼步行到过菲利普港。他在

1831 年就曾经预言：如果把巴斯海峡附近地区对移民开放，这个地区短期内就将成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的谷仓和澳大利亚最大的牧羊区之一。新南威尔士总测量师托马斯·米切尔于 1836 年报告说，他从墨累河前往波特兰(该地位于菲利普港以西的海岸上)，走过一片无比肥沃、无比美丽的土地，越过许多长流不竭的河川和水草丰茂的平原。参天的树木和巍峨的山岭点缀着这个地区，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景色。这里就是澳大利亚最南和最富饶的地区。他兴高采烈地把这一个新地方叫做澳大利亚福地①。新南威尔士南部寻求土地的移民立即赶着货车，携带畜群，循着这位少校的路线，跋涉长途[54]来到了这里。刚到悉尼的新移民也闻风而动，跟着来了。

与此同时，隆塞斯顿和霍巴特的移民和商人 75
也正在筹划在菲利普港建立一个移民区。约翰·巴特曼组织了菲利普港协会，并郑重其事地用二十张毛毯、三十把刀子、十二把斧头、十面镜子、十二把剪刀、五十条手帕、十二件红衬衫、四件法兰绒

① 原文是 Australian Felix，Felix 意为幸福。参见本书第88—89页地图 3 。——译者

上衣、四套衣服和五十磅面粉，向土著居民购买了菲利普港周围十万英亩的土地。约翰·帕斯科·福克纳也看中菲利普港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他是一个罪犯的儿子，小的时候曾见过范迪门地区副总督一边观看鞭笞罪犯，一边用手一把一把地捏吸鼻烟。1835年，巴特曼和福克纳都在菲利普港湾北端亚腊河畔取得了土地，而且展开了无谓的争吵，争论究竟谁是这个地区的真正开拓先驱。

到了1836年，已有很多的人跋涉长途，移居到澳大利亚福地（即西部地区）和菲利普港，新南威尔士政府只好宣布将菲利普港一带作为开放移民地区，并任命朗斯代尔为该地行政官。1839年，测量师罗伯特·霍多草拟了一个城市规划，拟建立一个长方形的城市，占地不到一平方哩；该城的大道正对南北方向，这样就使全部未来居民在夏季面迎炎热的北风而在冬季面迎寒冷的南风。为了纪念当时联合王国的首相，把这个后来扩建为市的城镇命名为墨尔本。到184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达一万零二百九十一人，它的历史从此纠缠上了移民、土地法、流放、教育和自治等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在居民中孕育了休戚与共之感，从而

他们开始要求脱离新南威尔士，实行分治。

与此同时，自由劳工入境的增加和畜牧业的发展，也大大影响着新南威尔士居民的生活方式。1831年，在有计划的殖民地开拓者们认为定居集中有利这种意见的影响下，戈德里奇勋爵采用了按每英亩五先令的最低定价出卖皇家土地的办法，并把所得收入支付移民（移入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的路费。从1835到1840年，补助移民的费用和适于领取路费者的种类两者都有所增 76
加。为了贯彻选拔移民的原则，曾草拟一些条例，对适于移民的类型加以规定。由于殖民地纷纷反对所谓清除救济院的办法，1835年推行了一项津贴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入境移民到达后要出示由牧师或由知名人士签署的、证明本人品行端正的证明书，并出示证明他们适合津贴年龄的文件，才能领到路费。

从1831至1850年，根据政府安排和津贴计划来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移民在二十万人以上。由此看来，移民显然有助于减少联合王国的过多人口。但在殖民地，移民的办法却引起了愤怒和恐惧。市镇雇主和内地居民都对新入境移民

的品质感到非常头痛。内地居民埋怨移民不愿离开市镇。他们可以强迫罪犯到穷乡僻壤忍受艰苦和孤独；但移民首先是不肯离开市镇，或者到了内地不久就溜了回来，无论说服或威胁都不能叫他们遵守合同，进行劳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位印度军官的妻子卡罗琳·奇泽姆由于热情关怀移民少女的命运，表现了基督精神，同时也同情居民对于劳动力的需要，曾带领一群移民少女，从悉尼城穿过乡野，去到较边远的地区。

移民们还埋怨工资过高招致了毁灭性的后果。过高的工资鼓励自由工人要末把收入浪费在乡野的酒店，要末用来购买土地，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乡村地区对工人的需要是无法满足的。有一个乡村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写道："事实是，我们总得有这种或那种的劳工：如果找得到，就雇用自由劳工，否则就用罪犯劳工，如果两样都没有，就用苦力① 劳工"。

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移民入境后，还在市镇里激发了根源于流放犯时代的教派情绪。1840年3月17日《悉尼先驱晨报》曾写道：出售土地所

① 苦力系专指中国、印度等地的亚洲劳工而言。——译者

得资金都掌握在一班代理人手里，他们为了要达 77
到在新南威尔士建立天主教优势地位的可鄙目的，把天主教地主财产的累赘物从监狱和教区清除出来作为移民。另一方面，天主教会的神父们又担心占优势地位的新教徒会利用这个移民计划来剥夺爱尔兰穷人的信仰——这一帮恶魔已经把上帝的大地上最美丽的岛屿变成白骨累累之地，可能又在阴谋以其叛教邪行来毒害天主教徒移民的心灵。

移民计划无疑地使新南威尔士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尖锐。范迪门地区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从爱尔兰来的移民带来了和爱尔兰罪犯相似的一套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尘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诱他们去违反神父的愿望和意旨，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按照神父的意向行事，将来才能得救。他们之间即使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也能以穷人的互爱互济的精神相待。他们也具有从神圣信仰学来的对待群众的热情。他们没有忘却他们的悲惨历史。他们相信在新教徒主持的法庭上，对天主教徒没有正义可言；为了战胜传统的民族敌人，无论说谎、告发、欺诈、纵火、盗窃、行

凶，甚至谋杀，都是容许的。神父们对此表示忧虑，也曾警告信徒们不要为了发泄复仇的幼稚情绪而危害永恒的得救。尽管澳大利亚殖民地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是英国人为解决爱尔兰的混乱而发现的上等良方，殖民地社会却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世界观的严重对抗的场所。

如果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甚至也适用于爱尔兰新教徒——知道如何发财致富，理解政治经济学法则，并且看到了正直的人与成功的人二者间的联系，那么爱尔兰人却懂得仁爱、怜悯和团结一致的秘密。爱尔兰人在联合王国生活于惊人肮脏的环境中；其所以能维持不敝，一是由于他们同仇敌忾地反对某一整个民族①，一是
78 由于他们有圣洁的信仰。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再度碰上了他们民族的传统敌人；这些敌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厚颜无耻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接受英国的一套制度和改奉新教。同时，新教徒也害怕自由移民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蜂拥而来，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害怕爱尔兰天主教徒迷信异端和崇拜偶像的习尚

① 即指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而言。——译者

会把他们的心灵引入邪途，趋向堕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公众议论的另一主题是流放制的前途问题。1835年，在福贝斯堡米迪少校所属地产上，有五个犯人由于不断受到过分的鞭笞，铤而走险，枪伤了管理人，然后逃进丛林。他们被捕后，受审定罪。当法官要他们说明为什么不应对他们判处死刑时，他们请求在庭上展示他们皮开肉绽的背部，以表明他们所受折磨之深。庭上的群众看了都吓得发抖；殖民地的人道主义者一时也有同感。但是，对鞭笞这种“合法的可憎行为”感到愤慨的，毕竟只有少数人，正如对流放制下的苦役和堕落感到义愤的为数不多一样。一个天主教神父W·乌拉索恩教士写道：

> 我们一直干着一件不仁的、渎神的勾当。我们取得了一大片上帝所创造的大地，却把它变成了臭水沟；我们取得了环绕地球、富于奇迹的海洋，却把它变成了罪恶的渊薮。我们把人类的渣滓一层一层地倾倒下去，而当这些东西板结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时，我们就是在用它们来建立一个犯罪之邦。除非我们赶快做点什么进行补救，这个犯罪之邦即

> 将成为祸患和罪恶的中心，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话柄……扫除这一罪恶中心，是和人类全体密切相关的事情。

可是移民的上层人物在讨论流放制度的前途时，使用的却不是这种腔调。他们只把它作为劳力的来源来考虑它的利弊。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还是不怕罪犯劳工引起的各种麻
79 烦，如偷窃、生活放荡以及可能给他们家庭带来的道德败坏等；因为使用犯人比较合算，并且可以强迫他们做自由劳工不干的工作。到了1840年，新南威尔士有一些富有的自由移民开始怀疑究竟流放制度是否一个有效的劳动力来源。1835年，英国政府指令新南威尔士政府从出卖土地的收入中拨付警察和监狱的经费，这就是说，有一部分他们原来相信已指定作为支付入境移民旅费的专款，要挪充流放制的经费了。

1840年，约翰·麦克阿瑟的儿子詹姆斯·麦克阿瑟在新南威尔士的立法会议上说，殖民地人民所以感到劳动力缺乏，大部分是由于土地基金被挪用于其他目的。他还说，自由劳工比罪犯劳工为好，因为自由劳工总是胜于奴隶劳工的，使用

奴隶劳工总是而且一定是无利可图的。由于土地基金挪为别用，他们就无法得到自由劳工。在他看来，流放制度曾经对殖民地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罪犯的劳动为文明打下了基础，为居民创造了财富，但是到了 1840 年，它却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借助于罪犯劳动，现在殖民区已经达到比较富庶的程度，可以让自由的、善良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但是，并非所有富裕移民都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有些人仍然相信他们的经济前途有赖于使用罪犯，从而认为流放制和指派制是迄今最人道的、最有改造意义的刑罚。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思，当时新南威尔士的最大土地拥有者之一，就是流放制的最积极的辩护士。

与此相反，在英格兰讨论流放制的前途时，却集中于研究它在处罚和改造罪犯上究竟是成功抑或失败的问题。1837—1838 年，英国下院成立了一个由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主持的委员会，对流放制进行调查。他们在报告中指出，流放制对于阻止犯罪没有什么效果，倒是对促进服刑的人 80
进一步腐化堕落有显著作用。他们认为这是这个制度固有的属性，因此这一制度没有任何改进的

余地。他们还进而指出，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个“更为离奇怪诞的祸害：它造成而且不断扩大一批社会集团（或者民族的胚芽），这些社会集团或民族胚芽就它们作恶癖性的性质或程度来说都是恶劣透顶的”。因此他们建议，一俟可行，即应停止把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以及范迪门地区的移民区。

但是英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时，又与此不大相同。1840 年，殖民部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说，指派制简直就是奴隶制，因为它把一个罪犯送到充军地去当奴隶。哪里有奴隶制，那里也就有奴隶制的祸害。一方是一个完全处于隶属地位的人，其一切行动受着恐惧、复仇情绪以及各种足以贬低人性的动机的驱使；另一方是主人，他也不免要受同样低级动机的支配，如情绪激动、作威作福、反复无常、傲慢自大以及腐化堕落等等。因此，他认为指派制不容继续存在。根据这些理由，新南威尔士总督于1837年奉命采取措施，准备废除指派制；因为就败坏主人和奴隶双方的品格来说，指派制比流放制的其他流弊都更加严重。英国政府为流放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说服，认为这个制度并不能阻止犯罪，乃于 1839 年下令在新南威

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废除指派制。1840年，他们废止了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罪犯的制度。

1840年10月，当这个消息传到悉尼时，开明的移民和自由工人举行了庆祝，把这项改革看作他们的道德观念的胜利。但是其他移民却大喊大叫，说这些集团并不是害怕犯罪行为泛滥，而是害怕自己对劳动力的垄断会受到干预。澳大利亚圣公会会督威廉·布劳顿向当地出生的人民致以祝贺，因为现在已经洗雪了他们国家的一种耻辱
——他们国家给这种耻辱苦恼得太久了。在霍巴 81
特，继续向范迪门地区流放罪犯的决定，既没有引起恐惧，也没有引起义愤，因为罪犯还正在替当地社会增添财富。但是，停止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罪犯却使范迪门地区罪犯充斥。到了这时，范迪门地区的移民、牧师和慈善家为他们地区出现所多玛和蛾摩拉①发出了恐惧的呼声。

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所表现的恼怒和愤慨主要还是针对英国政府强加于它们的土地法。早在1826年，政

① 据圣经所载，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巴勒斯坦死海边两座古城，因道德败坏，邪恶多端而得名。——译者

府为了对付针对土地赐与制而提出的关于徇私受贿的批评，曾推行土地出售制。到了1831年，他们认识到土地赐与和出售并行的制度，既不能使土地所有者使用土地，也不能防止定居分散。他们也注意到解放论者提出的指摘，即现行制度有利于拥有资本的入境移民，而不利于本地出生的居民。1826年，为了避免定居过于分散，他们曾划定定居的界线，禁止越界定居。1829年，又重新划定一次。但是在地图上划一条线并不能阻止居民分散，正好象土地法不能推动人们垦殖自有的或租用的土地一样。为了鼓励耕种和促使定居地集中，也为了防止劳工过早地成为土地所有者，戈德里奇勋爵于1831年实行按每英亩五先令的最低定价出卖皇家土地。1838年，格楞内格认为每英亩五先令的定价不足以制止居民的分散，他把最低定价提高为十二先令。1842年，斯坦利再把最低定价提高为每英亩一镑。

居民们大肆责难这个制度不公平合理。他们说，工人并不会因此而不能成为地主，土地法也不能防止定居分散。居民给入境移民支付了路费，但入境移民却留在市镇工作。菲利普港的居民埋

怨把当地出售土地的收入用来向新南威尔士的移民区输送移民，那里的一些权贵，也就是新南威尔 82
士的元老贵族，强占了所有的劳动力。菲利普港地区的居民愤愤不平，并开始鼓吹脱离新南威尔士，实行分治。新南威尔士的居民害怕失去在菲利普港出售土地的收入，于是也捐弃前嫌，联合一致，集中向伦敦要求自治。在他们看来，既然英国政府不能妥善处理流放、移民和土地问题，那么，为了保持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首先就要把政治权力从伦敦转移到他们自己手里。

边远地区的居民认为土地价格太高，使他们不能增置田亩，而有关租地条例和准许用地条例又不能保障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在没有得到这种保障以前，他们不打算在他们的牧场开展文化建设，如修建房屋、学校或教堂。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乡野中的野蛮状态应该归咎于土地法。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也应归因于土地法。租用土地或获准用地为期一年的人，都属于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斯旺河（以及1836年以后的南澳大利亚）的土地财主之列。这些人物照理应当成为奉公守法的社会栋梁，但是正因为土地使用

权没有保障，却逼得他们无法无天地辱骂政府。这样一来，在一个既无政治传统可言，又没有历史遗产的社会里，本来可以拥护统治权力和社会安定的一些人物，却大言不惭地讲起革命的词句来了。斯旺河畔的居民认为他们的殖民区正在遭到一些经济学家和英国辉格党的一帮无能政客的摧毁。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对实行土地按最低定价出售的办法也并不感到高兴。对他们来说，地价仍然太高，很难用他们的积蓄购置一块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所以，当乡野工人[18]宁肯把工资花在出售兰姆酒的小店而不肯购置地产时，道德家只有摇头叹息了。

但是，土地终究是财富的巨大泉源，同时也是获得尊敬和威望的手段。而在各种从土地取得财富的方式之中，最富浪漫色彩、最为常见而且可能
83 最易赚钱的方式，莫过于在皇家土地上放牧，每年交付租金或执照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叫做牧地借用人。按照当时流行的看法，牧地借用人是一个幸福的人，远离尘世的一切忧虑，过着宁静的牧人生活，注视并赞赏羊群的繁衍能力，不用很多麻烦和苦恼就可以发财致富。曾有一个时期，有人

利用廉价的罪犯劳动力，降低了成本，在伦敦出售羊毛，从而很快就发了财。但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定居的密度越来越大，牧地借用人不得不把羊群赶到三、四百哩远的内地。他们在探险家新发现的地区（如新英格兰地区、达令丘原、巴瑟斯特平原、古尔本平原和菲利普港的西部地区）建立了牧场[60]。

牧地借用人要不是能够从银行或商人得到贷款，就是自己拥有足以经营这项事业的资本。他们有些是合伙经营，有些是替城里人或在定居区拥有土地的人充当代理人或管理员的。他们的社会出身形形色色，正如他们的资金来源五花八门一样。有些是英国绅士，他们曾在著名学校和学院受过教育，而且出身高贵，家中大厅挂有“古代蒙面骑士的甲胄”。有些是发了财的商人或农场主，他们初到新南威尔士或范迪门地区时还是一贫如洗，但由于自己的努力而致富。有一些是罪犯的儿子。还有一些是少尉级以上的军官，他们由于土地法对陆海军军官有特别照顾而被吸引到澳大利亚殖民地。

牧地借用人把生活必需品诸如食物、衣服、遮

蔽物、饮料和精神食粮等装满货车之后，便赶着牲口，带着工人，还可能带有妻子，一同向乡野出发。他们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既没有大路，也没有小道。有时他们要越过深沟[36]，货车很容易落到沟里，于是阉牛在车夫连声咒骂中把车拖上对岸。有时他们为泛滥的河水或沼泽所阻，要多次把车
84 上的物品卸下才能通过。有时货车陷入泥泞，深达车轴。有时人和牲畜都忙于对付苍蝇和尘土。天气良好时，一天可走十二哩；天气恶劣时，只能走三、四哩，因此要在路上走四十天到六十天才能到达牧场。

在选定牧场之后，牧主和牧工就搭起一座简单的树皮小屋，在山坡上挖一个洞作为食物的冷藏库，竖起栅栏供夜间关入畜群，以免为野兽所害。然后牧主或管理员就要跋涉一趟长途，到土地局申请牧场的标界权并交纳租金或执照费。牧人则留在牧场看管羊群，或读书消磨时间（如果他们是“学者”的话），或则弹弄犹太人琴，或则走到邻近的乡野茅屋[14]或小酒店[63]狂饮作乐，受到热烈的欢迎。

黄昏时分，他们在乡野茅屋里谈笑。正如一

个观察家说的，全国的牧人和畜牧工人有三分之二都在无休止地移动，乡野茅屋就是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那个时候，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殖民区中，几乎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当时，内陆地区现金非常缺乏，因而产生了以物易物和合伙消费的传统。晚饭后，大家拿出烟斗，把能容一夸脱①的茶壶放在火旁，这个人唱一支歌，那个人讲一个关于殖民区早期的故事，另一个人讲一则有关乡野歹徒的最近新闻，还有一些人夸赞或咒骂他们的阉牛，而新来的入境移民则讲述有关“家乡”的最新消息，并且尽量忍耐听任大家谈论在殖民地流行的、关于他×的移民的笑话。到了午夜，他们就躺在地板上，头露出在毛毯的这一端而脚则露出在另一端。在兰姆酒店里，酒客的目的是尽快地迷入醉乡，而酒店老板的目的是尽快地抢走顾客的收入。正如一个改了过的酒徒说的，这些人象阉牛似地挣来了一些钱，却象蠢驴似地把钱花掉。对这些人来说，看到了一个白人妇女就是一件新鲜事物。他们毫未受到宗

① 英国容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加仑，折合一·一三六公升。——译者

教和教育的感化，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85 牧主的生活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同样孤寂，同样与高尚文明隔绝。在开始的时候，牧地借用人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一个牧地借用人写道："一个住在这里的移民，简直就是一个吉普赛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过着茅屋的生活。夜晚在火旁缩成一团，披着负鼠皮斗篷，白天就整天骑在马上。"牧地借用人受到了种种困难的磨折：首先是他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其次是羊群染病——这可以在一夜之间劫走他们的全部流动资本；再次是时运变幻——这可以使他们不惜亲历千辛万苦而追逐的利润有落空的危险。还有一些人费尽气力，在"荒凉贫瘠的原野"上到处奔波，却找不到一块安全的投资场所，因而感到厌倦。

他们的生活长期处于紧急状态。1839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南部靠近布雷德伍德的地方，有一个牧地借用人在一个闷热的暑天（当时气温在〔华氏〕九十度以上，湿度也很高）出外沐浴，回来时，他大吃一惊，只见浓烟滚滚，笼罩住谷地。大家都跑了出来，发现整片丛林都在燃烧，一阵热风扇着火头向茅屋伸来。他们一直干得两眼几乎昏

花。恰好风向转南，气温五分钟内突然下降到六十度，茅屋和牲畜才算是保住了。那一年，整个新南威尔士因为经过了连续两年的干旱，出现了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色。在整个马兰比季河流域，旅行者到处都可碰到死马，碰到用于劳役的阉牛。牛羊爬下将近干涸的水坑，陷进泥淖，死在那儿，留下了腐烂的尸体作为连年干旱的见证。

有身分的牧地借用人见到一些同行为了赚钱不惜干出肮脏的勾当，感到寒心。在很多地区，偷窃迷路的牛羊[37]是常见的。有身分的牧地借用人认为干这些勾当的都是罪犯出身的同行。他们写长信给英国本土的亲友大发牢骚，说澳大利亚不是绅士或高尚正直人士立身的地方，因为绅士很难对付那种遇事就要无赖和时时刻刻都在行骗说谎的行为。那些高雅的、文弱的以及不能适应这种不正规的新生活的人，都举起双手表示厌恶至极，或者呼吁上帝把他们救出这个魔窟。

牧地借用人的最大困难是劳动力不足，或者 86
叫做“人手缺乏”。当1838年新南威尔士废除了指派制时，悉尼、墨尔本以及各乡区报纸上都载满了招工广告，一个牧场[67]要招收牧工十名、十二名

甚至二十名。牧工的无能或任性，有时会使牧地借用人大发脾气。如果罪犯工人不听吩咐或玩忽职守，还可以把他们鞭挞一顿。但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自由工人却任意自由行动起来了。如果主人惹怒了他们，他们就跑掉了。1839年12月，维多利亚西部巴拉腊特附近有一个名叫利尔蒙思的牧地借用人，在一次大风暴中，发现他的羊栏走失了九百只羔羊。他派遣穆尼和加布两个牧工出去寻找，可是他们却从停在牧场的售货车买到了兰姆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他们二人和雇来剪毛的全部工人一直睡了一天才清醒过来。两星期以后，由于剪毛工人屡次纵酒，利尔蒙思把他们全部辞退了，但他们却兴高采烈地举行庆祝，弄得他的厨师兼管家本·古德有两天没有干一点事。据他的主人说，这是因为“售货车带来的酒引起了身体不适”。1840年4月一个美好的晴天，利尔蒙思出去巡视他牧场上的篱笆工作，回来时发现全部牧工喝了前一天由墨尔本带来的酒，正在狂喊乱叫。这些人好几天都处于醉酒状态，不听指挥，而且威胁着要走。为了要暂时安抚他们，利尔蒙思只得再拿出几瓶酒来。

牧地借用人的另一桩严重麻烦就是土著居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英国政府由于伦敦人道主义者的恳切呼吁，决定采取措施以保护新南威尔士的土著和范迪门地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1837年，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写道："处于原始状态中的新荷兰居民曾被旅行家描写为人类中的最落后的种族，但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和欧洲人接触已对他们原来的低贱处境投下了一层更为不幸的阴影。"1838年，英国政府为了妥善保护土著、促进他们开化，命令吉普斯总督把菲利普港划为 87
四个区，每区各任命一个土著保护人。这些保护人既是传教士也是教师，其职责在于保护土著不受白人的欺诈和虐待。但这并没有引起牧地借用人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种任命和伦敦的其他任命一样，都是费钱而无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或者应当在黑人和白人之间保持和平。当黑人偷了他们的牲畜或者把着火的柴枝投向他们的干草堆时，他们就给黑人以掺了毒药的面粉作为报复。

1838年，迈阿尔溪附近有一群白人受了黑人的行为的激怒，不顾一切地捉了几个黑人，把他们绑在一起加以枪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烧掉。有

十一个白人受到审判，并宣告无罪，但总督下令复审。结果有七人被宣告有罪，判处绞刑。殖民区舆论哗然。悉尼的报刊谴责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们过分苛求，但吉普斯不为所动，这七个人终于在悉尼被绞死了。在定居区的边疆各地，土著的前途和以前一样毫无希望，因为一切关于开化他们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从幻想出发的，傻瓜才会给以支持”。早些时候，在范迪门地区，为了尽最后努力使幸存的几百个土著不至全部消灭，副总督阿瑟曾于1830年组织了一次在全岛搜索土著的行动。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给捉到了，但剩下的土著活的日子也不长了，因为最后一个土著男子于1869年死掉了；一个东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妇女也于1888年在康加鲁岛死掉了。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就这样消灭了。无论在澳洲大陆或范迪门地区，随着牧地借用人的增加而来的殖民区的扩展，都给土著带来了浩劫。

凡受过早期严峻考验而留存下来的牧地借用人，都得到了丰硕的报酬。他们庆祝基督教会的各个节日都是非常隆重的。例如1839年圣诞节那一天，在西港海岸附近，就有许多人在一个牧地借

用人的茅屋里举行宴会。餐桌上摆满了英国所常
见的佳肴：烤牛肉、烤土豆、烧青菜，还有香槟酒佐
膳。这位牧地借用人写信给他在英格兰的朋友
说："那天我们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虽然我们
聚会的地方是一间连英格兰的乞丐大概也不会住 88
的茅屋：四壁尽是窟窿，泥土地面，坐落在连绵不
断的森林的中心，十八个月前还是白人足迹没有
到过的地方。"正是这种事业感，正是这种想要开
辟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把文明移植到从前的野蛮
蒙昧地区的雄心，使他们挨过了那些阴暗的日
子。有些人无聊时就读书解闷。有些人在乡野中
挥汗度日，但心里明白一年中总会有几天可以到
悉尼、墨尔本和霍巴特等城市里休息娱乐。大家
都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希望所吸引，因为有的人一
年就可以挣得一千至二千五百英镑，同时牲畜头
数也翻了一番，牧场价值也随着土地竞争的加剧
而提高起来了。

大家都望着市镇或伦敦，希望在那里解决他们的供应、娱乐和儿童教育问题，并且发泄他们对土地法和土著的怨气。他们很少关心纯属本地或地区的事务。由于定居分散，由于没有其他活动

要他们互相合作，再加上他们都得呆在家里保护家庭和牲畜，以免遭受罪犯仆役、酗酒牧工和土著的破坏，大部分居民总是把他们的生活局限在自己的牧场上。在北方的英国殖民地，由于定居比较集中，成帮的印第安人势力较强，移民们不得不密切合作以保护他们的财产，这种合作过程也就成了培育地方自治的第一所简易学校。但是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却趋向于中央集权。尽管乡野中的情况在乡野工人中孕育了平等观念和伙伴情谊，但这些情况并没有促使他们为达到政治目的而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在一个有一部分人深爱平等的社会里，也可以产生行政集权，而行政集权又带来了在多数人专横下达到一致和平等的可能性。

为了教育移民的子弟以便培养他们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威廉·格兰特·布劳顿（他于1829年接替斯各脱任新南威尔士副会督）于1830年建议设立一些公学，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布劳顿
89 来到这里的第一年，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青年继承了巨额财产，都要成为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在国家中占重要地位，但是他们却常常过于缺乏与这一地位相称的学识素养。使他很

惊奇的是，这些青年竟然同自己的罪犯仆役厮混，不顾自己的社会身分和影响。他相信，如果他们的思想受到适当开导，就决不至疏忽到这一地步。他主张教导学生钻研古典文学艺术，一般地学习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借以锻炼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培养耐心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在这种后来定名为英王学校的公学中，准备把牧地借用人的子弟训练成为统治阶级。1832年，悉尼附近的帕拉马塔开设了第一间这样的学校，但是对学生灌输基督教人文主义却好象把种子播在石田一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牧地借用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强取豪夺，特别是提倡使用罪犯或“苦力”以解决劳动力问题，使他们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们日益疏远了。所以，当他们的子弟在英王学校学习过程中惊讶地发现世界上不但有马，而且还有关于马的概念时，他们的父辈却由于自身的愚蠢和贪婪而失去了政治、社会权力和威望。

与此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发生了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激烈争论，把公共生活扰乱了。范迪门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程度较轻而已。在这两个殖民区，天主教徒、长老会教友、卫理公会教

友以及不从国教者都对英国国教垄断教育事业表示不满。1831 年，接替达令任总督的伯克，在政治上属辉格党，但在宗教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希望促进人民的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事业。他认为，在一个包括有各种教派成员的殖民区，要想扶植一个最有势力并受到国家资助的教派而不产生敌对情绪是不可能的。这种建制无疑地与殖民地开拓者的意向相左，而这种意向倒是与时代精神步伐一致的。因此，他建议对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即圣公会、天主教和长老会，一律给予财政补助。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友立即大喊大叫，认为这一建
90 议会招致新教的覆灭。布劳顿要求，所有儿童都要学习圣经，因为圣经包含了使灵魂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他还说，英国圣公会已经把译成英文的圣经贡献给说英语的世界，这就是它的光荣，这就是它有权要求得到大家感谢和尊重的原因。新教徒使用了这样一些夸大之词，迫使伯克总督放弃了他的计划。

但是伯克的继任者吉普斯在宗教问题上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 1840 年宣称，人类的最高利益要求这里的青年应该养成这样的感情，即

不管人们信奉的宗教教义如何，都应该彼此相爱相谅。这一主张使圣公会和天主教徒都惶恐不安。因为吉普斯坚决认为，如果各个教派在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学校，那么即使在市镇中也将有大部分人口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把各派新教徒都包括在内的综合性教育计划。但是布劳顿还不满意。他争辩说，如果认为各种形式的宗教都是一样，那么，只要再进一步，就会得出更为全面的信念，即所有宗教都是不重要的。有两位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来到悉尼的英国本笃会教士——乌拉索恩和波尔丁，也向吉普斯提出劝告。吉普斯对他们说，他的职责是支持最强大的一方，并说："我不认为你们是最强大的"。于是乌拉索恩和波尔丁就在悉尼市区组织了一次游行。队伍前头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接着是许多壮丽的彩旗迎风招展，三百名少女穿着象征基督教会的圣洁的白色衣服，后面跟着一些非宗教人士、教堂助手和穿上教袍的教士，最后是全副教装、俨如圣者的波尔丁。游行示威的目的在于表明：如果他们必须在基督和世俗真理以及启蒙思想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便选择基督。在新南威尔士和范

迪门地区，由于圣公会、天主教、长老会各派对宗教真理的看法各不相同，以 致使普通教育遭到了牺牲。反之，在南澳大利亚，由于不从国教者人数较多而圣公会和天主教力量较弱，就为了普通教育而牺牲了宗教教育。

在这个时候，新南威尔士的政治越来越少地涉及解放论者和移民之间的争论，范迪门地区也是如此，不过程度较轻而已。只要入境移民，特别
91 是其中的排斥论派，在土地授与方面继续得到偏袒，只要他们继续主张排斥释放犯，如不容他们列入陪审团名单，不许他们在未来立法机关选举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那末，解放论者和本地出生居民由于共同利害关系，就会联合起来抵制这些主张。另一方面，只要解放论者要求实行陪审制，成立立法大会，并反对把他们排斥于陪审团名单和选民名册之外，那末，一般移民，特别是排斥论者，显然就要加以反对，认为殖民区向这一步发展的时机尚未成熟。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总督的任免权已经扩大，可以使释放犯要求享有和本地出生居民一样担任公职的权利。这就为解放论者提供了一个“工作”论点，有利于他

们和移民相抗衡。

1835年，解放论者组织了澳大利亚爱国者协会，以便在悉尼并且(通过他们的代表)在伦敦宣传他们的要求。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新南威尔士的政治风向已经有了改变。1831年，实行按最低定价出售土地的办法消除了本地出生居民和移民之间由于土地授与制所产生的恶感。到了1838年，富有的解放论者和富有的移民在反对英国关于出卖皇家土地、关于移民以及关于流放制的前途等等计划上，已经开始找到了共同立场。同年7月，一些解放论者和一些排斥论者在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中讨论罪犯问题时就曾联合起来。在以后的三年中，英国继续控制着土地政策、移民政策和罪犯政策，并且有允许菲利普港分治的征兆，于是移民开始感到自治的需要。与此同时，许多富裕的解放论者，例如温特沃思，对一般解放论者提出的激进主张也感到惶恐不安。因此，1841年2月4日，在悉尼的一次会议上，为了对肢解新南威尔士表示抗议，詹姆斯·麦克阿瑟劝请解放论者和排斥论者联合一致，表示他们实行代议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他而言，他已准备忘记过去，放下长期争论的释放犯问题，以便集中力量要求自治。

92 英国政府在1842年作出的决定，给这个要求增加了分量。根据1842年英国政府的一项法令，新南威尔士的立法会议从一个全体议员由政府指派的议会改为十二名议员由英王指派、二十四名议员由具备巨额财产资格的居民选出的立法会议。但英国议会仍旧保留处理皇家土地的立法权，并保有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令在三年内予以驳回的权力。英国议会在同年通过的另一法令把南澳大利亚的立法会议议员名额扩充到七名，使女王可以根据枢密院的意见指派几名非官方议员。范迪门地区的立法会议议员则仍然由官方指派，原因是，女王政府认为没有理由向议会建议把同样的立法形式扩大到范迪门地区，因为他们考虑到授与这种组织形式同在该殖民区继续实行流放制度二者实不相容。但是在以后的十年中，范迪门地区的罪犯问题引起了一场愤怒的争取自治的运动，同时新南威尔士发出的“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的呼声，也暗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可能已处于出现波士顿茶党① 的前夕了。

① 1773年，英国议会为了倾销茶叶，剥削美洲殖民地人民，通过“茶叶税法”，强迫殖民地人民缴纳未经他们同意的捐税。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波士顿市民将英国茶船运来的茶叶投入海中。当时的群众被称为波士顿茶党。——译者

六、政治和文化 93

（1843—1851年）

据J·邓莫尔·兰牧师的叙述，在1825—1827年间，正当土地和牲畜投机买卖盛行的年代，上帝给殖民地降下了严重干旱的惩罚，旱灾持续了将近三年。兰牧师接着说，它的影响同牛羊投机狂的必然结果结合起来，使殖民者对于自己的愚蠢和疯狂有所醒悟，打破了许多人的美好希望，并使许多体面的家庭陷于贫困破产。这些事件似乎还曾在1840年和1843年先后重演。土地投机和牲畜投机再度盛行：牛羊和土地售价远远超出了真实价值。于是出现了破绽。欠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款项到期了，土地和牲畜不得不降价求售，以便偿还债务。物价因此大跌。一头羊只卖六便士；一头牛从前以高达六基尼① 的价格购入，而现在卖出价格低至七先令六便士；在丰收

① 基尼为英国货币单位，一基尼合二十一先令。——译者

的日子里价格高达一百四十镑的马车，在1843年3、4月的歉收月份只卖三镑。破产普遍发生，失业和贫困如此普遍，以致悉尼的立法会议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贫困的工人和技工的情况。在阿得雷德，作为一项节约措施，格雷总督关闭了大部分官办工厂，让阿得雷德居民的七分之一领取失业救济金；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已为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取消了任何“安逸和享受”了。

牧师们再次敲着布道坛央求会众，要把这种
94 苦难看作万能上帝对他们的罪孽以及他们的疯狂和愚蠢表示不满的朕兆。但这个时候，另有一些人却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原因——例如土地最低价格定得偏高——来解释货币危机；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货币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种假定，以为无须勤奋和节约，而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增加社会财富。这些论点足以证明当时的世俗精神正在增长。1842年，悉尼美国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这次经济萧条，一部分是由于地方上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萧条，后者曾经显著地影响了对欧洲制造品的需求，以致几乎把新南威尔士的羊毛生产业主全部搞垮了。

1843年6月，在极度经济萧条中，新南威尔士奉令举行第一次选举，选出了二十四名立法会议议员。《悉尼先驱晨报》告诉读者说，这次选举的争论焦点是：行政当局是不是要拥有太大的权力，工人应当受奴役还是获得自由，要不要保护本地工业，如何资助入境移民，释放犯是否合适担任市政和立法官职。该报认为，候选人可分为三个派别：政府党，由詹姆斯·麦克阿瑟和W·C·温特沃思领导的地主党，由罗伯特·库珀领导的城市激进派。一周后，该报又表示遗憾，认为选举一般已成了私人间的竞争，几乎完全没有原则的争论。1843年8月1日，新选出的立法会议中政府提名的十二名议员宣誓就职，其中包括五名官方议员和贝里、布拉克斯兰等大地主。在二十四名民选议员中，大地主也占了多数，其中有詹姆士·麦克阿瑟、W·C·温特沃思和W·劳森等人①。但民选议员中也有工人的朋友罗伯特·库珀和性

① 根据M·巴纳德：《澳大利亚史》(Marjorie Barnard: A History of Australia, 1963, Angus and Robertson, Sydney)第318页，詹姆士·麦克阿瑟该次并未当选。又此句前半段按原文也可以译为："至于二十四名民选议员，他们受到詹姆士·麦克阿瑟……和W·劳森等大地主的控制。"——译者

情暴躁的J·邓莫尔·兰，后者在这次选举中是菲利普港候选人，据说这是因为他在悉尼名气太大的缘故。

不出六个月，由于吉普斯总督公布了新的牧地借用条例，立法会议就陷入了一场吵嚷。吉普斯说，当时已有三百万英亩的皇家土地出租或者
95 特准交牧地借用人使用，而皇家每年从那里只得到七千镑的收入。他承认牧地借用人可以依法要求保障他们的使用权，作为他们对社会财富提供贡献的报酬。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为了规定牧地借用人使用土地的合理代价，并为了保障牧地借用人的使用权，吉普斯于1844年4月建议：牧地借用人每年须按每一个面积不超过二十平方哩的牧场分别缴交十镑的执照费。任何单个牧场的范围不得超过可以放牧五百头牛和七千头羊的面积。这一建议在新南威尔士的牧地借用人中激起了一阵大混乱。在斯科尼、古尔本、彭里斯、马奇、卡姆顿、辛格尔顿、墨尔本和悉尼，都纷纷举行集会。在4月9日的悉尼集会上，温特沃思说，他对这些条例深为惊骇，他认为这些条例的实施是违反宪法的，其影响是难于忍受的，而且估计会大

大加重这个殖民区的现有灾难。在欢声雷动中(甚至可以说在疯狂的欢呼声中)，他号召所有到会的人使用除革命以外的一切宪法许可的手段，迫使政府改变这些条例。

这种吵嚷引起了重新要求自治的运动，因为温特沃思立即在立法会议上提议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公众的不满进行调查，由他本人担任主席，并由其他一些志趣相投的地主、专门职业者和工商界人士协助工作。他们在报告中陈述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完全分立必然产生的有害倾向。他们还指出，各殖民区的总督经常要向唐宁街①请示，从而显示出他们仍处于十足未成年的、受监护的状态。更大的弊害是伦敦方面缺乏必要的情报以供正确解决纯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因而必然导致错误的决定和不完善的立法。为了补救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弊病，委员会建议成立责任政府；为了补救请示唐宁街这种较大的弊病，委员会提出实行自治，或者说，除了纯属帝国性质的问题以外，

① 唐宁街，伦敦一条街的名字，该处有英国首相、财政大臣等的官邸，因此一般也用唐宁街一词指英国政府。——译者

96 一切不受唐宁街的干涉。他们要求殖民地议会享有关于土地、入境移民、教育、邮电和关税的立法权，至于国防和对外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的立法权，则保留给帝国议会。

和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倡导成立陪审制和立法大会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温特沃思的放恣的语言损害了他在悉尼和伦敦政界所致力的事业。《悉尼先驱晨报》写道：如果以最好的手段追求最好的目的才算是真正聪明的话，那末，温特沃思不是一个聪明人。他们接着说，他的最有力的论据常因混杂有鲁莽和粗暴的成分而归于失效。尽管他的意图大体上是正直爱国的，但往往受到挨他谩骂而积怨的人们的误解和谴责。他们断定，温特沃思命该自招毁灭，他使人们确信他争取实现责任政府、自治政府的决心并非出自热爱祖国或热心公益，而是存心作弄、诋毁显要的官员，即他讥为"帝国官吏"的官员。

在伦敦方面，这些要求被交给一班擅长推诿的人士加以处理。斯坦利勋爵曾就要求成立责任政府一点这样写道：

女王陛下必须拒绝立即作出那么抽象和

> 含糊的任何约定……无论在哪一种地方①，女王都未曾作出关于殖民地政府的任何理论或抽象原则的任何声明；女王陛下也不必认为讨论这种理论或者提出这种抽象原则，系英帝国法律和宪法要求她履行的义务的一个部分。

这是英国人表达“时机未到”的方式，也是利用机会给殖民者讲授政治学基本原理的方式。

牧地借用人提出的保证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倒获得了较大的满足。根据1846年荒地出售条例授
予的权力，枢密院颁布了一项敕令，于1847年10 97
月在悉尼各报公布。殖民地拟划分为三类地区：已定居地区、未定居地区和中间地区。牧地借用人可以在每类地区租用土地，为期可长达十四年，每年缴纳小额租金；也可以按每英亩一镑的最低价格取得土地所有权。牧地借用人再次叫嚷他们的全部劳动果实已被伦敦的闭门造车理论家置于危险的境地。敕令中将价格规定为一镑，其原意是想表明，当土地收益折合起来比其所值为大时，才将土地出卖，但实际上却变成了表明根本不出

① 即既不是在加拿大，也不是在新南威尔士。——作者注

卖土地，这是一个奇怪的讽刺。

这意味着地产积累于少数人手中，多数人被排除在外。这是因为牧地借用人事实上业已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保证，从而取得了澳大利亚牧地和耕地的垄断权，例如仅在新南威尔士，枢密院敕令就把一亿八千万英亩的土地分给约一千八百人。这样一来，原意在于防止定居分散的条例，结果反而把十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新南威尔士规定定居范围以外的一些牧地借用人。正如立法会议一个委员会在1847年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最胡乱地滥用土地赐与权，其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由于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的保障，牧地借用人就着手改善他们的牧场：用篱笆将小牧场[55]围住，并用砖石建造起同他们的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家园。在已定居的地区，如新英格兰、堪培拉、维多利亚西部地区、德温特谷地和南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他们开始与悉尼、霍巴特或阿得雷德的政府合作，建筑学校和教堂，作为秩序和文明的表面的、有形的标志。在新南威尔士的亚斯，有一些牧地借用人在英国圣公会教堂的钟楼上刻上“我在异乡唱圣歌”的词句，借以概括他们的苦闷和对较

古文明的怀念。牧地借用人还致力于解决内地长
期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但是，由于处境十分窘迫，
他们迫不及待，力图补救，以致所提的补救办法使
他们失去了以乡间管事人身分本可享到的声望和 98
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种土地使用权的保
障，已为他们提供了采取这些措施的机会。

在此期间，所有各殖民区的政治活动继续受到了教育问题争论的干扰。到了1844年，教派制度不能给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十分明显了；而它的失败在乡村地区比在市镇更为显著。教派制度由于浪费、开支巨大、加深宗派情绪、强迫教员奉承牧师、教师质量差(因为低工资招致了怪诞不经，甚至类似恶徒的人物担任教师)，也受到了批评。政府、长老会教友和不从国教者，都建议实行公立学校制度，让在校儿童学习有关宗教的见解，而不学习宗教教义。但圣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却对这种办法深恶痛绝。在他们双方看来，试图讲授一些象大家公认的宗教信仰那样含糊的东西，都将使大家不关心宗教和不信宗教。1844年，布劳顿甚至对立法会议的教育特别委员会主席说，如果对儿童不讲授他们自己所属教会的教义，

他宁愿让他们完全不受教育。波尔丁主教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尽管他巧妙地不让人家知道他也有“与其错误，毋宁无知”的看法。

这一次，在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和南澳大利亚，政府倒有勇气不理睬神父和牧师关于公立学校是不道德和不信神的温床的预言。在1848年至1849年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采用了双轨制教育：教派教育局负责在各教派中分配国家拨给的款项；国民教育局享有建筑学校、装备学校和支付教师薪金的财力和权力。教师必须具有基督教感情，性情沉着，态度谨慎。他们还必须是富于和平精神和善于教人守法忠君的人。选用的课本要大量灌输全体基督教徒同意作为宗教真义的最重要的原理。至于各教派的教义，则由基督教各教派的神父和牧师在规定的时间传授。

99 天主教徒把公立学校指为新教的神学校。有些新教徒也误受影响，以为这比屈服于“天主教的”支配稍胜一筹。在试图调和两派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政府对教派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不拨给所需的经费。因此，两种类型教育的质量都由于宗派愚行受到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同

意发展一种教育制度，让三种类型的学校(新教徒的学校、天主教徒的学校以及由具有启蒙思想的人所办的学校)同时存在，在人性、人生意义等方面各自提出其根本不同的观点。

与此相反，南澳大利亚于1851年成立了一个中央教育局，那些单纯代表教派的人明确地被排斥在外。在他们监督下开办了学校，对儿童传授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良好的普通教育，排除一切关于修行、教义等神学方面引起争论的不同观点，也不采用任何教派的教义问答。圣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对讲授没有教义的宗教课表示抗议，长老会和不从国教者则庆祝自立原则的又一次胜利，并轻蔑地不理睬圣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所提出的警告——所谓没有教义的宗教将为不信神的时代开辟道路。

当神父和牧师为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发生争吵的时候，牧地借用人已被迫采取很少成功希望的补救办法来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1843年，因为相信劳动力缺乏一定会导致破产，他们建议输入印度苦力。他们认为，这些人十分适合充当牧人的角色，并且在诚实和不喝酒两方面有出色的

表现。此外，牧地借用人认为印度苦力到澳大利
亚居留以后，势必习染文明生活习惯，同时由于偏
见的消除，他们会更易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和
感化。有一个来自新南威尔士南海岸伊登附近
博伊德镇的流浪汉[77]，名叫本·博伊德，在伊
登一莫纳罗地区拥有辽阔的牧场。他不耐烦地摒
弃了有关文明和基督的空谈，从太平洋岛屿招募
了一批牧人。城市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咒
100 骂他是一个想在太平洋重新开辟奴隶买卖的、贪
婪的恶徒。市镇工人也表示抗议，认为采用那些
势必妨碍道德品质发展的手段来降低工资是缺德
的。他们认为，苦力意味着奴役和卑贱。他们还
提出另一理由，说这里的工人要不是欧洲人，就一
定是欧洲人的后代。

因此，在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准的第一次尝试中，工人有意识地主张澳大利亚应当保留给白种人。他们开始把牧地借用人视为“白澳”观念的叛徒。他们认为，作为一个集团，牧地借用人总是想保存他们在流放制下享受的利益，使社会上其他阶级蒙受明显的损失。与此同时，伦敦殖民部的常任负责人詹姆斯·斯蒂芬就牧地借用人的建议

写了两份备忘录。他在1843年7月写道：

……据我看来，引进黑种人(从印度引进新南威尔士)将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一项最不合理的措施。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五、六代，地球上没有哪一种社会利益比下述利益更为重大，那就是：把新荷兰大陆留作英国种族随处定居的场所，避免与任何低级种姓混杂……我们的祖先曾把黑人从非洲移殖北美，现在我们对他们的愚行感到了遗憾。

1843年9月，他又在备忘录中写道："(有色人种)①将因他们与较高贵的欧洲人种混杂而使后者降格。"

面对着专门职业阶级、中等阶级、工人和在英国的国教教友对有色劳工的反对，一些牧地借用人改变了主意，转而希望恢复流放制。当1840年新南威尔士废除流放制时，约翰·罗素勋爵曾经计划把一部分罪犯留在联合王国，以减少流放到范迪门地区的人数。政府的更迭打乱了这些计划，以致范迪门地区罪犯充斥。1829年到1840年间，平均每年有一千六百五十八名罪犯流放到范

① 括号内的字为作者所加。——译者

101 迪门地区；1841年至1846年间，激增至三千五百二十七名。在这期间，既没有准备增加房屋以收容罪犯，也没有增加官员人数。移民并没有因为劳动力充斥而得到裨益，因为1841年7月，范迪门地区废除了指派制，而代之以假释制，罪犯就在官办的农场或工厂编队劳动。可是范迪门地区政府得到指示，使用罪犯要给以报酬，而殖民区政府却无力负担这种费用，因而无法使用他们。这样，编入假释队的罪犯都给安排去生产他们自己所需的粮食。

不久，定居乡间的移民和市镇居民就开始抱怨说，那些原来旨在感化罪犯的假释队却不过是高级邪恶的养成所。牧师们大吃一惊，对这种刑事惩罚感到极端失望，因为它助长假释队队员每夜犯下了“曾由上帝降火毁灭的平原诸城①的种种可厌、可鄙、可憎、可恨的罪恶”。1841年至1846年间发生的经济混乱和行政混乱，使范迪门地区的居民认清了流放制在道德方面所产生的祸害。

---

① 平原诸城系指所多玛、蛾摩拉等五个城，称为罪恶之都，位于约旦河畔的平原，故名。典故出自《旧约全书·创世纪》。——译者

新任殖民大臣格拉德斯通一听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又发生鸡奸的消息，就决定在1846年停止把罪犯流放到范迪门地区，为期两年。

于是，新南威尔士有些牧地借用人乘机要求英国政府重新把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中的一个委员会(由温特沃思任主席，并集中了不少地主分子)于1846年大胆地提出：牧人或茅屋看守人[42]的生活，会使堕落了的人受到教化，恢复正常，使他们疏远以前的嗜好和所干的勾当，特别是牧人的生活方式会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默察“宇宙的伟大创造者”的力量和善行。据他们说，“这个宏大的国民教育和移民计划最终将使大不列颠的犯罪和贫穷减少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 102
同时也将解决牧地借用人的劳动力问题”。这时，英国政府在犯罪增加的压力下，决定恢复把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的制度，但规定不得指派罪犯充当移民的雇工。当这个消息在新南威尔士宣布的时候，悉尼的居民准备反对，而霍巴特的居民则认为政府官员背弃了自己所作的庄严保证。

1849年6月11日，在悉尼环形码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大会，向从伦敦运送罪犯来到悉

尼的轮船“哈申米号”举行示威。尽管天雨连绵，仍有四、五千人聚集在一起倾听演说。生得肤发苍白的罗伯特·洛因为曾在英国的寄宿学校受到各种屈辱，这时候为了泄忿，就在热烈的欢呼中站了出来，支持他们的抗议。他说，堕落的威胁已经来了；悉尼市的庄严市容和悉尼港的美丽海面，今天又因浮动地狱——罪犯船的出现再度遭受玷污了。在喧哗的欢呼声伴奏下，他告诉听众说，新南威尔士势必再一次变成为非作歹的“学士”们修完他们课程的大学校，大不列颠的社会垃圾又倒进新南威尔士来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个钱包问题；罪犯也许可以增加牧地借用人的利润，但对于他们，这却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反对一种曾在各国破坏过自由的制度。在美洲，压迫曾经产生过独立；在这个国家也将是这样。在这里，不义不仁也将引起反抗，而反抗则将发展为独立。在另一些人发表了演讲以后，大会在肃静中结束，没有发生什么纷扰。据《悉尼先驱晨报》记者报道，人们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气氛，行动得当。在极度慷慨激昂的时刻，大会曾考虑过一种鲁莽意见：攻占总督官邸，强迫胆小的菲茨罗伊总督命令船

长把道德垃圾倒进大海。但总督官邸同意接见他们的代表，并把一些罪犯送到内地，其余则由“哈申米号”载往莫尔顿湾；在那里，牧地借用人正在 103
叫喊着需要劳动力，而且也没有中等阶级或工人阶级出来反对他们。

尽管市镇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愤然反对，澳大利亚东部的牧地借用人并没有统统放弃获得罪犯劳动力的希望。莫尔顿湾地区的牧地借用人曾请求脱离新南威尔士独立，但求能够得到罪犯。菲利普港的一些牧地借用人也是这样。因此，从1847年起，菲利普港有一个支持接纳流放罪犯的团体鼓吹脱离新南威尔士独立，而且与墨尔本一个坚决反对恢复流放制的、争取独立的团体合作。与此同时，除西澳大利亚外，其余殖民区全都组织了反对流放制协会，根据道德理由鼓吹反对恢复流放制。当“伦道夫号”罪犯船于1849年8月在菲利普港的霍布森湾下锚时，墨尔本群情激昂。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居民发誓要和决心拒绝使用罪犯的其他殖民区合作。1850年10月1日，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在收到许多关于反对流放制的请愿书之后，决定不再把罪犯运到这个殖民区的任何

地方。

与此同时，菲茨罗伊总督正在秘密写信给伦敦说，反对流放制的运动是有预谋的，是由心怀不满的人搞起来的，他们正在把不忠于母国政府的情绪逐渐灌输到社会下层阶级的心中。为了揭穿这些报告的谎言，墨尔本于1851年2月成立了反流放同盟，它的成员都发誓要阻止在澳大利亚设立英国监狱或充军地。不出三个月，除西澳大利亚外，所有殖民区都有了这个同盟的分部。同盟还选定南方十字星座作为这个运动的全国性标志。这样，罪犯问题就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居民之间培育了一些利害一致的情绪。但是格雷勋爵由于信任菲茨罗伊关于有预谋和心怀不满的人的报告，断然拒绝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的决议和反流放同盟的请求，从而使形势有利于性急的人和极端主义者。

104 与此同时，流放问题已使要求自治和要求责任政府二者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居民集中全力对现行宪法进行激昂尖刻的抨击，因而他们都不花费时间来考虑他们需要哪一种宪法。这些问题大部分正在英国由格雷和斯蒂芬这样的人

物来进行考虑，他们都是深受德托克维尔①的著作，特别是《美洲民主政治》一书的影响的。正当移民们纷纷议论英国的压迫时，格雷却在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在那些由于定居分散和使用罪犯而出现行政高度集中的殖民区推广地方政府经验和培育自治精神。格雷还考虑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新宪法要作出什么规定才能防止多数的专横？他也考虑到四个殖民区的议会就诸如铁路或关税等方面各自立法的不利情况，因为各殖民区对铁路和关税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多式多样的立法也许要招致浪费。他运用使人联想起公祷书节奏音律那样的华丽词藻，引起了殖民者对设立联邦众议院问题的注意：联邦众议院可以在若干特定的范围制定约束各殖民区的法律。

可是殖民者始终无动于衷，他们重弹自治政府的旧调。而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的议员还补充

① 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法国外交部长(1849年)。著有《美洲民主政治》(两卷，1835、1840年)和《旧制度和革命》(1856年)。曾因反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入狱。——译者

说，他们对一个不受新南威尔士控制的联邦众议院不感兴趣。南澳大利亚也拒绝了上述建议，认为按照英国人的观念，这个建议是违宪的——这是他们后来忠于地方的态度的一个迹象。在他们眼里，象美国那样的联邦是一种不合英国传统的政治行动，因为它违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并且危害他们的殖民经验。各殖民区相互间的关税和不同的铁路轨距，就是姑息这种愚行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因为格雷考虑了殖民地反应之后，终于在澳大利亚殖民区政府条例的最后草案中规定让菲利普港脱离新南威尔士分治，并
105 在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分别成立立法会议，议员中三分之一由政府提名，三分之二按高额财产资格选举产生。这个条例于1850年由英国议会通过。此外，格雷还在条例中列上一项条款，授予各殖民区立法会议起草新宪法的权力，但须提交英国议会批准。

当澳大利亚殖民区政府条例的内容于1850年末传到悉尼的时候，人们报以表示失望的咆哮。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对条例授予这个殖民区的宪法深感失望和不满，这种情绪充分表现在1851年

初通过的宣言、抗议和申辩上面。他们抗议说，征税的权力只能由殖民区的立法机关行使，出售皇家土地所得的收入应由他们管理和使用，海关和所有其他政府部门应归殖民区立法机关直接管理和监督，机要的、高薪的官职应授予已定居的居民(总督一职除外)，立法的全部权力应授给殖民区的立法机关，由它行使。他们严肃地告诉女王陛下和联合王国的同胞说，如果一个地方行政机关，不管多么紧急，都得把所有重要的施政措施向毫无经验、不负责任而远在伦敦的部门请示，那么，它的威信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霍巴特对这个条例的反应也不热烈，报界力促新的立法会议进一步控制地方事务，并使该殖民区摆脱流刑执行地的臭名。《霍巴特信使报》写道，由官方指派的旧立法会议已不再受到尊重了。阿得雷德平静地听取了这个消息，态度严肃得体，正如正直的人惯常谈论上峰的决定那样。佩思的居民因为从罪犯身上得到了物质利益，却准备放弃英国人生来就享有的自治权利作为代价。

当这个消息于1850年11月传到墨尔本时，全市连续开展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当地报纸出版

号外；旗竿山上升起了英国国旗；鸣放礼炮；夜间
106 全市灯火辉煌；教堂举行特别的感恩祈祷。庆祝活动持续了一星期之久，最后还举行了一次化装舞会。在这一周，横跨亚腊河上的大桥即王子大桥正式通车。墨尔本开始打算让物质进步和政治进步二者并驾齐驱。这种并驾齐驱迷惑了新教徒，使他们宣称自己是天赐恩泽的受惠者；也迷惑了其他人，使他们感到他们文明的优越性。1851 年 2 月某日，新南威尔士殖民区政府秘书迪斯·汤姆森拆阅了一位爱德华·哈格雷夫斯先生的来信，信中报道在巴瑟斯特附近发现了金矿。迪斯·汤姆森曾对殖民地走向平等的趋势感到厌恶，他希望见到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发展成为由生产细羊毛致富的殖民贵族领导的殖民地社会。当他在悉尼炎炎长夏之末读到这封信时，他是否觉察到他所希望见到的那种殖民地社会在随着发现金矿而出现的变化面前，将会象风里雪花一样顷刻消失呢？关于这一点，可惜历史并未记载。

1849 年 8 月，《悉尼先驱晨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曾这样提出问题："各位先生，我们的澳大利亚是不是要成为第二个彼奥提亚①，成为世界各

国的笑柄？我们有哪一所房屋或公共建筑物同艺术或科学有关，配得上称为文明的民族？或者说，难道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些事吗？”这封信可以作为入境移民长期埋怨殖民地社会没有文化的一个例子。不过信中所说最后一点并非事实。正如在所有的社会一样，这里也有少数人是关心这些事情的，不过他们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见解存在着严重分歧罢了。在发现金矿的前夕，新南威尔士的居民有二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三人，范迪门地区有七万零一百三十人，南澳大利亚有六万三千七百人，西澳大利亚有四千六百多人，所有这些人在文明方面至少受到了下列三种创造力之一的影响：新教的基督教教义、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启蒙思潮。

乍看起来，好象所有这些殖民地社会都由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无休止的派系争论而陷于骚动不安。报纸、布道坛、公众讲台、小册子都成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不体面的交锋场所，甚至

① 彼奥提亚(Boeotia)为古希腊地名。其居民以农业为生，沉默寡言，不象雅典人那样热衷于海外扩张。因此，雅典人讥笑他们为有钱而头脑迟钝的人。后来“彼奥提亚人”(Boeotian)一词成为粗野、蠢材的同义语。——译者

107 法庭的诉讼也往往这样。1838年7月底，悉尼市中心贴出了通告，召集天主教徒参加波尔丁主教召开的大会，抗议最高法院威利斯推事指控他们崇拜偶像。1848年，整个新南威尔士的新教会众宣布，把圣公会牧师斯康斯和麦肯森被准许加入罗马天主教会的日子定为哀悼的日子和受上帝惩罚的日子，因为他们两人存心邪恶，已象迷途羔羊一样背离了上帝。一个名叫约翰·麦肯克罗的天主教会神父称约翰·喀尔文为鸡奸者，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所有领导人为肉欲的奴隶。象在早期一样，新教徒已被这样可怕的梦魔所困扰：他的高级物质标准和个人自由将随天主教势力的膨胀而受到蔑视。他还受到了贫穷不堪的爱尔兰人的侮辱，他们十分鲁莽地告诉他说，除了罗马教会以外，再也找不到救世之道了。对于新教徒来说，这种意见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才会相信。另方面，天主教徒则为一种恐惧心情所纠缠：由于面对着一个新教徒占优势的社会，他们的信仰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因为这个社会的学校、公共建筑物和公共仪式无不浸透了新教教义的正统精神。他们还抱怨他们的社会地位低微，抱怨这是做天主教徒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认为，专门职业、工商界和公共职务的最高职位都留给了新教徒。因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双方都唯恐失去他们暂时和永久的幸福，按不住满腔怒火，以致任性地表现出人类的疯狂与愚蠢，往彼此的脸上抹黑。

不过表面现象使人们产生了错觉，因为它们分散了人们对这一时期新教和天主教文化复兴的注意力。新教徒部分地由于"英国式天主教的"牛津运动①传来澳大利亚各殖民区，显得生气勃勃。劝告别人改变信仰来支持这个运动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新南威尔士的布劳顿和范迪门地区的尼克松。至于圣公会以外各教派的新教徒，则由于政教分离论者的到来以及福音派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复兴，平添了生气和力量。他们也因卡迈克尔和曼斯菲尔德等人的到来而得到了至少是暂时的加强。这两个人相信有平常人的宗教这么回事，这就是 108
既无需教义问答也不要教理，单以新、旧约全书中上帝的启示为牢固基础的一种宗教。同时，他

① 牛津运动是1833年以后在英国发生的宗教运动，其目的要在英国教会内恢复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维护英国圣公会的权力和尊严。——译者

们的宗教也从启蒙思潮中关于人类手足之情和可能在人世谋得幸福的教导得到了灵感。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教徒不仅分裂成为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教派，而且对世界的看法也正在开始发生分歧。在圣公会教友、长老会教友甚至一些卫理公会教友当中，有人把人生看成是悲壮的一幕。他们从严峻的环境中学到了他们对人生的见解。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们体会到即使具有崇高品质的人们，其性格上的瑕疵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人世间深重的惩罚。从押沙龙① 的故事、«骚札纳和老者»② 的故事中，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以及从一些«诗篇»中，他们看到了：坏人比好人更有势力，正直的人今世得不到善报，赋有仁爱、怜悯之心的人无力对付坏人。

但另一方面，新教徒向群众宣讲虔敬行为时

① 押沙龙(Absalom)是«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中的人物。据说他是大卫王宠爱的第三子，因“结民谋位”，叛变失败，为人所杀。——译者

② «骚札纳和老者»是«旧约全书·但以理书»三个附篇中的一篇。说的是在犹太人被囚巴比伦期间，一个虔诚貌美的妇女骚札纳被两个老者调戏，她不肯屈服。后来，审判官偏信二老者诬指骚札纳与人通奸的谎言，要把她定罪，但以理挺身为骚札纳辩护，最后她被宣判无罪。——译者

仍旧涉及道德问题。南澳大利亚伯腊的一个通讯员在1849年高兴地报道说，人类的祸根——酗酒——依靠戒酒协会的帮助，已从伯腊迅速消灭了。他高兴地报道说，在新近一次茶会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桌上摆满了茶点，许多挤不进去的人聚集在室外。这位通讯员接着说："大约有八至十名演说者向在座不饮酒的、懂得合理享受的儿女们作了演讲，中间穿插有戒酒赞美歌，由出色的乐队卖力伴奏。"由于新教牧师对戒酒运动、对减少卖淫和赌博表示了过分而虚伪的支持，在大众的心目中，他们被认为是赞成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道德警察，而不是以言教和身教引向得救的导师。他们不断地劝说人们要接受从属的地位，不断地怂恿穷人忍受生活上的卑贱处境，这就无异于出卖他们的宗教信仰来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和伦敦的 109
掌权阶级的社会需要服务。不管后果怎样，新教牧师们已让他们的宗教变成服从于社会功利的宗教。这样，这种宗教的声誉高低，就全靠社会上是否还需要道德警察这一点来决定了。

另一方面，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神父的一举一动使那些不属他们教会的人把爱尔兰天主教和

爱尔兰人的世俗抱负等同起来。神父们以教念玫瑰经一样的热情教导信徒认识英国人在爱尔兰所犯的罪行和新教徒的罪恶。这样，天主教会象新教教会那样，也势必成为一种服从于社会功利的宗教。天主教神父也象新教牧师那样，充当了道德警察的角色：痛斥酗酒、卖淫和赌博。可是表面现象又使人产生了错觉，因为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区和西澳大利亚的天主教会逐渐受到当时英国天主教文化复兴的影响。这是由诸如下列一些本笃会教士传入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新南威尔士的乌拉索恩和波尔丁、范迪门地区的威尔逊以及西澳大利亚靠近佩思的新诺查的西班牙本笃会会士。他们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欧洲文明的创造者。他们只提到天主教会作为欧洲文明创造者的作用，只提到天主教会崇高、伟大的传统；至于那些从爱尔兰几世纪贫穷和压迫中产生的基督教反常现象，例如神父统治、教派的污点、不容许异己、坚持迷信，以至仍然把基督圣像和圣母像作为神迹保存等，则闭口不谈。当爱尔兰神父对爱尔兰下层阶级的世俗抱负表示同情时，本笃会会士则教人们维护社会等级和不平等现象。

与此同时，乡野工人正在摸索一套迥然不同的标准。由于对宗教慰藉的无知，由于同欧洲社会的传统和习惯毫无接触，他们寻求能够给人安慰的东西以弥补生活的寂寥，并使他们免受寂寥之害。他们在伙伴情谊中找到了这样的东西。一位观察员这样写道：

> 两个人在人迹罕到的乡野中这样一起劳动，大大养成了互相关心、互相信赖的习惯；彼此之间一旦有了互相帮助的习惯，就会引起感激，而感激又是关心的先导。在这种情况 110
> 下，人们常常能够同甘共苦，互相支援。事实上，人们普遍感觉到：一个人应能在任何方面信赖自己的伙伴。

同样的条件也促使人们笃信平等，并使大家习于根据表现而不是根据遗产来判断一个人。在凡事都愿意互相支援的同时，乡野居民却也对陌生人或不速之客抱着病态的怀疑，担心这些人也许会使他们失去劳动的垄断或者会扰乱他们的生活方式。伙伴情谊总是局限于本地出生居民的范围，而从他们的寂寞、孤立中孕育出来的理想反过来又成为加强地方主义、排外心理的力量。

111 七、黄　金

（1851—1861年）

1851年1月，E·H·哈格雷夫斯怀着渴望的心情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场回到悉尼。他并不具备任何实在的地质知识，只是把加利福尼亚的地质构造和十八年前他在新南威尔士所见到的情况相比，就断定澳大利亚一定有金矿。他回到悉尼，把他的设想告诉了他的朋友和熟人，大家都笑他是个疯子。但他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嘲笑而却步，却从悉尼出发到巴瑟斯特，然后在一个名叫利斯特的乡野居民[15]陪同下，从那里循麦夸里河而下，再转入它的一条支流，然后沿着流入那条支流的小溪[24]溯流而上，最后发现他已到达他所渴望的地方。他激动地对利斯特说，黄金就在他们的脚下。但那个乡野居民和悉尼的嘲笑者一样地表示怀疑。于是，哈格雷夫斯挖了一盆泥土放在水坑里淘洗，接着高声叫道："这就是。今天是新

南威尔士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将成为一个准男爵，你也将得到爵士的头衔。我的这匹老马将被制成标本，装进玻璃橱，送往英国博物馆。”当晚，在回到古勇的旅店后，哈格雷夫斯就他的发现写了一份报告寄给殖民区政府秘书迪斯·汤姆森，而汤姆森把这一发现的消息公布于1851年5月15日的《悉尼先驱晨报》。

这一消息立即轰动了全城。政府和雇主们由于工人纷纷离职去寻找美梦而感到震惊。采金场所需用的商品开始涨价：面粉涨到每吨三十至三十五镑，一磅面包卖到六至八便士。商店窗橱中 112
开始陈列专供采金人用的商品——蓝色和红色毛哔叽衬衫、加利福尼亚帽、皮带、采矿用靴和露营毛毯。行人道旁有镐、盆、罐和弗吉尼亚式淘金槽[23]出售。每天都有关于地上挖出金块的消息传遍全城，而且越来越过分渲染，甚至说金块就露在地面，先到的人可以随地拾取。

到了8月，人们的兴趣转而集中到了墨尔本，因为就在那个月，T·希斯科克在巴拉腊特发现了丰富的沙金。于是人心再度振奋。墨尔本和季隆两城的人几乎走光了。农舍为之一空；商业停顿；

停泊在菲利普港湾的船只也无人照管。甚至有些船主认定水手离船是不可避免的，就索性和他们一起出发前往采金。在那个潮湿而沉闷的8月，在那一阵采金热初起的日子里，墨尔本没有几家能够把仆人留在家里。但到了12月，已有许多人发现采金这一行并不是他们干的，于是又流回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办事员和有可靠职业的胆小鬼总是不愿孤注一掷来进行这种赌博的。采金业越来越只对冒险家和身强力壮的人才具有吸引力。到了1852年1月，已有足够的人从采金地回来参加那一季剪羊毛的工作。到了3月，也有足够的人力从事收割了。

1851年10月，矿区里的聪明人就已指出，采金业纯然是一件碰机会的事儿。另外有些人对那些希望费最少劳力就可以积得黄金满袋的笨蛋大摇其头。后者不久也就流回城市，对采金场上的艰苦抱怨不止。另一方面，那些装备优良的人，那些辛勤劳动了三、四个月的人和那些能熬住艰苦的人，却常常十分成功。身强力壮的人取得了成绩，但有教养的和文雅的人则在严峻的考验面前遭到失败。在早期，矿区的条件是简陋的。采金

人住在帐篷里，由同组的一员或一位女眷料理炊
事和杂务。帐篷和树皮小屋结构简单：在几根木
柱间张挂着几码长的白布，这就是大部分采金人
用以抵挡风雨的设备。采金人连胡子也不刮，因
为“长胡子”[3]已成为那些专心致志追求财富的 113
人的一种风尚。商店老板、狡诈的酒贩，间或还有
娼妓，则搭起了较为坚实的帐篷。采金人每周六
天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在安息日，不信教
的就打扮得整整齐齐，信教者则聚成一群，听从站
在树墩上的牧师领他们唱赞美诗，或者同声背诵
关于死者可以复活、来世可得永生的信条。

采金者多半以四至六人为一组，一人在矿洞中挖土和铲土，二人用手推车把土从洞口运到水边，其余的人则把泥土淘洗，直至黄金与泥土分离。一组人每日大约可淘得黄金一盎司，卖给矿区的商人可得三镑。如直接卖给墨尔本或悉尼的政府化验员，则可得三镑六至十先令。他们每天清早以肉排和排骨当早餐，伴以大罐的茶。餐后立即开工，用镐、铲、大车、手推车和淘金槽认真地工作。不时可能有人用宏亮的声音号召采金人集合，然后，由采金人公推的主席登上树墩，敦促大

家要为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规章。

与此同时，城市的生活也完全卷入了采金狂。据墨尔本《守卫报》报道，有些少女由于父亲到过巴瑟斯特采金，已开始以新的姿态出现街头。她们头戴崭新的小软帽，还可能手持阳伞装模作样地走来走去，活象印度的橡皮玩偶。有几个曾经有社会地位的、庄重的中年妇女也穿上华丽的绸缎服装走上街头，飘出一股股浓郁的香气。成功的采金人常常和妇女们坐在低级酒店里，一手拿着一卷钞票，一手拿着半品脱①烧酒，款待每一个朝他们方向走去的人。至于和他们呆在一起的妇女，其道德品行都可以作为牧师讲道时引用的资料。季隆城有一个医生曾把这种狂热和患某种发热病的病人所表现的下列症状相比：坐立不安，忧虑焦急，不想干本职工作。他预料这种兴奋必将造成神经错乱。但是矿场上一般还可以保持正常秩序和社交礼仪，同时，城里人看到采金人把辛勤
114 劳动的果实浪费于片刻的纵情享乐，也已习以为常了。

① 容量单位。一品脱等于二分之一夸脱或八分之一加仑，折合〇·五六八公升。——译者

到了10月，新成立的维多利亚殖民区的政府临时设立了一个金矿场管理机构。所有矿场归由一个总监统一管制。每个矿场设助理监督一人，受总监的领导。总监和助理监督的职责在于保证金矿开采条例的普遍执行。凡未经按月缴纳一镑十先令领取执照者，均不得在任何地方挖取、寻找或移动黄金。监督或由政府授权的任何人员得随时要求采金人出示执照，无执照者处以罚款。后来维多利亚的执照费改为一个月一镑，三个月二镑，半年四镑或一年八镑。商店营业的执照费为三个月十五镑，半年二十五镑，一年五十镑。采金人和店主们都埋怨收费太高。当有关人员站在树墩上宣读这项条例时，一个采金人高呼："分治有什么好处？"另一个采金人以轻蔑的态度提到这一宗"自治政府的范例"。还有一个采金人愤怒地叫嚷，说这种执照费比牧地借用人租用二十平方哩土地的费用还要高，况且牧地借用人并不是穷人，和采金人不一样。但是政府必须靠这些收入来支付矿场的管理费用。立法会议中反对采金的人士为数不少，只要它拒绝以其他方式给以财政支持，那就只有征税一途了。

金矿场的行政管理开始时还相当好。目击者盛赞矿场秩序井然。英国的专栏作家曾大言不惭地说，感谢上帝保佑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毕竟和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佬不同，没有象美国佬那样无耻地施用私刑。据一个目击者说，如果考虑到他们这些人的“材料”(即社会出身)，那末，可以说他们还是表现得不错的，虽然他们并不喜欢和绅士派在一起。那里也经常发生死人的事：这或是由于自然灾害，如大树倒落、矿壁崩塌，或由于从早到晚劳动艰苦、生活紧张而引起中风。医生，甚
115 至牧师，也都在为金子而工作。胡须满腮的牧师每个星期天沉溺于露天说教。到了夜晚，乐队奏起轻快的调子；成功者的呼喊、喝采和怪叫以及破产者的醉呼，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恐怖的夜晚。偷窃很少发生，谋杀更属罕见，这是因为到了第一个夏末，懦怯的人已离开了金矿场，寄生者、游手好闲的人〔6〕和骗子来的也不多，留下来的采金人虽然得不到象当初吸引他们来到矿场的那种财宝，但是大部分都挣得了优厚的工资。

在警官管理不到的地区，采金人有时采用简易审判的办法来处理盗窃事件。1852 年初，维多

利亚矿场有些采金人曾捉到一个小偷。在妇女惊叫、男子呐喊和狗群狂吠声中，大家开始闹哄哄地讨论自行处罚的方法。有人主张把他绑在树上用绳索来鞭挞，有人主张把他淹死，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弄到足够的水；还有人主张把他扔到崖下去。一个新到的人问道："难道犯人做了什么事值得把他处死吗？"回答"没有"的喊声未落，群众已急急忙忙把犯人推到附近的桉树下，剥去他的衣服，用半吋粗的绳索来鞭挞他裸露的背部，打得他几乎连走也走不动了。他知道，如果再去采金将有生命危险，只好一步一拐地离开金矿走到丛林去。偷水或偷金是采金者唯一不能饶恕的犯罪，虽然他们也并不优容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受不了艰苦的人。

1851年末，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已传遍世界。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有寻金人争先定购往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船票。已到加利福尼亚参加采金的澳大利亚人也试图返回家乡。有些美洲人认为在他们那里，象1849年那样兴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也乘船来到悉尼或墨尔本。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已开始考虑黄金的发

现对殖民政策的影响，虽然直到1852年12月，即在最早报告送到伦敦一年多以后，他们才在给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一份文件中宣布他们的决定。各殖民区的立法会议和无数公共集会都宣布他们强烈
116 反对流放制。国务大臣说："用公费把罪犯送到紧靠金矿场的地方，并有不久即行释放他们的意图，而数以千计的诚实劳工却欲往采金而不可得，这看来是很不合理的。"国务大臣满足了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流放制的愿望，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希望，即希望他们通过这一照顾认识到政府确愿考虑他们的要求，也希望他们加深对英王和英帝国的忠诚。这样一来，金矿的发现终于导致了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亚东部的结束。最后一批罪犯于 1853年到达范迪门地区。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总数约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 1850—1868 年间流放到西澳大利亚的约一万人。

由于使用罪犯劳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取得了把半奴隶劳动用于移植文明的好处，却没有给后代留下社会问题或犯罪意识；而这种情况在使用奴隶或半奴隶劳动的其他地方是往往发生的。至于使用罪犯所产生的其他影响，则仍然有各种

各样的看法。有些人多少凭想象地认为，澳大利亚人之所以热爱平等，可追溯到罪犯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大家都属不中用的共同感受，就象罪犯们灰溜溜地觉察到一项精神真理：反正已经倒下，也就不怕跌跤。另外有些人看到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早期男女数目悬殊，就把澳大利亚由男性统治的社会溯源到罪犯时代，并认为下列两种情况是从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产生出来的，即在社交场合上男女分别成群、互不相混的社会习惯以及男子使妇女蒙受一切大小屈辱的现象。还有人看到人们对警察公然持藐视和敌视态度，也把这一态度追溯到从前警察对服苦役的人辱骂和嘲笑的情况，当时的警察又常常是由罪犯出身的人来充任的。另外有些人提出，使用罪犯对大地主产生了不良影响。他们认为后来上层阶级目空一切、骄傲自大地对待社会上一切人的现象，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人还认为，由于使用了罪犯劳工，地主的上层才开始同社会中其他阶层疏远起来。但在1853年8月宣布停止输送流放犯的那一天，却没有什么人闲着去考虑罪犯劳动制度的遗留问题。悉尼市全市欢庆，并举行了感恩祈祷。霍巴特 117

居民把8月10日作为自愿假日，举行了盛大庆祝。为了纪念这件事，范迪门地区的立法会议于翌年恳求英国女王陛下把该岛改名为塔斯马尼亚，以纪念首先发现该岛的欧洲人。1855年7月21日，伦敦枢密院敕令公布：从1856年1月1日起，范迪门地区这一殖民区正式改称塔斯马尼亚。

与此同时，金矿的发现也使英国官员重新考虑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未来宪法问题。到了1852年末，国务大臣承认了这个事实，即社会上最忠诚、最受人尊重和最有势力的人物都要求成立责任自治政府。他也受到金矿发现的影响，相信这一发现将促进人口、财富和物质繁荣以无比的速度增长起来。因此，他要求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的立法会议分别草拟各殖民区的新宪法，以便提交英国议会审查和批准。各殖民区立法会议立即成立委员会草拟这种宪法。在立法会议的辩论以及在报刊和公众集会上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在澳大利亚谁应行使政治权力问题，暴露了两种极不相同的观点。

大家一致认为各殖民区议会应该被赋予有关关税、处理皇家土地以及所有地方性问题的立法

权。但是大家意见一致的也只是这一点而已。有一个集团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保守派的意见，它要求宪法反映社会上一些大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要求殖民区有一部具有稳定性的宪法，不要一受到群众意见的冲击就被搁置、更改或撕毁。就象温特沃思在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他们所要求的是“一部保守的——一部英国式的而不是美国佬的宪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温特沃思起初建议，上院应由享有世袭爵位头衔的人士所组成。但是他受到了当地有识之士的嘲笑，他们有力地指出这是一种“冒牌贵族政治”〔11〕〔12〕，而且建议给那些靠使用罪犯劳工发财致富的人物 118
加上嘲骂性的头衔——例如詹姆斯·麦克阿瑟可以称为卡姆登① 伯爵，而且不妨在他的族徽上添饰一个小兰姆酒桶。这样一来，温特沃思表示妥协，退而建议上议院议员的任命采取指派方式，并必须由具备一定财富、产业和教育条件的人士组成。他说：“这些人不是从社会上某一特殊阶层里选拔出来的，而是来自各阶层的有能力挣得地位

① 关于约翰·麦克阿瑟在卡姆登养羊发家的经过，参见本书第二章第35—37页。——译者

和荣誉的人物。”为了进一步保障保守派的利益，他提出一个条款，规定两院要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修改宪法。

新南威尔士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些建议很不高兴。他们要求宪法规定：无论上院下院，议员都应代表全体居民，而不只是代表拥有大量财产或较高文化程度的人。他们的发言人在群众大会上对温特沃思的建议报以叫嚷和嘲笑。1853年8月，在悉尼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自由主义者W·R·皮丁顿站出来问大家：是否甘心让自己的权利被人剥夺？人们高声答道：“不干！”当皮丁顿继续指出温特沃思的建议是企图制造一个拥有世袭特权的殖民地贵族时，听众发出了表示反对温特沃思的起哄声。在一片欢呼声中，皮丁顿结束他的讲话说：“殖民地的人们！现在说话吧！否则就得永远保持缄默了。”可是在当时，权力都操在牧场主、城市利益集团和官方利益集团的手里，并不操在人民手中。因此，温特沃思赢得了胜利，而在提交英国议会批准的法案中，保守派的利益得到了层层保障：立法会议由官方指派，修改宪法要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复数选权制，对选举立法大

会的选民规定了财产资格限制。

与此相比，维多利亚的牧场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尖锐。为了要共同对付采金人的过激要求，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对立情绪较少，而互相妥协的精神较多。1853年12月，殖民区政府秘书在维多利亚立法会议中宣称，要把已经在上涨的洪水堵住，这将是很拙劣的政策；较为可靠的政策是把这股洪流引入正当的渠道，使民主因素获得正当发展。这就是托克维尔的主张，他认为民主政治应由有教养和有知识的人来指 119
导，而不为群氓的意见所左右。他要求立法大会同时代表各“利益集团”和“人民”二者，而立法会议则代表该殖民区固定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这样一来，维多利亚立法会议提交英国议会审批的宪法规定，两院都采取复数选权制，参加两院选举的选民都定有财产资格限制，修改宪法要经两院绝对多数通过。塔斯马尼亚的立法会议也提交了类似的宪法。

另一方面，南澳大利亚盛行把地产一分再分，以致人口中有较大部分在土地上拥有固定利益。那里的人们认为，可以采用一部民主的宪法，同时

又不会使有产者和教育界的利益受到威胁。因此，南澳大利亚的宪法规定：凡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并在选举前六个月即已列入选民册的男子，都享有选举立法大会议员的权利。同时由于对立法会议的选举人有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权，特别是有产者的代表权，也有所保证因此，一般地说，这几部宪法是混合式宪法。它们首先将“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和“人民”的代表权加以调和。其次，当时对殖民地社会中究竟谁应行使权力，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两种意见；这几部宪法也调和了这两派意见。宪法规定最高权力仍归于英国议会。殖民区议会通过的法案，凡是关于修改宪法，关于总督的权力和薪俸，关于国防、对外政策以及关于结婚、离婚的，都必须由总督予以保留，提交英国政府批准。殖民区议会所通过的每项法令都必须送交殖民大臣一份，后者在收到二年之内有权驳回。不过这只是纸上文章。实际上，各殖民区议会对于地方性问题具有最高权力，而英国议会对于外交和有关帝国问题则享有大权。这样一来，按照1855年和1856年英国议会为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以及维多利亚制

定的宪法，这些殖民区议会既在地方性问题上获得了自治，也成为责任政府，这就是说，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当时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观察家正在 120
评论金矿场的生活对于社会标准所产生的影响。1851年末，巴瑟斯特金矿场有人写道：

> 的确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采金的力量对社会产生平等的效果更大，因为这种工作至少在一个时期可以无需任何资本而只要有健康和体力就干得了；一个惯于劳累的人，尽管无知，但在一项免不了要亲历艰苦的工作中却能和有教养和文化的人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

1853年，另一个来自英国的观察家指出，在维多利亚金矿场中，故国的那一整套贵族感情和联想转眼就消逝了。风靡一时的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最坏的那一种平民主义。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是看你过去是什么，而是看你现在是什么。在这个社会里，体力和勤奋是衡量一个人处世能力的最高标准。如果你不能工作，你就

是无用，你的社会地位就必然会降低。他最后说，维多利亚已成为“一个拥有黄金和牛羊肉的平等化的殖民区了”。

到了1853年底，沙金采掘人的收入下降了，这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金矿场上平等和友谊的可贵，他们把这一点和周围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政治、社会特权相比，看出了两者差异的深远意义。1853年末，树墩演说家开始向听众提出了比较广泛的问题。他们开始谈论采金人身受的三大不平待遇：执照问题上的不平待遇，土地问题上的不平待遇以及政治上的不平待遇。他们叫苦说，他们已无力缴纳执照费，而警察在搜索没有执照的人时态度严厉而残暴。警察们把没有执照的采金人视同重犯，由骑警押解沿公路游行示众。如果缴不起执照费，警察就把他们同小偷、盗马贼、惯犯[47]、杀人犯一起关在污秽而多蚤虱的囚室中。有的被用锁链拴在柱子上让太阳曝晒，让无情的骑警[74]嘲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人
121 阶级一向对警察怀有不可调和的憎恨的殖民地土地上。成群的采金人抱怨说，要是在加利福尼亚，这种情况一定不会长期不变的。有些则对人诉述

警察横行的国家的种种祸害。他们缺乏按合理条件取得土地的机会，因此也感到伤心。有些人想把采金赚得的钱投资于土地，但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使他们感到伤心的是缺乏政治权利。在他们看来，他们对殖民区的富庶和壮大曾作出贡献，但对殖民区的行政管理却未曾享有任何发言权。

1854年10月6日晚，巴拉腊特金矿场有一名叫詹姆斯·斯科比的被人杀害了。尤里卡旅馆主人詹姆斯·本特利、他的妻子和约翰·法雷尔以杀人罪受审，但知事宣判他们无罪。采金人从这次宣判中看到了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沾染了贪污受贿，而正是这些人在折磨着他们的阶级，于是他们群集在旅馆外面，一把火把旅馆烧掉了。从那天起，采金人召开了一系列群众大会。在这些会上，群众先是要求公正处理杀害斯科比的凶手，但这一要求很快就为要求革除对采金人的不平等待遇的呼声所淹没。11月11日，在贝克里山冈上召开了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会上成立了一个革新同盟，争取实现下列要求：(1)充分而公平的代表权；(2)成年男子选举权；(3)立法会议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4)对议员发给薪俸；(5)缩短议会任

期。此外，他们还要求撤销总监和助理监督，废除采金人和店主的执照税。但是墨尔本政府却派来了更多的军队，并且组织了更多的执照稽查队。

11月29日，采金人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树墩演说家的煽动下，采金人把他们的执照投入大篝火中焚毁。大会就在这样热烈和激动的气氛中结束。监督却愚蠢得难以置信，竟决定在第二天进行执照总检查，从而激发了一次暴动。官方宣读了“暴乱取缔法”①。于是采金人中的激烈分子开始拿起武器，并在巴拉腊特的尤里卡构筑了栅栏，在栅内进行操练。夜晚，当“南方十字星座”旗在栅栏上空升起时，他们庄严地举行了效忠宣誓。12月3日，也就是星期日的早晨，当栅栏中许多
122 人已泄气离开，只留下一百五十人的时候，军队指挥官号召他们立即投降。当这一号召遭到拒绝时，指挥官便下令开枪。全部战斗在十五或二十分钟之内便告结束。采金人有二十五人被杀，三

① “暴乱取缔法”是英国于1715年颁布的一项镇压人民群众的法律。它规定凡十二人以上“非法”集会“扰乱治安”者，政府官吏得宣读该法，命令解散；如宣读后一小时仍不散去，即构成重罪，得被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译者

十人受伤；军队方面有士兵三名、军官一名被杀，有士兵十一名受伤。士兵们一旦闻到了血腥，就变得十分凶暴。骑兵开始对采金人乱砍乱杀，直到长官下令制止时才住手。警察也趁机对金矿场上的新闻记者加以胁迫，因为后者报道过警察镇压采金人的可憎行动。采金人的领袖彼得·莱勒在这次战斗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他躲藏了一个时期以避开官府的迫害。几年之后，他重新露面，当了维多利亚立法大会的一名保守派议员。

总督呼吁女王的所有忠实臣民和在女王旗帜下受到优待和保护的外来人协助维持社会秩序，保持法律威权；看来这个呼吁已经战胜了叛乱的力量和激进派的要求。政府也急忙采取一些措施，以缓和采金人的不满：废除令人憎恨的执照费，采金人每年付款一镑就可取得采矿权；黄金出口每盎司抽税二先令六便士以供矿场行政费开支；改革矿场管理，设监护人以代替监督；把金矿场列入选区，凡取得采矿权即等于具备维多利亚立法大会的选民条件。似乎由于满足了温和派分子的要求，盎格鲁撒克逊人再度使激进派分子安静下来了。可是尤里卡意识毕竟比原来栅栏防御

者显得更加持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澳大利亚卡尔古利的沙金采掘人在另一次争取采金人权利的斗争中，援引尤里卡的事例来鼓舞自己。在转入二十世纪的时候，激进派的诗人开始把尤里卡作为民主派和激进派取得后来一切成就的原因加以描述。维克托·戴利写道：

可是，这一年还没有消逝，
自由就象洪水一般奔流：
123 他们给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当时我们用鲜血提出了要求。

与此同时，亨利·劳森①也在叙事诗《尤里卡》中写道：

可是采金人并没有白白地死去。他们的同志可以欢欣，
因为人民的呼声已压倒暴政的声音。
它说：改革你们腐朽的法律，使采金人得以伸冤，
要不然啊，现在的兄弟们，我们就要团结战斗，和他们在一边。

---

① H·A·劳森（1867—1922）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和短篇小说家之一。详见本书第九章第312—314页。——译者

这样一来，尤里卡已成为某些澳大利亚人民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的历史是一个从殖民地呱呱坠地时的黑暗而血腥的日子走向光明而伟大的将来的稳步发展的过程，而一旦到达了光明和伟大的将来，人民就会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得到解放。

可是，饱受他×的执照税的折磨和污辱而满肚怨气的采金人，他们的脑海中却没有浮现过那样美丽的憧憬。一旦那种侮辱被去掉以后，他们又立即陷进了其他的苦恼之中。其中的第一宗就是中国人问题。中国人于1855—1856年开始大批来到维多利亚金矿场。当时沙金采掘人的收入已降到不熟练体力劳动者的水平，同时因为金矿位于深层，已开始由采金公司雇用采金人作为工人进行开采，代替了原来四至六个独立采金人结合的淘金小组。这些中国人来自华南，一般都和某个头人立了约，听从他的命令而从事劳动，以偿还他们在国内所欠的宿债。他们每来一批，都有六、七百人之谱，每人带一条扁担和两只畚箕，头戴直径约有一码、形如干草堆尖顶的帽子。初来的时候，他们还遵守旧社会的一套规矩：年轻的尊

敬老者，未经老者招呼不敢坐下。但是，就象一个讽刺家说的："我预料他们经过殖民地化之后，就会丧失他们那一套好礼仪。"

1857年，维多利亚金矿场有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名中国人；1861年有二万四千零六十二人，其中仅有妇女六人。当时维多利亚金矿场有二十
124 万零三千九百六十六名欧洲人，其中男子一十三万零五百三十五人，妇女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一人。到1857年，无论是市镇里或金矿场上的欧洲人都害怕中国人。约翰·帕斯科·福克纳要求维多利亚立法会议指派一个委员会拟订法案，以控制涌入该殖民区的中国移民洪流，并且"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金矿场变成中国皇帝和亚洲的蒙古、鞑靼部落的财产"。采金人对中国人加以非难，说他们因缺乏妇女而有不道德行为；说他们对当地财富无所贡献，反而把他们所得的全部财富输往中国；说他们还犯了其他大罪。但是主要引起当地采金人不满的，是黄金产量的大量减少和劳动力价格的日益降低。欧洲人为之惊恐。中国人反应说，他们认为英国人十分和善，同时也欣赏英国人所表现的仁慈。他们说：

我们在这里的中国佬只不过采些头头尾尾,从欧洲人已经放弃的矿洞里采一点,此外再没有捞到什么黄金,我们所得的也仅够糊口罢了。我们所捞得的只是残渣,不可能和欧洲人相比;要是我们有他们那样的机会,我们决不至穷成这样。只要我们挣得一点钱,我们就会设法返回祖国和年老的父母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古书教导我们要侍奉父母……现在听说你们要每月征税一镑,我们非常难过,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求求你们尊贵的议会能够体谅穷人,不要征收税款,那末我们全体中国人将感到高兴,将永远尊敬总督和议员们,永远不会忘记对穷人表现仁慈的人们。当我们返回祖国以后,我们将永远称赞对穷人如此仁慈的统治者。

可是欧洲人并没有被这种扣人心弦的恳诉所感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议会都通过了法令,以限制中国人入境并歧视在金矿场居留的中国人。但中国人并未因此却步,转而陆续在南澳大利亚登陆,每批六、七百人,排成单行,徒步从阿得雷德横越内陆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场。于是盎格

125 鲁撒克逊采金人就在金矿场上私自执行法律。1857年，维多利亚的巴克兰河畔曾发生过一场险恶的排华暴乱。1861年6月30日，新南威尔士杨镇附近兰明低地还掀起了一场带有惊人暴行的排华风暴。一阵“集合”[58]声之后，一千多人手持大头棒和锄头柄聚集在写有“不要中国人”的旗帜周围。他们粗略地组成一列纵队，由当地乐队伴奏军乐，奔向兰明低地的华人区。他们高声呐喊和歌唱，以宣泄他们对中国人的痛恨。据《悉尼先驱晨报》的通讯员报道，这些恶徒骑在马背上，仍然手持大头棒和鞭子，他们抓住中国人的辫子，把他们拉向马屁股，割掉他们的辫子，然后让周围的人向他们发泄愤怒。有一个中国小孩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乞求饶恕。但一个凶徒给他以足使巨人致死的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有个嫁给中国人的欧洲妇女也遭到殴打，她和她的孩子的衣服都被撕成碎片。逞凶者还曾商议如何对她进行无礼，只因其他欧洲人加以劝阻才未得逞。这次暴行进行了一整天，直到附近地区的军警接到口传电报[17]赶到后才恢复了秩序。9月，被控参与这次暴乱的所有欧洲人都由古尔本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悉

尼先驱晨报》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倒是“对那很不名誉的开端的一个适当的结束，而这一结束和开端又是那样圆满地协调一致”。在后来的十年中，由于沙金采掘趋于衰落，排华骚动也渐入低潮，只是在那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才又把激情煽动到白热化。既然采金人已经找到了发泄他们隐藏着的激情的替罪羔羊，社会大部分阶层的人们迟早也会为同样的情绪所激动。

金矿场上所发生的种种，使采金人伙伴情谊的理想受到了种族仇恨毒素的污染，但是在金矿发现之前即已出现的平等和均一的倾向，却也由于各种事件而得到了加强。1854年末，采金人就已开始发动争取政治平等的运动。1855年10月， 126
在维多利亚的比奇沃思，采金者的候选人把他的马镶上金护蹄，领着一支喝醉了酒的、吵吵闹闹的队伍，经过大街去参加一个争取全民选举的群众大会。1856年，在墨尔本和悉尼以及各金矿场都组织了改革协会，会员们都曾宣誓致力争取：成年男子选举权；任期多年的议会；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对牧地借用人不予补偿；停止政府对宗教的补助；义务和免费的普通教育。1856年11月，当墨尔

本责任政府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会场外面曾举行喧嚷的示威。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处议会内部，从金矿场选出的议员都要求激进的宪法，而从城市选出的一些议员则要求自由主义的宪法。1858年5月，亨利·帕克斯向新南威尔士的立法大会说道：

比较地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水平上……原则上，这个国家基本还是民主的。至于等级差别，就目前我们当中已经发展到的情况来说，会让母国的人们付之一笑。人们必须按照本国的精神来建立自己的制度。

因此，他对下列建议表示支持：采用成年男子选举权制以选出立法大会；选区分配应有利于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利益集团；采用不记名投票；废除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的规定；废除立法大会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他认为议会应代表多数才是对的，应当让有才能的人出头，而不是让出身好或享有特权的人出头。

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论在新南威尔士或维多利亚都受到了大地主和牧地借用人的强烈反对。这两类人继续维护议会应代表利益集团的这一原则。他们要求两院一定要代表社会上的主要

利益集团：地主、城市利益集团、金矿利益集团
(虽然他们对承认这个集团的存在是感到难过的)
以及教育界或专门职业界。例如唐纳森就曾在新
南威尔士立法大会上提出意见，认为承认自由主 127
义者的要求就会把立法大会变成一个危险的、糟
透了的、使财产和自由受到破坏的大会，就象1789
年在巴黎召开的大会那样。他认为自由主义分子
所提的各项建议会把一个一向富裕的殖民区变为
一个贫困之邦，使它再也得不到信贷和投资。丹
尼希曾在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上慷慨陈词，要求
悉尼大学应得到特别代表权，理由是教育界人士
可以冲淡殖民地社会粗鄙的物质主义风气。但是
提倡由多数来统治的人们把他的建议挫败了，而
当新南威尔士的物质繁荣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
汹涌而过的时候，这个倡议甜蜜和光明的人一直
到死还是一个穷光蛋。

在1856到1858年间，自由主义派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二区都胜利地实现了成年男子选举权制、无记名投票、重新分配选举区以及废除立法大会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至于有产者的代表权，在新南威尔士由于复数选权制和指派立法会

议议员两项规定而得到了保障，在维多利亚则由于对立法会议的选举人规定了高额财产资格限制而得到了保障。这个由大多数来统治的原则产生了一个副产物，那就是英国政府决定同意北部各地区居民的一项请求：履行澳大利亚殖民区政府条例的一项条款，宣布另行成立昆士兰殖民区。这个新殖民区的疆界在1859年6月颁发的特许状中得到规定。同月，根据枢密院敕令，授予新殖民区一部宪法，其内容同于新南威尔士的宪法，也就是在1856年通过的、在1856—1859年间曾几次由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法令(例如选区条例)加以修正的宪法。

当政治制度和价值标准出现上列变化的同时，各殖民区的物质环境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从1851年12月到1861年12月的十年间，澳大利亚总人口由四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增到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一百四十九人。同一期间，仅维多利亚一区的人口就由九万七千四百八十九人增至五十三万九千七百六十四人，南澳大利亚由六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人增至一十三万零八百一十二人，塔斯马尼亚由六万九千一百八十七人增至八万九

千九百零八人，西澳大利亚由七千一百八十六人增至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六人，新南威尔士由十九万七千二百六十五人增至三十五万七千三百六十二人。1861年昆士兰的人口为三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人。人口的陡增并没有改变黄金发现以前来自 128
联合王国的人口和来自欧洲或美洲人口的比例关系。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少数民族。1861年，维多利亚的华人略多于二万四千人；1877年，在昆士兰金矿场的华人在一万三千人以上。殖民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比例关系也没有改变。1861年，天主教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金矿的发现长期地影响着几个殖民区的历史。它使维多利亚在二十年之内从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区，在人口、财富的生产以及在联合王国的声望各方面，都足以和原来所属殖民区媲美。另一方面，塔斯马尼亚由于没有发现金矿（仅有少量黄金），使得那里自由移民的一场幻梦——把霍巴特发展成为南太平洋的雅典——归于破灭；随着历史的流逝，霍巴特和它的腹地反而回到了毫无生气的地区性状

态。南澳大利亚人不但未能在他们的殖民区找到黄金，开始时还付出了一笔代价：那里的工人阶级人口有一大部分迁徙到维多利亚金矿场去了。不过，他们曾经把本地坚硬的石头变成了静水；凭借着同样的天赋，他们这次也竟把新的燧石砾变成了自流井。1852 年初，他们的立法会议通过了金块分析条例，这一条例防止了在阿得雷德对黄金进行投机买卖（除非将所得用来投资于南澳大利亚）。这一措施促进了用船只装运货物到墨尔本并运回沙金作为支付手段。同一措施也有力地诱致南澳大利亚采金人携带黄金回到自己的殖民区，并为农民的产品获得优厚的价格。南澳大利亚凭借着这一手段，不但挡住了采金风暴的袭击，而且还利用了这一形势得到了好处。有如 1852 年扬总督所指出的，南澳大利亚"得到不少好处，而没有碰到任何麻烦；而如果本区发现了金矿，这些麻烦就免不了"。

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建筑业的繁荣。在金矿发现以前的十年间，因为墨尔本房屋供不应求，营造商为势所逼，临时凑合用套板或帆布代替石
129 块。在十年的金矿时代，套板和帆布重新在墨尔

本盛行一时。临时住所变成了长期住房，应急之物竟为后来二十年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住宅制订了规范。一般中等质量的准则已经进入城市了。

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这些地区的财富得到更为深入开发的机会。1853年，一个美国商人G·F·特雷恩来到了墨尔本，想在金矿场经营企业，碰碰运气。他从美国进口了一部底盘装有弹簧板的、供长途行驶的马车，很快就改善了墨尔本与悉尼以及与各矿场之间的运输。1854年，第一列火车行驶于威廉斯敦和墨尔本之间；1855年，郊区火车开始在悉尼行驶。到了1862年，维多利亚政府已修筑从墨尔本到巴拉腊特金矿场以及到本迪戈金矿场的铁路。1864年，又将后一条铁路延长到墨累河畔的厄丘卡，以便把里弗来纳区的羊毛和小麦以及沿达令河和墨累河运来的新南威尔士西部的羊毛引到墨尔本港口，而不必运到悉尼。1856年10月，伦敦市长举行了一次雅致的宴会以祝愿"伊斯坦布尔号"一帆风顺。"伊斯坦布尔号"是一艘机帆船，预计它能把从伦敦到墨尔本的航程缩短为六十五天。这样一来，正如市

长在席间指出的，由于把风帆与蒸汽机结合使用，人们就能使航海达到完美的程度，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的费用来往于伦敦和澳大利亚之间。1858年10月19日，悉尼、墨尔本和阿得雷德之间的电信交通网也架设完成了。

由此可见，金矿的发现即使不是推进物质进步和促使民主运动强烈发展的原因，也为此提供了时机。正是由于物质进步和民主运动二者并肩前进，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居民才掀起了一股实利主义乐观情绪的浪潮。1858年5月13日，墨尔本《时代报》写道：

> ……让我们重提一下这一确定的事实：自治政府是促进和提高人民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一
> 130 部无可比拟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它胜过了其他用于同一目的的机构，正好象蒸汽机超过一切旧式运转方法一样。

《时代报》继续写道：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维多利亚人民远比旧世界任何优秀民族更宜于运用文明人的这一特权。维多利亚人实际上是精选出来的欧洲人，因此在这里，智慧、进取心、精力、气魄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普遍性。

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人民都把精力或心机用于追求物质利益。1853年12月，墨尔本圣公会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落成并举行礼拜仪式，有大批专诚的听众参加早祷和晚祷。185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宣布把下述信条作为天主教信奉的教义："最圣洁的圣母玛利亚，从她怀孕的最初一瞬起，就依靠全能上帝的殊恩，通过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功业，得免于一切原罪的污点。"当这一消息传到墨尔本时，天主教团体用维多利亚所产的黄金铸造了一枚纪念章献给教皇陛下，借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事件。

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免产生了一种自负的情绪；他们也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必然会尾随民主觉醒和物质进步而来。但是在五十年代之末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这一情绪和信念趋于破产。十多年来，南澳大利亚政府和维多利亚政府都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中部和卡奔塔利亚湾之间找到可供放牧的土地。1860年，维多利亚政府挑选了罗伯特·奥哈拉·伯克作为这样一支探险队的领导人，这一选择使了解内情的人士感到意外。伯克的天性是由

多种成分如此混杂在一起，以致当他达到人类成就最高峰的一刹那，他的弱点却招致了他的毁灭。当他年青在爱尔兰时，他曾带着在战场上成名立功的幻想参过军。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伯克
131 正在维多利亚金矿场任警察巡官；等他到达欧洲时，战争已告结束。他领导的这支维多利亚探险队装备非常充足。探险队于1860年离开墨尔本，那时维多利亚殖民区人民的热情和信心都已达到高峰，好象天地都要屈从于他们的意志似的。探险队经达令河上的梅宁迪到达库珀兹河畔的给养站；然后伯克带领威尔斯、格雷和金三人离开这个给养站前往卡奔塔利亚湾，留下一小队人由布拉领导在给养站等待他们回来。

伯克催赶同伴兼程前进，到1861年2月就冲到了卡奔塔利亚湾①。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的精力和技能，就是他狂热追求人世间功名荣誉的有效工具。但从这以后，事情开始变糟了。在他们的回程中，当格雷开始有体力衰竭的象征时，伯克以为他故意装病以借口多领口粮，因而狠狠地鞭打了他。十七天以后，格雷死去了。伯克怀着后悔

① 参见本书第202—203页地图4。——译者

和内疚的心情继续前进，希望到达供给站后不但得到新的补给，还可以受到人情的鼓舞。但布拉恰巧在伯克到达的那天早上离开了给养站，留下了一个埋在地下的瓶子，并在上面的树干刻了一个“挖”字。伯克、威尔斯和金三人由于艰苦跋涉和缺乏食物，双腿已接近于瘫痪，于是只好留在库珀兹河的给养站，直到他们恢复了体力。

随后，伯克作了一个愚蠢得难以置信的决定：不循原路回到达令河畔的梅宁迪，而出发到南澳大利亚的绝望峰。他还做了一件几乎同样愚蠢的事：他把留给布拉的字条放在瓶子里，却没有更改树干上的“挖”字标记。当布拉一班人在伯克、威尔斯和金三人离开后重返给养站时，他们没有去挖瓶子，以为伯克一伙人没有回来过。同时，三位探险家由于只食蘋[52]根和乌鸦而虚弱不堪，于是威尔斯再度回到库珀兹河给养站。他发现没有人动过瓶子，又认为布拉没有回来过。当威尔斯回到伯克和金那里时，伯克由于缺乏食物、体力衰竭而死去。他临终时叫威尔斯把一支手枪放在他的手里，这样就可以死得象一位军官和绅士。几天之后，威尔斯也死了。金则为土著所养活，免于

死亡。为了查明探险队的究竟，曾派出几支救援队，其中有一队最后找到了金。

132 当这一情况传到墨尔本时，有些人把伯克和威尔斯指为两个最富于勇敢精神的人，认为他们为了发展科学和人类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牧地借用人开始认真计划怎样去占领伯克到过的卡奔塔利亚湾以南的土地。有人说，几年之内，由墨尔本到卡奔塔利亚湾的旅程就会比较方便了，可以从一个牧场经另一个牧场依次走到。威尔斯在垂死的几天里曾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今天这样的处境下，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知道我们的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行动鲁莽，毋宁说是由于别人的处理失当，这总算是一个很大的慰藉。"究竟一个人内心有什么原因引导伯克走向毁灭，究竟机会和境遇构成怎样一个巧合，致使内心火热的伯克得不到他拚命渴求的东西，这一切，那些确信有进步这回事，确信人类可以达到圆满无缺的人们也无从加以推测。二十年之后，当民族主义者在这片土地上取得发言权的时候，他们还记得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曾在荒漠中受到考验而没有合格。

八、资产阶级的时代 133

（1861—1883年）

1858 年至 1861 年间，殖民地游吟诗人查尔斯·撒切尔在维多利亚殖民区从市镇到市镇漫游歌唱，夸耀人民的力量：

推翻了牧地借用人的统治，
给每个穷人一个家，
鼓舞我们伟大的居民，
我们不再象流浪者到处漂泊；
大发善心让劳动得到用武之地，
支持最纯朴而勇敢的勤劳，
因此没有谁会羡慕他的邻人，
而将感到满足和幸福。

当时听众报以掌声、嘘声、口哨声和热烈的欢呼声。当资产阶级变更各殖民区的土地法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推翻牧地借用人的统治了。在城市、市镇和乡村，要求“开放土地”的呼声甚嚣尘上。城市

资产阶级站在机会均等原则的立场上。资产阶级还认为，牧地借用人使用土地是浪费的。1858 年，维多利亚殖民区的牧地借用人领有执照的牧场共有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一十六英亩，这些土地全年产额（包括殖民区内部消费和出口在内）只不过净值一百九十九万七千四百六十九镑，即平均每英亩净值一先令三个半便士。而且，占有三千多万英亩土地的人们无法供应维多利亚居民的粮食。畜牧业佃户积聚了财富，留下来的却只
134 有大量的蓟、牛蒡以及几间残破的简陋小屋罢了。由于 1851 年以前滥行让与大片土地，殖民区最肥沃的和最好使用的土地已经永久地被列入人民力所不及的范围。在资产阶级的眼光看来，牧地借用人的独占是浪费的，而且违反了他们关于使用土地机会均等的原则。这种独占还抑制了农业发展并妨碍了定居地区的扩展。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有永远停滞为牧羊场[75]的危险。

在各城市，激进派进行活动，要求分给居民开垦的土地，并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他们轻率地向激动的人群讲话，认为人民有权利向地主和资本家分得一份财富，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一般劳动

者。1860年12月,在悉尼市丹尼森旅馆召开的大会上，有一位奇特尔先生对一批热情的听众说：土地

> 最初是完全可以自由占有的。但是有些人手伸得很长，总要把它据为已有。他们最好放松手，让一些小人物参加进去。在今后六年间无偿配给土地,那就更好了。……让他们授予土地而不是把土地封锁起来,这样他们可以不要派人到外边要谷物，而在这里就有充足的优良土地可以种植谷物。

照《悉尼先驱晨报》看来——固然对所有保守派也是一样，奇特尔的演说和这次大会本身就有点儿滑稽表演的性质。早先,在1857年，悉尼有一位里德先生向一群人发表了关于平等选举区、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居民免费分配土地的激昂演说,但是被“他喝醉了”、“在酒醒以前不许说话”等叫声所打断,直至他坐了下来;会议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谈论机会均等或者免费分配土地是一回事，可是要把这两条付诸实现又是一回事。鼓吹土地改革的悉尼大地主兼商人约翰·罗伯逊在新南威

尔士立法大会就1860年皇家土地让渡法案二读辩论首先发言时解释说："……应该记住，法律并不
135 是凭空制定的——目前就有许多利益集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集团——那就是牧场主。"他希望促进自由保有者永远占有土地，而又尽可能不使牧场主蒙受损害。

在新南威尔士议会的同一次辩论期间，一些牧地借用人冒充旷野里古代的先知——安息日礼拜时牧师就是向他们诵读这些先知的预言——预言土地改革将使一切毁灭。他们认为，自由选领土地旨在打击牧场主，使这个曾经为殖民区提供最大量出口商品的阶级受到损害。它将导致定居分散，从而助长犯罪和酗酒；它将引起生产过剩，这反过来又使选领人〔62〕陷于贫困和沮丧。牧地借用人问道：选领人产品的市场在哪里？把产品运往市场的运输工具在哪里？供给选领人所需的资金以及使他渡过物价波动和气候变化等难关的资金又在哪里？《悉尼先驱晨报》向读者发出警告说，民主洪流正在扫平通向暴政的障碍；要是居民任意行使财产权利，那么让他们在废墟中咆吼，在烽火周围跳舞，在他们的猪群中宴乐吧。

但是在当时的激情中，这些警告被漠视了。1861年，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了两个法令——土地让渡条例和土地占用条例。人们指望这些法令能够成为一种折衷办法，“在给与新的权利的同时，保护旧的权利——在公平对待将来的同时，对过去保持信用”。从1862年1月1日起，任何人可以购买四十至三百二十英亩皇家土地(市镇土地、郊区土地或已被正式宣布的金矿场除外)，地价每英亩二十先令，但须先付地价25%作为定金，和在三年内向殖民区财务主管结清余额，并提出改良土地和有效定居的申报。出售土地的所得，一部分将用以支付入境移民的旅费。

在维多利亚，1862年的达菲条例正式宣布将一千万英亩土地划为耕作面积。除婴儿、婚姻继续有效的已婚妇女外，任何人可以选领四十英亩至六百四十英亩的地段[5]，地价每英亩一镑，一 136
部分在选领时作为定金缴纳，余额在八年期间按每年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计算付清。选领人须耕作土地十分之一，或建造住宅一所，或用坚实的栅栏围住选领的土地。土地资金的四分之一将用以支付入境移民的旅费。

昆士兰1868年的选领条例正式宣布皇家土地分三级招人承领：耕作土地售价每英亩十五先令，按十年分期付款，每年每英亩一先令；第二级畜牧土地售价每英亩五先令，按十年分期付款，每年每英亩六便士。选领人须竖立并保持界标，他的代理人或管家须在选领土地居住。任何婴儿或已婚妇女不得享受选领土地的权利。

在南澳大利亚，1869年斯特兰韦斯条例正式宣布某些耕作地区招人选领，任何人可以购买多达六百四十英亩的耕作土地，地价每英亩一镑，先交定金，余额于第四年年终付清。

各殖民区实行选领土地的效果各有不同。在新南威尔士，选领条例把农村居民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并助长了牧地借用人同土地选领人之间为占有土地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双方互相攻击，极尽欺诈辱骂之能事。“冒领”〔30〕、“挖眼睛”〔56〕、向土地局官员行贿、放火、行凶，都成了社会的常态。为了保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合法利益免受选领人的侵犯，一些牧地借用人把地产抵押给银行或畜牧业公司，并把自己的身分降为土地代理人，在这些土地上，他们曾一度享有物主身分的权力

和威望。牧地借用人委身以求保护一己利益的方法，使他们继续和社会上的其他人疏远。当他们的父辈竭力为获得在地产上廉价的奴隶劳动而试图恢复罪犯流放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输入苦力劳工的时候，这种疏远就开始存在了。

选领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1861年至
1880年间，原先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申请选领 187
土地的十七万零二百四十二人中，到1880年只有
一万八千人至二万人没有使原先制订法律的目的
落空，依然保有领得的土地。在德尼利昆地区，在
1861年至1880年间，备价选领土地的一千四百人
中，到1880年只有二百四十四人仍旧占有土地。
在德尼利昆以南的墨累选区，在接受选领土地的
二千一百人中，只有五百九十人仍旧占有土地。
在同一期间，新南威尔士政府出售皇家土地的收
入，从1862年的二十一万二千七百五十镑十五先
令十便士增加到1882年的二百三十五万一千二
百二十六镑六先令十一便士。在同一期间，新南
威尔士的小麦种植面积从1860—1861年度的十
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九英亩增加到1880—1881年
度的二十五万三千一百三十八英亩。但是，政府

收入的提高和小麦种植面积翻了一番，并不是选领人的功劳，而是牧地借用人根据土地选领条例获得耕作土地的结果。

新南威尔士大部分选领人居住地区的肮脏是骇人听闻的。有些人住在树皮棚屋[39]里，用树皮和袋子隔成房间，用踏平的泥土充作地板，在几根木杆之间张挂可容一蒲式耳① 谷物的袋子，当作睡床。装运货物的粗木箱权充梳妆桌；在地上打上几根桩，上面放一块凹凸不平的木板，当作桌子；用同样方法造了几张凳子。这些就是他们的家具。旧的《伦敦新闻画报》的剪报和家庭照片是墙上唯一的装饰品。陶器是有裂缝的和肮脏的。在新南威尔士，由选领人开发的地区，有许多这样位于一片荒野中的贫民窟，在那里，父母儿女在肮脏、污秽、愚昧和迷信中牛马似地劳动，靠土地过活。

气候变化、物价波动、农业设备和资金的缺乏、愚昧以及运出市场的运输工具不足或运费过高，这些造成了他们的赤贫。一些人从牲畜饲养

① 蒲式耳为谷物和水果量名，等于八加仑或三十六公升。——译者

站代理人或本地杂货店店主获得农具、种子和生活用品，利息有时高达80%。当他们无力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就取消他们赎取抵押品的权利。象这样的选领人要么成为地方上的工资劳动者，要么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有些人坚持下去，盼望有朝一日可以赚到优厚收入，以酬偿他们多年来所受的痛苦和奴役。直至二十世纪中，农业机械的采用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政府在财政上的补助也 138
开始把选领人从高利贷者的魔掌中解救出来，这时奴役和肮脏才开始消失。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新南威尔士一些小农才能买得起洗涤槽和木地板等等文明的物质设备，从而开始使他们的妻儿摆脱从早到晚从事的苦工。亨利·劳森的《给它们——天竺葵浇水》、巴巴拉·贝恩顿①的《乡野素描》和斯蒂尔·拉德②的《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描写了选领

① 巴巴拉·贝恩顿(1862—1929)，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女作家，其作品《乡野素描》于1902年出版。——译者

② 斯蒂尔·拉德是澳大利亚幽默小说作家阿瑟·霍伊·戴维斯(Arthur Hoey Davis, 1868—1935)的笔名。戴维斯的作品，以《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这部短篇小说集(1899年出版)最为有名，其中《在我们选领的土地上》一篇曾被拍成电影。——译者

人的生活，反复出现的伤心事是这些书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可是这些伤心事后来竟被“爹爹、妈妈”呀，“戴夫和梅布尔[49]”①呀等一类伤感的膏药和粗俗笑剧的幽默掩盖起来了。这样一来，时间竟把人们的痛苦变成了一场大笑话。

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用大批拥有自己田地的自耕农代替少数畜牧地承租人的尝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维多利亚，自从1865年的格兰特条例通过以后四年内接受选领土地的人超过三万。从维多利亚一端游荡到另一端的无业游民[71]和流浪着的矿工，都在他们选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根据一位为土地条例辩护的人说，土地条例在南澳大利亚就算没有完全成功，也确实没有失败，因为实际上有许多人定居下来了。在这两个殖民区，造成赤贫或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牧地借用人的阴谋诡计、勒索者的活动或土地局官员的贪污，倒不如说是选领人财政上的困

① 爹爹(Dad)、妈妈(Mum)和戴夫(Dave)都是阿瑟·霍伊·戴维斯在所著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是澳大利亚内地的农民。梅布尔(Mabel)是戴夫的女友。这些人物以后在澳大利亚的影片、动画片、连环图、广播节目中经常出现，流为一种诙谐角色，是对所谓“愚笨农民”的一种嘲笑和侮辱。——译者

难。为了按照法律规定改良土地，选领人常常要向银行、高利贷代理人和商店老板借款，当他们不能偿还债务时，土地便落在债权人手中，使后者成为一个地区的大地产所有人。这样，狡猾的乡村商店老板或牲畜饲养站代理人，就在经商积累财富之外又加上了由拥有广阔土地而得到的社会声望，从而在社会阶梯上爬高了一两级，尽管不是个个都能这样，因为正象有人于1878年在维多利亚议会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的，“呆账出不了富翁”。

少数人用“盗窃牛羊”〔29〕的手段进入富翁之林，甚至进入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之列。“大亨”克拉克(他身材魁伟，在晚年需要四条大汉才能把他从马车抬进屋里)就靠出售他偷来的牲口发了财。 139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他在维多利亚占有土地十二万英亩，在塔斯马尼亚占有五万英亩，估计共值二百五十万镑。他是墨尔本的殖民区银行的董事，又是立法会议议员。他的私生活正象他追求金钱一样贪婪和狂热：在各殖民区，到处既有他的私生子，又有受过他欺骗的人。他死于1874年，那时候人们至少在口头上还相信：罪恶昭彰的、亵渎十诫的人不要希望在尘世得到酬谢或宽大。《墨

尔本笨拙》写道:“老顽固格伦迪夫人① 对于克拉克财产的处理②,决不感到高兴,但这位老太太对这个人死时这样富有,确实感到恼怒。”

在第一个土地选领条例(1862年)通过以前,休·格拉斯就以卑劣的诡诈手段,利用了维多利亚土地法的漏洞。由于他冒领过滥,以致一度有三百人上了他的薪饷账;他成了拥有一百万英亩以上土地的承租人。他在墨尔本盖了一座豪华的房子,其中建有人工湖,天鹅带着它们的庇护人所缺乏的威严,浮游湖上;另外还有水池和鸟舍,畜养珍奇的鱼类和飞禽,供宾客观赏。在他的餐桌周围,聚集了一批富有才智的、高尚的、有文化修养的人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报纸上和议会中流传着关于格拉斯行贿的消息,使社会上有身分的人物大为惊异。1871年,羊毛价格暴跌,使格拉斯无法清偿债务,他不愿忍受破产的耻辱,于是服毒自杀。

① 格伦迪夫人是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诺顿笔下创造的角色,是一个古板的、带有狭隘的传统观点的、对任何失礼行为都不能容忍的老太太。——译者

② 指他的私生子女得到他的遗产。——作者注

并不是所有的牧地借用人或大地主都过着象
“大亨”克拉克和休·格拉斯那种虚夸的、对上帝
和人间的法律都同样漠视的生活。从1850年至
1870年间，东部各殖民区的牧地借用人利用积聚
的财富和1847年枢密院敕令对土地使用权给与
事实上的保障，从事改良他们的牧场。他们用栅
栏把牧场围上，使他们可以不必雇用牧人；他们在
地上挖塘蓄水（在新南威尔士称为蓄水池[72]，在
维多利亚称为水坝）。他们开采当地石块，在自己
的地产上建筑家宅，因此，石灰石在亚斯和堪培
拉，红石在新英格兰，青石在整个维多利亚西部地 140
区，成为时尚。屋前一般有宽阔的走廊，上面种植
爬藤，在漫长的炎夏中绿树成荫。还有槌球场和
俯临附近小溪的花园。客厅用家具、彩色画和旅
行欧洲时搜集的艺术品装饰得非常华美，图书室
摆满了英国历史、文学、宗教的主要著作以及诸如
«布莱克伍德»杂志、«爱丁堡评论»和«墨尔本笨
拙»之类的期刊。卧室、厨房、仆人宿舍沿着U形
后院的两翼伸展。稍远一些，有男人住的小屋或
夫妇用房和供牧场临时雇用的剪羊毛工及其他季
节性工人住宿的棚屋。

牧地借用人和雇工之间开始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比较富裕的人在墨尔本、悉尼或阿得雷德等市镇盖起了房子。在春季里，男人们在墨尔本俱乐部或悉尼的澳大利亚人俱乐部或阿得雷德俱乐部讲故事、喝酒和诅咒时代的民主倾向，而妇女们则盛装出游，在墨尔本的科林斯大街街区，在悉尼的麦夸里夫人车道和阿得雷德的英王威廉大街等处漫步。当父母在田庄上劳动或春天在城市玩乐时，他们的子女在墨尔本中学、季隆中学、维多利亚的苏格兰书院、新南威尔士的英王学校和南澳大利亚的圣彼得学校之类的中学接受文明的教化。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可是，就在他们为自己的富裕和成就树立了这些表面的、可见的标志之前，他们已经播下不少以后使他们丧失卓越地位和荣誉的种子。成年男子选举权、投票表决、各殖民区议会议员财产资格限制的废除，使他们于 1856 年至 1858 年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的立法大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立法会议议员的提名指派制度以及维多利亚、塔斯马
141 尼亚和南澳大利亚立法会议选民的高额财产资格

限制，使他们有机会(同时也吸引他们)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政治应代表“利益集团”，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受多数人的专横。但是，支持一个由“利益集团”中挑选少数所谓优秀分子组成的政府，其代价就是招来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进一步的嘲笑谩骂。

这是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城市里，这个阶级正在为自己积累大量财富，并用砖块石料建起纪念碑，纵情炫耀他们的财富和显示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幻想。在悉尼和墨尔本，资产阶级从制造业、建筑业、进口业以及法律和医学等行业积累了财富。这两个城市的最重要工业是：服装、印刷、铁铸造、金属加工、车辆制造、家具、食品、酿酒、鞣革、锯木和制砖。截至1871年，悉尼和墨尔本的服装工场或工厂每处平均雇用工人五十名。截至1891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制造业的雇工刚好超过劳动力的10%。

从1861年至1883年间，建筑业异常繁荣。1852年，建筑师约瑟夫·里德从英国来到墨尔本，他原想在金矿场起家立业，但却在自己本行里碰上了好运气。里德设计的建筑物概括表现了当时

的价值标准，特别是他使用的巴洛克式圆屋顶成了过剩财富和明显浪费的象征。1855年至1880年间，他设计了市政厅、展览馆、墨尔本大学威尔逊堂、独立教会派礼拜堂、苏格兰人礼拜堂、澳大拉西亚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和工会会所，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建筑物不可磨灭地铭刻在墨尔本的外貌上了。在这些建筑物上，资产阶级讲究排场和追求稳固的热情融合在一起。在同一期间，在悉尼，巴洛克式开始同麦夸里时代建造的摄政时期建筑物的朴素线条混合起来，但不相调和。霍巴特和隆塞斯顿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而在阿得雷德和布里斯班，则只有巴洛克式以浮华壮丽的格调风靡一时。

为适应淘金热引起的人口骤增而建造的房
142 屋，反映了同样的倾向。从1851至1861年整整十年间，澳大利亚人有半数住在帐篷或棚屋里。市镇里发了财的人的公馆是有塔楼的灰色石砌大厦，有“哥德式”的，有“古典式”的，或者是兼有两式的建筑。公园似的庭园把这些大厦同无头无尾的、不象样的街道隔离开来，这些街道两旁很快就排满了较小的单独或成排的住宅。为了夸示他们

热爱物质享受上的成功，或者宽厚地说，为了表示他们忠于与资产阶级相同的理想，小资产阶级或工人的五开间别墅在正门出现了铁花边栏杆、灰泥缸和彩画玻璃窗框，和雇主们的公馆一模一样。大多数房屋是平房，具有折衷的和欧洲的风格，但以节约劳动力面貌出现的美国设计逐渐影响到那些没有佣人的住户的后院。在淘金热以前，厨房一般同房屋分离，而现在则开始附着在房屋后部。郊区房屋和牧地借用人、农场主以及富裕资产阶级的住宅一样，都盖有对付溽暑、荫蔽住户的走廊。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城市工人阶级中有些人过着赤贫的生活。据1860年一位目击者说，在悉尼，一个有二十或二十五所肮脏破旧小屋的街区恐怕要住上百人。每家有两个房间，每间只有十呎见方或十二呎见方，高度仅容一人直立。地板常常低于路面，屋顶经常渗漏，以致水从街上流入屋内，带来了各种污物。具有室内洗涤槽、食品小间、暖炉和衣服壁橱等家庭设备的房屋是很少的。房租高昂引起了过分拥挤，因此，在欧洲人居住的房屋，两个房间竟挤进七对夫妇之多，而在中国人居

住的房屋，一间房子塞上了三百一十五人。在日常生活上，居民陷入愚昧和肮脏之中，而他们的子女，据说“就象池里的鱼一样，在大街小巷”游荡。流浪儿童在悉尼街头成群出没。由于父母出卖女儿来弥补收入，卖淫极为猖獗。教士们眼见这种
143 穷困和罪恶而感到伤心，但是资产阶级却只看到他们自己的富足和德行。在墨尔本，血汗劳动、偷工减料盖成的房屋和居住过分拥挤，也使亚腊河以南资产阶级的富裕同菲茨罗伊、科林伍德甚至卡尔顿工业郊区工人阶级的肮脏形成了对照。在阿得雷德，市民住得不那么过分拥挤，而且又有由工人享有住房及其坐落地段的所有权的传统，因而避免了在一个城市出现“两种民族”的情况。不从英国国教很可能加强了这些资产阶级影响。

这个时期的政治发生动荡，并不是由于对财产所有权或行使政治权力方面有什么根本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为一个内阁阁员席位和附带的肥缺以及社会声望而进行争夺。在淘金热的十年间(1851—1861年)，在诸如土地政策、宪法、入境移民和关税等问题上，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保守派和自由派、牧地借用人和资产阶级、乡

村和城镇之间的对立。但是到了1861年，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政治问题就从基本原则的辩论转到了方式方法的争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都曾出现过两党制的雏型。但是，在1857年至1865年几次修改宪法，1861年、1862年和1865年通过土地选领条例，以及确定关税政策之后，政党便为派系所代替了。

为了利害关系，人们顾不上政治原则。例如，1872年，在新南威尔士，曾经在先前十五年间因关税问题争吵不休的詹姆斯·马丁爵士与约翰·罗伯逊弃嫌修好了。马丁一派一向被称为大鱼狗[46]，罗伯逊一派则被称为长尾鹦鹉[59]。亨利·帕克斯说，现在大鱼狗正在抓住罗伯逊，拿他的美丽羽毛来装饰自己。由于利害关系和个人野心代替了政治原则，所有议会的辩论都变成了喧嚷的、庸俗的和涉及私人的争吵。在1872年1月昆士兰的立法大会上，萨奇先生抱怨一位普林格先生从开会以来一直在布里斯班周围胡扯，并质问他在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对此，普林格先生回答说："在谈恋爱。"于是萨奇先生反唇相稽，说他不 144

打算理睬尊敬的议员茶余饭后发出的任何议论。普林格冒起火来，大声谩骂所有的人；当他大步走出议会时，他抓住一位议员的胡子，大声喊道："出来，我们要把问题解决。"只是由于议长叫喊"军曹，把那位尊敬的议员抓起来"，事情才平息下来。

各个议会的进行过程，往往变成一片喧嚣，议员们互相指控酗酒、徇私或贪污。一个议员值价多少，要看他从政府骗取学校、公路、桥梁或铁路能否得手来衡量。在这样的日子里，政治就成为执政党同在野党之间、政府党同反对党之间的一场争夺，所争的并不是信仰或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而是执政党阁员的席位。在对议员还没有发给薪金的时期，议员接受反对党的地位，只是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收入。少数议员象帕克斯那样以从政作为收入的可靠来源，靠政府对阁员发的薪金维持生活，或者从牧地借用人和银行等要在政治上保护自己利益的集团获得酬劳（说是贿赂也许太苛刻了）。这样，职业政治家变成了从资产阶级领取报酬的佣人。

新南威尔士的三个主要政治派系是由帕克斯、马丁和罗伯逊分别领导的。不论从同时代人

或后代看来，帕克斯是这三个人中的杰出人物，因为他富有戏剧天才，他的公务生涯一半成为悲剧，而且还因为他参与了教育等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都是涉及了人们的生活信念的。艾尔弗雷德·迪金以一种毫不宽厚的态度来评论帕克斯（这种态度是正直的人在评论上帝给以肉欲的“虫豸”的行为时所惯用的），他说：“再没有一个演员比他更加着意装模作样以求演出效果的了。”接着，他相当苛刻地补充说：帕克斯“总是在他心目中把自己的形象看作大人物的形象，并且经常向大人物的形象看齐”。但是，除却出于庸俗野心的装腔作势之外，这个人还具有更多的东西。

帕克斯于1815年生于英国沃里克郡的斯通
利，是小佃农的儿子，上了几年学之后，在伯明翰
从事体力劳动。在少年期之末，当了骨器和象牙 145
车工学徒，同时对宪章运动逐渐发生兴趣。1836
年结婚后，他开始独资经商，但遭到惨败，因此于
1838年决定移居新南威尔士。他很快就博得了
从政成功而经商失败的名声。到1849年，这个
狂热抨击罪犯流放制、指责它玷辱了殖民地声誉
的人物，在家里却面对着他无力清偿的大叠账

单。1850年，他创办了名叫《帝国》的报纸。1854年，他被选为立法会议议员，1856年，被选为新南威尔士首届立法大会议员。但是到了1858年，他因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宣告破产，当时他的资产共计四万八千镑，负债五万镑。1870年，他的经济处境更加困难，这时他的资产只有一万三千镑，而负债达三万二千镑，但他安然渡过了来自有身分的人的侮辱和嘲笑的风暴，并在两年后第一次当上了新南威尔士的总理。

从墨尔本褊狭资产阶级"公正"下教养出来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推动帕克斯前进的热情的。在动辄用偿债能力评价人物的社会里，帕克斯一再遭受破产的羞辱。他的第二个妻子曾在悉尼的总督官邸受到奚落，他本人也经常由于使用下层社会的说话方式而受到嘲笑。他追求女性的情欲是无法厌足的，直至他在八十岁生辰前夕钻进棺材时，他仍没有从这匹"凶恶的、野蛮的怪物"的蹂躏或放荡下解脱出来。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宏伟的。魁伟的身材，球状的眼睛，密茂粗浓的眉毛；苍苍白发梳向后面，掠过高高的头顶，非常讲究。

帕克斯的理想，也有同样宏伟的规模。青年时，他以近乎宗教的热忱鼓吹政治民主。到了中年，他的抱负是要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心中清除牧师和神父灌输的迷信。在晚年，当平凡人物为了降低肉价而要求实现联邦制时，帕克斯却谈论联邦制是使澳大利亚称霸太平洋的手段。可是到了最后，这个人依旧是一束自相矛盾的东西。
他接受启蒙思想的信条，但有时却向牧师和神父 146
卑躬屈节，乞求选票。这个曾全心全意地慷慨乐助的人，有时在银行经理面前屈膝，恳求不要拒绝承兑金额不大的支票，以免新南威尔士的总理受辱。这个在攀登高位的过程中，曾因出身微贱而备受侮辱的人，迫得终身要向轻视他的英国上流社会讨好献媚。帕克斯是一个缩影，集中表现了下述这种人的全部矛盾：支持他们在人世过活的希望的，除了个人野心和为启蒙运动和物质进步献身的人类理想之外，没有更坚实的东西。他的人生的半悲剧既从他所阐述的信条产生，也从他本性中对立着的诸要素产生。也许这个人的想象力的锋芒在债务和经济拮据的压力下受到了抑挫。也许这种命运把“激发着的活力转化为腐败

的毒剂”。也许经济方面的压力把有节操的人改变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以上三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其他政治家没有象帕克斯那样，以带悲剧性的庄严，在公务生活的舞台上傲慢地念诵台词和烦躁地消磨时刻。每个政治家都受到个人信仰和所受教育的影响。天主教徒政治家对于本教教士们的政见是敏感的，而一些新教徒则一心要想达到挫败天主教势力任何增长的目标。有些人对关税很热心；有些人关心教育；有些人关心入境移民；有些人则以能从吝啬的国库敲诈到一座桥梁、一条公路或一所学校为满足。所有的人，不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本地出生居民或入境移民，生来富有的人或白手起家的土生小伙子，都相信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的理想，都相信机会均等，也都相信精神上的和道德上的进步要以物质进步为前提。只有当他们转而注意要怎样和用什么来教育自己的儿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之间才发生严重分歧，以致使社会几乎发生了分裂。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的双轨教育制（即一些学校归国民教育局管理，另一些学校归教派教育

局管理)不能为各殖民区的儿童提供充分的教育,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两方设立的学校数目都跟 147
不上人口的增长,而两种类型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都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资产阶级、牧地借用人和工人阶级相信,教育是保证事业为有才能的人开门的手段,并且要以这样的原则为根据:知识是邪恶的敌人,又是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世代中,人们曾一致赞同世界属于勇敢的人这样的口号,而这一代人却相信,在工业文明中世界将属于饱受教育的人。因此,除了极端分子之外,大家都赞成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和义务的。

困难在于怎样在国民教育局和教派教育局的双轨制的范围内实现这一点。因为教派制度已濒于崩溃。但是如果所有儿童都要进国民教育局的学校,那么各教派的牧师和神父能不能同意开设一种公共的课程?各殖民区的天主教教士们坚持要所有天主教徒的儿童接受宗教教育,他们指的不是每天一小时或者类似这样的计划,而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即在用适当的宗教象征装饰的教室里上课,早晚祈祷,整个工作计划都要以神为中心。

圣公会教徒在这个问题上，象他们从宗教改革以来在所有问题上一样，也发生了分歧。低教会派倾向于认为，在世俗教员或牧师的指导下，通过学习圣经，儿童能够受到得救所必需的教育；要求恢复教派学校，等于动用公款资助错误，等于在他们中间助长“恶魔诱惑的制度”。高教会派想要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用他们的课本和教员来传授英国国教的教义，并且讲授英国国教的光荣和特征，说明它是天主教的权威与不从国教者的放肆之间的一种折衷。长老会教友同样地发生了分歧：自立派支持朝向非宗教性教育的运动，保守派则希望保留教派制度作为教育青年信仰他们的长老的可靠方法。卫理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公理
148 会教徒、独立教会教徒和其他的人急忙抓住非宗教性教育作为对抗天主教和英国国教极权主义的盾牌。此外，还有一个小集团也在活动，他们赞成实施非宗教性教育，要把非宗教性教育作为手段，培养青年，使他们在思想上不受各个不同教派所传播的迷信、野蛮的教条和荒谬观念的影响。

到了1870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在有关集团中，没有哪一个掌握了多数。同时，宗教信仰的

衰落和牧师、神父的下流怪诞行为，都对各殖民区的舆论发生了影响。学者对《旧约全书》的批判，已使把它当为上帝启示的教会观点归于破产，并把它贬低为关于犹太民族历史的一束来历不明的手稿。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使人们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圣经故事发生了怀疑。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出版后，关于人类介于天使与禽兽之间的独特性格的宗教臆说，也成为疑问了。学者们开始对童女生耶稣、耶稣化身为人、耶稣复活、耶稣升天等说法的来源——福音书①，表示怀疑。另外一些人认为，如果上帝的心意只有通过无限的人生苦恼，并把大部分人类判处永远在地狱受苦，才能实现，那么，他们就不接受天国。

对于这种批判，各派教会有不同的回答。有些新教徒勇敢地但是奇怪地坚持根本主义立场，认为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而不肯后退

① 福音书是指基督教《新约全书》的首四卷，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内容为关于耶稣言行的记述，其中包括基督教驯顺的说教，用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译者

一步。另外有些新教徒却顺应科学风气，越来越多地放弃他们教会的教义，并站在含糊的自然神论的立场上，谨慎地保持缄默，不谈天堂地狱问题。许多人继续重复替宗教辩护的传统说法，这种传统说法是从 1788 年澳大利亚创立以来一直由新教牧师提出来的——那就是，道德是不可避免地同宗教信仰连结起来的，荒淫、轻薄、贪婪和政治上的不服从则往往是无神论的亲密伴侣。马克斯·克拉克是赞成关于宇宙的非宗教观点的，在他的«没有错觉的文明»一书中回答说，事实已经证明有组织的宗教无法引导人类走上本分和美德
149 的道路，今后应该采取没有宗教的道德来尝试一下了。

墨尔本圣公会主教在 1869 年冒昧地断言，圣经一点也不害怕科学。十年后，阿得雷德一个不从国教者悲伤地看到，教会出于轻率和对真理某些表现的热心，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真理本身的斗争。他所惋惜的是，高教会派和天主教徒“仿佛软弱到经不起真理的阳光似的，正在胆怯地向仪式主义的黑暗洞穴退却，这个洞穴是为中古思想的枭鸟和蝙蝠所盘踞的”。他鼓励和他持相同信仰的

人们，让天国的阳光充满自己的灵魂，以对上帝的信仰作为支柱，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或恐吓他们了。作为对科学的答复和对圣经批判的答复，这位不从国教者力劝基督教徒放弃他们的大部分信条，放弃童女生耶稣、神人同体、耶稣复活、耶稣升天、各种神迹和教会的所有圣礼，而立足于笃信上帝及耶稣其人的教导之上。

1883年8月，维多利亚的乔治·希金博特姆审判长对墨尔本的苏格兰教会的会众说，基督教徒心灵的得救，有赖于所有教会平信徒的团结，这些平信徒应从内心和从基督教会把那些古老的、现在已被怀疑的谬论的幽灵驱逐出去，并从思想的所有较低级观点转到较高的立足点。他强调要信仰上帝，信仰“世界之光，即拿撒勒人耶稣的简单而深奥的哲学，信仰他最崇高的生活。〔我们的〕智慧和易于感应的心灵已经重新得到启示，上帝是整个人类也是每一个人的父亲、朋友、带路人和拯救者”。

与此相反，罗马教会却众口一词，拒不放弃它的任何信条。这个教会热情地相信它自己是被上帝挑选的维护宗教的神圣工具，仔细观察了人类

在各方面面临灾祸的悲惨情景：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真理普遍被破坏了，许多人顽固不接受任何权威，无休止的不和与内乱，人们贪婪地追求易毁
150 灭的东西而彻底遗忘了永恒的事物。它发觉，所有这些恶事的根源，就在于蔑视和忽略教会的神圣而尊严的权威。在罗马教皇通谕《不可思议的事物》即《关于影响现代世界的灾祸》(1878年4月21日)中，利奥十三世教导信徒们说，这个由宗教改革家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反抗教会权威的残酷斗争，其目的就在于破坏超自然的秩序而崇拜孤立的理性。那么，在罗马教会看来，〔这出戏中的〕主要反派角色，与其说是地质学家、圣经学者、施特劳斯①、勒南②、布雷德洛③、达尔文、赫胥黎和马克斯·克拉克，倒不如说是路德和喀尔文。正如有些新教徒把天主教徒而不是把无神论者和唯理

① 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耶稣传》(两卷，1835—1836年)批判了基督教教义，否定宗教奇迹。他宣布福音书是神话。他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只承认君主立宪制度的必要性。——译者

② 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其关于基督教早期传播事业的

论者看作超自然的死敌一样，罗马教会却把新教徒看作永久的敌人和宗教信仰被破坏的原因。

为了这种狂热的、愚蠢的派系斗争，各派教会都付出了代价，其中一项代价就是新的教育条例采用了非宗教性的条款。神父和牧师互相指责，说对方应承担宗教信仰衰微的责任，他们无法就学校应该讲授哪种宗教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这个时候，各殖民区的议会通过了立法，规定教育是免费的、义务的、非宗教性的。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维多利亚议会在1872年通过的。南澳大利亚仿效先例，在1875年通过一项条例，规定学校在正常上课时间进行普通教育，但容许每日早上在传授普通教育的规定时间之前，用十五分钟时间阅读钦定圣经英译本或杜爱英译本中的部分内容，由学生自由参加。同年，昆士兰议会通过一项

研究著名。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共八卷，其中以《耶稣生平》(1863年)、《使徒》(1866年)、《福音书和基督教的第二代》(1877年)、《基督教会》(1879年)和《马可·奥勒留和古代世界的结束》(1882年)等卷为最有名。——译者

③ 查尔斯·布雷德洛(1833—1891)，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论家。自称为无神论者。1880年创立自由思想者同盟，在同盟内宣传无神论和共和主义思想。——译者

条例，规定教育是免费的、义务的，并规定所有政府出钱办的学校（因此称为“公立学校”）每日应有四小时普通教育。新南威尔士在1880年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教育，但附有这样的条款：全部教学必须是非宗派性的，但“普通教育”一词，应理解为包括一般的宗教教学，以别于教条的或辩论法的神学。1885年，塔斯马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条例，规定教育是免费的、义务的和非宗教性的，并规定公
151 立学校每周留出一小时，使学生在家长的同意下，能够接受所属教派教士的教导。1871年，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初等教育条例，规定任何公立学校一律不得教授具有任何特殊教派特色的教义问答或宗教学说。1895年，西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旨在取消政府补助教派学校的条例。

天主教教会主教们反对使用天主教徒的金钱——从天主教徒腰包得来的税款——到处建立一种没有多少天主教徒能够用得上的教育制度，而且他们坚决认为：建立这种教育制度是蓄意要挖基督教的墙脚。天主教徒的儿童到公立学校受教育后，他们的宗教信仰削弱了；他们的举止变得粗野和不虔敬；他们很少尊严和教养的感觉；公立

学校的运动场是不道德和恶习的温床。神父们对这些放荡不羁的儿童的前途抱有重重忧虑。主教们预言这些儿童将要陷入黑暗之中，使宗教信仰遭到毁灭。

因此，主教们从事活动，要国家对每个教派恢复补助，同时从自己的会众中筹款建筑校舍和购置学校所需的设备。为了协助这项工作，主教们从爱尔兰吸收各个修道会的成员。如果要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有宗教信仰而教育质量可能低于标准，要么是非宗教性的教育，主教们就选择宗教信仰。新教徒对天主教徒要求恢复国家对教派的补助，始终表示怀疑。他们在每个殖民区都开展了要求公立学校教授圣经的运动。但是天主教会的主教和神父告诫信徒们说，这样一种变动将引起一场比不信宗教更糟的灾祸，这就是使国家教育新教化。这样，那些使天主教和新教失和的忧虑和猜疑，就为实行非宗教性的教育铺平了道路，并在以后的世代中保留下来。

在实行免费的、义务的、非宗教性的教育后，
所有殖民区都有三种类型的学校。新教学校培养 152
城市资产阶级、商人、银行家、贸易商、制造商、酒

店老板和专门职业者的子女，以及牧地借用人和富有的农场主的子女，还有少数被他们用奖学金收买的天分高的儿童。他们的学校仿照英国的公学，并立意培养儿童，使他们在教会、政府和专门职业等方面为上帝服务——培养出这样一种正直的人：敬畏上帝，避开邪恶，同时为英国人的现世抱负贡献力量。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天主教会只为资产阶级、牧地借用人和专门职业者的子女办了几所学校，因为天主教徒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了在天主教学校培养这些阶级的子女，教会在信徒中筹款，并任用各修道会的成员为教师。在这些学校，神父、青年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对人类历史、对人和人生的意义，都提出了和新教学校中所讲授的内容完全不同的说法。公立学校按殖民区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新教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儿童长大起来就相信英国人对于人类自由和世界进步的贡献；天主教学校的儿童长大起来就认真考虑爱尔兰民族伤心的历史，并相信英国人极端野蛮、残忍，参与了对他们在爱尔兰的祖先的压迫和贬黜。新的教育条例还保持了集中管

理各殖民区的倾向。参加教育问题大辩论的双方由于害怕受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支配，都不愿把教师的任用或教学大纲、课本的选定，委托地方的委员会；结果，管理权归属于教育部，它对在每个殖民区首府的部长负责。因此，派系的争论促进了中央集权和信奉国教，并助长了那种迅速支配全部论战主题的怯懦和避讳气氛，因为当争论的各派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各殖民区的教育部只好教授一种历史，一种伦理和一种宗教：其内容是 153
如此含混暧昧，因而不能引起男女学童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兴趣。

这种对人生重大问题的畏避，是在人的本性、人生意义的问题正在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时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上，在学的儿童们就要做出抉择。一方面，唯理主义者正在严厉斥责伪善、顽固、愚昧和偏执，指出这个多头的怪物乃是宗教信仰必然产生的恶果，正如白天之后必有黑夜一样。另一方面，罗马教皇正在大声疾呼反对不信宗教，预言不信宗教将破坏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真理，形成争执的无尽的根源，而从争执又会发生内乱和残忍的战争，使人们永不厌足地追求那些转眼

毁灭的东西而彻底遗忘了永恒的事物。唯理主义者号召人类“打倒无耻的家伙”①；神父们却提出警告说，没有基督，人类就要毁灭。

正当教皇、神父和牧师们详述由不信宗教思想蔓延而引起的灾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的时候，海员工会会员于1878年提出了关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社会的成份和组织这些根本问题。海员工会通知会员说，澳大利亚联合轮船公司正在悄悄地用中国人代替欧籍船员，“在这场对他们说来很巨大的斗争中，他们充满信心地向海员兄弟们呼吁，希望最坚决地拒绝运载那些将要取代他们工作的中国人。”于是，同年11月18日，海员、厨师和服务员都离开了停泊悉尼环形码头的澳大利亚联合轮船公司的船只，实行罢工。海员工会不仅在有关工资和雇佣条件等问题上要求有发言权，而且在有关社会应包括哪些成份的问题上也要求有发言权。当工人们于1879年1月2日答应复工时，公司同意在三个月内减少船上中国人的数目。

① 原文为“*Ecraser l'infame*”，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攻击天主教会时说过的一句话，伏尔泰曾骂罗马教皇是“两足禽兽”。——译者

四年后，澳大利亚东部各殖民区面临着同外面世界交往的问题。1883年4月，昆士兰总理托马斯·麦基尔雷思爵士因对英国政府迟疑不先采 154
取行动阻止德国兼并新几内亚东部感到恼火，在莫尔兹比港升起了英国国旗。英国殖民大臣德比勋爵不承认昆士兰总理这一行动，他坚定地拒绝为了满足昆士兰甘蔗种植园主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贪婪而使英国在太平洋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时，维多利亚政府和新南威尔士政府都担心法国人有兼并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打算。所有这几个殖民区政府对于从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囚犯岛脱逃的罪犯带来的损害，亦极关心。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总理同意于1883年11月在悉尼召开殖民区区际会议。会上，昆士兰的新任总理塞缪尔·格里菲思提议成立一个澳大拉西亚联合理事会，以处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领土范围以外的澳大拉西亚海上防御、影响澳大拉西亚同太平洋岛屿关系的事务、刑事犯流入的防范、海港检疫的管理和澳大拉西亚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但是，联合理事会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这部分地是由于它缺乏行政权力，但主要还是由于新南威

尔士拒绝参加。正如同外界世界相抗衡促使各殖民区走向某种形式的联合，殖民区之间的抗衡正在加强各殖民区走向地方主义的趋势。从殖民区区际会议回到墨尔本以后，维多利亚总理塞维斯在一次招待宴会上说，他已注意到悉尼对墨尔本和墨尔本居民怀有最强烈的猜忌，悉尼并没有饶恕维多利亚或昆士兰从母区分离出去。当这个讲话传到悉尼时，群情激昂。在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上，有人在欢呼声中宣称：新南威尔士远远高于维多利亚，其程度正象天高于地一样，而约翰·罗伯逊爵士则把维多利亚轻蔑地描绘为一块“包心菜地[19]”，还有一位卡梅伦先生谈到了目前任维多利亚总理的这位绅士用无礼的、招摇的语调向新南威尔士的议长、议院和居民发出的侮辱。

155 在澳大利亚海员提出澳大利亚有色劳工问题之前一个月，肯尼迪、朗尼根、斯堪伦和麦金太尔等四名警察从维多利亚东北部的曼斯菲尔德出发去逮捕内德·凯利、乔·伯恩、丹·凯利和史蒂夫·哈特等四名盗窃牛马的罪犯。1878年10月26日，当警察在腹地[68]小溪同乡野匪徒遭遇时，内德·凯利开枪把肯尼迪、朗尼根和斯堪伦打死。麦金

太尔逃往曼斯菲尔德告急。维多利亚殖民区顿时发生骚动。对牧地借用人、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代表法律、秩序和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肯尼迪、朗尼根和斯堪伦是三个勇士，他们在试图俘获一股武装罪犯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从这次暴行发生之日起，就有一种传说开始在小农[21]、翻废矿寻金者[34]、罪犯的后裔和贫穷不堪的爱尔兰流犯当中流行，这些人象内德一样，曾经试图在那个冷酷辛酸的国土用合法手段谋生，但是失败了。根据这种传说，内德和罗宾汉①一样，是以劫富济贫为奋斗目标的。因此，这个冷酷地杀害了三个警察的人被颂扬为民间英雄，他要贬抑妄自尊大的人，把强有力者从他们的宝座拉下来，并使有钱的人变得一无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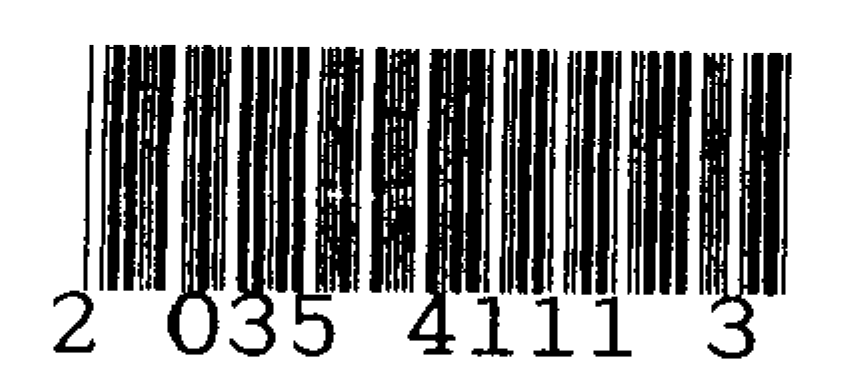
在内德一伙于1878年12月抢劫了贝纳拉镇的国家银行和新南威尔士银行（设在墨累河北岸三十哩的杰里耳德里）后，他夸说他的部下从没有伤害过妇女，也没有抢劫过穷人。但是，由于人生的嘲弄，使内德他们陷于失败的，却正是内德善意照

① 罗宾汉，英国中古传说中的绿林好汉。——译者

顾的这些小人物中的一个。1880年6月，他们一伙占领了维多利亚北部格伦罗恩（在万加腊塔附近）的旅馆。内德由于过去的成功而满怀骄傲，他订了破坏搜索他的警察和土著追踪者[4]的火车的狂妄计划。在警察乘搭的火车预定到达之前不久，他们一伙拆掉了一段车轨。当内德和匪帮的其他成员正在为他们的遭难者准备可怕的守丧时，一个学校教师从旅馆溜走，及时阻止了火车行进。警察包围了旅馆，并纵火焚烧。史蒂夫·哈特、丹·凯利和乔·伯恩被烧死了，但内德狂妄如旧，他穿
156 上自制钢甲，同警察进行枪战，直至中弹受伤。他被带到墨尔本受审，于1880年11月11日被绞死。据传说，当时他留下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遗言。

他死后并没有被人遗忘。牧地借用人和资产阶级把凯利等人和他们的凶暴归因于土地选领条例，这些条例为人们提供了在那些宗教势力和教育势力无法渗入的遥远地区选领土地的机会。结果出现一群不信上帝的、无法无天的男女，这些人一半是土匪，一半是家畜盗窃犯，完全是邪恶的。但对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被霸占了土地的人来说，内德却是一位英雄。在旧的宗教诸神摇摇欲坠

的时代，内德或内德的理想已是人们可以崇奉的偶像，因为他的生与死象征着本地出生居民的体验，象征着他们对接受英国道德的厌恶，象征着他们对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内德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前夜在墨尔本的监狱被绞死的：澳大利亚人为了用一种现世的教义代替有组织的宗教教条，为寻找一个能够总结欧洲文明在澳大利亚正好一百年的经验的记载而进行摸索。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在1883年至1900年间专心致志去做的正是这项工作。



九、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 157

（1883—1901年）

1883年6月14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墨累河岸上两殖民区交界处的阿尔伯里镇，观看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铁路接轨。街道用彩旗装饰得非常华丽：学生在街上列队欢迎两个殖民区的总理。当天晚上，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新南威尔士总督向座上的人祝贺两个殖民区铁路通轨这个可喜的联合。他接着说，这两个澳大利亚殖民区的居民，属于同一的种族，说同一的语言，具有同一的传统和抱负，当天完成的铁路通轨应当是双方联合的象征。他希望这将成为幸福、繁荣的新时代的开端。他的同僚维多利亚的总督也表示相信，铁路通轨的必然结果将是各殖民区本身的联合。

当1887年1月维多利亚同南澳大利亚铁路接轨完成和1888年1月新南威尔士同昆士兰铁

路接轨完成的时候，人们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感情。南澳大利亚同西澳大利亚之间铁路则迟迟未能接轨（奥古斯塔港和卡尔古利之间的路线直至1917年10月才完成），这足以说明地方情绪在西澳大利亚（它在面积上占澳大利亚三分之一）是很强烈的。交通的改进也为和谐感情的增长提供了自然的环境。澳大利亚各城市间互通电报的时间是：墨尔本和阿得雷德于1858年7月；悉尼和墨尔本于同年10月；悉尼和布里斯班于1861年；悉尼和
158 阿得雷德于1867年；隆塞斯顿和墨尔本之间暂时性的电报于1859年开始，永久性的电报于1869年完成；奥古斯塔港和达尔文港于1872年；阿得雷德和佩思于1877年。

第一批电话局开放的年代如下：墨尔本于1878年，布里斯班于1880年，悉尼于1881年，阿得雷德和霍巴特于1883年，佩思于1887年。有些电话局开始是由私营公司经营的，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各殖民区的议会把电话业务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划归殖民区的邮政局。

在这期间，本地出生居民的人口开始超过入境移民。1861年，在总人口中，恰好有过半数是在

联合王国出生的。截至1871年，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出生的居民几乎达到总人口的60%；截至1891年，达到75%；截至1901年，达到82%。本地出生居民人口比例的增长，使民族文学有了广大的读者。这些居民的才能、生活方式和成就，过去因被指为“殖民地的”而受到轻视，现在民族文学作者们就能够在作品中阐明澳大利亚人民的经验，提供勇气、机智和信心以激励人们的志气。对被藐视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安慰，而对于那些奉承英国一切东西的人来说，它又是一种斥责。

在这些年代里，人口逐渐增加。1881年，所有澳大利亚殖民区的总人口为二百三十万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其中新南威尔士七十七万七千零二十五人，维多利亚八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人，昆士兰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九人，南澳大利亚二十八万五千九百七十一人，西澳大利亚三万零一百五十六人，塔斯马尼亚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人。1901年，所有殖民区的总人口为三百七十七万三千八百零一人，其中新南威尔士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六人，维多利亚一百二十万一千零七十人，昆士兰四十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九人，南澳大

利亚三十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七人，西澳大利亚十八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人，塔斯马尼亚十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五人。

在此期间，悉尼和墨尔本的工业开始向本殖民区以外寻找产品销场。悉尼的食品工业渴望在墨尔本开辟广大的市场，但为维多利亚的关税所阻。新南威尔士的里弗来纳地区的农场主想在墨尔本出售他们出产的羊毛和小麦，但发现维多利亚的关税率太高了。墨尔本和季隆的制造商——特别是食品工业和纺织业——希望在悉尼和阿得雷德销售产品，但由于新南威尔士铁路对维多利
159 亚货物收取特别运费，以及由于南澳大利亚的关税，以致销路减少。死的拖住了活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习惯势力的阻碍。

尽管澳大利亚过去被分成六个分散的殖民区，而且他们的边界是由偶然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由地理情况或商品生产和交换等实际情况来划定的，但是经济发展，即使受到关税和其他关卡的障碍，仍然迅速跃进，并使各个殖民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经济服务的工商企业、银行、金融公司和畜牧业公司，例如多格蒂公司、丹尼斯·拉塞

尔公司、埃尔德·史密斯公司和戈茨巴勒·莫特公司等，在各殖民区的首府和一些乡镇都设有分支机构。1888 年，澳大利亚雇主联合会成立。约在十年之前，即 1879 年 10 月，在悉尼举行了第一次殖民区区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们已着手解决诸如受补助的移民和中国移民等问题。1884 年 4 月在墨尔本举行的第二次殖民区区际工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讨论了诸如工会合并和合法化、限制中国劳工和有色劳工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讨论了工人在议会直接代表权的问题。尽管把工会统一为一个联合体的尝试屡次失败——在 1884 年墨尔本代表大会、1885 年悉尼代表大会、1886 年阿得雷德代表大会、1888 年布里斯班代表大会、1889 年霍巴特代表大会、1891 年巴拉腊特(维多利亚)代表大会或 1898 年阿得雷德代表大会上都失败了，但是，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1891 年至 1898 年因罢工和经济萧条中断召开）却都保持着一种思想：整个澳大利亚工人，不论那个殖民区，在实现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努力中，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从 1880 年到 1900 年，耕作面积从四百五十

万英亩增加到八百七十五万英亩，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农业适应了澳大利亚和世界对货物的需求，这种需求部分是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引起的，部分是由于许多国家生活水准的提高引起的。各殖民区的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是粮食生产增加的内部原因。1871年，悉尼的人口为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人，新南威尔士的人口五十一万六千七百零四人。到
160 1901年，悉尼的人口增至四十八万一千八百三十人，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则约为一百四十万人。1871年，墨尔本的人口为二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人，维多利亚的人口七十四万六千四百五十人，而到了1901年，墨尔本的人口增至四十九万六千零七十九人，维多利亚的人口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的增长，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避根犁[69]和脱粒收割机的发明，粮食生产技术有了改进。农业科学家威廉·法勒试验繁殖抗锈病的小麦和旱小麦，以提高小麦的产量。这些试验于1885年至1898年间在兰布里格（在现今堪培拉城址附近）获得成功。1886年，查费伊兄弟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同维多利亚政府签订合

同，在米尔杜腊弄到土地五万英亩(以后再增加二十万英亩)，修筑沟洫和阡陌，建立灌溉系统，从墨累河引水灌溉，用以种植葡萄、橘子和梨子。在新南威尔士的格里菲思、利顿和南澳大利亚的仑马克也相继实行类似的灌溉计划。其结果是，创设了干果工业，并大大推动了当地酒类的生产。

1875 年，一所供出口的肉类冷冻工厂在新南威尔士的利思果谷地投入生产。牛羊被宰后经最先进的方法处理，用冷藏货车运往悉尼的达令港，再经特殊程序使它冻结，然后装入船上的冷存舱，运往英、美，保证运到市场时肉类依然冰冻。肉类在英国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价格等于澳大利亚的四、五倍；这样一来，既可保证出口商货物畅销，又能保证成千上万的英国消费者的肉类供应。第一批冻肉由“斯特拉思利文号”装运，于 1879 年 11 月从悉尼启航，1880 年 2 月顺利地运到伦敦。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另一个试验在昆士兰得到成功。1863 年，路易斯·霍普上校在布里斯班附近的奥尔米斯顿种植甘蔗二十英亩，获得 161
丰收。种植地位于昆士兰沿海地带的肥沃的江河流域，树丛繁茂。当时，开荒、耕耘、种植和收割，

都是在酷热的气候下用手来搞的。这里的蔗糖必须同斐济、爪哇和南非用廉价“黑色”劳工生产的蔗糖竞争。在一个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殖民区，蔗田要雇佣欧洲人是办不到的，除非付给高工资，而那样生产出来的“白”糖就会卖不出去。因此，蔗糖种植园主开始从太平洋岛屿输入劳工（用双手开荒、种植和收割）。他们被称为喀纳喀人[43]，这是夏威夷语“人”的意思。在1868年至1876年间，来到昆士兰的喀纳喀人超过一万一千人。

传教士、慈善家、市镇居民和工人立即对甘蔗种植园主提出指责，认为他们创立了奴隶制度。在他们看来，喀纳喀人是从他们本岛被引诱来的，或者是被他们的头人卖给白种人，再在布里斯班、马里巴勒、罗克汉普顿和麦凯的码头转卖的。据反对派说，喀纳喀人就是商品。为了预防流弊，昆士兰议会于1868年通过一项法令，对波利尼西亚劳工的输入及其待遇实行管理和控制。从1868年至1885年间，昆士兰和英国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以保护喀纳喀人，使不受招募人和甘蔗种植园主贪婪和虐待之害。

截至1892年，昆士兰议会多数人得出的结论

是，如果把这里殖民地看作不列颠民族的家乡，那么使用黑色劳工就会有损于殖民地的最高利益。昆士兰总理塞缪尔·格里菲思把反对黑色劳工的论据概括如下：

1. 它易于助长大地产的产生，这种大地产大部分归在外地主所有，而由成群的工人耕作，因而阻碍自耕小农实际定居。
2. 它使人轻视热带农业的田间劳动，认为白种人从事这种劳动是不名誉的和不值得的。
3. 众多的奴隶不许享有选举权，长此下去， 162
同维持自由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

格里菲思还说：昆士兰已为那些在南太平洋岛屿贸易中流行多年的弊病而名誉扫地。由于这些原因，他建议废除在昆士兰蔗田使用黑色劳工。

但是经济的变化正在排除使用黑色劳工的需要，这比较传教士、慈善家和英国文明的福音派传道士的所有论据更为有效。喀纳喀人劳工法令加于种植园主的条件，已提高了他们使用黑色劳工的费用，从1883年至1889年间，提高了50%以上。新的生产方法正在逐渐代替体力劳动。到

1895年，除砍蔗外，田间工作全部使用机械。象《麦凯糖业杂志》在1896年所提出的："白种人自己动手，并使用最好的节省劳力的工具，他们正在迅速地取代有色工人。大地产正在迅速地变成充满小农的地方。"到1895年，白种人在昆士兰中部、南部的蔗田减少了喀纳喀人的人数，但在昆士兰北部，喀纳喀人仍多于白色工人，例如在班达伯格，人数是二千六百一十二比三百零四。如果昆士兰蔗田停止使用黑色劳工，那末，政府就有必要保护工业，以抵制斐济、爪哇和南非"黑"糖的竞争。

北部多数种植园主想要保留有色劳工，但他们认识到，只要北部继续是昆士兰殖民区的一部分，他们的愿望和利益将为该殖民区南部反对黑人劳工的多数人所漠视。为了保存他们的种植园，他们准备从南部分离，成立一个独立的殖民区。占昆士兰人口多数的南部居民认识到，如果昆士兰决定与其他殖民区结合，成立联邦，那个联邦势将承担实现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的义务，于是，昆士兰就可以得到白人劳工，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要答应对制糖工业采取保护措施，以免受到外国

的竞争。这样一来，因使用喀纳喀人而激起的愤怒，已把昆士兰南部的移民转变为联邦制的热心支持者。经济发展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政治制度的 163
不完善。

人们要在殖民区挖除黑色劳工这个"败坏道德的祸根"，并在一首四行诗中证明自己的论点：

就象数目字那样明白，
一加一等于二是确然无疑，
那些把黑人变成黑奴的人，
正要把你变作白奴。

正在这个时候，昆士兰的地方主义就发展为澳大利亚的爱国主义了。在移民们看来，他们当心着别让那些不共戴天的有色外族两足动物再在树丛[61]中潜伏，拿着蔗刀，伺机杀害路过的第一个白人。当他们摸索各种方式方法以维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时，这种对别人行为的残酷的幻想就沾污了他们的思想。这样，蔗田上的经历使民族主义感染了种族的偏见。

在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企业和私营企业轻率地扩展经济活动。1885年，英帝国议会通过法令，决定成立联邦会议，1886年，在伦敦举

行了殖民地和印度展览会，1887年，召开了帝国会议，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注意。各殖民区政府在伦敦借款以为修建铁路、公路、学校及其他公共工程之用，其数额超过了当前的急需，也超过了他们最后偿还的能力。投资者贷款给股份公司。随着墨尔本的突然繁荣，有人组织许多公司投资于房地产，于是房地产的价格很快就被抬高，远远超过了实在价值。还有别的公司投资于1871年在塔斯马尼亚的比肖夫山开发的矿山和1888年在泽海因山开采的铅矿和锌矿。

1890年7、8月，曾经是世界投机中心的阿根廷发生了金融崩溃。同年11月，巴林家族在伦敦破产①，这件事又引起了从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迅速提取存款。公共工程和大部分私人建筑都停
164 工了。政府公务人员、承包商、建筑行业的人员、银行职员和金融公司均受影响。1892年3月，一家银行宣告破产，次年1月，另一家银行停业，3、

① 巴林家族是英国金融资本家的一个家族，1890年因牵涉到英国资本家在阿根廷的贷款而破产，其产业由英格兰银行接管。——译者

4 月间，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有十三家银行相继倒闭。

在乡村地区，农场主和牧地借用人因产品跌价达到 50%，特别是因为银行收取高利率没有降低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土地减值给抵押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农场主在偿还债务之后，就没有剩下多少东西足以作为他们劳动的适当报酬。

189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悉尼三百名失业者组织了一个队伍，由一个手举大十字架的人率领，十字架钉上一个衣服褴褛的受迫害者的画像，胁部涂上红色颜料，背部涂上“被富翁杀害”等字样。一般说来，牧师们对城市中经济萧条的反应是进行布道，挖苦穷人，把他们的灾难归咎于浪费、喝酒和赌博。墨尔本的圣公会主教在 1893 年 5 月提醒他们的会众说，罪恶和苦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并且希望圣公会教友把下一个星期天作为纪念〔耶稣〕受难的耻辱日子，人人带着上帝将会嘉许的悲伤和悔悟的心情，进行忏悔和认罪。维多利亚长老会的高级会议也宣布一个耻辱祈祷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跟着捶胸悲叹，向他们

的耶和华号哭："罪在我，大罪在我"，期待着上帝使消逝的繁荣复活过来。«新闻公报»谴责牧师们使教会表现愚蠢、荒谬，受人嘲弄。有些报纸发表了工党对于经济萧条的意见，说人们必须在资本家的计划和他们工党的计划之间加以抉择，前者准备重建银行，后者却准备重建社会。«布里斯班工人报»在1893年3月20日写道：

> 社会的重建者同被砸碎了的银行的重建者争
> 165 论起来，并将战斗到底，以结束目前的无政府
> 状态，坚决反对维持一种吸血鬼制度和延长
> 目前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尝试。

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董事们所得出的结论则完全不同，他们订出计划，准备把那些不得已停业的银行重建起来。为了避免重演1890至1893年的灾难，他们极力主张成立一个有权就银行和通货进行立法的联邦议会。经济萧条已把他们转变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并对各殖民区的总理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各殖民区的总理于1893年5月在墨尔本召开的会议上作出决议："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证明有必要制定包括所有殖民区银行业的法律，而且立法应当划一。"银行家和政治家开始看

出，实现联邦制可能为他们的物质利益服务，这就使一些劳工思想家心里产生阴暗的猜疑，担心联邦制将成为永远阻碍他们一直向往的社会重建的一种手段。

1890年到1894年期间的一系列工业罢工，使资本家和工人对社会前途都抱有相似的想法。在1890年以前，罢工的原因是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反对增加工时，或者反对开除担任工会职务的工人。1890年，东部的殖民区开始爆发一系列罢工，提出组织工会的权利问题，这样就引起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直接冲突。当航运业的雇主不同意海事职员协会参加各殖民区的其他劳工组织时，职员们罢工离船。同年，剪毛工也起来反对牧地借用人要求的契约自由——指他们有权同工会会员或非工会会员商订雇佣合同。当畜牧业主开始雇佣非工会会员工人(即工会所谓"罢工破坏者"或"工贼")时，悉尼和墨尔本的码头工人拒绝处理非工会会员工人剪出的羊毛。

同年8月，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发生骚动。在墨尔本的动乱中，部队指挥官命令部下"向下瞄准，使他们暂时不能行动——使扰乱法律和 166

秩序的人们暂时不能行动，以便今后不必执行这种任务。让这作为他们的教训”。同年11月，当非工会会员工人用车装运多捆由非工会会员剪下的羊毛，在武装护送下通过悉尼街道时，群众嘲笑、起哄，还对“工贼”工人进行咒骂。而在环形码头附近商业大厦（这些用石头和砖建造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纪念碑）外面，则有少数人举行声援〔非工会会员〕的游行，以示〔与群众〕对抗，这又惹起了工会支持者更多的疯狂叫喊。在环形码头，聚集了上万人，开始扔石块和其他投掷物。在一名警察被人用石块击伤面颊后，宣读了暴乱取缔法①，用暴力把群众驱散。过后，费希尔上校在羊毛交易所外面对军警维护法律和秩序表示谢意。

与此同时，无政府状态和骚动支配着乡村地区。1891年初，伯克②发生了多次动乱，同年3月底，在昆士兰西部的巴科尔代因，工会、部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武装小冲突。新南威尔士、维多利

① 宣读暴乱取缔法，是英国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镇压的信号。参见本书第七章第204页译注①。——译者

② 伯克是新南威尔士北部一个市镇，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铁路起运点。距悉尼410哩。英国殖民者于1835年开始定居，把它建成城堡。——译者

亚和昆士兰的政府都迅速采取行动来维持法律和秩序。1891年6月，昆士兰总理塞缪尔·格里菲思向立法大会说明暂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危险，人们在法律保障下从事正当职业的自由将受到严重损害"。工会的领导人被捕并以密谋罪被控，判处长期监禁。工人的领袖们怀疑政府和法院是为维护资本主义而战，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是保证"契约自由"，而不是镇压不法行为。工会领导人从自由党人关于政治哲学的教科书中听到说，国家是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公正人；他们曾经怀疑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现在有些人理解到，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组织。新南威尔士政府在1892年布罗肯希尔银、铅、锌矿工罢工中采取的行动，昆士兰政府在1893年 167
至1894年剪毛工和乡野工人罢工中采取的行动，都证实了这些怀疑。

另外一些人却从罢工期间的经验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悉尼卫理公会牧师沃特金博士在几次大罢工中察觉出上帝的力量，他把罢工看成是上帝惩罚几乎所有阶级在许多方面亵渎主日的迹象。他认为，上帝用资本家打击工人，用工人打

击资本家，又用资本家和工人打击老百姓。在注视经济萧条引起的人类苦难时，和他同属一个教会的牧师们曾经说过，这位牧师博士要求的是民族屈辱和民族赎罪。为了避免这些苦难，他提醒他的会众必须学会守上帝的安息日和崇敬上帝的圣堂。莫兰红衣主教则盼望有朝一日雇主和雇工之间会有较好感情，他提出一些妥协方案、计划，根据这些方案、计划，船主要彼此放弃破坏性的竞争，给工人以优厚工资，让自己也得到优厚的红利。但是，这位红衣主教不能明确指出在现存社会里如何能够实现这些。

同经济萧条的情况相似，罢工期间的经验也促使雇主赞成联邦制。早在1890年9月在悉尼召开的泛澳大拉西亚雇主会议上，他们重申契约自由的信念，并断言任何违反这种信念的行为不仅破坏商业，而且损害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他们还表示决心用暴力回答暴力。最后，他们鼓励所有雇主为了相互照顾、共同防卫而参加雇主联合会，并在每个殖民区成立联合理事会。这是1890年的事。到1893年，即在又经过了罢工和急剧的金融恐慌的三年之后，雇主们在思想上更进

了一步,他们宣称,一个由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组成的政治联邦,最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同时,罢工期间的经验也使工人的领袖们转而相信政治行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运动传统地被用为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的工具。工人们 168
认为,推翻那个社会,并不是他们份内的事。但罢工使他们怀疑这种看法。正如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工会会员认识到多年来他们曾经在死胡同里徘徊着,它的出路已为法律所牢固保护的专利事业所堵塞。因此,他们有责任问问自己:社会要不要变革?如果要,怎样进行?他们认为,唯有在主要吹出政治调子的号角声中,才能推翻社会上的种种障碍。工人们一旦察觉现代工业的基础本身是和他们的幸福势不两立的,他们便应当在可能实现改革的地方——议会,着手进行改革工作。在议会里,他们一定能够从政治生活的全部伪善中使自己子孙的(即使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更为光明。

这种思想并不是新鲜的。1874年12月,安格斯·卡梅伦被选为代表西悉尼的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议员。为了使一位工人能够在议会里担任议

员，悉尼的各业劳工理事会给他一份薪金。1880年，N·梅尔维尔被选代表诺森伯兰，J·加勒德被选代表巴尔曼，1885年，E·W·奥沙利文被选代表昆比恩，曾先后担任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议员。这些人都没有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代表，而把自己看成是执行下列任务的人物：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

到工人另立政党时，这种工会的政治概念，便成为对工人的各种影响之一。1891年，新南威尔士成立了劳工选举同盟，他们的候选人在同年立法大会选举中获得了三十五席。1892年，进步劳工政治同盟在维多利亚获得了十席。1893年，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在昆士兰获得了十五席。1893年，联合工人党在南澳大利亚立法大会获得了八席。1901年，工人代表在西澳大利亚获得了六席，1903年，在塔斯马尼亚获得了三席。

在初期，工会渴望使工党成为自己的政党。例如1891年在南澳大利亚，一个工会代表在联合工人党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只有那些有资格成为行
169 业劳工团体成员的人才能参加劳工政治同盟，但这个提议未获通过。到1893年年底，所有殖民区

都承认了非工会会员参加政党的权利。这样一来，工党就不再是全部由劳工阶级组成的政党，这一事实也许使工党有机会在此后十五年间夺取了各殖民区议会的多数席位，虽然这一成就是以放弃重建社会的理想作为代价的。

从一开始，工党的目的就只是要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关，而不是要摧毁它们。其目的仅在于使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成为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的现实，而不仅限于有特权的少数人。因此，在政治上，工党想让每个人对决定其生存条件的问题享有发言权。在他们党里，他们宣称由党员群众决定政策。起初，他们对这种政治上的民主谈得很多——例如复数选权制的废止，立法会议的废除，阁员的选举、罢免权，为一人一票而重划选区等等。与其说他们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人，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

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也是一样谨慎的。起初，他们以正直人士面对重大邪恶时所抱的那种激情和信心来讲话和写作。1890年，《布里斯班工人报》告诉读者说，工党的任务在于“把工人从雇佣奴隶制解放出来，使世界脱离耻辱和

悲哀，男子有丈夫气概，女子有妇德，孩子充满笑声，生活富有情意。”1890年1月，瓦加镇的«赫默»杂志告诉读者说，杀婴和竞争同是病态的、邪恶的、不道德的环境的产物，两者都是一样的坏。«赫默»最后断定：“它们两个都不是真正的伙伴！”

但是当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的第一批工人政治团体想明文规定他们的社会行动纲领时，他们的理想就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理想一样，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的理想。1891年，新南威尔士劳工选举同盟的第一个政纲，反映了对工人思想产生的种种影响。
170 例如，政纲第十三项就概括了主张单一税的意见：

> 我们的法律条例应该承认整个社会对土地享有天然的、不能让与的权利——所有的人必须依赖土地生存，并通过劳动从土地创造一切财富，因此，必须对因社会的存在和需要而增值的土地价值实行征税，不论土地是否通过人力得到了改良。

到1889年，新南威尔士的单一税联盟有十五个分部，到1890年，它的分部已遍布所有殖民区。主张单一税的人认为，除了地价税以外，其他赋税

应全部废除，这样，他们就能提高工资，增加就业，消灭贫困，减少犯罪，提高卑贱工作的尊严感，使政府纯洁起来，并把文明提到更卓越的高度。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类似的高尚目的可以通过严格采用选举中一人一票的原则而得到实现。还有另外一些人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教义的影响，认为人具有创造现世幸福以代替天国幸福的能力，天国幸福已由于宗教信仰的破灭而消失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会使人类成为兄弟。

在同一运动中，有人从教皇通谕《新事物》①中学到了关于社会前途的概念（《新事物》通谕是在新南威尔士劳工政治同盟成立那一年发表的），宗教领袖教导这些人要怀疑世界上所有关于幸福的许愿。1890年，在悉尼圣玛丽教堂为纽曼红衣主教的死亡举行安魂弥撒仪式中，莫兰红衣主教对会众说：

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废墟的时代，在这

① 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1810—1903)于1891年发表《新事物》通谕，针对当时在欧洲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宣称私有制"出自天性"，属于"基本人权"，主张工人与资本家"协作"，并力图在欧洲各国建立天主教的政党和工会，以贯彻他的社会主张。——译者

些废墟之中，虚伪的科学家们将在我们前面展出一座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鬼庙……在鬼庙里，要求我们加以尊敬和崇拜的，是被一些腐化的心灵奉为偶像的自私和骄傲。在天主教会的范围内，情况就不同。她召拢她的儿女在上帝圣坛的周围，给他们以神圣的生命，用天上的智慧教导他们，向他们指示真正幸福的秘密，把他们引向永恒的归宿。

171 当劳工政治同盟在1891年初次参加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候选人竞选时，有三十五人当选。工党十分高兴。在胜利的狂欢中，他们的一位代表乔治·布莱克在1891年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上站起来告诉议员们说，“……我们到议会里来，是为了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和破坏另一种社会环境的。”但在工党能够献身于这个崇高目的之前，它已因派系斗争发生了分裂；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斗争；工会会员想要控制工党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张单一税的人们也企图利用工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工党发生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采取党员履行“宣誓”手续的做法。在新南威尔士、昆士

兰、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工党成为议会中第三党或者说“举足轻重”的党。和所有这样的政党一样，它支持其他两个政党中的一个，以换取让步。也和所有这样的政党一样，他们很快就发觉，他们的实力有赖于他们在议会内的团结。工党也认为，在党内，党员决定政策。为达到这些关于团结和党内民主的目的，工党向全体成员提出一个誓约。誓约的初稿是1891年在新南威尔士写成的，到1893年，全体党员都签署过下列的声明：

> 我宣誓不反对劳工政治同盟本分部或其他分部所选出的候选人。我还宣誓：如果当选为议员，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尽力贯彻工党党纲所体现的各种原则，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特别是在影响政府命运的问题上，将按照工党多数人在正式组成的决策会议上的决定，进行投票。

在南澳大利亚，联合工人党于1891年成立时，原则上采纳了这个誓约；1890年在昆士兰，誓约列入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的章程之中；维多利亚在1894年，西澳大利亚在1902年，塔斯马尼亚在1903年，相继采用了这个誓约。

172 工党的反对者立即大肆咆哮地说，工党党员是院外团体的契约奴隶，他们对自己的选民不负责，誓约侵犯了信仰自由，并把能干的、独创的智慧置于多数派的专横之下。党内有些党员宁可装模作样地辞职，以表示追求自由，而不愿违心屈从党的决策机构的决定。工党党员本来可以下一点功夫制订本党一旦执政时所要采取的措施，可是他们现在却忙于为自己的政治斗争的方法辩护。

不管一小伙空想家对运动怎样热心，同时代机敏的评论家在总结工党的作用时却认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严重的威胁。悉尼《每日电讯报》在 1891 年 6 月 26 日写道："如果工党在议会的举动同他们在立法上的大部分要求一样合理，或者同他们大部分竞选发言一样温和，那末，他们将来会使资本家感到的困难也不会比现在更多一点。"工党对其他政党的行动产生了更多的直接影响。到了 1891 年，工党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出现，标志着政治上宗派主义的终结，因而也标志着"小宗派"领袖的收场；在其他殖民区，到1900 年也是这样。到 1891 年，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小宗派已为两个由公认的领袖所领导的政党

所代替。诸如帕克斯、罗伯逊、吉利斯等小宗派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两个殖民区，资产阶级政党已分为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两派都承担实现人人享受物质福利、机会均等、事业为有才能的人开门等原则，他们的区别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根本目的。

新人物开始接管政治。在约翰·斯图尔特·弥尔① 和德托克维尔② 思想的薰陶中和在乱哄哄的殖民地政治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家，正在让位于另外一些政治家，后者的自由主义是从阅读T·H·格林③ 和博赞克特④ 的著作，从阅读1868年至1874年格拉德斯通⑤ 政府的立法记载中锻炼

① 约翰·斯图尔特·弥尔(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经济学方面，他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取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在哲学上，他是实证论者，拥护主观唯心主义。——译者

②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175页译注①。——译者

③ T·H·格林(1836—1882)，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伦理学绪论》。——译者

④ 博赞克特(1848—1923)，英国黑格尔派哲学家，T·H·格林的门徒。著有《逻辑精义》(1895年)和《国家的哲学理论》(1899年)等书。——译者

⑤ 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自由党领袖。从1868年至1894年间，四度担任英国首相，实行广泛的殖民地扩张政策。——译者

出来的，其中一个天资非凡的人物是艾尔弗雷德·迪金。他于1856年8月生于墨尔本郊区菲茨罗伊，曾在墨尔本中学和墨尔本大学学习，在大学时
173 专攻法律。他在墨尔本中学曾受布朗比博士的影响，后者曾参加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公开大辩论，当迪金在大学肄业时，这个大辩论的主题已缩小为没有上帝的人生这个问题。迪金所接受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进步的信仰，对物质福利的追求，事业向有才能的人开门和政治民主等信念，部分地代替了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之乐。尽管他得天独厚，仪表堂堂，辩才卓绝，但在这个人的脑海里似乎经常浮现一些暗示，认为这个事务纷繁的世界，这个充满政争，充满在朝、在野的争执的世界，完全不是真实的世界；人应当为自己储备天国的财富；如果上帝和未来世界的生命并不存在，那么人应当潜心著述，在文艺界中创造荣誉。可是人间的荣誉他得来是容易的。1879年，他被选为代表西伯克的维多利亚立法大会议员。1883年，他在塞维斯—贝里联合政府任职，时年二十七岁。1884年，他留学美国，专攻灌溉。1887年，当他代表维多利亚殖民区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殖民地会议时，他

的举止庄重和政治热情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殖民地后，他把全部精力献给组织联邦的工作。1903 年，他出任澳大利亚第二任总理。

从 1879 年直至 1900 年，他是维多利亚议会中自由主义立法(例如工厂条例、复数选权制的废止、仲裁、最低工资等)的幕后主要力量。他是卓越的演说家；虽然经常成为粗暴和恶毒攻击的对象，但是他从不以粗鲁的语言回报，没有降低自己在议会生活中的风格。他的想象力是崇高的，品格是高尚的，但带有悲伤，带有丧失正当权利者的忧郁，似乎在模糊地暗示说：人们所能认识的不只限于这个外观世界；除了外观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真实世界。因此，当他宣称笃信英国制度、新教和英国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最大成就的时候，他内心苦恼，而表面上则在流行的观点面前表示畏缩。迪金内心依旧是褊狭的，对于更广泛的忠诚一无所知，而这种更广泛的忠诚已因生产、运输和交通的迅速发展而变为可能。

正是这种对流行的观点的敏感，说明了他对 174
诸如帕克斯和里德等人的厌恶。里德是一个魁伟的人，面目臃肿，声音高亢而尖锐。他的低级趣味

使一本正经的迪金感到震惊。带着道学先生那种对于谈吐放荡、猥亵和举止粗鄙的人的不宽容，迪金说里德青年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懒惰和富于生殖能力。里德在1845年生于苏格兰，1852年移居澳大利亚，后来充当文官，兼学法律，并获得作为辩论家的技巧。他怀着那种直至老死依然显露的厚颜和胆量，从对抗亨利·帕克斯爵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提名日对选民说，他的抱负是要使自己作出贡献而为人所知，而不愿以他已得的奖赏知名。选民们使他得票最多，作为回答。

里德经常当众扮演小丑。在市政厅或露天当着广大的听众面前，他的高亢嗓音，樱桃似的肤色，懒洋洋地抚摩着他的大肚子和表链上俗不可耐的饰品，使人联想到一个幸运的流氓[48]已经参加到政党斗争中来。有一次，当他正在墨尔本市政厅演说的时候，一个诘问者指着他的大肚子问他："这一胎将是个什么呢，乔治——是男孩，还是女孩？"里德回答说："如果你同它有过任何关系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袋鼠。"听众哄堂大笑，表示赞许。另一次，在里奇蒙德市政厅，他告诉群众说，自由贸易比保护关税优越，这一点已为悉尼每平

方哩的精神病人少于墨尔本这一事实所证明。

品格高尚和认真负责的人目睹这种当众做出的丑态不禁为之却步。但是滑稽淫秽的故事只是假面具的一部分，在假面具的后面，他仍然有着一副聪明伶俐的头脑。里德和迪金一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笃信通过国家可以使人人享受物质福利，并且认为事业要为有才能的人开门。但和迪金不同，里德信仰自由贸易而不赞成保护关税——这仅仅意味着他是在悉尼而不是在墨尔本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和迪金不同，他喜欢吵吵闹闹的政治活动。他不信宗教，对来世生活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自由贸易、教育、仲裁、最低 175
工资、工厂立法和政治民主将在适当时机为每个人创造自由和幸福。在通向这个目标的路上，里德准备尽情享受政治游戏的乐趣，欣赏佳肴美酒和聊天。他相信人类的善良和尊严，他的热情从来没有使他陷入帕克斯忍受过的屈辱，而他的思想感情也没有使他去追求迪金认为隐藏在人生背后的其他快乐。

抱有这些原则的自由党人受到议会中工党议员的推动和怂恿，采取行动，使殖民地的政治制度

更加民主，使国家政权起一种新的作用，促进并保护公民的物质福利。1870年，维多利亚实行了对立法大会议员给予薪俸的制度，昆士兰（于1886年）、南澳大利亚（于1887年）、新南威尔士（于1889年）、塔斯马尼亚（于1890年）、西澳大利亚（于1900年）相继仿效。1893年，新南威尔士废止立法大会复数选权制，维多利亚（于1899年）、塔斯马尼亚（于1901年）、昆士兰（于1905年）、西澳大利亚（于1907年）相继仿效。南澳大利亚从1856年以来对立法大会一直实行单数选权制，但对“利益集团”给以保护，以免非法改划选区后受到一人一票主义的影响。1894年，南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妇女参加选举，西澳大利亚（于1899年）、新南威尔士（于1902年）、塔斯马尼亚（于1903年）、昆士兰（于1905年）和维多利亚（于1909年）相继仿效。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殖民区立法大会实现政治平等，即一人一票主义。

和一般大众有所区别的“利益集团”，其权利和特权继续受到保护，途径是通过选区的分配，使乡村票数超过城市，其次是通过立法会议。工党还要自由党更进一步，废除政治不平等的全部残

余(如非法改划选举区和立法会议)和英帝国统治的残余(如各殖民区的总督和英帝国国会的保留权、驳回权)。有几个保守分子预言会发生厄运和灾难，或是无端地虚构一场恶梦，幻想人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将被新主人——多数派威迫、压服，政治变成清一色。但是自由党和工党反驳说，保守派与其说是要维护个人自由，倒不如说是要保 176
护自己的物质特权。

自由党人还按照工党的许多提示，扩大了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促进全民的物质福利。维多利亚议会在1885年至1900年间通过了八项工厂条例，塔斯马尼亚于1884年通过了一项单行的工厂条例，南澳大利亚则在1894年和1900年通过这种条例。新南威尔士在1896年通过了工厂条例，规定关于工厂、面包厂、洗衣坊、染坊、工场的监督和管理办法，并在一定情况下限制上列厂坊的工时，扩大雇主对雇工遇到某些工伤事故应负的责任。昆士兰于1896年通过了工厂条例。西澳大利亚于1899年通过了一项条例，规定要为店员准备座位，并于1904年通过第一个全面的工厂条例。保守派不承认天下任何议会享有规定劳

动时间的权利；自由党人和工党党员不纠缠于抽象的权利问题，只是关心如何保护工人阶级免受中国人的竞争，担心血汗制度和自由竞争的祸害。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维多利亚议会于1896年通过一项条例，授权政府成立工资局，以决定工厂或工场工人的最低工资率。保守派再一次大事宣传，认为这个社会正在肆无忌惮地违犯有关契约自由的法律。可是自由党和工党利用多数票把这种思想定入法令。在1890年至1894年罢工之前，新闻界和教士曾宣传劳资合作的思想。一幅典型的漫画把资本家描绘成一个穿大礼服，结蝴蝶硬领，戴大礼帽和留络腮胡子的商人，同他亲热握手的是一位工人，身穿粗蓝布的工人衬衣和有背带的宽裤，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的，在各方面都是清洁生活的缩影。在罢工以后，一些人很想知道今后的劳资关系是不是会以对抗为特征，而不再是合作。雇主当中的悲观主义者开始谈论强制，或者幻想回到工会运动开展以前的黄金时代，当时他们的“雇工”是恭顺的，安于贫困，白天从事苦役，
177 晚上则带着感激雇主的心情，于疲乏中躺下去。一些工党领袖坚持说，只要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

段归私人占有，劳资对抗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资产阶级政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和工党中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仲裁和调解作为解决这种对抗的办法。调查新南威尔士罢工的皇家委员会于1891年写道："据坦白承认，许多纠纷都是由于无知、误会、无稽的猜疑和夸大的惊慌所引起的。如果能够排除这些附加的干扰因素，把争论缩小到问题的焦点，将有很大的好处。"为了驱散这些云雾，维多利亚议会和新南威尔士议会先后于1891年、1892年采取了自愿仲裁的办法。南澳大利亚也于1894年采用了。1901年，新南威尔士议会对劳资纠纷采用了强制仲裁。保守派再一次强调指出强制在道德上的各种弊病。但是，在创立澳大利亚联邦的兴奋和热情中，这一次劳资对立被人们暂时忽视了。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间，联邦运动对殖民地政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运动。早在1842年，当开始有人鼓动把老的新南威尔士分成两个或三个殖民区的时候，有远见的人就以方便为理由为某种中央政府进行辩护，但决心把新南威尔士分成三个殖民区的人对他们

的意见听不进去。南澳大利亚有一些人把所有关于中央政府或联邦制的建议都与受新南威尔士的控制混为一谈，他们对此更加充耳不闻。格雷伯爵于 1846 年至 1850 年间曾就各殖民区议会各自制定关于铁路轨距、邮政电报、检疫和防御等共同关心事项的法律所产生的危险，再次劝告移民们加以考虑，但当时这个告诫被一些人粗暴地搁置一边。他们相信他们的前途在于自治和责任政府，而不在于任何单一的政府或联邦政府。由于这种愚蠢而付出的代价是，新南威尔士的铁路采
178 用了标准轨距，维多利亚采用五呎三吋的轨距，昆士兰、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采用了三呎六吋的轨距。

各殖民区议会对其他殖民区的货物征收关税，或用不同等级的火车运费加以歧视。新南威尔士有自由贸易的既得利益；而维多利亚则有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新南威尔士是一个罪犯殖民地；而南澳大利亚则不是。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盛行橄榄球运动；而其他殖民区则按澳大利亚足球规则进行比赛。这样一来，从 1850 年到 1881 年间所有关于成立联邦的建议都失败了，原因是各

殖民区之间相互竞争，而且缺乏充分强大的推动力使人们的眼界超出于地方性的琐碎事务以外。

在十九世纪最后整个二十年间，防御问题、对有色劳工的恐惧和经济利益加强了推动联合的力量。1889年，爱德华兹少将告诉各殖民区的政府说，如果各殖民区不得不依靠本身的防御能力，它们的地位将是危险的。这位少将认为，如果没有各个殖民区力量的联合，就完全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国防。按照帕克斯的看法，正是这个防御的问题使各个殖民区“面临着成立联邦政府的紧急需要”。有见识的、对外界世界发生兴趣的一小群人，害怕德国侵略新几内亚，害怕法国侵略新赫布里底群岛，或者更笼统地害怕俄国和美国在太平洋的经济帝国主义。的确，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直到爱德华兹少将提出报告的时候，太平洋每次战争恐慌，每一次真实的和假想的威胁，都曾引起人们对联邦制的谈论。

帕克斯读了爱德华兹的报告后，建议召开一次联邦会议，由六个殖民区和新西兰各自的议会选派代表参加。会议从1890年2月6日至14日在墨尔本举行，五个殖民区和新西兰各派代表二

人，西澳大利亚派代表一人出席会议。会议先由帕克斯致词，谈及他们的工作的重大意义，继由其他代表发表演说，在这些演说里，统一的澳大利亚的理想往往为殖民区之间的自私的、琐细的嫉忌和人类的虚荣心所淹没了。之后，他们同意在
179 1891年到悉尼召开会议，起草联邦宪法。当代表们把这次悉尼会议起草的宪法提交各自的议会时，新南威尔士否决了这个宪法草案。这不仅因为所提出的这个宪法对这个殖民区不公平，而且因为联邦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根据它对主要政党的权力产生的影响来判断。联邦制已成为政治的玩具。为防御而联合的推动力，尚不足以说服澳大利亚人超越殖民区的利益。

其他动机——对有色劳工的恐惧，经济利益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沙文主义——提供了成立联邦所必需的动力。1880年至1900年间，对有色劳工的恐惧已成为东部各殖民区的歇斯底里症。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工人担心白人劳工与有色劳工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昆士兰的工人怕“黑人”和中国人会把所有的白种工人的生活至少降到更低的水准，如果

不是降低到奴隶地位的话。资产阶级担忧中国进口商和家具制造商的竞争。他们担心黑白人种通婚的祸害，并生怕让中国人、日本人、太平洋岛屿居民或印度人在澳大利亚居住，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象迪金在1901年说的，问题触及

> ……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因为处于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性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隔开来，要消除这种划分，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的愿望起到更广泛、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经济发展，加深了这种一个民族一种命运的感情。从1880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制造商曾因殖民地货品背上了二等品
或蹩脚货的名号而感到恼火着急。据说"殖民地的 180
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搀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殖民地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至少民族主

义者认为是这样。但是制造商相信，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的力量的诬蔑将被揭穿，他们攀登高峰的机会将由于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而得到保证。

1890 年至 1894 年发生的事件使资产阶级各阶层确信，成立联邦将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一位塔斯马尼亚人讲得那么直率："我们要建立一个光荣的国家，这样肉价就会便宜一些。"制造商想要废除殖民区区际关税和有差别的运费；一些雇主相信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将会防止 1890 年至 1893 年罢工的重演；在边区，例如在里弗来纳、新英格兰、威默腊、马累和达令丘原，农场主和畜牧业者叫嚣要求废除殖民区的关税；一些银行家和金融家相信联邦政府可以防止 1890 年至 1893 年金融恐慌的再现。

对建立联邦开始作出决定性的尝试的是"边区"利益集团。1893 年召开的科腊瓦会议，有澳大利亚人协会、墨尔本商会、制造商协会、进步协会和旅行推销员协会的代表参加。代表们在决议中说：

会议认为……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目前和将来的利益，将因它们在国王统治下及早联合而

> 得到增进。其次，这些殖民区在人口、财富、资源发现和自治能力等方面，现已大大增长，其增长的程度足以证明，已有充足理由依据公正对待各殖民区的原则，在一个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政府下，把它们联合起来。

1894 年，新南威尔士总理乔治·里德打电报给其他五个殖民区总理，建议他们在霍巴特会商。1895 年 1 月，在霍巴特召开的第二次总理会议上，总理们决定成立国民代表会议，由各殖民区选民直接选举代表各十人组成，负责制订联邦宪法 181
草案。1897 年 3 月，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进行了选举，各选出了十名代表。西澳大利亚的代表则由他们的议会选出。昆士兰没有选派代表，一方面是由于该区立法大会与立法会议之间在选举方法上发生争论，另方面是由于联邦制同昆士兰北部要求分治的行动纠缠在一起。

这样，五十名代表(其中一些人体重超过二十㖊①)在闷热的天气中，穿着毛哔叽衣服、浆硬了

① 㖊是英国重量单位，通常用于计算体重。每㖊等于十四磅，二十㖊等于二百八十磅。——译者

的衬衣和硬领，聚首一堂，从1897年3月至4月在阿得雷德，1897年9月在悉尼，从1898年1月至3月在墨尔本，相继开会，着手起草联邦宪法。他们遇到不少障碍。劳工政治同盟是多疑的。在五十名代表中，只有一人代表他们的观点，而这个人又缺乏热忱，在墨尔本会议后几个月就脱离了运动。其余的人则代表"资产阶级阴谋"。在他们看来，联邦的创始人就是那些在1890年至1893年骚动中下令射击墨尔本和巴科尔代因的罢工者的人物。有些人抱有更阴暗的猜疑，说资产阶级各政党建立联邦，是希望要压倒工党。感情冲动的人说，工党应该提防联邦的阴谋。在劳工运动里面的另外一些人，认为联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断言，他们的任务在于使联邦宪法尽可能与他们所提出的"一人一票"的口号接近。

在1897年至1898年的几次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同意应该成立联邦，但他们却因种种困难而感到沮丧。如果联邦议会受权征收关税，那么还会有什么税收留给各殖民区议会呢？如果联邦政府有了剩余收入，将按什么原则在六个殖民区政府之间分配剩余？将按人口、面积还是按财

政需要来分配？联邦制就是双方——各个殖民区议会为一方，联邦议会为另一方——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如果契约的双方权力相等，那么少数可以指挥多数；反之，如果他们的权力不能相等，那么联邦的原则就要从属于责任政府的原则。 182

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后，代表们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以粉饰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主张各州有较大权力的人与主张强大的联邦议会和内阁的人之间的分歧。新的国家定名为澳大利亚联邦；六个殖民区称为州。联邦将设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由普选产生，参议院由各州选民选出的每州六名代表组成。联邦将设高等法院，由联邦议会任命的法官组成，其职责是审理联邦与各州之间管辖权发生抵触的案件。联邦议会受权制定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法律：与外国或各州之间贸易通商、租税、电报、邮政、银行业、结婚、离婚和婚姻事件、残废恤金和养老金、移民入境和出境、对外事务、为了预防和解决超出任何一州州界的劳资争端而进行的和解和仲裁；这些叫做“特定的”权力。“残余的”权力例如教育、卫生和铁路等依旧属于州议会。

随后举行了公民投票，由各殖民区享有选举权的居民对这个宪法进行表决。但在墨尔本代表会议和公民投票期间，新南威尔士的里德政府经由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赞成"票须超过八万张；当1898年6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票不能达到这个数字时，各殖民区的总理同意在墨尔本开会考虑修正宪法。在1899年1月至2月的会上，通过了关于两院发生僵局、剩余税收的分配、修改宪法和参议院权力等修正案。这是为了应付一种批评，说是第一次草案过于保守，对人口稀少的州过分有利。此外，为了抚慰新南威尔士的自尊心而又不过分冒犯墨尔本，大家同意联邦首都设在新南威尔士，与悉尼市保持合
183 理的距离。当宪法修正案提交第二次公民投票时，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赞成票都占多数，尽管在享有选举权的人中只有40%赞成，约有16%反对。

西澳大利亚依然坚持不让。在这个殖民区，库尔加迪和卡尔古利金矿场的选举人正在叫嚣要求成立联邦，并要求以此作为一根打击佩思的保守派和地方主义者的棍棒。在西澳大利亚，约翰·

福雷斯特好象小池里的一条大鱼。在他控制下的西澳大利亚政府，因担心金矿场的激进主义和担心在丧失征收关税的权利后的政府收入而感到烦恼。在1898年，关税几乎占这个殖民区收入的90%。因此，他们同东部各殖民区和伦敦讨价还价。对方向他们提出：如果他们成为联邦的一个创始成员，联邦将建筑一条从卡尔古利到南澳大利亚的奥古斯塔港的铁路。1900年7月31日，他们举行公民投票，在有资格参加投票的选民中，赞成者占46%，反对者略为超过20%。这是在所有殖民区中赞成票的最高比例，赞成票的总平均数是59%①。

与此同时，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的代表正在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讨论宪法的文本。张伯伦对于没有规定从高等法院上诉枢密院的权利感到不满，这部分是由于感情上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想要鼓励英国资本家继续在澳大利亚投资。为了迎合英国的论点，代表们放弃他们的有点闯劲的民族

① 原著此处疑有错误。"赞成票"的比例可能是"选民投票"的比例之误。——译者

主义，并同意用折衷办法与张伯伦妥协，规定在联邦和任何一州或几州就宪法权力范围发生纠纷时，如果高等法院认为问题应由女王根据枢密院意见作出决定，则允许从高等法院上诉枢密院。当代表们听到张伯伦接受了这个办法时，感到非常高兴。

1900年5月21日，在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之后，
184 张伯伦便在英国下议院提出了这个法案。他在下议院宣布：批准澳大利亚联邦，绝不损害或削弱帝国的统一。他相信，英国人可以期望这个伟大功绩的完成不致有损于他们由于澳大利亚同胞的智慧和爱国精神而感到的自豪。同年7月，维多利亚女王签署了这个法案，但不到一年，女王逝世了。一年后，新南威尔士第一次用平炉炼钢获得成功。当1904年至1905年日本人摧毁了俄国舰队的时候，看来欧洲人统治亚洲的日子已经不长了。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风度和文明在澳大利亚达到顶点的时刻，旧秩序已在死亡中了。

可是正当生产方法的改变和交通运输的革命破坏了乡野居民的独特地位以及他们与世隔绝的状态的时刻，一些澳大利亚人却继续吵吵闹闹，要

求他们的独特地位和机会，想要建立一个得免于旧世界的阶级、贫穷和战争等祸害的新社会。英国人或欧洲人在澳大利亚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英国人习气。英国文学家弗朗西斯·亚当斯从1884年至1889年间曾在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住过，他于1886年写道：

> 一个下午在悉尼漫步时给我留下的头一个印象……是英国文明的惊人的力量。……到处都是六个手指和六个脚趾的巨人的拇指印和拇趾印，这个巨人就是安诺德先生的终身仇敌英国的非利士人①！……清教主义的、喀尔文主义的耶和华（或者我们说莫洛克神②好吗？）在悉尼和在伦敦是一样的，在墨

① 非利士人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仇敌，相传是巨人族安那金人的后裔，所以这里叫他们为巨人。英国作家马修·安诺德(1822—1888)在其所著《文化和无政府状态》(1869年)等书中，称英国中等阶级为非利士人，指责他们轻视文化教养、追求实利的市侩主义："那些相信我们的巨大财富足以证明我们的伟大和福利，从而以其生命及智力最大限度地致力于追求致富的人们，正是那些我们叫作非利士的人"。亚当斯在这里说到的英国非利士人，即指英国中等阶级。——译者

② 据《旧约全书》，莫洛克(Moloch)是以子女为祭品的火神，比喻牺牲人命的恐怖事物。——译者

> 尔本和在爱丁堡也是一样的！……在悉尼，这些人不仅墨守他们的巨人的教义，而且墨守巨人的道道地地的衣服款式。女人穿起来笨重，男人穿起来难看的飘垂的衣服，和我们在伦敦看到的一样！……同类的食品，一样地暴饮暴食，以及和我们（请注意我们是多么仔细地遵守就餐时刻）在相同的时刻就餐！

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混淆不清，这正是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当制造商把自己的货品同“故
185 国”的货品比较时，他对诬蔑感到愤慨；作家对奉承、崇拜、屈从英国人的作品和讥诮他本人的作品感到忿恨；表演技艺的人要求歌厅的歌词中有更多的澳大利亚生活特色，如紧腿裤带[10]、飞旋镖[7]、活动围栏[64]等等，而少一些英伦三岛情调的歌曲，如《小船坞》、《多里斯》和《亲爱的妈妈》等。问题是，如果澳大利亚人不是英国人，他们又是什么？亨利·劳森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许做了最令人难忘的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

劳森于1867年在新南威尔士的格伦菲尔金矿场的一个帐棚出生。他的父亲是挪威人，由水手转业为金矿勘探员，母亲是澳大利亚人，渴望过有

文化的生活而不愿过乱七八糟的矿区生活。他曾在尤朗德里公立学校肄业。他十六岁时，他的母亲遗弃了她的丈夫，他随同母亲迁居悉尼。他处理日常生活的先天无能，使他在经历了格伦菲尔、尤朗德里的农村的寒微生活之后，又尝到了城市的穷困滋味。1887 年，他开始替悉尼《新闻公报》撰写小说和诗歌。他在 1896 年结了一次不能偕老的婚姻。他纵酒到了愚蠢的程度，因为纵酒毒害了人的性情。1900 年，他到伦敦去，寻求别人的赏识，但招致了祸害：他受到奚落和伤害，使他抱憾终身。他逐渐变成了聋子，这更增加了他处世的困难。

他怀有一种对伙伴情谊[50]的憧憬，把它作为对抗冷酷环境的安慰，或许也作为对失去来世生命的慰藉以及对于自己因任性、敏感而招致的轻视和羞辱的慰藉。但他是在一个充满乡下气息的环境中说话，这一点把他的憧憬弄别扭了。他以朴素和热情的笔调描写伙伴情谊和人类尊严。他以怜惜的心情描写乡野中的男男女女英勇无畏地同土壤、气候、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斗争的生活。他把本地出生居民和殖民地开拓者的

性格写成文字。他创造了米切尔这个典型人物，这个放肆无耻的无赖，在对待敌人时是一个骗子和说谎者，但在和自己的伙伴相处时，却集一切美德于一身，成为荣誉的典型。

186 劳森只关心乡村居民的问题，因而不能处理在失去宗教慰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在不得意的时候，他挖苦中国人、娇气的英国人和文化。因为劳森热烈称赞那些评论家们早已批评过的、在英国中等阶级社会里的非利士人的品质，所以他没有给后人指出前进的明确方向。这是弗菲[1]、布伦南[2]等人的任务；在一些澳大利亚人陶醉于民族主义的流行歌曲的时候，他们开始以坚毅严肃的态度专心致力于处理更深刻的人类问题。

---

① 约瑟夫·弗菲(1843—1912)，澳大利亚著名小说家，笔名“托姆·科林斯”，曾当过牧人和矿工。他的著名作品《如此人生》(1903年)用旅途随笔的形式，表现了居民中不同的社会群。——译者

② 克里斯托弗·布伦南(1870—1932)，澳大利亚诗人，著有《布伦南诗集》和《布伦南散文集》。——译者

十、乐观主义者的时代 187

(1901—1919年)

1901年1月1日，从清晨起，火车、电车和渡船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悉尼这个大都市。早上10时，太阳从云层里出来了，清爽的南风减弱了可怕的溽热。11时，游行队伍从悉尼公园出发，向百年纪念公园前进。由剪毛工领头，跟着是介绍澳大利亚人生活面貌的图片展览车，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街道，从一群群高兴的人们身旁经过，并通过许多拱门，上面有表现团结友爱精神的标语。脸色黝黑的毛利人骑着大而瘦的马，酷似塑像；印度人穿着华丽的服装游行；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快乐的骑兵和枪手飞驰而过。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除外)造成了隆重严肃的气氛。可是据一位目击者说，居民一般是嘻嘻哈哈的，欢呼而且不断地欢呼，同时也有一些人擦着眼泪，他们因爱国心、忠诚和亲切的感情而过度激

动，热泪纵横。

在百年纪念公园里，在七千名应邀的客人、帝国部队、一个由一万五千名歌手组成的歌唱队和六万名观众的面前，一个身材细长而有趣的人物霍普顿勋爵在响亮而持续的掌声中进入会场中心。歌唱队合唱《啊上帝，我们昔日的救星!》；圣公会总主教宣读为这次盛会制定的祈祷文；接着，曾于1897年至1898年间担任联邦会议书记的E·G·布莱克默为霍普顿勋爵担任澳大利亚
188 联邦总督举行就职宣誓。歌唱队唱起了一支感恩赞美歌，由于酷热，歌声一阵阵地荡漾在会场的周围；新的联邦国旗升起来了；当广大群众一次又一次欢呼时，礼炮也轰鸣起来。然后，霍普顿勋爵以响亮而清晰的声调宣读女王和英国政府的贺电和祝词。欢呼声再一次响彻会场周围，只是由于奏起国歌才被歌声淹没。跟着，政府人员退场。至此，澳大利亚联邦的"光辉灿烂"的成立典礼便告结束。

联邦成立前一天，霍普顿勋爵已任命埃德蒙·巴顿组织新联邦的第一任内阁。巴顿是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他的政治经验是在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获得的。资产阶级报刊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他

们的乐观和信心。墨尔本《时代报》写道：对于澳大利亚的工业来说，这是吉兆。这不仅因为有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护关税派的内阁执政，而且因为与它抗衡的自由贸易派领袖早已声名狼藉，使他的党处于不利地位。《时代报》接着说明，这是因为里德先生虽在某方面有些能力，但已因惯于玩弄政治骗术以致不可救药地丧失了信任。这样，墨尔本——直至1927年迁都堪培拉之前，它是政府的所在地——开始勉强使新成立的联邦接受它的公正、正直和实利主义。

工党的意见同样是乐观的，虽然出于另外一种原因。在《布里斯班工人报》看来，澳大利亚联邦的产生，摆脱了古老国家的许多迷信和传统，也摆脱了阶级差别以及神圣化的寓言和谬论。澳大利亚已站在通向未来的门槛上，手里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派对就职典礼那天发生的事件并不满意。《新闻公报》注意到，外国军队列队开进留作专用的围场；而澳大利亚军队则留在外边。只有一些工会的代表获准进入会场中心，而成千上万的“上流人物”、特权阶级和趋炎附势的人却坐在看台附近。

对他们说来，总督显得渺小无力，好象总督以他本人为例，表现了君主主义理想基础也是渺小无力的一样。《新闻公报》补充说：对于澳大利亚人说
189 来，英国的代表应当退居末席，这才是恰当的，因为在队伍的所有成分中，他是最不需要的，又是最无足轻重的。

在举行庆祝后，各政党准备第一次议会选举。概括地说，有三个政党参加竞选活动。保守党自由贸易派的特点，不在于他们所赞成的，而在于他们所反对的。对当时普遍谈论的白澳、人人享受物质福利等政治主张，他们也保证要赞同，但他们反对在任何足以侵犯臣民自由的方面行使国家权力。作为自由贸易派，他们坚持放任主义政策。因此，他们在竞选中极力否认与他们的敌手所提出的办法有关，而不愿阐述打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支持他们的有：一向支持自由贸易的畜牧业区、各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商会和大的进口商行。

另外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他们也保证要实现白澳、事业为有才能的人开门和人人享受物质福利，但准备运用国家权力

保证最低生活水准和保护弱者抵抗强权。在准备运用国家权力的程度上，他们与工党双方并不一致，他们在宣传中笼统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在自由党保护关税派看来，工党的誓约侵犯了信仰自由，并强制党员服从本党年会的命令，以此来破坏党员对选民的责任。从一开始，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内部就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它得到制造商协会和专门职业阶层的支持；另一个是激进派，它得到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前一派就投向保守党，后一派则投向工党；但从1901年至1909年间，在澳大利亚，也象在英国和法国一样，制造商的利益同自由党理想家的利益看来还是一致的。

起初，工党就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而不是激进的或革命的政党。工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也小心翼翼地把投合社会上其他阶级心意的观点包括在党纲里面，同时又避而不提任何可能促使中间派倒向自由党保护关税派怀抱的一般 190
革命的目标。工党联邦议会党团于1902年成立时，曾就一系列的“政纲条目”作出保证，以后在

1905 年党的联邦会议上，激进派叫嚷要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改良主义者却极力反对任何这样激进的主张，结果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1. 把各种专利事业收归集体所有，扩展州和自治市的工业职能和经济职能，以保证所有生产者得到他们企业的全部收益；
2. 培养一种建立在保持种族纯洁基础上的澳大利亚人的感情，并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开明的和自立的社会。

这简洁地概括了工党党内各个明显的主要派别的共同愿望。这些派别是：受 1891 年教皇通谕《新事物》影响的天主教徒、激进的世俗人道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正是由于工党自称为民族主义政党，它才赢得了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从而扩大工党在选举中的吸引力，并减弱党内激进派的力量。经济民族主义者就是与英国、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入口商品进行竞争的当地制造商。

天主教同样也起着缓和作用。从 1891 年到 1905 年，澳大利亚天主教教士们的一系列宣言曾经把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同那些出于基督教仁爱的动机、企图纠正错误和减轻工人阶级痛苦的人们

加以区别。在他们看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准备推翻社会现存的秩序，把人们的目标仅仅集中在现世福利方面，而把天堂留给天使和雀鸟。主教们在1905年一封给教区教友的书信中提醒信徒们说，耶稣基督自己曾在旷野对周围的千万饥饿群众说过：“我怜惜大众。”只要这些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动机，主教们就想不出理由来反对天主教徒投工党的票。

到1905年，情势已把天主教选民推入工党的怀抱。原因是多方面的。象天主教徒在悉尼办的一份周报《自由人杂志》在1902年11月8日所指 191
出的：一个旨在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的政党和旨在提高群众精神生活的教会，不会是互不相容的。在天主教教士们看来，保守党自由贸易派也好，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也好，它们都是一心要使澳大利亚公众生活非宗教化的新教徒政党。在他们眼里，非宗教化总是社会新教化的后果。天主教会领袖们曾经赞成联邦制，因为增强澳大利亚的力量将削弱英国的统治；任何事情，只要能把英国人从强者的宝座上推翻，就非常投合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心意。因此，从1902年起，天主教的报刊一

直鼓励它们的读者加入工党支部。天主教会夺取工党的过程已经开始，因而工党内部激进派的声音就变得微弱了。

澳大利亚工党的第一个领袖是J·C·沃森。他于1867年在智利出生，曾在新西兰受过教育。他在新西兰的印刷业中工作时，开始听到关于人类改善生活的希望以及温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优点。工党的温和态度和巴顿、迪金、金斯顿等人的进步的自由主义，使工党同自由党保护关税派能够实现有效的联合。

首届联邦议会中各政党的形势，使工党和自由党保护关税派不得不达成这种协议。从1901年到1910年，在三个政党中确实没有一个能够在众议院获得绝对多数。在1901年第一次选举中，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得三十二席，保守党自由贸易派得二十七席，工党得十六席。在参议院，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得十一席，保守党自由贸易派得十七席，工党得八席。由于可以指望得到工党的支持，巴顿政府在两院都获得了有效的多数，以推行其白澳政策、保护关税、仲裁和关于社会服务的立法。

关于白澳政策，除了参议院两名自由贸易派空论家之外，所有政党的议员都是赞成的。通过禁止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移入，驱逐昆士兰州蔗田喀纳喀人劳工出境和歧视住在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及太平洋岛屿居民(包括毛利人)等办法，192
使澳大利亚保存一个欧洲人占优势的社会，这种愿望已有长久的历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牧地借用人试图使用苦力来代替罪犯时，就有人第一次抛出这种想法作为回答。它的再次出现，则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在金矿场上对抗的结果。从1860年至1900年间的种种经验，使排斥和歧视的措施更加需要了。美国内战似乎已经证明，使用奴隶或半奴隶有色劳工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邪恶的。政治平等和事业向有才能的人开门的原则和社会金字塔的基础只包括一个阶级的那种大农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欧洲人在亚洲的统治，曾被人理解为阐明达尔文关于适者生存学说的例证。据认为，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注定要让别人骑在头上耀武扬威，而欧洲人则一定要避免遭到一下跌得粉碎的命运。工人们深信，使用有色劳工威胁了他们的生活水准和各种特权。中等阶级

既害怕对欧洲文明和对英国政治制度产生威胁，又害怕异族通婚的祸害。

因此，迪金于1901年向众议院提出限制入境移民法案。迪金是一个善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为人正直，品格高尚。他郑重地谈到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都处在危险之中，政治自由的传统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不容削弱。工党领袖沃森则郑重地谈到白澳是工人阶级生活高水准的一个必要条件。在院外，慎重和克制更被抛到九霄云外。《布里斯班工人报》写道：

> 澳大利亚一定要免于有色人种的祸害，要消除罢工，要获得没有穷人、没有贫民救济院的声誉，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体。不然的话，它就要变成一个杂种的国家：因种族纷争而动乱不安，因工业竞争而受摧残，贫民充斥，并为律师、银行家、商业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结成的派系所统治。

过后，《新闻公报》称澳大利亚为欧洲以外唯一的
193 纯粹白种人的国家。他们写道：澳大利亚打算让全世界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看到在一面旗帜、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下的一个完整的大陆。有少

数人害怕，侮辱亚洲居民将会带来长远的后果，并且担心，如果后代子孙不得不忍受祖先罪行招来的报应，澳大利亚是否还有能力继续存在下去。但是，那些相信人类彼此是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们，都默不作声。于是，那些相信工人的团结乃是世界希望所在的人们便同基督教文明的使徒们联合起来，争取澳大利亚继续成为白种人的天下。

方法是简单的。根据1901年限制移民入境条例第三节的规定，要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必须参加测验，默写一种欧洲语言中的五十个单词，不及格者得被宣告禁止入境；任何居住期未满五年的入境移民也须参加这种测验，如不及格，应被驱逐出境。根据1905年的修正条例，“欧洲语言”改为“指定的语言”，以避免触怒日本和印度。同年，印度、日本的学生、游客和商人获准入境，居留期限不超过五年，到1912年，中国人亦得享受这种权利。根据1901年通过的太平洋岛屿劳工条例，所有移居昆士兰州的太平洋岛屿劳工，应在1905年以前被驱逐出境。同年的修正条例允许若干种类的人继续居留，这是出于同情心的决定，因为他们

如果回到原住的岛屿会被处死刑。

此外，联邦立法和各州立法都歧视亚洲人、太平洋岛屿居民和土著居民。根据1901年联邦邮政电报条例第十六节的规定，凡代表联邦政府签订的关于运输邮包的合同或协定，应以雇佣白种工人从事运输为限。根据1902年联邦选举权条例第四节的规定，任何澳大利亚、亚洲、非洲或太平洋岛屿(新西兰除外)的土著居民，其姓名不得列入选民名册，但根据宪法第四十一节的规定享有这种资格的不在此限(宪法第四十一节规定对所有获准列入本州选民名册的人，给予联邦选举
194 权)。1908年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第十六节剥夺了亚洲人(在澳大利亚出生者除外)以及澳大利亚、非洲或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领取残废恤金或养老金的权利。根据1901年新南威尔士剪毛工待遇条例，中国人须住在与白种人不同的住房。澳大利亚工会章程规定，不准亚洲人、土著居民和混血儿入会。这样，白种人的澳大利亚这个目的，就可以通过限制移民入境、驱逐出境和种族歧视而得到实现。

从1901年到1909年间，执政的政府都决心

要提高白种人的物质文明水平。保护关税制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制订第一次税则的动机既是要提高收入，也是要保护本国工业，使不受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竞争的影响。但是制订第二次税则的动机，则是要促进正规就业，为投资提供保证，使劳动条件趋于稳定，以及防止工业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外国的标准。这是“旧的”保护关税制。1908年，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得到工党的刺激和支持，提出了“新的”保护关税制。这种保护关税制保证制造商不受外界竞争的影响，并使他能在工业不受损害以及它的供应当地市场的能力不致减弱的条件下，支付公平合理的工资。高等法院是根据1902年司法条例成立的，它正式宣布：根据宪法，议会无权制订关于工资的法律，更不必说关于公平合理的工资了。这样一来，“新的”保护关税制由于缺乏宪法的权力便告失效，而“旧的”保护关税制也就是保护本国工业的制度则继续存在，并成为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的信条以及制造商获得利润的一个来源。

与此同时，“公平合理”工资的观念并没有被人遗忘。根据1903年的条例，议会成立了联邦调

解仲裁法院，任务之一是调解和仲裁超越州界的劳资纠纷。当H·V·麦凯代表阳光收割机公司于1906年促使法院注意公司同工会就最低工资问
195 题发生的纠纷时，法院的审判长H·B·希金斯断言，法院的任务是判决一般雇工的正常需要是什么。希金斯是迪金派的自由主义者，他曾有勇气公然说，英国人在南非的行动在道德上是无可饶恕的。他继续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说，议会打算保证工人得到一些单靠个人同雇主讨价还价的通常方法所得不到的东西，即：所得的工资足以供应他们适当的粮食和用水，适当的住所和休息，适当的衣着和按一般人标准估计的俭约的舒适条件。希金斯所讲的数字限于一家的房租、日用必需品、面包、牛奶、燃料、蔬菜和水果，而不包括储蓄、互助会、保险、车费、学校学杂费、娱乐、假日、酒、烟、非常的意外事故、宗教或慈善等开支。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属于一个文明人的最低需要的范围。

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和工党关心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侵犯，比关心建立新的文明为多。在某种意义上，白澳政策是保护关税的一个巨大的行动。养老金和残废恤金则是同一动机在较小规模上的

表现。根据1908年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所有年满六十五岁的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臣民，只要在澳大利亚居留达到规定的年限，都可以领取养老金。所有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臣民，如系残废并经证明丧失劳动能力者，亦得享受恤金。对自由党和工党来说，养老金和残废恤金都不足以证明他们想要降低强有力者的地位，或者想要削减富翁的巨大财富（更不用说重新分配财富了），而只证明他们想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使澳大利亚成为能在世界列国中占崇高地位的文明国家，以实践它的创立人所设想的伟大诺言。可是诺言和物质福利再一次留为白种人专用，因为亚洲人以及澳大利亚、非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明确地被剥夺了享受养老金或残废恤金的权利，而按当时的居住限制条件，只有“真正的澳大利亚人”[2][28]才有领取的资格，而“从英 196
国新来的移民”[57]、“南欧人”[26]或“德国人”[40]是没有资格的。

到1908年年底，自由党和工党的基本思想已被定为法律。就他们看来，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身体

衰弱、年老、跛脚、残废和瞎眼的人将受到仁慈的尽管是紧缩而俭约的国家的保障，使他们不受供求律的影响。当时，自由党保护关税派自信已在原则许可的限度内运用国家权力，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那些冷冰冰的地方变得温暖起来。在因自由党和工党的保护关税政策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郊区，自由党人的选票被工党候选人夺取了，自由党人也为此感到不安。例如在1908年，以兴起中的工业市镇季隆(菲利普港西海岸的一个港口，离墨尔本四十哩)为中心的科里奥选区，自由党保护关税派就被工党击败。与此同时，自由党内比较保守的一翼，或是在保护关税方面有着既得利益，或是对曾使迪金得到鼓舞的理想不感兴趣，他们对工党关于"专利事业"的宣言的长远含义越来越感到惊慌。产生焦虑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而引起的政治动荡，以致在1901年至1908年选举期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控制住多数议席。

大选中选票减少，对工党内部激进派的顾虑，三党制的不稳定以及对工党关于防御和联邦剩余收入分配的建议的一些临时的（那怕是相当短暂

的）焦虑，这一切引起了迪金的惊慌，于是他与保守党自由贸易派进行了关于两党合并的谈判。结果，在1909年5月，两党合并为自由党，由迪金担任党的领袖。合并的目的是要把联邦所有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在议会通过自由主义的立法，以便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澳大利亚。党纲提出了下列意图：拥护联邦，坚持有效的保护关税政策，建立白种人的澳大利亚，通过普遍军训以发展澳大利 197
亚海陆军。党纲还提到：由联邦承受各州的公债，以节省联邦公共支出和提高公共事业的效率；坚持所有居民代表在选举和行动上应直接和单独对居民负责的原则。自由主义已放弃了它作为改良社会的先锋作用，而只承担保持现状的义务。

资产阶级报刊热烈欢呼两党合并的协议。墨尔本《时代报》写道："按照实际来说，自由党位于保守主义和工党两个极端之间，它有着十分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工党的报刊却发出了尖刻的谩骂。《澳大利亚工人》在论述迪金在两党合并中的作用时写道："当官是他的癖好，而且对他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中国人[20]离不开鸦片，醉汉离不了酒一样。"当迪金于1909年5月即两党宣布合并

后几天在墨尔本走进众议院时，一些人大喊犹大①。工党方面的休斯熟知各种变节和不名誉的卑鄙行径，他嘲笑说，犹大至少还有那种风度，走到外面去上吊自杀。使迪金惊慌失措的是，他发现所有那些他曾经跟他们一起努力为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奠定基础的人们已站在议会的反对派一边，而他从前的对手却成了自己政治上的朋友。

这次合并的直接政治后果是在选举中第一次出现了一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这是一个奇妙的讽刺。但是获得这次胜利的却是工党而不是迪金新组成的自由党。在1910年4月13日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在众议院得了四十一席，自由党得了三十一席；而在选举过后，工党在参议院得了二十二席，自由党得了十四席。因此，迪金便于4月29日辞职，由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出

① 犹大是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据《新约全书》说，犹大原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把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权者，替捉拿耶稣的人带路。后人用来作为叛徒的代称。——译者

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执政后行使权力的情况，证明迪金对工党极端主义的恐惧并没有应验，因为新政府对既得利益采取了改良主义政党那样的克制和尊重，而不是采取激进党的态度。

工党以一种与它自称具有澳大利亚民族感情的政党相适合的坚定性，选择了距悉尼西南一百九十哩的一个畜牧业中心——堪培拉作为首都的所在地。尽管党内比较喜欢表现自己、热心致力文化的人士曾建议把首都命名为莎士比亚，但政府中多数人却坚持采用了土名。由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自私竞争和政治上的盛衰机遇，澳大利亚把首都奠在一个自然风景非常明媚的地区。在首都的建筑上又是喜逢了好运。在世界各地送来应选的该市设计中，他们选中了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的设计。他的设计着重于美观，反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建筑的杂乱和丑陋。这是1911年的事情。同年，工党政府宣布不得在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销售烈酒[66]，因为工党在道德上是要求严格的，它注重使资产阶级循规蹈矩，使工人阶级受到尊敬，而不甚致力于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和毁坏另一种社会环境。

1910年至1913年间，他们对社会福利立法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他们通过了设立联邦银行的条例，而在一阵关于人民的银行的空谈消散以后，这个联邦银行不过是陈旧褪色的淡酒。他们打算通过私营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来提高现行银行制度的效率。1910年通过了土地税条例，其目的在于强迫地主使用土地或者卖掉废置不用的大块土地。它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在于进攻经济特权的内层堡垒，而在于打破专利权。他们发现自己由于受宪法的限制，以致在诸如工资、物价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社会、经济问题上，实际上没有立法的权力，因此，他们把部分精力转移到修改宪法方面。当他们的领袖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公开为这些建议辩护时，他们的言词含混不清，这正是那种在理论上破产即使不是在道义上破产的人的特点。当休斯于1910年在《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替工人说话》的一系列文章时，路易斯·埃逊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写道：
199 休斯没有写《替工人说话》，而只是为工党说话罢了。埃逊写道："在这本书中，我们找不到根本原理的阐述——没有经济学，也没有哲学——我们

也没有看到书中提到任何明显的事实，足以暗示休斯先生及其信徒有一个他们朝之前进的远大目标。”

在工党获得多数议席的第一次执政期间，它的特点在于首都的选定和设计，在于国家陆海军的创建，而不在于它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形式及前途有什么想法和行动。1913年5月选举后，自由党以一席之差在众议院获得多数，而在参议院则居于少数。自由党的新领袖约瑟夫·库克组成了政府，这个政府一直维持至1914年6月总督在工党以多数票在参议院两次否决了政府禁止优待法案①后解散两院的时候为止。但是到了7月底，澳大利亚政治的地方性问题已被卷入了世界事务的大漩涡之中。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整个7月，澳大利亚人都在处理许多在历史上对他们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问题。天主教新任墨尔本副主教曼尼克斯博士深感高兴，因为墨尔本大学纽曼学院的开幕将使天主教徒堪以担任澳大利亚公务、专门职业和商务等方

① 政府禁止优待法案于1913年10月31日提出，内容是要取消工会会员在政府机关中被录用的优先权利。——译者

面的较高职位。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航空邮递第一次得到实现；这时，墨尔本居民正瑟缩于7月杪雨雪交加的天气中。但是到了7月28日，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条款传开了，这个消息使他们从褊狭的自满情绪中惊觉过来。

当7月30日报刊宣布奥地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已经动员的时候，费希尔先生代表澳大利亚工党于7月31日在维多利亚州的科拉克讲话，他说："但是，如果在不损害荣誉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努力，而最坏的情况依然出现，澳大利亚人将坚决站在祖国一边，协助她和支持她，战斗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个先令。"听众掌声雷动。8月3日，联邦总理约瑟夫·库克宣布政府决定把澳大利亚海军全部交由英国海军部指挥，并向英帝国提供一支二万人的远征部队。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星
200 期日，神父和牧师要求他们的会众祈祷和平，同时一位作家在一家工党报纸上写道："如果欧洲竟将陶醉于流血之中，那么就完全有更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工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当大不列颠在8月4日午夜向德国宣战时，人群在街上唱国歌，咖啡馆的乐队演奏《统治吧，不列颠！》，戏院里

的人群欢呼歌唱。在墨尔本，一群不受约束的暴徒劫掠了小伯克街的中国居民区，而在第二天，墨尔本大学的学生在下课时唱起了《主佑我王》。

在整个8月，库克政府继续准备参战和选举工作。在9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工党在众议院得四十二席，自由党得三十一席，无党派人士得一席；在参议院，工党得三十一席，自由党得五席。安德鲁·费希尔再次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则担任总检察长这个部长级的职务，并凭借他的品格上的力量，不久就控制了内阁和党的决策机构。威廉·莫里斯·休斯1862年在伦敦出生于威尔士人的家庭，曾用部分时间在威尔士和伦敦接受师范教育，但在1884年，他决定移居澳大利亚。在谢绝了昆士兰州僻远地方一所学校的教席之后，他当过碎石工、牧场巡界员[9]、牛贩和海员。他后来迁居悉尼，在那里，当过饭厅管理员和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他顶了一家书店，并且开始热心研究社会史和工人状况，这使他参加码头工人联合会、新南威尔士州劳工政治同盟和州立法大会的活动；1894年，他成为州立法大会议员。1901年，他是西悉尼选出的第一届联邦议会议员。

他可曾爱过任何人，这是值得怀疑的。他身材矮小，几乎是个侏儒，在昆士兰州西部地区的严酷的经历，又使他成了聋子。在为生存而挣扎中，他的遭遇是冷酷无情的，这使他对同胞的热爱也
201 归于消失。他把一个经过严格磨练而幸存的人的诡诈和果断带到政治中来。他在悉尼的初期政治生涯，是忙于在选举中舞弊，在咆哮的群众面前逃窜，在码头参加搏斗[51]，而对于人类前途的计划却漠不关心。这个人对于人类是缺乏信心的，他认为，人类的心地太卑鄙了，除了自私的目的以外，不会为其他目的而工作。尽管从1890年到1910年间，他总想相信使自己吃过苦头的一些坏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他没有把他的探究引到逻辑上的结论。他的头一次结婚（他的妻子生了四个孩子后，于1906年死去）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坏，对人类更加失望。这样，休斯就成为关于人性的悲观论者。他虽作出姿态，要把强者的地位降低下来，并使富人一无所有，但用什么来代替这些人，他又毫无见解。大战期间的经历生动地暴露了他扮演的角色是资产阶级仆从，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公仆。

在整个8月和9月间，先是库克政府，后来是费希尔政府，都为参战作了准备。按照英帝国政府的指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派遣了人数不多的远征军分别占领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萨摩亚等处的德国殖民地。同时，政府号召公民入伍，以组成一支两万人的远征部队，实践对英国的诺言。当志愿兵在利物浦(悉尼附近)和布罗德米多斯(墨尔本附近)训练的时候，政府大量制造货车、马具、制服，改装用于运载军队的船只，征用粮食，准备医药装备。到10月底，二十六艘澳大利亚运输船和十艘新西兰运输船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州南海岸的英王乔治海湾，11月1日，这个海上运输队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战舰护送下驶出公海开往中东。途中，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与在海上袭击协约国船舰的德国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在可可群岛交战，并把后者击沉。

到12月，英国总参谋部已经设想了一项计划，准备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炮轰君士坦丁堡①，借以削弱土耳其，并指望由此减轻土耳其和

① 土耳其最大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首都，现称伊斯坦布尔(Istanbul)。——译者

德国在东线对俄国人的压力，后者当时正因坦仑
202 堡战役大败而处于困境。这是一个幻想家的计划，只有那些相信为了丰厚的战利品就可以不顾任何痛苦、残酷和牺牲的人才会欣赏的计划。因为加利波利的高地是峻峭的，而且有装备精良的英勇部队防守；这是由土耳其的德国军事顾问林曼·冯·赞德尔斯训练的一支斗志很强的部队。这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远征部队还在开罗附近的营房进行军事训练，或在开罗的咖啡店和下级酒馆休憩、寻欢作乐，对于别人在伦敦暗中给他安排下的严峻考验一无所知。

4月1日，澳大利亚士兵和新西兰士兵获得通知，取消一切休假。4月3日，部队从开罗乘火车到达亚历山大，由此登船开往达达尼尔。4月25日黎明前，先头部队划小船登陆。但是，正如偶然的命运在这样宏伟的计划中首先把他们当作玩具一样，自然对他们也是同样冷酷无情的。海流把他们的小船从一个海岸陡度不大的海湾冲了开去，冲到另一个海湾，而那里的海岸却和澳大利亚南方海边的悬崖一样陡峭和险恶。当士兵向高地攀登时，他们遭到土耳其火炮无情的轰击。但

是他们坚持下去，掘战壕，准备进攻，同时他们的澳大利亚战友和新西兰战友以及英国和法国军队也开始参加向达达尼尔的进攻，海军也不断向土耳其防线开炮。

从4月到12月，协约国军队一直坚持战斗，直至伦敦命令撤退。12月19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乘上护航舰队的船只，开往埃及。截至那时为止，澳大利亚军队阵亡七千六百人，新西兰军队阵亡将近二千五百人，澳大利亚军队受伤一万九千人，新西兰军队受伤五千人。法军伤亡人数和澳新军团[1]一样多，英国损失约达澳新军团损失的三倍。迅速结束中东战局的宏大计划终于成了军事上的惨败。出于失败后的愧悔，人们把澳新军团士兵(即使不是他们所属的民族)部分地提升到光荣的地位，并从那年起，在加利波利登陆的日期就被定为澳新军团的纪念日了。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日子象征着民族最崇高的抱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对许多战士的约束。他们经历 203
过炽烈的战争熔炉的锻炼，已经大有提高，他们不是没有善恶标准的，平凡、琐屑、庸俗、卑鄙的做法并不能讨好他们。

1916年初，伦敦总参谋部决定把澳新军团从埃及调到法国西线。3月19日，第一批军队到达马赛，在军乐队奏《马赛曲》① 声中，在人们吹锡笛、叫喊、欢呼乃至用渎神、淫秽的语言叫喊声中，军队又从马赛转乘火车开往西线。军队的行为是堪作模范的。这使那些预料澳大利亚军队踏上法国领土后将爆发大混乱的军官们十分欣慰。驻马赛的英军司令写道："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桩行为不端或不守纪律的事件。"这是从来没有的优良纪录。到了5月，军队已在西线的阿尔芒提埃尔附近进入阵地，准备对付从1914年8月4日疯狂战斗开始以来各国军队所已遭遇到的大屠杀、泥淖和艰苦。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调整了经济机构，以便为战争服务，战争大大地增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也增加了联邦对各州的权力。物价被冻结下来了。当在格冷费里（墨尔本的一个郊区）一个名叫法里的面包师傅对联邦冻结物价的权力提出抗告时，高等法院于1916年判他败

① 法国国歌，或译《马赛进行曲》。——译者

诉。政府建立了对羊毛、小麦和其他初级产品①的市场的国家管理制度。政府还购买船只以补充可供英澳贸易使用的少数轮船。由于对粮食、衣服、靴子、武器和弹药的需要迅速增大，战争也加速了加工工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以及为了取代英国的产品，布罗肯希尔产业有限公司的钢铁厂于1915年4月在纽卡斯尔投入生产。这样一来，由于奇妙的机缘巧合，战争不仅有助于澳大利亚传统在加利波利的深化，而且为工业发展准备了经济环境：它迟早会使澳大利亚工业化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其独特状态和乡野知识都归于消失。铁路已把乡野和世界拴在一起了。

同样，战争也必然要使十九世纪末叶曾使自由党和工党中的高尚人士受到鼓舞的梦想归于破 204
灭。1915年10月，费希尔受任驻伦敦高级专员，休斯成为联邦总理。由于英军在法国的伤亡人数将达百万，以及德国潜艇战切断了海外对英国的

① 没有经过加工或加工很少的农、林、牧、渔、矿产品都叫初级产品(Primary products)，以别于把特定的原料经过机器加工后的合格产品，即工业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初级产品也译作基本产品、原产品或原始产品。——译者

供应，英国政府只好指靠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补充。为了直接了解母国的困境，休斯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于1916年初访问英国。在一个陷于绝境的国家掀起的狂热和激动中，休斯为那些与他同样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人们效劳。他在英国上下奔忙，向被卷入战争歇斯底里的听众高呼"醒来吧，英国！"

由于文明的行为标准正在他周围消失，休斯嘲笑阿斯奎斯、格雷和霍尔丹，这些人曾经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模范。休斯被他的作为一个群众演说家的胜利所陶醉，又到处受到从战争中发了财的人的礼遇，他扬扬得意地继续前往西线。西线的士兵亲切地把他当作"澳大利亚小兵"[27]来欢迎。当时他确信澳大利亚必须增加人力、军需品和粮食等方面的补给，并且确信：澳大利亚每月能提供一万六千五百名士兵——英帝国总参谋部规定的数字——的唯一方法，只有实行海外服役征兵制。英国人答应在战胜国瓜分战利品的和会上给澳大利亚以发言权作为酬报。

但是，休斯领导的工党，却是一个保证要反对海外服役征兵制并且怀疑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政

党。从1916年8月他在阿得雷德登岸时起，征兵的危机已开始使全国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在他乘火车从阿得雷德到墨尔本途中，每个车站都聚集有许多人向这位“澳大利亚小兵”歌唱«家，甜蜜的家» 和国歌。在墨尔本，人群欢呼或叫喊“比利①，你好！”当休斯告诉他们希望过后谈一谈一个严重问题时，一个士兵热烈地紧握他的手，要求大伙为征兵制欢呼三声。但是，在自己的党内，休斯却遭遇到人们用以对待叛徒的那种冷遇和敌意。新南威尔士劳工政治同盟和维多利亚劳工政 205
治同盟都重申他们反对征兵的立场。当休斯宣布他打算就这个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时，悉尼劳工政治同盟把他开除出澳大利亚工党。

在公民投票期间，群情激昂。休斯采取的立场是根据事实的。在给选民的宣言中，他写道：“我们夸耀自由的时候，必须证明我们自己配得上享受自由。”要做到这一点，澳大利亚必须每月补充一万六千五百名陆军士兵，而这是志愿兵役制所不能办到的。休斯断言，前线士兵们正在召唤

① 休斯名威廉，比尔(Bill)或比利(Billy)是威廉的爱称。——译者

澳大利亚人民去和他们并肩作战。他提出了和前线士兵团结在一起的呼吁，并恳求联邦每一个男子或妇女以民主的名义在10月28日投“赞成”票。工党中一部分人抱有怀疑。他们鼓励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投“反对”票，以保持澳大利亚继续成为白种人的国家，其理由是：志愿兵役制所补充的兵员已经足够了；征兵制要是在澳大利亚实行，就将实行于全国；任何人不应决定别人的命运；征兵制使工会运动受到威胁；征兵制曾被每一个工党组织和大多数工会会员所拒绝。这样，工党的宣传又把白澳和阶级团结等危言耸听的题目提了出来。

群众对各个教派的忠诚也被煽动起来了。墨尔本圣公会宗教会议宣称，这次大战是一次宗教战争，协约国的意见正在被上帝用来维护弱者的权利以及维持世界的道德秩序。他们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一项赞成征兵制的决议，由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勃发，他们还站起来唱《主佑我王》。曼尼克斯主教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这次大战是一次肮脏的贸易战，尽管他认为协约国取胜是要得的，但澳大利亚已作出足够的牺牲了。

没有征兵制，他们照样可以尽义务，并且干得很出色。他还说，教士不应当在布道坛上充当募兵员的角色。在他演说结束的时候，人群不时站起来，歌唱«主佑爱尔兰»。

1916年10月28日，政府要求选民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次严重的非常状态中，政府在兵役问 206
题上，应对公民拥有强制权力，在这次战争期内采用联邦以外服役征兵制和目前政府在联邦内服役方面所有的权力一样，你赞成吗?"①有一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五十七人投赞成票，一百一十六万零三十七人投反对票。不管教派吵闹如何愤激，不管双方宣传如何凶猛，从各选区的投票数字来看，人们主要是按照所属政党的路线来投票的。工党于是着手把休斯作为违反誓约的人来对待；这样，曾经在«替工人说话»中精明而出色地为誓约辩护的人，就要变成它的一个最难忘的牺牲者。这是一桩具有讽刺性的事件。

---

① 原书此处漏去十个字，现根据«剑桥不列颠帝国史»1933年第7卷第一部分«澳大利亚»第579页和马乔里·巴纳德著：«澳大利亚史»1963年第二版第495页补译。——译者

10 月 10 日，休斯在维多利亚州巴拉腊特的一次演说中夸口说："不久，我们将辨别良莠，我们要考验一下在劳工运动中有多大一部分值得保全下来——又有多大一部分一定得垮掉。"这些话博得了喝采，但这是虚假的胜利，因为并没有人授权休斯决定劳工运动的前途。当工党议员们在墨尔本议会内工党会议厅开会时，芬利森先生提议："总理（休斯先生）作为党的领袖已不再享有党的信任，兹特宣布主席的职位悬空。"休斯愤然要求他的支持者跟他离开会场，有四名阁员和二十六名一般党员跟他一起退场。墨尔本《守卫报》说，"工党已经拔枪自杀了"。

留下的工党党员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他们已从反对征兵制运动的领导层清洗了赞成征兵制的头目。他们已把队伍中的叛徒清除出去。这次分裂使工党被削弱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它连续在野达十三年之久。这次分裂也加强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工党中的势力。由于受到休斯一派的沙文主义的破坏，运动的政治侧翼大为削弱，从而使热中于斗争的分子得以乘机夺取了工会组织。因此，从 1918 年起，世界产业工人协

会①、工团主义者和一个大工会运动②，开始对工会组织在罢工、同雇主合作、劳工运动策略等方面的态度，产生了影响。

当休斯在墨尔本引人注目地退出会场后，他立即开始关于成立国民政府的谈判。工党新任领 207
袖图德先生断然拒绝了这个倡议，但自由党领袖约瑟夫·库克对它作出了反应。结果，不仅在1917年1月成立了国民政府(从11月到1月，休斯领导了得到自由党支持的政府)，而且成立了国

①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 I. W. W.)是美国的工人组织，成立于1905年。该组织的活动带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如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必要性，拒绝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工会进行工作。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后来变成一个对工人不起任何作用的宗派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译者

② 一个大工会运动(One Big Union Movement)，即把各种行业工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团结。早在1891年，殖民区区际工会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大工会的计划，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1918年8月，在悉尼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又通过了这样的计划，并经其他州的工会代表大会讨论，最后在墨尔本召开的全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但由于行业工会职员、工人政客和澳大利亚工会官僚的反对，未能实现。——译者

民党，这个党是休斯集团和原来自由党的合流。他们保证要得到胜利、民主和白种人的澳大利亚，但抛弃了关于他们的前辈曾经持有的自由主义理想和激进情绪的全部伪装。

西线传来了伤亡更为惨重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休斯决定于1917年12月20日就征兵问题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要求选民回答："你们赞成联邦政府增援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这个提案吗？"这一次群众的反应极为强烈。曼尼克斯博士在墨尔本展览馆的一次演说中称休斯为"小沙皇"。休斯扬言要把这位大主教驱逐出境以为报复；当他到达昆士兰州沃里克时，人们向这位总理扔鸡蛋和西红柿；作为报复，休斯则把昆士兰州《议会会议录》撕去了几页，因为这几页中记录了昆士兰州总理、爱尔兰天主教徒瑞安痛斥休斯为骗子和说谎者的发言。正当教派对立和地方对立把澳大利亚分裂为二的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猛攻彼得格勒的冬宫。11月7日，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向他的信徒们宣布："今天，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已经开始。"就在那一天，昆士兰州的工人向休斯扔臭蛋，而人群则歌唱《主佑我王》

或«主佑爱尔兰»。12 月 20 日举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有一百零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人投赞成票，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人投反对票。

与此同时，西线的战事逼近危急阶段。协约国军队因伤亡惨重，又遇上敌方使用狙击、毒气以及例如坦克、飞机投弹等可怕的新式武器，还有德军即将进攻的谣言，以致过度紧张而烦躁不安。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和平、面包与土地的口号，同帝国主义者“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18 年 3 月，德军发动攻势，并在某一点突入离巴黎不足三十五
哩的地方，但是，已经得到美军增援的协约国军队 208
堵住了德军的进攻，然后将德军逐退，直到德军的退却变成了溃败。10 月 28 日，奥匈乞求单独媾和；一天后，德国海军在基尔叛变。11 月初，德国爆发了一次几乎是不流血的革命。德国皇帝退位，由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出任首相，及时接受了福煦代表战胜的协约国提出的停战条件。11 月 11 日上午十一时停火。当停火的消息在澳大利亚宣布时，旗帜迎风招展，教堂鸣钟，乐队奏乐，人们在街上互相拥抱。

在大战期间入伍的四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九人中，有三十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一人上过战场，其中阵亡人数为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二人，负伤人数为十五万二千一百七十一人。从1914年至1919年间，战费估计达三亿六千四百万镑，而自1919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年金、遣送回国费、伤员照料费、战债利息以及归国士兵补助等项，又达二亿七千万镑左右。

带着他在全部政治生涯中所显示的坚持性和炫耀性，休斯来到了伦敦。当时他深信弱肉强食之说，公开宣布澳大利亚不受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主义的约束。当和平谈判于1919年1月在凡尔赛开始时，休斯好斗地反对五强提出的要把德国殖民地委任澳大利亚统治而允许自由移居的建议。休斯认识到，根据这些规定，日本人可以移居新几内亚。这是他热心进行的生存斗争之一。象他后来所说那样，“士兵为澳大利亚的安全而死，澳大利亚现已安全”。他的意思是说，由于他的努力，澳大利亚已从日本人手中被拯救出来了，因为根据澳大利亚代表团一位成员在凡尔赛提出的折衷方案，被委任统治新几内亚领土的国家得在该

地区适用它自己的入境移民法律。休斯还力求保证：国际联盟盟约并不包括一项约束每一会员国给予所有其他会员国以平等待遇的条款。在这一点上，休斯也是一样喜欢争执的，而且又是一样奏效。根据休斯这种行为，代表们大可以推论说，战 209
争的目的是使澳大利亚保持作为白种人的天下，而不是〔威尔逊〕十四点所概括的崇高愿望。在对待赔偿问题上，休斯也是一样贪婪的，他想要一大笔战争赔款：他想要德国人补偿澳大利亚花在战争中的三亿六千四百万镑。但是这一次，“澳大利亚小兵”只好以部分解决为满足，就返回本国。

当休斯于8月31日在墨尔本走出火车时，士兵们报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给他戴上一顶澳大利亚士兵帽，并用澳大利亚国旗裹住他。当他的车子徐徐从斯潘塞大街火车站开往市政厅时，也出现了类似的热烈场面。在市政厅，士兵们把他从车上拉出来，抬上梯级，同时人群欢呼和叫喊“你是美好的人”和“澳大利亚小兵”。在这个胜利和完成任务的时刻，有些人高兴得流出眼泪。当休斯第二天晚上在本迪戈演说时，他用大部分时间嘲笑那些正在哄骗别人相信有通向天堂的

捷径的空想家。9月10日，当他在众议院起立发言时，他激动地讲到澳大利亚如何通过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幽谷，他们现在大可高声感谢上帝说，由于士兵们的牺牲，他们已安然被引导到绿草如茵、太平无事的牧场了。他接着又说："除了努力工作，别无得救之途。那些企图使各阶级互相对立或企图毁灭财富的人们，他们劝导别人走上的是一条灭亡的道路。"

十一、从战争中熬过来的人 210

（1919—1941年）

1919年9月10日，休斯在众议院讲话时，对议员们说：

> 我们加入这一场争取国家安全的战斗，为的是要挽救危亡，保证国家完整；是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自由政治制度（不管我们的政治主张如何，它们对我们国家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是要坚持那些我们曾经公开宣布而竭力维护的理想，即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和这个年青民主国的其他抱负。

他接着提出问题："现在，我们得到了什么？"并对此提出了简单的答案：国家安全，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免于陷入共产主义。休斯说："澳大利亚现在是安全的。"熬过了战争以后的时代开始了。

各个主要的政党，尽管在着重点上和方法上互不相同，都接受了休斯所阐明的上述方针。国

民党积极致力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共产主义，但有许多党员却对休斯推行白澳政策的毒辣和狂热感到不安。国民党也主张采用保护本国工业和仲裁等传统方法来保持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由于工党自1916—1917年分裂以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因而政治地平线上的乌云，不是工党的挑战，而是乡村党的兴起。

211 直至1917年，乡村的利益集团只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阶层组织，例如畜牧业者协会或农场主和移民协会来发挥他们的影响。然而在1917年至1920年间，乡村利益集团，包括羊毛生产者、小麦农场主、奶品农场主、果园主和乡镇的专门职业人员，在联邦和各州都组织起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乡村党的一派是由畜牧业者和发了财的农场主组成的。他们非常保守而且狂热地反对激进主义、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诋毁民主为毒素，认为一人一票意味着城市中“整天吹牛、游手好闲的人”支配了辛勤劳动的畜牧业者或农场主。另一派则由小农、农场工人、小资产阶级和乡镇中的工人阶级所组成。他们是党内的激进派，叫嚷要求分割大地产但

不太认真地考虑单一税制和类似的激进观点。同时，他们还赞成乡村中所虚构的关于城市的故事，说是——由于城市的影响，农民和乡镇居民在污秽中过活；高额基本工资正在助长仙人掌和其他祸害在整个澳大利亚的乡村蔓延①；澳大利亚的财富不是由辛勤劳动得来的，而是从海外借来的。

1920年，乡村党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恢复了以前的局面，即不但有三个政党存在，而且国民党人可能在议会中不再占有多数，因而需要依靠乡村党才能继续执政。在以后整个四十年中，乡村党的领袖巧妙地利用了本党举足轻重的作用，迫使国民党对乡村利益集团作出让步，以换取它的支持。他们采用的策略是，赞成保护加工工业，而以乡村利益集团也得到保护为交换条件。因为他们也把自己看成是从战争中熬过来的人，因而也有分享高标准生活的权利。

工党也要工人获得恰当的一份，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要求，他们之间是有严重的分歧的。从1917年11月俄国革命开始直至1920年，激进

① 指农村人口因追求高额工资流向城市，以致农村劳动力不足而引起的现象。——译者

分子、积极斗争派和空论社会主义者一直继续同
212 工党保持不自然的联系，或者参加比较极端的运动(例如维多利亚社会党)。随着1920年10月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立，这些派别终于与澳大利亚工党决裂。工党党员抱着和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同样的热忱，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邪恶。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J·斯托里在1919年3月曾说：

> 我们主张培养一种以保持种族纯洁为基础的澳大利亚人的感情，并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开明的、自立的社会，由政府掌握各种专利事业，同时扩大州和自治市的工业职能和经济职能。

工党为了实现改良主义和取得它在战后利益中的份额，依然小心翼翼。

1921年10月，在澳大利亚工党布里斯班会议上，大多数人投票赞成一个新的目标："实行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化。"但党员对于这个目标却有不同的理解。对激进分子来说，这个新目标将使工人摆脱"雇佣奴隶的枷锁"，并使工党一旦执政时不至演出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笑剧。另外一些人承认他们不了解新目标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些人说，它意味着工业最后将由国家控制，这个转变必须是渐进的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

从1919年到1929年十年间，政权一直掌握在国民党和乡村党手里。在1919年12月9日举行的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三十五席；工党二十六席；乡村党十席；无党派人士获得四席，其中除一席外，一般都投工党的票。在参议院，国民党有三十五名议员，而工党只有一名议员。休斯重新组成政府，保证要继续实行保护关税制和白澳政策，保持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和镇压共产党人。有关关税制度、仲裁和限制移民入境的法令，依然是贯彻这些目的的工具。为了酬报那些使澳大利亚人民平安地进入和平的绿洲的人，休斯政府通过法令，使归国士兵能够以低价和相当的抵押购买 213
耕地，在物价和收成有利时能过优裕的生活。

政府以排斥亚洲人的同样狂热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休斯对限制移民入境条例进行了修正，授权联邦得宣告任何提倡暴力颠覆联邦现存政府的人为禁止入境移民，或将其驱逐出境。1920年通过的刑法同样包括一个条款，宣布任何提倡以暴力颠覆现存政府的人为有罪，得受监禁的惩罚。

休斯政府打算不让亚洲人和共产党人破坏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休斯领导澳大利亚人走进和平绿洲的时间并不长久。1922年12月选举后，工党在众议院获得三十席，国民党二十八席，乡村党十四席，自由党二席，无党派人士一席；而在参议院，工党获得十二席，国民党二十三席，乡村党一席。如果和乡村党没有某种默契，国民党便不可能组成政府。这个时候，休斯已和他自己的政府和政党的其他成员疏远起来了，因为从他在1916年到伦敦活动得到成功，并在1919年以其机智、坚忍和在凡尔赛取得的胜利而成为世界名人后，他的傲慢自大已发展到令人厌恶的程度。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已不怎么注意掩饰自己对内阁其他能力较低的成员的藐视。因此，尽管他在伦敦和凡尔赛的成就得到了公众的赞扬，但国民党的其他领袖却开始和乡村党的领袖密谋推翻他。

厄尔·佩奇是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格腊夫顿的医生，他在1921年4月任乡村党领袖。当他透露他的政党不愿与休斯共事而准备和国民党另一位领袖合作时，休斯乃于1923年2月辞职。于是佩

奇立即与斯坦利·墨尔本·布鲁斯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布鲁斯于1883年生于墨尔本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墨尔本中学受过古典教育。这加强了他相 214
信由仁爱的和高尚的优秀分子治理社会这种天赋的自然倾向。他由墨尔本中学直接升入剑桥大学。1907年，他充当律师。到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在武斯特团任军官，服务成绩卓越。他在苏伐拉与英军联合作战时受了伤。1917年回到澳大利亚后，他参加佩特森、莱恩和布鲁斯家族企业的工作；1918年，被弗林德斯选为众议院议员。由于出身、所受教育和他本人的气质，布鲁斯从来不同情关于伙伴情谊和平等的乡野传说或市镇恶棍的恶习。他生性远离群众，不爱活动。从他穿英国式的衣服(他使用鞋罩)，从他讲话是英国口音而不是澳大利亚口音，从他对工人阶级讲话时那种英国式的态度(他在议会的群众接待室中对工党党员讲话时，总是称呼他们的姓)，大家都知道他和民主传统的距离。于是，在1923年，一个文质彬彬的贵族、移植到澳大利亚的英国文明的一朵奇花，便和一个精明的乡村医生结成联盟，组成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他们的目标和休斯的目标是一样的，他们想维持白澳政策，保持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标准并保证国家安全。不过，在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设想上，他们和休斯的政策却有所不同。得到制造商协会和商会支持的布鲁斯，主张加强保护本地工业，鼓励英国投资，增加人口，并为澳大利亚的剩余产品寻找市场。得到畜牧业者协会、农场主和移民组织以及奶品农场主支持的佩奇则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制订计划以保护初级产品生产；改善乡村生活，供应电灯，提供较多的娱乐和较好的道路等物质设备。他们两人都同意必须把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积极斗争派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运动的残余扫到他们无能为害的地方去。

215 1923年至1928年间，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给予鼓励。政府规定了食糖的固定零售价格；生产者受到了保护，免受外来的竞争。当葡萄价格跌落到一定程度时，政府便给葡萄种植者以补贴。对水果罐头工业给予补助金，使它能在海外市场竞争。奶油的内销价格被提高了，将公价和原价的

差额用来补助出口商，使他们能在伦敦市场上同新西兰、欧洲和美国的奶品农场主竞争。对来自英国的移民给予特殊补助，以鼓励入境移居。这是因为布鲁斯和佩奇象菲尔丁① 小说中的托姆·琼斯一样，是富于英雄本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把文明的前途同新教信仰和英国制度的兴盛混淆起来。1921 年至 1929 年间，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正好超过二十一万二千人。为了鼓励他们到农村定居并缓和乡村的不景气，布鲁斯—佩奇政府广泛地补助各州政府修筑道路。为使政府收入在联邦和各州之间能有比较公平、有效的分配，佩奇于 1927 年说服议会和人民支持联邦和各州之间订立一项财政协议。

与此同时，政府大力促进堪培拉的建设，作为鼓励公共工程和开发的政策的一部分。到 1927 年 5 月 9 日，由约克公爵在堪培拉主持的议会开幕典礼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一天，在天空开阔、

① 亨利·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1749 年出版著名小说《托姆·琼斯史，一个遗弃儿》。小说中的托姆·琼斯被塑造成一个行为慷慨大方的模范，但有点放荡、胡闹。这本小说对后来英国小说的发展颇有影响。——译者

平地略带起伏的这个小城中，三、四万人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外，恭候公爵和公爵夫人光临。当他们站在新的洁白建筑物的石阶上时，内利·梅尔巴夫人① 歌唱《主佑我王》。一个孤独的土著居民要求全部看完这场“杂耍表演”。但由于他被认为衣着不适合这个场面，一个警察把他带走了。公爵从台阶上敦促人们要倾听伟大的先烈的呼唤，踏着他们的足迹走向光辉的前途。在庆祝这次典礼的官方午宴上，只向国王陛下一人祝酒，而且是
216 用了果汁，没有酒类供应，演说也取消了。工党领袖们再一次对宴乐和崇拜上层社会感到怀疑。墨尔本《劳工呼声报》写道：“堪培拉的场面看来似乎是一场失败。”

在此期间，政府正在拟订计划，以帮助那些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磨折或在经济上遭遇不幸的人们。甚至在担任总理以前，布鲁斯就已经提议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是否可以把国民保险作为一项为偶然患病、终身残废、年老和失业预作

① 内利·梅尔巴夫人（1861—1931），澳大利亚歌唱家，出生于墨尔本。她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土生的花腔抒情高音歌唱家。——译者

准备的措施。在1925年的第一个报告中，委员会赞成对病人、残废者和产妇给予补助。它的第二个报告推荐了一个失业国民保险计划。1928年，把国民保险法案提交议会初读，但在议会充分讨论之前，由于政府对他们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病害——积极斗争派和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处理不当，这项计划和政府本身一起垮了台。

在1925年和1926年，海员和码头工人的一系列罢工使码头区陷于停顿状态。布鲁斯认为工会会员受了共产主义煽动者例如沃尔什和约翰逊等人的欺骗，因此他修正了航海条例和限制移民入境条例，规定政府有权强迫海员停止罢工或将工会领导人中的极端分子驱逐出境。这样，白澳政策便成为谋求一个政治上纯洁和体面的澳大利亚的工具。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高等法院于1925年年底挫败了把驱逐沃尔什和约翰逊出境的企图，而镇压工人运动的法令和在激烈争论期间的失言，也使工党中的稳健分子和广大成员怀疑布鲁斯的目的在于把工人压成齑粉。

布鲁斯相当轻率地断定，工业骚动的根源，部分在于联邦和各州仲裁制度之间管辖权的重复和

抵触，于是他于1928年11月向选民提出改革的建议。国民党和乡村党的联盟在众议院得四十二
217 席，但工党增加了八席即共得三十一席，无党派人士得二席。在参议院，国民党人得二十四席，乡村党得四席，工党得七席。布鲁斯愚蠢地认为这是对他的镇压措施的赞许。1929年8月，他提出了一个航运业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把工业的管理让给各州。休斯一直都在伺机要对布鲁斯在1923年的背叛行为进行报复，于是他谴责布鲁斯继续玩弄“一个又一个的花招[70]”，然后在调查委员会研究法案阶段，提出了一个动议，并以一票之差击败了政府的提案。休斯兴高采烈，等待着工党的信息，以便与他的老“同事”重修旧好，但这一愿望未能成为事实。唯一使休斯感到满意的是，在1929年选举中击败了布鲁斯和佩奇政府，并在弗林德斯选区中击败了布鲁斯。不过这只是一场空欢喜。当詹姆斯·斯卡伦组成政府时，并没有建议同“澳大利亚小兵”重修旧好。人们毫不容情地按照永远仇视政治叛徒的政策行事，因而休斯依然在野。在工党看来，他是分裂分子；在国民党看来，他是推翻布鲁斯—佩奇政府的人物。

但是，工党在1929年除了提供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材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一伙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曾于1891年骄傲地宣布他们进入议会的目的是在于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和破坏另一种社会环境，但是经过二十世纪整个二十年代的派系斗争而分裂后，他们现在已成为一个愈来愈多关心夺取政权的手段而越来越少关心如何运用政权的小集团。工党从1915年到1929年在昆士兰州执政，从1910年到1916年，从1925年到1927年，从1930年到1932年先后在新南威尔士州执政。除了着重社会福利和创建国营企业外，工党政府和非工党政府没有多大差别。在昆士兰州，政府拥有和控制了牧羊场、肉店、一个渔场、一家罐头厂、一家旅店、焦炭工厂、冶炼工厂和矿山。他们在1922年撤消了立法会议。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则拥有船坞、砖瓦工厂、金属矿场、管道和钢筋混凝土工厂以及煤矿。它们的动机与其说是利用国家来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让国家控制资本 218
主义。因为这些企业的目的只在于促进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有效地提高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控制物价，而不在于破坏私营企业。在管

理各州的教育制度方面，工党政府也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工党利用权力，把文职机关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位奖赏给自己的追随者。

激进主义者的旗帜已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它保证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其他方面，共产党也比工党激进。虽然工党接受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全世界的希望”这个口号，但在白澳政策上，它依然是忠于种族而不是忠于阶级。192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书记处会议① 上，澳大利亚代表团接受了下列的论点，那就是：白澳理论的根据不仅是害怕低工资工人的经济竞争，而且是谬误的白种人优越论。白种人优越论是帝国主义者为自己打算和准备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存心炮制出来的学说。工党领袖对此大发雷霆。1929年1月《澳大利亚工人》公开指摘早些时候在上海

① 泛太平洋书记处原名为太平洋劳动会议书记处，是太平洋沿岸各邻近国家工人的联合机构，曾对帝国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书记处于1926年成立，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第一次会议，1927年5月在中国汉口召开第二次会议，1928年10月在海参崴召开第三次会议。作者在此处及下文对书记处开会地点及日期的叙述均有错误。——译者

召开的泛太平洋书记处会议，说“有色人种的绅士们”已在会上决定要“暗害和破坏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目的是想把共产党从瓦砾堆里抬出来”。

然而共产党人未能在工人阶级中获得追随者。他们的领袖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天主教的叛道者中吸收过来的；在一般党员中，来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党员人数和工人新党员一样多。澳大利亚共产党人要使人民改变信仰，同意颠覆现存的社会，其困难有如在塔希提岛的传教士要使土人相信生来有罪一样。他们正直地然而呆板地墨守日益贫困化的理论，这对他们企图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他们懂得如何消除人类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为大家谋求物质福利，是没有
帮助的。他们追随着莫斯科千变万化的政策和策 219
略，这使他们受到了非难，被认为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打转。

1929年10月在堪培拉宣誓就职的斯卡伦工党政府，与前任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工党里面那些把社会化的保证想象为对新社会的许诺的少数派，由于缺乏党内的支持，由于缺乏宪法权力和由于在参议院没有获得多数席位

而遭到挫折。但工党既是一个主张社会改良的政党，又是一个具有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当斯通黑文勋爵辞去总督职务时，斯卡伦提名艾萨克·艾萨克斯接任总督。艾萨克·艾萨克斯是一个有教养的犹太人，具有迪金派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经验和高等法院推事的长期的卓越的经历。但这没有引起乔治五世的注意，他相当尖锐地通过他的秘书询问："谁是艾萨克·艾萨克斯？"但斯卡伦坚持己见。乔治五世没有其他办法，只得高高兴兴地同意了。这是本地出生的澳大利亚人第一次被任命为联邦总督。

但是斯卡伦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不象他的民族主义那样坚定。他在1929年就职后，立即面临着六个州和联邦政府的预算危机。1929年初，随着羊毛和小麦价格急剧下跌，英国资本抽走了，出口物价下降50%，于是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1928—1929年和1929—1930年两个财政年度之间，国民收入从六亿四千万镑下降到五亿六千万镑。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截至1933年，在要赡养全家的工人中将近有三分之一失业。在所有重要城市，失业者吵闹着要求工作或救济；保

守主义者谆谆劝诫要辛勤劳动和作出牺牲；财政幻想家鼓吹道格拉斯①信贷；神父和教士在他们的布道坛和祷告桌上喃喃咕咕地说经济萧条是神灵对他们的罪恶不满的象征；一个教士叫嚷他们正朝着毁灭走下去；共产主义者带着冷笑，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将变得一天比一天严重。

工党政府对危机缺乏踏实的解决办法。在政府中，有些人受过天主教社会教义和爱尔兰悲惨历史的影响，如斯卡伦和莱昂斯；有些人玩弄财政贷款，如西奥多②；还有象安斯蒂这样的人，总是相信经济萧条是缺德的资本家出于他们的贪婪和阶级仇恨榨取穷人膏血的手段。1929年10月召开了讨论解决办法的第一次总理会议，斯卡伦无精打采地接受了会议关于紧缩开支的论据。1930

① 克利福德·休·道格拉斯(1879—1952)，英国社会经济学家，提倡社会信贷。著有《经济民主》、《社会信贷》和《垄断信贷》等书。——译者

② 爱德华·格兰维尔·西奥多(1884—1950)，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政治家、工党领袖。1929—1931年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部长时，曾提出扩大贷款的“西奥多计划”，企图使物价回复到1925—1929年的水平，并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借以对付经济危机，但因银行拒绝合作，致计划失败。——译者

年初，由于国民收入的数字和物价继续下降，失业人数增长，斯卡伦邀请了英格兰银行的奥托·尼迈耶爵士来澳大利亚与各州总理会晤。尼迈耶于6月抵达，8月就把他对澳大利亚形势的分析交给各州的总理。

尼迈耶建议进一步紧缩开支。在他看来，澳大利亚保护本地工业和向国外大量借款的政策，已经创造出和澳大利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的生活水平。这就使人对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产生怀疑。奥托爵士关心的，是高标准生活缺乏任何牢固的基础。当亚洲邻国过着肮脏可怜的生活时，澳大利亚竟有这样高的生活水平。它在道义上有没有权利这样做，这样做是否有利——对于这些问题奥托爵士是不关心的。在尼迈耶的影响下，各州总理担保平衡预算和不把借来的钱用于非生产的目的。

于是，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J·T·兰在他的报纸《劳工日报》上发动了一个宣传运动，指斥尼迈耶为英国债券持有人的一个恶毒的爪牙，而这些债券持有人正决心要从善良而勤劳的澳大利亚人身上榨取最后的一个便士。英国人再一次被

说成是阴险的、复杂的和腐败的人，而澳大利亚人则被说成是新世界朴素而纯洁的美德的典范。兰的宣传运动显示出他在新南威尔士州多年政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他于1876年生于悉尼，最初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在悉尼开设了一家地产经纪行；1913年成为新南威尔士州众议院议员，并于1923年被选为该州的工党领袖。在1925年到1927年他第一次担任总理任内，他把工党关于新南威尔士州社会的发展形式和方向的改良主 221
义设想定为法令。他创办了公营企业，迫使私营企业变得较有效率和较为公平。他使悉尼的公共交通摆脱混乱和无能的状态，建立了秩序和提高了效率。他采取了一套救济疾病和贫穷的办法。

可是，大约从1925年第一次任职到1930年中举行州选举期间，这个曾经证明工党能够准备一个同资产阶级一样有效的班子出来管理国家的人，由于掌握了党内的权力而蜕化了。这个党曾以依靠群众制订政策而自豪，但他却渐渐要求群众盲从他个人的意志。他变成了一个蛊惑家；张贴广告的栅墙上公开写着“兰是正确的”，或者“兰比列宁更伟大”。在悉尼公园巨大的公众集会上，当

他过分夸张地反对英国的债券持有人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但是这个人完全缺乏政策，缺乏政治学说，缺乏社会前途的方案。他只会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些舶来的政客。他后来写道："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参加运动的成员，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太讲求实际了，因此，那些理论对我们来说太空洞。"工党在州选举中获胜后，他于 1930 年 10 月第二次出任新南威尔士州总理。

与此同时，派系斗争正使斯卡伦政府趋于毁灭。西奥多因芒加纳金矿案被控贪污，这使莱昂斯和芬顿受到了震惊，而当蒙受诽谤而引起的红晕刚从自己的脸上褪色，西奥多便马上着手鼓吹一项拒偿外债的政策，这更使莱昂斯和芬顿感到沮丧。约瑟夫·阿洛伊修斯·莱昂斯于 1879 年在塔斯马尼亚出生于一个忠实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家庭。当他早年在塔斯马尼亚当教师时，就曾为这样一种愿望所感动：既要在最高上帝面前立下最大的功劳，又要为自己所属集团的成员赢得一番成就。表面上，他具有一个纯朴的农村孩子所有的美德，对一切人都抱有仁慈和热爱，正如耶稣

在前往耶路撒冷的不祥旅行之前曾经热情地提过的一样。深入一层来看，他具有一个曾在数百年间对抗强敌力求生存的民族所养成的那种狡猾和技巧。

1909 年莱昂斯成为塔斯马尼亚众议院议员 222
后，很快就以能干著称，这就使他得以在 1914—1916 年在工党政府任职，并于 1923 年当上了州的总理。1929 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他在众议院接触到一些人物，这些人所关心的不只是让事情一时办得通，也不只是把过去的不公正作一点改正，而一心等候天国降临，他们所关心的却是要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使莱昂斯大吃一惊。他辞掉了斯卡伦政府中的职务，并考虑同反对党领袖商谈。1931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他到堪培拉火车站乘车前往墨尔本。当火车开动增速时，他的一个工党党员朋友赶到火车旁，大声喊叫："看在上帝面上，乔，不要这样做。"但他就是这样做了。在墨尔本，他和国民党联合组成了澳大利亚统一党，保证要做到正派、诚实、品格高尚，为实现"一切为澳大利亚，一切为帝国"的口号而奋斗。

澳大利亚统一党答应采取下列措施：对财政

管理做到廉洁公正，以恢复企业家的信心，从而促进信贷和企业活动的恢复；承认并如期偿付国家债务；撙节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开支；采用稳健的关税政策，对澳大利亚最好的主顾大不列颠给予特惠；鼓励企业经营积极性，使人民重新就业；对社会各阶层给予公平的分配；镇压共产党的和煽动性的组织，取缔所有鼓吹扰乱工业或社会安宁的出版物；采取严格取缔（唯一能使共产党懂得的方法），以扑灭共产主义；坚持优待归国士兵。《澳大利亚工人》把莱昂斯和脱离工党追随他的那些人的行动描写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对工人阶级最无耻的背叛之一。他们继续写道，澳大利亚统一党、乡村党、各种金融机构、雇主协会、资本家的报纸和为大企业服务的许多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对工人运动发动一个联合的进攻。

1931 年 3 月，工党内兰的一派已辞掉斯卡伦政府的职务。在他的政府和政党正濒于崩溃的情
223 况下，斯卡伦于 6 月在墨尔本和各州总理会晤，结果制订了总理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和各州承担削减政府开支 20%，用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更换州政府的内债，降低银行存放款的利率，提高赋

税。兰接受了这项计划，尽管郁郁不乐，大为反感，正好象夸大口的人往往不得不屈从于计量人员和经济学家的那种情绪。当西奥多在11月向议会提出一项给予失业者圣诞节救济金计划时，政府的提案不获通过。随后在12月的选举中，工党遭到惨败。选举结果，澳大利亚统一党在众议院获得了三十七席，乡村党获得十七席，工党获得十六席；在参议院，澳大利亚统一党获得二十二席，乡村党获得四席，工党获得八席，兰集团仅得二席。

莱昂斯宣誓就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兼财政部长职务；看来保守派和有社会地位的人似乎已得到了一个确定的胜利。1932年4月在维多利亚州选举时，圣公会墨尔本大主教在《圣公会信使报》上刊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诉正直的信奉新教的墨尔本市民：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圣公会的信徒投票赞成澳大利亚统一党以表示他们支持公正的话，那么他们将有机会拯救澳大利亚其余部分免于财政崩溃。当时，情绪激昂。1月，兰没有偿还伦敦债券持有人的债务。在保守分子看来，工党或它的部分党员象征着撒谎、赖债和不

忠。

3 月 20 日，有群众七十五万人以上聚集在悉尼街头，观看横越港口大桥的落成典礼。各个教会的代表都为新的大桥祝福，但他们并不在一起进行，尽管他们应当一起为新桥祝福才算恰当。莱昂斯戴了高顶丝质礼帽，穿着礼服大衣来到了。兰戴着他平常的灰色毡帽，仿佛要象征社会被分成了两个集团似的。在桥的西端拉着一条缎带横过大桥，但在兰动手剪彩之前，新卫军德·格鲁特上尉骑在马上飞驰而来，猛冲缎带，用剑把它砍
224 断，并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庄重而可尊敬的公民宣布大桥通车。正如他后来所提出来的那样，这一行动是要向兰及其一伙表明，那些庄重而可尊敬的人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后来只好匆忙地把缎带重新结起，以便让兰代表新南威尔士州的人民剪彩。

从那天起，情况变化很快。莱昂斯政府急忙通过了两个法令，迫使兰根据总理计划履行他的诺言。当兰拒绝偿还债务时，新南威尔士州总督菲利普·盖姆爵士以违法的罪名把他免职。群众愤怒地聚集在麦夸里大街议会里。在这以前，兰曾

用煽动性的语言和不负责任的词句议论债券持有人和贪婪的英国银行家，借以煽动人民。但这次，当法律、秩序和有声望的人的势力一致反对他时，他没有直接呼吁人民起来反抗。和联邦的工党政府一样，兰也静悄悄地垮台了。由于澳大利亚统一党在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选举获胜，保守分子暂时赢得了争取生存的胜利。但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因为在澳大利亚国外发生的一些事件，剥夺了他们和平而安全地享受这一胜利的任何机会。

从 1932 年到 1937 年间，莱昂斯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稳定财政、减少失业和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等目标上面。预算得到了平衡。1932 年渥太华协定所规定的帝国特惠制继续生效。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路人为侵犯公民自由的六种法令（按共产党支持者的叫法）所追逼。司空见惯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一些政客企图禁止所有那些可能败坏道德、使人腐化的书籍、小册子和报纸进口。他们害怕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意识到传统道德的堕落已在精神上为改信共产主义作好准备。因此，有名气的作品如乔伊斯① 的《尤利塞斯》和劳

伦斯②的《查特利夫人的情人》都被禁了。而赞扬暴力的连环图画和那些确实连正经人的情欲也会受挑动的低级趣味杂志却没有查禁。热衷于维护旧秩序的政府正开始走入迷途。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都市化和工业化正在
225 迅速发展。1906年，居住在主要城市的人占总人口的35.49%，1921年增加到43.01%，1940年再增加到47.5%。尽管道德学家发出牢骚，并预言要发生灾难，居民还是继续迁入城市。铁路不良、公路崎岖、教育落后、家庭中没有使生活舒适的设备以及乡镇娱乐的缺乏，这是使居民移居城市的部分原因。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加工工业的发达。在1901年的劳动力总额中，用于工业的占26%强，用于初级产品生产的占32.5%；到1933年，用于工业的劳动力为27%强，用于初级产品生

①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和诗人。1922年在巴黎出版小说《尤利塞斯》。书中叙述住在爱尔兰都柏林海湾三个心理变态的人一天的生活。——译者

②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1928年出版的小说《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小说叙述一个英国贵族的妻子和看门人恋爱私奔的故事。——译者

产的为17.5%弱；而到了1947年，用于工业的劳动力超过了33%，用于初级产品生产的劳动力只占14.5%弱。在1929年经济萧条的前夕，澳大利亚有56%的雇工是职工会的会员，到1934年，这个百分比降到43.5%，而在1941年对日战争开始时回升到将近50%。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群众性的娱乐和群众性的传播工具对澳大利亚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1930年，无声电影在城市和乡村几乎排斥了先前的娱乐形式，例如流动演出、杂耍歌唱队等等。1928年，有声电影首次在悉尼和墨尔本放映。尽管维护旧秩序的人嘲笑美国人的腔调为“令人作呕，鼻音重，无意义”，但有声电影的“流行歌曲”很快就可以在乡村每一家公共舞厅里听到，象老老少少彼此劝说那样，“不要对古老的百老汇皱眉头，因为你总要扮百老汇的小丑”。无线电广播的发展加速了这种群众性文化的普及。第一次定期广播于1923年开始。从1924年至1932年，广播执照是由邮政总局发给私营公司的。1932年7月联邦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该委员会奉命建立国家广播电台，广播“适当的综合节目……

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还奉命组织“乐队，演奏
226 高质量的管弦乐、圣乐和军乐”。这样，就把提高公众在音乐、戏剧和教育等方面的欣赏能力的责任交给了一个公营公司。

在此期间，邮政总局对商营广播电台继续发给执照。这些广播电台不分昼夜播送节目，它们用以取悦听众的，有时是广告，有时是鲁迪·瓦利“生命正是一碗樱桃，别太认真，它是太神秘了”的安慰声。手提留声机和唱片廉价出售也促进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因此，到了1939年，墨尔本、悉尼、阿得雷德、佩思、布里斯班和霍巴特等地的海滩，以及那些城市的美丽腹地，开始听到查利·孔兹演出欧文·伯林的《我要怎么办！》。陶醉于音乐较深的人们则在棕榈海滩或波特西啜饮白兰地鸡尾酒，倾听埃林顿公爵的《寂寞》或鲁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光辉》。从1920年到对日战争开始时止，除了有声电影、无线电和留声机以外，美国的音乐喜剧也支配了整个商营剧场。在二十年代，《不，不，南尼特》、《沙漠之歌》和《学生王子》等剧目纷纷首轮连演，而在三十年代又再演出。因此供多愁善感的人欣赏的《幸运的爱情》和《我的内

心深处》，或者供脆弱和轻薄的人欣赏的《两人共饮茶》等歌曲也列入大众文化，而本地的艺术家、剧作家、广播节目的撰稿人和音乐家却抱怨那些廉价的灌成唱片的美国文化吞噬了本地文化的元气。一位有喜剧天才的罗伊·雷内①(又名莫)，在轻松的喜剧中把澳大利亚人描写成受到英国人和美国人腐化影响的天真无邪的人，非常生动。在这几十年间，澳大利亚人仍然从英国来源听到国外消息。远至东京、纽约等地的国外新闻都是从伦敦转送出来的。这样一来，汽车、飞机、电报、无线电、有声电影、留声机和大量发行的报纸，使所有人的心灵和思想接受同样的影响。这种情况正在澳大利亚出现，而它的过去早已促使人民在行为的某些方面做到清一色和随大流。

在十九世纪，新教的基督教教义和爱尔兰天
主教的教义已加强了清教徒和实利主义者对本地 227
文化的强烈影响。工业化更养成了一种随大流的和清一色的习惯。知识分子为清教徒和实利主义

① 罗伊·雷内(1893—1954)，著名喜剧艺术家，曾在悉尼国家剧院主演澳大利亚最早的讽刺剧。他创造了很多澳大利亚人物的典型。——译者

者的这种力量感到恼怒。集团与集团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反应是各不相同的。在悉尼（它既是畜牧业者的金融中心和社交中心，也是新南威尔士州“古代贵族”的首都），诗人克里斯托弗·布伦南、艺术家诺曼·林赛①和悉尼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②——在尼采③的影响下，鼓吹文化是为“伟大人物”而设，以此作为对多数人的清教主义和实利主义的解毒剂。他们的某些追随者在1923年5月创刊的《视界》杂志中写道：

> 我们将给诗歌、音乐和艺术带来灵感。这里有的是对心灵上青春的永久追求，只要我们能够唱出几首吐放着这种期望的芬芳的歌曲，我们就将证明我们是青春的、自由的，而任何

---

① 诺曼·林赛（1879年出生），澳大利亚艺术家和作家。他的版画、油画和水彩画以及他写的小说，曾引起很大的争论。——译者

② 约翰·安德森（1893—1962），生于苏格兰，1926年到澳大利亚，任悉尼大学哲学教授。他的哲学思想在澳大利亚影响甚深。曾主编《澳大拉西亚心理学和哲学学报》，著有《经验哲学的研究》。——译者

③ 尼采（1844—1900），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诗人，提倡“权力意志”，宣扬“超人哲学”。是法西斯“思想家”的祖师爷。——译者

对小公牛或旱灾的赞美歌则绝不可能证明这一点。被叫作原始主义的那种狂热病的精神分裂症，必须在诸神的初次欢笑之前归于消灭。诸神将以快乐和美丽的形象降临人间，而为此搭造桥梁的那些人，其对同胞们的贡献远非任何民谣作者或现实主义者所能企及。

与此相反，另一些主要集中在墨尔本的集团，他们关心消灭澳大利亚清教主义和澳大利亚实利主义这两个孪生巨人比关心向所有人提供幸福、文化和物质福利为少。他们自命为他们所谓澳大利亚居民民主传统(包括伙伴情谊和平等)的继承者。为了这些民主传统，他们的先辈曾于1854年在尤里卡，1893年在巴科尔代因，以及于本世纪初在卡尔古利金矿场流洒了鲜血。他们同意诗人伯纳德·奥多德①所写的：

教养、欢乐和美好等权利
将由一切人共同享有。
贪婪将不再压制
那些倒在路旁的人。

---

① 伯纳德·奥多德(1866—1953)，澳大利亚律师和诗人。1942年出版《奥多德诗集》。——译者

228 众人所播下的，每人都有一份。
肤色和种姓是一个欺骗。
是人，不管多卑贱，也都是神——
又不管多高贵，人总是人。

他们也同意约瑟夫·弗菲在《如此人生》中对自己的信仰的表白。此书于1902年初版，但其观点则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才被“人类未来派”吸收。这观点就是：“人类的共同体掌握着通向上帝在尘世中的王国的锁钥，有眼光的历代先知们，已用永不褪变的颜色把这个王国加以描绘。上帝王国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无所不包的责任是给它以形式和外观、空间的位置，还要给一个名称。”这个集团对自己就在当地建成这个王国的能力是具有自信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报道的俄国为人类未来的和谐准备条件而进行了残暴杀害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双方犯下的暴行，这些都不能吓倒他们。他们固执地坚持他们的信念：人类罪恶的根源，与其说是先天的劣根性，毋宁说是恶劣环境。他们中间的一个争论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目的：有些人（也许是多数人）指望有一天，工党肃清了它的个人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之后，进而建

立“王国”；其他一些人（肯定是少数人）相信工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改良主义者，将不可避免地要腐败下去，指望共产党破坏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引导人类进入“王国”。到1937年，那些对欧洲或亚洲情况偶或加以注意的人，他们也知道，在澳大利亚建立“千年的地上王国”，使人们得以摆脱旧文明的腐朽影响，这样的旧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到那时，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新秩序的鼓吹者之间关于人类前途的争论，已经被一场争取生存的新的斗争所淹没了。

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已从欧洲和亚洲两方面来临。自从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那些日子以来，澳大利亚就有一些人预言日本将有威胁欧洲文明在澳大利亚存在的一天。1914年以前，这一天似乎是遥远的，只要鼓励日本向西扩张到中国大陆，
这一天甚至是可以避免的。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 229
大战期间和在凡尔赛会议上的行动，证实了对他们今后扩张到南太平洋地区的最不祥的忧虑。1927年，田中奏折将澳大利亚列入日本的“待征服地区”的名单；1931年，日本对满洲发动进攻；1937年，上海发生了警察事件。这一切都使上述

忧虑继续存在。1935年，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一项歧视日本人的贸易政策，以保护英国纺织业者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利益。在那个时候，眼光敏锐的人已预言这套政策也许会使日本人从经济扩张转变为军事扩张。

各个主要政党在如何抵抗日本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不一致的。澳大利亚统一党相信，澳大利亚人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一个下定决心的侵略者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澳大利亚人的最后一着，唯有依靠新加坡的英国舰队。澳大利亚也不可能单靠本身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白澳政策。此外，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和英国进行的，因此不但和大不列颠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是大大地依赖她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自己既看作澳大利亚人，也看作英帝国的成员。乡村党也赞成这种意见，尽管羊毛和其他初级产品对日输出额的增长使他们切盼不要冒犯他们的新主顾。相反，工党对所有帝国主义的行动，无论是英国的、美国的或日本的都感到怀疑，并且反对征兵出国服役。澳大利亚统一党指望新加坡海军基地成为他们对抗日本人的堡垒，而工党则主张

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以抵抗任何侵略者的军舰。联邦工党于1937年在他们的堪培拉会议上采纳了这个新的防御政策。

在这期间，这两个政党日益重视在增长中的
欧洲风暴。象所有的保守派政党一样，澳大利亚
统一党党内在对待德国纳粹政府的态度上是有分
歧的。一方面，由于德国对英、法发动复仇战争的
消息甚嚣尘上而吃惊，对犹太人受野蛮迫害感到
愤怒；但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统一党又为防御共
产主义、维护西方文明的前景所吸引，只愿意当纳 230
粹进攻大不列颠时保证予英国以支援。在这一点
上，感情和物质利益比之用鞭子、集中营和大炮来
维持欧洲旧秩序的渺茫希望更为有力。工党也有
它的苦恼，因为工党虽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
义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威胁，党内的天主教徒
和稳健分子却不愿把这个论点作过多的发挥，以
免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两个主要政党新任领导人的生活道路和价值标准，正是上述忧虑和不同倾向的缩影。当莱昂斯在1939年4月逝世后，罗伯特·戈登·孟席斯被选为澳大利亚统一党的领袖。孟席斯这时才四

十四岁。他在1894年生于杰帕里特——维多利亚州西北部小麦带的一个小乡镇。他的父亲曾任维多利亚议会议员，有激进倾向。他的祖父当过维多利亚殖民区矿工工会主席。他在乡村公立学校受教育，参加全州奖学金考试，名列前茅，因而从小就显出他在智力方面前途远大。以后，他获得奖学金，进墨尔本卫斯理学院学习，然后入墨尔本大学学法律。由于他的学识、机智和辩才，他在这两所学校里都曾获得各种奖学金和荣誉。1918年，他开始在维多利亚州执行律师职务，再一次轻易地获得了成功，尽管这时他和别人相处得不是那么好，象在大学时代一样。对于这点，他总想责备群众对杰出人物的猜忌，而为他所尖刻嘲弄的受害者则归咎于此人的自命不凡和狂妄自大。他在律师界干了十年后，于1928年进入政界，成为维多利亚州参议院议员，后来在1929年转入众议院，在那里，他很快就飞黄腾达，成为铁道部长兼副总理。1934年他作为古勇代表被选为堪培拉联邦众议院议员，并担任莱昂斯政府的总检察长。后来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39年3月当上了总理。

这位重要人物被三种炽热的感情所推动。其 231
一是对名声的追求，这使他很快就爬上他本国的最高地位。不妨顺便指出，当他跃登高位后，他以藐视和轻侮的态度对待他的同事，因而使他自己与大多数曾与他共事的人疏远起来。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让那些男男女女围绕在自己周围，每当他炫示雄辩的伟大天才时，对他欢笑和表示敬仰。

他一生中第二种起主导作用的热情是他所养成的对英国制度的崇拜(实在说，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这可能是大学时代从墨尔本大学法律系主任哈里森·穆尔学来的。他热情地相信英国人曾经创造出人类所知的最高文明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正是由于意识到这种使命和崇高目的，他才得到尊严和有威望的一生，这种威望已由于他大力维护注定要衰亡的秩序而受到了损害。

他一生中第三种起主要作用的热情是对所有那些提出一条前进道路的、要求“进步”的人加以嘲笑。他要求爱德华时代伦敦人士所具有的那种庄严、华丽、礼节、机智和文雅，然而到这个时候，人类的这个伟大成就已经正在崩溃而成为废墟了。他内心不仅狂热地追求前一时代的成就，而

且可能追求他在杰帕里特年代的天真无邪。这种追求导致他的伤感和寂寥，而对有特殊机会得以在现世的成功和荣誉后面窥见内心活动的那些人来说，这种伤感和寂寥将唤起他们的抚爱和同情。1939年，他热情地相信事情并非绝望，认为英国制度和英国生活方式是文明的同义语，一切不抱有这种观点的人都是受迷信的无知迷惑的牺牲者。

与此相反，工党的新领袖是一个曾经一度对人类前进道路抱有理想的人。这就是约翰·约瑟夫·柯廷。柯廷在1885年生于维多利亚州的克雷齐克。他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警察巡官的儿子。青年时，在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柯廷放弃了天主教关于死而复生的天国的希望，而代之以空想社会主义的梦想，即人类能够在世界
232 上达到至善。他参加了维多利亚州社会主义联盟。他还率先参加反征兵运动，在运动中，他对人民的忠诚同已成习惯的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巧妙地结合起来。1916年，他接受了《西澳大利亚[76]工人报》编辑职位，并迁居佩思。从那年起直到1928年被弗里曼特尔地区选为议员时止，多年在野的操劳生活，加上他自己戒酒的苦恼，使他的嘴角两

边形成了严重下垂，而这张嘴巴曾在十年前对俄国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人类的美好希望，有过非常热烈的反应。其后，在1935年当他戒酒完全成功时，他被选为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这样，一个由于出身和信念而对英国政府推行的全部政策感到怀疑的人，一个相信人类应互相爱护、互相慰藉以弥补永生的丧失但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标非常含混和糊涂的人，从1939年3月开始，就在议会里面对着另一个人，这个人却相信英国是文明的典范，而对于曾在童年、青年和中年时代鼓舞和支持柯廷的那些东西却非常藐视。

在他们对1939年9月3日对德战争爆发的反应上，这种分歧有所加强。孟席斯严肃地谈到他的沉重的责任，向澳大利亚人民正式宣布：由于德国继续进犯波兰，澳大利亚现已处于战争状态。他最后说，在斗争中真理在我们一边，真理一定会取得胜利。“愿上帝大施慈爱，让世界得以尽快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德国总理撒了谎，破坏诺言，行为不正直。他没有提到纳粹党反对民主或违背人类尊严的罪行。与此相反，柯廷只简单地声明，人们可以

指望工党将正确完成自己的责任以保卫澳大利亚和英联邦的完整。

孟席斯于是着手使澳大利亚准备参战。在他看来，澳大利亚的任务是援助她的母国，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大不列颠输送军需和粮食，维持英联邦的生命线，镇压所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同路人以及对澳大利亚备战工作进
233 行破坏的分子。政府立即采取步骤以增加军需生产和招募、训练及装备一支军队到海外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陆军中将托马斯·布兰米爵士被任命指挥第六师，这个师是为国内或国外服役而招募的。11 月，政府为准备国内服役而实行义务军事训练。1939 年年底，政府派遣第六师到巴勒斯坦接受训练，然后参加驻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次年 4 月，第七师招募成立，并被派到中东接受训练。但是1940年 6 月意大利的参战和同一个月法国的崩溃，使训练日程有加速的必要。

从 1940 年 9 月到 1941 年 7 月，澳大利亚军队投入战斗，抵抗意大利军（而稍后是德军）沿非洲北岸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1941 年 4 月，澳大利亚军队试图阻止德国军队进入希腊，但没有成

功。接着是1941年5月英勇的、但注定了要失败的克里特保卫战，在那里，一些最优秀的墨尔本青年淹死了。1941年6月和7月，第七师同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地方部队在叙利亚作战，虽然损失颇重，但取得了胜利。在这些战役的间歇中，士兵们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招待所休息，正如他们的先辈在1916—1918年所做过的那样。一些人行走在耶稣曾经踏过的土地上，也深怀敬畏之心，但在耶路撒冷一家小饭馆中，当某个人叫喊“我饿极了，连基督的胫骨也得吃”时，却引起了许多人哄堂大笑。

当莫斯科电台通过短波外语广播向全世界宣布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严重时，孟席斯却把这一切看成是对他奉为至宝的英国文明的威胁。整个1941年6月，谣传德国军队集结在俄国边境。6月21日，墨尔本的《时代报》告诉它的读者说，俄国之谜依然没有得到解答，斯大林被称为“不可思议的乔”，确是名不虚传。6月22日星期日早上4时，德国军队侵入俄国。上午5时45分，戈培尔博士在德国电台宣布，德国飞机已轰炸基辅、塞 234
瓦斯托波尔和考那斯。接着，希特勒告诉德国人

民和全世界：由于犹太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要纵火燃烧全世界，由于犹太人要以莫斯科为中心扩展他们的统治，他已命令德国军队竭尽全力对抗这种威胁。他继续说，德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他们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而且要把整个文明世界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致命危险中拯救出来，从而为欧洲真正的社会进步扫清道路。这样，狂人说话了，而德国军队迈向他们的毁灭。

邱吉尔在伦敦宣布："我们决心毁灭希特勒及其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这意味着英国将帮助苏联和苏联人民。但对邱吉尔来说，这是一种出于权宜的姿态。对他来说，纳粹制度和共产主义的最坏特征是毫无区别的。在澳大利亚，德国进攻苏联引起了类似的反应。在天主教堂，信徒们连续祷告九天，祈求公正的和平；在墨尔本圣公会大教堂，一位主教看到魔鬼的门徒竟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表示悲伤；左翼政治家欢迎德军侵苏这一事件的发生，把它看成是战争从帝国之间的冲突转变为摆脱压迫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一次机会。

孟席斯对这一切都不赞同。对他来说，这是德国违背她最庄严的义务的又一个例证。他补充

说:“条约对德国仅仅是一纸空文，绝不是什么合同，如果还需要什么另外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那么，这就是证据。”孟席斯仿佛是时代的落伍者，没有感觉到历史在前进。那时候，他过分埋头于地方性的政治，以致不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从1940年选举以来，他的政府已不得不在众议院仅有微弱多数的条件下工作。在政府内部和在参众两院的两个执政党的成员当中，对孟席斯担任领袖是存在不满的。他从来不原谅糊涂的人。在战争和政党斗争的炽热气氛中，为他的口齿刻薄所中伤的人有所增加。

8月28日晚，在堪培拉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意见不同的人劝他辞职。这个自命能拯救英国文明的人，在遭遇到鄙视和挫折之下离开了议会大厅。他以自己在逆境中总能保持的尊严和勇 235
气为恢复声名和荣誉作准备工作。第二天，他读了墨尔本代表亨蒂的议员科尔斯先生的声明而感到满意，这声明说:“坏人们”推倒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前一天晚上，由于对变节和追逐高位表示厌恶，科尔斯曾愤然离开澳大利亚统一党的会议室，宣布从那时起，他退出该党。

这件事意味着乡村党的领袖法登（孟席斯的反对派已选定他为下届内阁总理）必须获得科尔斯和威尔逊这两个无党派人士的支持，才能继续执政。当10月向议院提出预算案时，首先是科尔斯，其后是威尔逊宣布他准备投票反对政府。于是工党接管了政府。在兴奋的时刻，工党党员在议会党的会议室里，成群结队围绕着他们的领袖约翰·柯廷歌唱着："工人们的旗帜是最深红的……。"这样，约翰·约瑟夫·柯廷，这个过去的天主教徒，旧日的社会主义者，曾经一度在他心中设想过人类终有一天不再伤害或破坏的人，现在当上了澳大利亚联邦的总理。

和柯廷共事的一班人曾经历过啃硬面包的日子，经历过经济萧条的艰难时代，还备尝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激发的希望竟然带来莫斯科叛国审判案的苦果而引起的苦痛。这些人之中有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夫利，他和柯廷一样受过要信仰尼西亚教条①和教皇通谕《新事物》的教

① 尼西亚是小亚细亚的旧都。公元325年曾在此地召开第一次世界基督教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些教条。这些教条是反对不信耶稣为神的阿里乌斯教的，后被称为"尼西亚教条"。——译者

育，是一个把工党当作实现启蒙运动理想的工具的知识分子；还有约翰·比斯利，他的政治经验是从新南威尔士工会会所的混战中得到的，对柯廷和奇夫利所曾接受的对人类前途的启示一无所知。这些人认为工人阶级蒙受的沮丧和一切痛苦不应重演，正如认为澳大利亚应当赢得这场战争一样，态度是坚定的。但在他们的计划成熟以前，日本军队已在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那时候，德国军队正在莫斯科的门外。工党必须首先赢得 236
争取民族生存的战斗才能专心致志于解决深刻的问题："是弥缝旧的秩序呢？还是重温建设一个新秩序的旧梦呢？"

237 十二、在两个世界之间
（1941—1969年）

在战争初期，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和美国军队在日军进攻下，就象狂风中的落叶。12月7日，日本第十五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三天之后，日本空军在马来亚东海岸炸沉了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保卫澳大利亚的这两个堡垒被彻底毁掉，葬身海底，不起作用了。同日，日军占领了关岛；12月23日，占领了威克岛。12月26日，驻守香港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投降。日军在马来半岛长驱直入，到12月底，他们就已进抵柔佛省，并准备渡海占领新加坡。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人的情绪已从宁静变成了忧虑，有时甚至惊惶失措。各城市普遍流传日本计划在澳大利亚登陆的谣言。12月29日，柯廷总理在新年咨文中告诉澳大利亚人说：

> 我毫无保留地明白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害……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台，而英国仍然能够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我们得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使
> 我国有信心坚持下去，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向 238
> 到对敌人不利的时刻。

他接着说，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是根据下述两个事实：第一，这次对日本作战不是与轴心国家斗争的一部分，而是一场新的战争；其次，澳大利亚必须转入战时状态。面临当时的危机，柯廷的才干增长起来了。但是别人却不能那么轻易抛弃传统的思想框框。继孟席斯担任澳大利亚统一党领袖的休斯说道，如果以为英国的支持不如其他国家的重要，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种自杀性的错误的想法。他接着说，在所有国家的海军中，英国海军是最强大有力的。

正当各党的政治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恶耗不断从前线传来。1月23日和2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不列颠的腊包尔、西里伯的肯达里和婆罗

洲①的巴厘巴板。1942年2月15日，英国驻新加坡的军队向日军正式投降；澳大利亚军队有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名被俘，一千七百八十九人死亡，一千三百零六人受伤。2月19日，日本空军轰炸澳北区的达尔文港和西澳大利亚的布鲁姆。两周之前，正当马来亚的陷落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柯廷在靠近佩思的弗里曼特尔市政厅对集会的群众说，他现在无暇考虑什么"战后新社会秩序的蓝图。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解决敌人强加于我们的头等重要任务——我们必须打败他，不然就是死亡。"他接着说，对敌人宣传使徒的格言是没有用处的。唯一可以使敌人理解的使徒书就是子弹的啸声。

那时候，子弹的啸声日益迫近澳洲大陆。2月3日，日本空军轰炸新几内亚南面海岸的莫尔兹比港。2月17日，澳大利亚战时内阁拒绝了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②关于把正在开往太平洋的澳

① 西里伯和婆罗洲是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的旧名。——译者

② 太平洋作战会议于1942年4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宣布成立。参加国家有澳、新、荷、加、中、英、美等七国。该会议正式成立之前曾在伦敦多次开会，当时澳大利亚尚未参加。——译者

军第七师调往缅甸的要求。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敦促柯廷重新考虑这项决定，但是柯廷拒绝了。因此，邱吉尔在2月22日相当恼火地答复说：“我们不能想象你竟会拒绝我们的恳求，同时也是美国 239
总统的恳求，要求把澳大利亚的主力师调往缅甸以挽救局势。”但是，柯廷依然坚持说：“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正在迅速消失，我们的弱点已经完全暴露了。”这样，邱吉尔才很不高兴地命令护送第七师的船队驶往澳大利亚。3月8日，日军在新几内亚北海岸莱城和萨拉毛亚登陆，并沿着科科达山径向莫尔兹比港推进。4月，日本远征军在海军掩护下乘船从特鲁克开往所罗门群岛，企图在莫尔兹比港登陆。5月7日晚上，面无人色的柯廷打断了堪培拉议会的辩论，告诉议员们说，驻在昆士兰海岸的澳大利亚飞机和美国飞机在珊瑚海截击了这支敌军。一天之后，经过了一场胜负未决的交锋，也就是后来所谓珊瑚海战役，日军返回了基地。南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东海岸这才得免于侵略者的蹂躏。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迅速地越过了划分新几内亚为南北两部的高山障碍，到了7月，莫尔兹比

港已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但是从那个月开始，在莱城和萨拉毛亚附近登陆的澳大利亚军队不断袭击日军的基地，同时在莫尔兹比港东边的米尔尼湾，澳军也把日军打得大败。害怕敌人入侵和害怕澳大利亚欧洲文明遭受破坏的心情开始为一种长期的苦恼所代替，那就是要把日军赶出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亚、婆罗洲、关岛、威克岛、菲律宾和香港等地区。

与此同时，欧洲和非洲的战争也有类似的进展。1942年一年中，德军深入苏联领土，北边直抵列宁格勒外围，中路迫近莫斯科，南线到达斯大林格勒。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几十万德国侵略军的精锐落入苏联军队的包围圈，并被迫投
240 降。就象珊瑚海、科科达山径、米尔尼湾和威克岛等战役打开了日军失败之路一样，斯大林格勒扭转了欧洲的战局，使它从一场死里求生的战斗转变为一场争取全面胜利的斗争。

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澳大利亚人可以对全面胜利提供三点贡献。他们可以充当处于前线地位的各国——例如不列颠群岛——的粮仓；他们能够出力把德军和意军逐出非洲北海岸；他们能

够协助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占领地区。1941年12月底,澳军曾解除了托卜鲁克的包围(该地被围凡二百四十二天之久)。但在1942年头六个月,就象其他战场一样,非洲的英国军队也很快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对日战争的爆发自然削弱了盟军在非洲的力量:原来打算送往中东的供应不得不转送到太平洋地区去了。

在1942年的头六个月,德、意军队把消耗殆尽的盟军赶回阿拉曼,六月间,双方军队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拉锯战。七、八两月,隆美尔部队力图突破战线,冲入尼罗河三角洲,同时,蒙哥马利指挥盟军第八军,其中包括澳军第九师,开始和德、意军队在阿拉曼展开了一场决战。整个10月和11月炮声隆隆,直到轴心国军队在第八军猛烈追击下退回的黎波里才告一段落。在这次战役中,澳军死伤共四千八百六十三人,有九百四十六人被俘。11月13日,盟军克复托卜鲁克;1943年1月23日盟军进入的黎波里;5月12日至13日,留在非洲的轴心国军队全部投降。

在此期间,澳军正在协助盟军把日军逐出太平洋占领地。但是这场战事进展很慢,因为在

1942年间，盟军司令官们采取了只求遏制日本军队以待欧洲战场取得胜利的策略。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策略并不完全满意，其中最不满意的人莫过于外交部长赫伯特·维尔·伊瓦特博士了。按
241 照他的出身和信念，伊瓦特属于这么一类从事法律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制定英国工党的政策上比在制定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因为在澳大利亚，工党传统地怀疑知识分子是阶级敌人的代表。伊瓦特生于1894年，在悉尼公立学校和悉尼大学受过教育。在学校里，他成为一个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而不是一个天国的信徒。他深受约翰·斯图尔特·弥尔和戴西① 以及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弥尔使他懂得个人应有自决的权利；戴西使他懂得法律的权力、庄严和力量；社会主义者则以他们的梦想——有朝一日人类将从压迫者和狱卒那里解放出来——启发他。在他们的影响下，伊瓦特不但确信人类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也成为一个抱有信念的人。他相信个人自

① 艾伯特·维恩·戴西（1835—1922），英国法学家，其主要著作为1885年出版的《宪法精义》。——译者

由；相信有朝一日人类思想会从教士权术和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应首先忠于国际义务，而民族或地方义务次之；他确信文化能给人类以慰藉。由于他接受了激进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恶劣环境是罪恶的根源，美好的环境会使人良善，因而他把罪恶看作不良环境的产物。

然而神灵或机遇赋予他的性格却使他在紧张状态下所采取的行动同自己秉持的设想迥然不同。伊瓦特在大学选习文艺和法律，得到多次嘉奖，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悉尼充当律师，随后成为W·A·霍尔曼的秘书(霍尔曼也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南威尔士州早期工党执政时当过总理)。之后，伊瓦特在新南威尔士州众议院呆过一个很短的时间，于1930年任高等法院推事，1940年辞职，进入联邦众议院。1941年10月工党组织政府时，工党的决策委员会推举他参加内阁，柯廷任命他为总检察长并掌握外交部。

当其他部长关心各部的日常行政和战争问题时，伊瓦特却致力于知识分子的永无休止的探索，企图在混乱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有几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澳大利亚人，同他一样，相信全民

的物质福利和幸福可以通过经济计划来创造。在这些有才能的澳大利亚人帮助下，伊瓦特谋求逐
242 步实现关于未来的计划。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去说服华盛顿的显要人物，要使他们相信：对抗日战争多提供一些援助与他们争取欧洲战场胜利的政策并无抵触。1942 年至 1943 年，他率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和伦敦。他没有得到成功，因为产生了乡下佬遇着城里人的难题。整个1943年和 1944 年，太平洋战争始终是一场消耗战，而苏联军队已逐渐把德军赶出苏联境外。当苏军把退却的德军逐出苏联和波兰，西方盟军于 1944 年 6 月在诺曼第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的时候，又有人在澳大利亚发出了焦虑不安的（即使说不是尖锐的）警告和预言，谈论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威胁。

可是工党领袖们在谋求实现他们关于澳大利亚未来的计划当中却并不曾有过这种忧虑。在他们看来，政府的任务在于防止失业和日本的扩张这两个灾害的重演。他们对前者的答复是建立福利国家。1943 年以前，由于缺乏政治力量，由于战争形势严重，他们只好慎重从事。但是，在1943

年选举中，他们获得了大胜：在众议院的七十五个席位中，他们赢得了四十九席；同时，较有利的战争形势，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于是，儿童基金、医药补助、残废恤金、养老金、产妇津贴、失业和疾病救济以及寡妇补助等，或则有所改进，或则开始创办。对贫穷家庭的优秀子女，则给予奖学金，使他们能够完成大学或专业学校的学业。1946 年，有人对联邦在和平时期对于社会服务立法是否享有宪法权力表示怀疑，于是工党政府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修改宪法。

为了使澳大利亚获得免遭日本侵占的永久安全，工党政府和新西兰于 1944 年 1 月签订了一个协定，即所谓澳新协定。伊瓦特博士凭他的天赋，看出他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因而把在堪培拉的签字仪式和盟国领袖的其他会议相比。他的敌人笑骂他言过其实和比拟不伦。但是他们却没有看
到他的悲剧：他因缘时会，获得了瞬息盛名，却恰 243
恰暴露了他的政党对当时形势的浅见。当伊瓦特向议会证明这一协定的正确性时，他骄傲地谈到由岛屿组成的屏障将如何保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为澳大利亚以北地区的人民制订的福利纲

领又将如何大大加强他们的物质力量，使日本军队再也不能象风扫落叶一般把欧洲文明在南太平洋的朋友打得七零八落。伊瓦特认为，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双方协商一致，两国可以保证不但会让伦敦和华盛顿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反对党领袖们由于对当时发生的大事理解得更为浅薄，才会嘲笑伊瓦特过于炫耀，才会提出警告，认为这样做有触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危险。反对派宣称，现在不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造他们自己的太平洋门罗主义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条约冒出了孤立主义的臭气。可见反对派当时也不知道：在中国和东欧所发生的事件有朝一日将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扮演保卫西方文明的反共角色。

这时，欧洲的战争正接近结束。政府和反对党的领袖们热烈欢呼苏联和盟军的胜利。当时澳大利亚曾有少数人在悉尼《新闻公报》或在墨尔本出版的天主教的《鼓吹》上发表文章，发出了共产主义正在威胁文明的呼喊。但是，在1945年5月欧洲战场取得最后胜利的兴奋中，他们被迫等候时机。在胜利的时刻发生的唯一不幸事件是：柯

廷于7月在堪培拉逝世。当时工党的国防政策和福利政策看来正在一帆风顺地取得胜利。

8月6日，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澳大利亚当时的评论只限于估计这一件事马上可能产生的后果。新总理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夫利预言战争还会延续十二个月。他说，尽管使用了原子弹，在战争中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澳大利亚教会会议主席看到首先能够使用这种恐怖武器的 244
是美国而不是德国或日本，因而感到了满意。他相信，除非几个主持正义的强国对这种武器保持控制，罪恶的力量就可以用它来灭绝人类。在欧洲，梵蒂冈对后代提出了警告；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有勇气谴责那些使用了足以杀死百万人的武器的人们。但是澳大利亚舆论界的头头们却没有这种远见。

8月15日星期六上午9时，总理正式宣布对日战争结束。悉尼立即全市欢腾：人们在街头欢呼呐喊，载歌载舞；汽笛啸鸣；乐队演奏《统治吧，大不列颠》，或《把简风琴奏起来》等歌曲。在墨尔本，怀有渴望情绪的人、快乐的人、悲哀的人

和忧伤的人，一齐尽情歌唱叫喊，借以表达战争结束带来的松一口气的心情。这样，在汽笛、钟响、哨音和闹声的喧扰中，一个“严肃”的城市，突然陷入了“狂欢”。第二天有二十万人以上在纪念堂参加感恩祈祷，借以庆祝民主事业的胜利。在堪培拉，也有数量较少的人群，聚集在市中心庆祝这个盛大的日子。

工党阁员们带着他们在阴暗日子里所表现的高尚胸怀和勤奋精神，把他们的精力转用于和平建设，以图证明他们在和平时期取得的胜利将不亚于从战争所获得的胜利。在对德、意的战争中，有九千五百七十二人阵亡或死于俘虏营；在对日战争中，陆、海、空军被俘的有二万二千多人，其中有七千九百六十四人因受不了骇人听闻的虐待和折磨而死亡；至于那些幸得生还的战俘，从他们衰弱的残躯和凹陷的双眼就能看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用口舌和笔墨形容不了的。与此同时，在役人员开始复员，并在政府资助下接受训练以回复平民生活。有些人则由政府资助进入大学；其余有的完成了职业教育，有的接受农业教育，以便按照士兵安置计划，领取一块土地。

当时是一个计划家的时代，而且在战胜德、意、日的兴奋中，到处充满着信心和热情。在墨尔 245
本和悉尼的各大学中，学生在复员军人的熏染下，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信念，即可以通过政治行动消除人类罪恶和痛苦的根源。胸怀豁达、辛勤工作、致力于改革的世俗人道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工作。红军的英雄业绩，中国共产党人在内战中即将取得的胜利，东欧反动派和蒙昧主义者的失败，英国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的胜利，所有这些都足以使他们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牧师们谆谆说教，说人类不能在尘世获得幸福，尽管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嘲笑别人谈论“人类前途的曙光”，但整个工人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里的宗教团体都染上了这种朝前看的乐观情绪。

十分幸运，奇夫利总理具有一股力量，能够赢得同事们的爱戴和理想主义者的尊重。他的生活、个性和兴趣似乎综合了澳大利亚激进主义的历史和愿望。他于1885年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而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家庭曾在澳大利亚的激进主义留下它的

印痕。他在巴瑟斯特的士绅兄弟学校受过短期教育，在那里接受了教会关于人和社会的教导。他十七岁参加铁路工作，二十四岁升为一级机车驾驶员。他在工会活动上也是成功的。这几年间，他在自己的世界观上加上了世俗人道主义者的某些希望。从这时起，他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反映出来的一些幻想，对党内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都同样具有吸引力。这两个集团都认为，奇夫利对“人类前途的曙光”的预感实现了自己的希望。他还具有天赋的坚强性格，这使他能够身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新南威尔士州具有塔曼尼派① 特点的工党政治，却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正直声誉，也没有失掉理想主义者对他的欢心。1928年，他取得了众议院中麦夸里选区的席位，1931
246 年，丧失了这个席位，接着进行了一次反对兰派的斗争。1940 年，他又被选上麦夸里选区的席位。1941 年 10 月，他担任柯廷政府的财政部长。当他当选为工党领袖的时候，由于平易近人，更加受到

① 塔曼尼派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组织，总部设于纽约市塔曼尼大厅。1865 至 1871 年间，在首领特威德领导下，实行首领统治，控制了纽约，对全城进行搜掠，以贪污腐败著称。——译者

参加工人运动人士的爱戴。他厌恶资产阶级社会的繁文缛节：当某一场合要求穿礼服出席时，他却只穿便装，或者干脆不出席。奇夫利生活俭朴，这或是出于天性，或是受了清教主义的影响，当时清教主义盛行于爱尔兰天主教，因此也盛行于工党。

在一段时间中，奇夫利和工党政府的其他领袖曾拟订了几项计划来实现他们的幻想。1946 年和 1947 年，政府曾宣布了几项计划以鼓励欧洲移民入境。他们决定不但资助来自英国的移民，而且帮助那些闲居在德国难民营的东欧人移居澳大利亚。他们时常要为这项计划提出辩护，说它是澳大利亚经济和国防的需要。负责移民事务的部长也不时郑重地向议会提出：政府打算每接收一个外国移民，就要接受十个来自联合王国的移民，这样既可以保持英国人的优势，又能使外国移民免受本地出生居民的潜在敌意。但是，他在另外一些时候又谈论澳大利亚对遭受宗教、种族和政治迫害的牺牲者应尽的义务。在他这方面来说，他不会驱逐任何愿意成为一个良好的澳大利亚公民的人。因为毫无疑问，任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人”。

在讨论移民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胸怀豁达的一方，或是具有地方主义思想的一方，从它们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有一个争取生存的主题。1947 年 11 月，阿瑟·卡尔韦尔说："我们没有无限的时间可用于加强我们的力量或者计划我们的将来。现在我们的决定必须是正确的决定，否则我们澳大利亚民族的生存就可能不会长过这一代儿童的生命。"从 1947 年 6 月至 1959 年 6 月，受到补助的英籍移民有三十六万零一百五十六名，而其他欧洲籍移民有三十四万一千六百八十五名。从 1959 年 6 月至 1968 年 12 月，英籍移民有六十五万八千二百三十六名，欧洲籍移民有四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五名，后者主要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荷兰人、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

到了 1967 年，澳大利亚的人口估计已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人。根据前一次
247 的人口普查，在总人口中，有三百八十七万七千四百七十三人自报为英国国教徒，一百一十万零三千九百六十九人为罗马天主教徒，一百九十三万二千一百六十一人为天主教徒，一百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一十人为卫理公会教徒，一百零四万三千

五百七十人为长老会教徒，有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行使了置不作答的权利，有九万四千零九十一人表示没有宗教信仰，有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二人属于基督教或犹太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截至1969年，欧洲籍的少数民族不但对“真正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习惯，而且对他们的精神境界也产生了影响。1947年，移民部长卡尔韦尔说：“孤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许他只是表达了一个希望，而不是发表观察的结果。但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的移民和交通的发展，却确已打破了澳大利亚文化上的孤立，让丛林文化成为历史遗迹，把一些人从清教徒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训练澳大利亚人去应付人类在塑料、铬和原子弹时代的普遍问题。

民用航空的发展引起了交通运输方面的最大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民用航空已由私营企业开始经营。1929年，澳大利亚航空事业的两位先驱者——C·E·金斯福德·史密斯和C·T·P·厄尔姆——组织了一家公司经营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之间的定期飞行业务。当1931年该公司陷入经济困难后，霍利曼兄弟以

不大的规模开始经营隆塞斯顿和弗林德斯岛之间的航空业务。由于他们经营得很有成绩，1936 年便以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公司的新名称在墨尔本注册，并且开始排斥其他州际航空公司。到 1939 年，他们在各州首府之间都开辟了航线。

1945年，奇夫利政府提出了一个法案，想把所有民航线收归国有，成立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委员会，并由联邦授权该委员会负责创办和经营全国航空业务。但私营航空公司却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法院也判决联邦无权垄断。因此，横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委员会的营业机构名称）就在与私营航空公司，特别是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公司进行竞争的情况下，于 1946 年 9 月 9
248 日首次航行于悉尼与墨尔本之间。到 1946 年底，横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在各州之间都辟有航线。

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公司刚刚避免了政府的征用，就面临着由另一家公司接管的命运。R·M·安塞特开始是经营维多利亚州的哈密顿和霍舍姆之间的客车运输的。到 1936 年，他从经营客运车队和附属旅馆的业务中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组织了安塞特航空公司。由于旅游业在战后繁荣中

蒸蒸日上,安塞特赚了大钱,便开始打进州内和州际两方面的航空业务。1958年,该公司接管了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公司,并以安塞特澳大利亚全国航空公司的名义营业。到1962年,政府经营的航线和私营公司在客运、货运和邮件运输方面的营业额大约相等。这样,在国内民航事业中,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使乘客和私人股东两受其益。

相反,澳大利亚国际民航事业却趋向于政府所有和控制。1931年,一家在昆士兰州注册的私营航空公司——堪达斯帝国航空公司——在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线上,经营达尔文港和悉尼之间载运航空邮件和乘客的业务。1934年,他们又把这条航线从达尔文港到新加坡一段的航运业务也接过来。在战争时期,堪达斯帝国航空公司由佩思经可可群岛飞往科伦坡,保证了来往伦敦航线的畅通;1946年4月,又重开了经新加坡的航线。第二年,联邦政府取得了堪达斯公司剩下的股份。1947年12月,该公司开办了通往日本的航线,1948年6月,开办了通往香港的航线,11月,开办了往南非的航线。1945年,泛美环球航空公司开辟了

从旧金山到悉尼的航线；1946年，英联邦太平洋航空公司开办了同样的航线；1949年，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开始了由温哥华到悉尼的班机飞行。1951年到1969年间，印度航空公司、新西兰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德国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南非航空公司、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以及其他公司，都先后开始经营飞到悉尼的航空业务。

在此期间，工党政府采取步骤，以实现一项早
24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已提出的老规划，这就是引斯诺伊河的水以灌溉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平原，并利用由新南威尔士州东南角的积雪的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头流下的水来发电。1949年，政府向议会提出了斯诺伊山水力发电法案，这个法案描绘出一个可以发电一百七十二万瓩的计划，足以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规划的二百零五万六千瓩的发电能力媲美。所发电力将被输送到墨尔本和悉尼等城市，其成本约为用煤或用油作燃料的火力发电站的一半。提出这个法案的部长还补充说："从国防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个计划还具备另外一项优点，即通过隧道把经

过水轮机后的水越过山岭引到内地，当地的水利机关只要付出一笔水费就可以利用它来促进粮食生产，而水费又可用以支付发电费用。这位部长已预见到将来马兰比季河和墨累河流域的内地城市将拥有一百万人口。他最后说，这是一项需要具备信心的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项宏伟计划，政府同美国、意大利、法国、挪威和日本的工程公司、电力公司、隧道公司和堤坝建筑公司订立了合同。工程中的体力劳动、卡车驾驶以及大机器操作，主要由入境移民担任。这样，欧洲就带着它的伟大的文明、它的欢乐和痛苦，带着它对人类悲惨命运的感觉，一起搬进了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地区。而在这以前，这里却只有石器时代的人、熟知爱尔兰人的冤屈的人以及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留下了一点点痕迹，仅足以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们曾经在这里呆过。

1946年，政府在堪培拉创办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企图使这个大学专门从事物理学、医学、社会科学和太平洋事务的研究。正如工党政府以往的许多措施一样，在理想主义中也隐藏着对生存的关注。这位部长说："如果我们的前途要得到保

250 障，如果我们要对世界大家庭作出充分贡献”，我们澳大利亚人就必须对太平洋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工党不但注意促进学术，也同样向往于民族主义者一向所追求的目的，这就是争取这位部长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恰当地位”。

在工党战后社会福利立法中，一方面抱有巩固国防、增加国力的动机，同时也带着要使澳大利亚成为社会实验室，成为人类走向友好和平的开路先锋的心情，并且抱有这样的信念：由经济萧条所引起的恐怖和堕落情景决不复返。从1946年到1949年，政府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范围，并作了某些改进。对凡因意外事故、经济变动或人间其他不幸遭遇而受害的人，都规定给以保护。矮胖子①仍然有可能跌倒，不过这一次纵然跌倒了，也会跌在福利国家的棉絮上面，而不是跌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冰冷而坚硬的砖头上面。

但是，工党政府在1949年遇到了两个无法回

① 原文为Humpty-Dumpty，英国民间谜语。谜面是一个跌下来就摔得粉碎的东西，名叫Humpty-Dumpty，谜底是鸡蛋。以后引申，身躯矮胖象个鸡蛋的人也被叫做Humpty-Dumpty。——译者

答的问题：它是否正在利用经济计划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序幕？还是正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保护弱者，使其免于遭受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苛刻待遇？如果它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或意图，那么，就有人会提出，有些在战时强制实行的管制，战后正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1947年的银行国有化建议，燃料定量配给的继续实行，堪培拉文官数目的增加——这一切不免使人怀疑，政府人士是否已变成了缺乏前后一贯的、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的计划者。同时，煤矿、码头和造船工业的一连串罢工也使政府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保守主义者迫使他们去维持法律和秩序，而当政府惩戒罢工工人时，激进主义者又斥责他们是纳粹突击队员和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当1949年煤矿工人罢工时，奇夫利命令军队去挖煤；这时候，党内右翼分子和支持他们的选民大吃一惊，而左翼分子则感到失望或愤慨。这时候，议会政党领袖席上的人们由于执政了八年，已经精疲力竭了。自从失掉了象柯廷那样富于想象力或比斯利那样具有行政手腕的人物，他们既没有本领也没有权力去判断选民中究竟是否存在

251 一股暗流，这种暗流到时候会吞没每一个著有政绩的政府，甚至著有他们这样伟大政绩的政府。

由于签订澳新协定时的世界形势已经象积雪一样溶解了，工党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也同样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当 1947 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起来反抗荷兰时，工党的反帝传统，加上战后几年来的普遍左倾情绪，使政府有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倾向。当码头工人拒绝装载供应荷兰军队的物资时，政府并没有施加压力。在联合国，他们的公开言论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但在幕后密谈和正式照会中则比较谨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抗引起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工党对白澳政策仍旧是热烈拥护的，现在对这一政策的前途应怎样看待？此外，谁能肯定印度尼西亚的反殖民主义不会转变为反资本主义，甚至转向共产主义呢？

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国的胜利暴露出了工党内部的分裂，虽然它还未至于瓦解。1948 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出现了共产党政府。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增长。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工党政府

是否要承认它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呢？共产主义世界赶忙承认了它，美国则拒绝承认。工党政府怎么办？党内的右翼和天主教徒反对承认；那些关心选举前途的人们力主在12月选举过后才予以承认；激进分子和左翼则叫嚷要立即承认。表决的结果，是推迟承认。到了12月，工党被自由党和乡村党的联盟沉重地击败了。这个联盟至少在关于共产党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克制或苦恼。

自由党东山再起，一方面可以说是孟席斯的政治手腕和勇气的胜利，他成功地利用了工党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世界分裂为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共产主义阵营的征兆。工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在1943年的选举中一败涂地之后，它们的时运衰落到了极点。澳大利亚统一党内部的派 252
别斗争，澳大利亚统一党和乡村党之间的恶感，由于孟席斯在1941年遇刺而产生的个人痛苦，选举的失败，这一切曾使两个集团同时面临公开的嘲笑和耻辱。1944年，在孟席斯领导下成立了自由党之后，这些创伤有的已经愈合了。从1945年到1948年，一批年青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些制造商、贸易商和畜牧业主的支持下，为一旦摆脱经济计

划家及共产主义威胁后的澳大利亚描绘了一幅可能实现的美丽蓝图。在1946年的选举中，新党在众议院中获得十七席。在1949年的选举中，他们获得了五十六席，工党获得了四十七席，乡村党十九席，无党派人士一席；当时众议院已从七十五席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席。

世界大势的发展，看来有利于自由党。北朝鲜共产党在1950年6月25日侵入南朝鲜①，26日，杜鲁门总统谴责北朝鲜无端发动侵略，并且宣称：为了响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号召，他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政府以支持。6月29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它已派一个海军分舰队交由美国指挥，供在朝鲜海域使用；第二天，驻日本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同样交给美国调遣。7月6日，孟席斯总理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参加陆军、海军和空军到朝鲜服役。他说："尽管有我们的一切弱点，但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切望和邻居和平相处，如果他没有

① 1950年6月25日，美帝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说"北朝鲜共产党""侵入南朝鲜"，完全是颠倒黑白。——译者

我们那么幸福，我们不惜作出额外的努力去帮助他。”于是，澳大利亚人再度志愿出国作战——有些人相信自己正在保卫基督教文明，以免受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侵害；有些人是为了追求奇遇；有些人想要摆脱自己的妻子；有些人是为了找一些事情来干。到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有二百八十一名澳大利亚人在朝鲜死亡或失踪。

由于战时对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尤其是羊毛的需求陡然增加，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也迅速地达 253
到了新高度。羊毛生产者为了减少他们的透支，曾辛苦工作了好几年，现在居然购买了华贵的小汽车以及各种节省主妇劳动力的装备，酒窖里堆满了大瓶的香槟酒，还可以到国外作阔气的旅行。朝鲜战争也加强了孟席斯政府的地位，使他得以更加放手采取反共的措施。

正当澳大利亚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之际，孟席斯政府接受了美国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要拯救文明就必须抑制国内外共产主义。1951年7月12日，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草拟一项安全条约，即所谓澳新美安全条约。1954年10月，

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王国、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个条约，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个条约，缔约国同意采取共同行动，以对付他们认为对他们安全和进步最紧迫的威胁，即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条约不但针对公开的侵略，而且也针对颠覆活动，以期从此得到下列保证：凡共产主义者不能用武装进攻得到的东西，也不可能以隐蔽的方式来得到。这样，澳大利亚就受到美国政策的约束，以抵抗澳大利亚政府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政策"。他们认为，阻止共产主义暴政的蔓延应是自由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澳大利亚人希望在亚洲克服贫穷、疾病和愚昧，这里既有道义上的动机，也有利己的一面。在这些问题上，按照孟席斯政府的见解，无论受人道的驱使或从求生存的欲望出发，都要求以一定方式对东南亚国家提供物质援助。因此，当英联邦国家总理于 1950 年 1 月在科伦坡举行会议时，由外交部长珀西·斯彭德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即后来所谓科伦坡计划。1950 年 5 月，在悉尼召开的

第二次会议上，经澳大利亚、加拿大、锡兰、印度、
巴基斯坦、新西兰和联合王国各国政府同意，每个 254
国家在三年中捐助八百万英镑以训练来自东南亚的人员，并向需要的国家遣送教师、专家和装备。9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它打算在六年内支付三千一百二十五万镑。

美国于 1951 年，菲律宾和日本于 1954 年，先后参加科伦坡计划。1954 年年底，有六百名以上来自东南亚的学生根据科伦坡计划领取补助金在澳大利亚各大学学习，并有七十九名澳大利亚专家派往东南亚各国服务。到 1968 年，澳大利亚派出了一千五百名以上的专家，并接受了来自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由科伦坡计划资助的九千四百名学生和受训人员。澳大利亚政府就是以这些方式提供微力以缩小欧洲人和亚洲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他们相信这种差距是亚洲人陷入共产主义魔手的始终不变的缘由。另一方面，东南亚条约组织仍然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最后防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一只手提供福利援助，而另一只手则拿着利剑。

在国内战线上，孟席斯政府也准备和共产党

决一死战。1950年4月27日，孟席斯向众议院提出了一个解散共产党法案。这个法案宣称：由于共产党企图以暴力颠覆现存的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该党是非法的，应予解散。10月19日，共产党和十个职工会向高等法院起诉，要求宣布这一法令为非法。1951年3月，当大多数法官宣布这一法令无效时，孟席斯要求同时解散上下议院，举行选举。在选举以后，他在7月提出了宪法修改法案，以便在修改宪法后，议会为了和平、秩序和联邦的有效统治，能够通过有关共产主义的法律。这个运动正待开展，奇夫利突然于6月13日死去，由伊瓦特继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当时右翼方面声言文明正在受到危害，左翼方面则提出自由正在受
255 到危害的警告。1951年9月22日，澳大利亚人民就这一提议进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有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七人赞成，二百三十七万人反对。左翼欢呼这个结果是澳大利亚民主传统的胜利；右翼的想法怎样，并不清楚，可是其中也有些人私下议论，既然在宪法上找到借口，以便执行巧妙地避免行动这个传统的保守派政策，他们也感到宽慰了。

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同年朝鲜战争的结束，冷战的灰烬已逐渐趋于冷却。但在澳大利亚却由于彼德罗夫事件而突然煽起了带有火药味的火焰。1954年4月3日，驻堪培拉的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弗拉迪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德罗夫要求政治避难。4月20日，他的妻子乘飞机从悉尼到达尔文港。在飞行途中，一个澳大利亚保安人员和苏联外交官为了争夺她的灵魂开展了一场斗争。经过了这次闹剧性的飞行后，她也要求政治避难。在众议院一场戏剧性的插曲中，孟席斯宣布委任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澳大利亚的间谍活动。事件的高潮曾带来一个希望，即案中揭露的内容将比克拉夫钦科在加拿大的泄露对苏联发生更大的损害。

伊瓦特博士宣称，他将代表那些被彼德罗夫告发的人，在皇家委员会上作证。伊瓦特、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坚信彼德罗夫案件是澳大利亚保安机构和澳大利亚政府安排的一个阴谋，以此来诽谤和中伤居于反对党地位的工党，并且企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利用反共来耸人听闻，进行绝望挣扎。1954年5月17日，在委员会开始听取证

词之前，曾简短地研究并驳回了伊瓦特所提出的指责（他认为彼德罗夫事件是一个阴谋和捏造），然后继续听取证词直到1955年3月。之后，便由三个委员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的结论不外乎街谈巷议所认为当然的内容，即苏联的代理人在澳大利亚搞间谍活动。

到这个时候，彼德罗夫所掀起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而它最长远的影响就是把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发展到了顶点，这也是一个奇妙的讽刺。1949年选举惨败以来，工党一直都在舐着自己的创伤。在奇夫利活着的时候，他的天赋的能力和坚强信
256 念——党的统一是拯救工党的关键——还能使工党免于分裂。但是，自从他于1951年6月去世，伊瓦特被选为领袖后，派系之争便趋于剧烈。后来，工党在1954年5月选举中的惨败，使党内左右两翼各自寻找替罪羊。工党左翼不满意澳大利亚接受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论点。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同亚洲那些腐败无能的反动政府结成联盟；这样会使澳大利亚在一场世界大战中有站在失败一方的危险；它会使澳大利亚与那些似乎企图阻挠亚洲民族解放的政权结成一伙，而这些亚洲民族多

少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穷困和被压迫的状态中；它还会使澳大利亚和印度疏远，而印度的领袖潘迪·尼赫鲁正象征着这部分工党人士所寻求的第三势力，也就是站在以共产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为一方，以反动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蒋介石军队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第三势力。这一派要求承认共产党中国，退出和美国缔结的军事联盟，建立一个中立的地位：既不归顺美国，也不效忠于苏联。反之，党内右翼却专心致志于组成反共十字军，在国际和国内反对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就曾支持过产业集团，那是一个右翼工人组织，其目的在于使职工会摆脱共产党的支配。

当伊瓦特宣布他要作为辩护律师出席彼德罗夫委员会之后，事态迅速发展。在堪培拉的一次党的激昂的会议上，右翼叫喊伊瓦特是“工党的耻辱”。左翼反驳说：如果右翼看到伊瓦特在伽利利①湖的水面行走，这些人士肯定会认为共产党人在水下把他托起。事态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

① 伽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小湖，现名为太巴列湖。《新约全书》中载有耶稣基督在伽利利湖水面行走的神迹故事。见《约翰福音》第6章第16—21节。——译者

地步。几星期后，由于右派的横蛮，伊瓦特变得更为左倾。1954 年 10 月 6 日，他在报上宣布，一小群工党党员，特别在维多利亚州，已变得日益不忠于工人运动。他说，这一集团采取了那些类似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方法，并且正在使工人运动背离工党原来的目标和理想。他最后说，似乎可以肯定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主要是由工人运动
257 以外的人物指挥的。伊瓦特所提到的那个集团反击说，伊瓦特是工党脖子上的赘瘤，他的唯一朋友是共产党人和过去的共产党人。

1955 年 3 月，在霍巴特召开的澳大利亚工党第二十一届大会上，中派集团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一方面，他们批准联邦执行委员会早些时候的一项决议，即撤销对工业集团的政治承认。另一方面，他们重申，他们彻底反对共产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并且强调只有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工人运动才能阻止那些罪恶的滋长。一方面，他们表示深信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合作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必须加以维持和扩大。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了几项决议，对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作了只是稍加掩饰的批评。他们认为：“印度支那是一个典型例

子；由于不可原谅地迟迟不承认亚洲的一个真正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结果却使共产主义逐渐夺取了民族主义运动。”工党要求：对亚洲人民要多给一些福利，多给一些帮助，使他们得以免除贫穷、疾病和缺乏教育的痛苦，同时要少用武力。工党要求东南亚条约组织致力于和平事业。它还要求接纳奥地利、保加利亚、锡兰、中国、芬兰、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约旦、朝鲜、利比亚、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加入联合国，使联合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组织，具有真正代表性。但是工党仍然拿不出其他办法来代替东南亚条约组织，它也不能描绘出一幅介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社会的略图。

在局外人看来，似乎调和派人物又赢得了一场战斗。在维多利亚州发生了暴风雨般的斗争，由于墨尔本大主教曼尼克斯博士和重要天主教人士B·A·桑塔玛里亚①的影响，工党两派之间的

---

① 桑塔玛里亚，宗教社会活动家，191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39—1961年任全国天主教农村运动秘书。创办天主教社会运动，拚命反对共产主义。1943—1957年担任这个运动的主席职务。著有《地球——我们的母亲》一书。——译者

冲突更加激烈了。在这以后，维多利亚州工业集团分子在 1955 年 4 月组织了反共工党。在新南威尔士州，一部分产业集团分子也在 1956 年组成了民主工党。到了 1957 年，反共工党和民主工党合并，仍名为民主工党。作为一个政党，他
258 们保证要使澳大利亚和世界摆脱共产主义的威胁，清除工党的风头主义、机会主义和腐败习气，树立工业民主。事实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使自由党一乡村党联盟在澳大利亚取得了稳定的地位。原因是，他们在 1958 年联邦选举中取得了 9.41 %的选票，包括在维多利亚州的 14.75%和在新南威尔士州的 5.59%，同时他们还指示他们的支持者要把第二选择对象给予自由党一乡村党联盟。这样一来，他们就使自己受到了一种非难，那就是不管他们的意图怎样高尚，他们在政治上却在为保守主义效力，而不是他们所热望的从党内专制下解放出来。

自由党和乡村党的领袖们在为未来确定一项信念方面未能有较多的成就。自从 1945 年以来，孟席斯总理对英国的制度和英国文明的信心从不动摇。当他于 1952 年 2 月 6 日在众议院宣布乔治

六世逝世的消息时，他是那样沉痛，以至嗓子嘶哑，讲不下去了。他以一种肃穆得体的语气告诉议会，说他很难说出要说的话；之后，他就坐在椅子上，双肘支在桌面，把握成拳头的指节塞进口里。

到1962年，这个人物把自己的伟大天才、雄辩、才智和谦恭全部用于保卫那个正在他眼前分崩离析的世界。当联合王国政府打算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他的政治上的同盟者——乡村党人，感觉到对他们的收入不利，便大叫先要满足某些物质条件，他们才能赞同。但是对孟席斯来说——确实，对所有抱有身躯比衣服更为重要的想法的自由党人也是如此——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将标志着一场大梦的结束，标志着英国生活方式中的亲切的、文明的影响也将结束。现在，新的十年即将开始，那些坚持反共立场的澳大利亚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景：这种效忠的代价或许就是英联邦的结束。因此，孟席斯和他的追随者都感到忧虑不安，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忠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而是忠于一个阶级。

在这同一个十年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遇 259
到了要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抉择的同样问题。他

们也面临着一个新世界。部分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工业化，生产和交通方面的技术改革，以及在冷战的歇斯底里中对澳大利亚初级产品需求的突然增加，澳大利亚已出现了富裕的社会，而且正在达到足与美国媲美的物质生活水平。工厂每年生产的物质享受和群众性娱乐用品越来越多。汽车、机动割草机、电炉、电冰箱、陶瓷水罐、烘面包器、电动剃须器、真空吸尘器、洗衣机、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数量，按每人平均计算超过了美国和瑞典。由于物质福利的增进，由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结束了对英伦三岛的依赖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欧洲的依赖，于是滋长了一种新的信心。这种信心不同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种用卤莽的、浮夸的、无耻的、吵吵闹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信心，而是新的一代的信心：他们用不着再以"新世界"自居来聊以自慰了。1950 年，伯特兰·罗素① 曾到澳大利亚作过一次短期旅行，临别时，他评论说：澳大利亚人"不但在发展澳大利

①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数学家，著作甚多。晚年曾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译者

亚本土方面是先行者，而且他们为未来世代的人类指出了一条走向更大的幸福的道路。”

时论作家们这时正在准备庆祝澳大利亚的成年。但是诗人、小说家和画家们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建立这种信心。他们中间有些人已把兴趣转到关于人性和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去了，而这一类问题在过去各种文明盛世都曾经提出讨论过。他们探索罪恶的根源和人类苦难的原因。他们问道：究竟是上帝还是人要对人类痛苦负责？他们还提出：人类到底是否能够互相了解？他们描写了那些有勇气面对人生恐惧和悲剧的人所表现的怜悯和同情。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象这样沉溺于罪恶的题材，象这样专门劝告人们要听天由命，这象征资产阶级文明的精神病态。在他们看来，只有毁灭了资产阶级社会，才能解放人民的创作才
能，使文学和艺术重新表现为深知人类前进道路 260
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信心和希望。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在它的历史中再一次站在两个世界之间。

越南战争迫使澳大利亚人就下列问题表示态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他们到底站在哪一

边？1954年，法国和中国政府同意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划分为北越和南越①。当时北越是由胡志明和武元甲将军的共产党政府统治，南越在1956年以后由吴庭艳的独裁政府统治。1959年5月，由于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冲突，恐怖主义的蔓延和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北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通过各种适当的手段建立统一的越南。7月，北越共产党宣布它的目的是要把南越从它的资本家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到1961年1月，在南方组织了民族解放阵线，即越共；他们和北越共产党人合力作战，以求摧毁他们所谓的“美吴集团”。

因此在1961年12月，肯尼迪总统在提到“共产党人在南越的暗杀、绑架和放肆的暴行”后，接着表示美国准备帮助越南共和国保护它的人民和捍卫它的独立。在有些人看来，美国是为着抵抗

①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规定，以北纬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分界线以南为法兰西联邦军队集结地区。日内瓦协议的最后宣言规定：“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的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作者在这里的提法是错误的。——译者

共产党人对南越的进攻而战。在另一些人看来，美国在一场内战中帮助了保守的（即使不算腐败的）反动分子。

这时，澳大利亚看来有充分理由要帮助遏止共产主义在南越、泰国、马来半岛的蔓延。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有更使人惊慌的关于北京和雅加达达成协议的谈论，都表明需要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以防止一旦防御被摧毁时，东南亚各国象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落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1955 年 4 月，孟席斯宣布为了分担东南亚条约组织地区的防务，澳大利亚准备派军队到马来亚去。同年12月，他 261
又宣布，这些军队可以用来对付共产主义恐怖分子。1964 年，他宣布采取挑选式（用投票或抽签选拔）的征兵制度，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经过两年训练后，可送往海外服役。

接着，由于 1964 年 10 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南越军事失利的谣言，以及南越的整个政府即将崩溃的警报，孟席斯遂于 1965 年 4 月 29 日宣布政府的决定：派一营军队到南越去"作为我们此时对这一地区的防御所能提供的最有用的又一贡献"。

1964 年，发生了北部湾事件(关于这次事件，目击者说法不一)，随后约翰逊总统宣布了轰炸北越军事目标的重大决定。1965 年 5 月和 6 月，澳军一千五百人抵达南越，驻防边和，编入美国第一七三空降旅。1966 年 6 月，这个营由特遣部队接替。次年，皇家海军导弹驱逐舰“霍巴特号”所属第二中队的空军和堪培拉式双管喷气轰炸机，开始在南越和非军事区协助美国军队。1967 年，澳大利亚在南越的军队有六千三百人，其中40%为国家武装部队，其余为志愿人员。

1965 年 4 月，当第一次宣布派军队到越南的决定时，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曾强烈反对，部分是由于他相信这个决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以为这场战争是由北越共产党人的入侵而引起的。卡尔韦尔坚持这个战争是一场内战。他还相信政府误解了共产党人挑战的性质，也认为政府把原已少得可怜的军队再调一部分到国外去，就危险地削弱了澳大利亚的防务。尽管这次派出远征军是用了现代名词“前哨防卫”的招牌，工党还是照传统的观点对它抱有怀疑。工党相信对东南亚应采取福利政策而不是大炮政策，

虽然它对提出如何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个地区蔓延的做法也极感为难。 262

除了工党、共产党、一些下了决心的激进分子以及志气高尚以改良人类为己任的人以外，谁都没有理睬卡尔韦尔的警告。到1966年，澳大利亚选民又选举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执政。这个联盟只答应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作为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简单办法，同时许下了一个诺言：用自由企业的办法增加更多的财富。当生产战线上源源不绝地出产商品，澳大利亚大沙漠的许多金属矿已投入开采，机器从地里挖出铁矿石或是钻进地层深处乃至汪洋大海的海底来开发石油，澳大利亚对日本、美国、西德及联合王国的贸易都繁荣发展的时候，似乎整个大陆即将处于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之下。

看来好象从达尔文港到霍巴特，从布鲁姆到布里斯班，这个国家终于免不了要成为一片城市郊区了。在前几代里，这片国土上曾诞生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思，他曾经梦想一个新不列颠崛起于悉尼港畔壮丽的海滨；也出现过内德·凯利，他憧憬一种无所畏惧的、自由和勇敢的生活；也有

过罗伯特·奥哈拉·伯克，他曾把人间境遇中最悲壮的感受留给后代。可见，当工业社会的随大流和标准化洪流把社会引进霓虹管广告时代和节制生育时代之前，这片国土上也曾出现过出众的人物。大家得到物质福利，这就使人们没有必要再去乞灵于过去曾给人以巨大慰藉的东西：对来世幸福生活的指望、对此生幸福的指望以及诗歌和音乐，后二者过去不但供人娱乐，而且还给人们以力量和勇气去忍耐一切。政府似乎已经理解了时代的精神：要为城郊居民提供应有尽有的生活便利品，还要培养人们文化生活的标准，这些人指望每家有两部汽车，每周工作三十小时，电视屏幕上不断出现富有刺激性的节目，还有机会到邦迪海滩跨上浮板破浪消闲，而政府则把派出一支象征性部队前往越南作为给予这一切的代价。

到 1967 年，又开始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声音，工党的新领袖高夫·惠特拉姆，用生长在干燥贫
263 瘠土地的古代先知们的调子警告说，澳大利亚已经不再是英国的农场，而成为日本的采矿场了。有些人对日本和美国在澳大利亚投资数量之大感到不安。有些人则为他们所谓美国大众文明——杂

志上的色情文学和电视连播节目中的凶杀暴行——的腐化堕落影响而感到忧虑。有些人鉴于政府一切听从华盛顿指挥而感到不安。1966年1月，孟席斯在他垂老之年载誉引退了。堪培拉的发展和各大学的扩大，这两项功绩是他留给后代的永久纪念。

孟席斯去职后，由哈罗德·霍尔特继任总理。霍尔特认为全人类都是兄弟；这一个值得赞美的理想在私生活方面鼓舞着他。在公共生活方面，他梦想教育澳大利亚人懂得与东南亚各族人民紧密联系的必要性。但是在这一年，命运给霍尔特安排了离奇的一着，使他不但在那年宣布增加在越南的澳大利亚部队，而且还提出了“和L·B·约翰逊永远在一起”的口号，借以表示他们的政府对美国联盟的热忱。

1967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促使社会上很多勇于发表意见的人士怀疑这样的政策是否明智。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被推翻了，北京—雅加达轴心暂告结束，中苏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这些事件似乎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重新考虑澳大利亚的安全问题。有两件事更加使这个重新考虑成

为必要：一件事是英国政府宣布准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未确定日期从东南亚撤退他们的军事力量；另一件是越南形势的发展日益使人不安。

有人主张，鉴于美国经过越南的惨痛经验之后，孤立主义必然日益得势，鉴于英国退出东南亚，澳大利亚必须仿效以色列或瑞士的做法，采取武装中立政策。有些人眼看一部巨大的军事机器把一个小国的广泛地区碾成齑粉，感到厌恶，从而援引了罗马教皇的话——“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恳求你住手！”有些人看到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在越南用以代替共产党人的盲从和灰溜溜的精神状
264 态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也感到痛心。有些人则担心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中将会落在失败的一方。澳大利亚工党曾提醒选民们，由于西方部队使用凝固汽油弹、燃烧弹、杀伤弹进攻丛林中的村庄，西方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受到损害。某些过去的传统和政治信条曾把一切战争指摘为阶级仇恨和帝国主义野心的产物。有些人受到这一影响，同时还注意到澳大利亚本来就有保护弱者的激进主义传统；因此，当他们看到澳大利亚关于

伙伴情谊和社会平等的可贵传统有被埋葬在越南战场上的危险时，不免深感痛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不安的气氛中接近结束。1967年12月17日，据报霍尔特失踪，相信是淹死了。霍尔特为了争取人们互相友善而经历过极度的苦恼，没料到他自己却在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得到他应得的同情。当世界各国领导人云集墨尔本向这位受人们爱戴的人物最后一次致敬的时候，那些对澳大利亚灾难临头有所预见的人们，已注意到除美国总统外，澳大利亚所接待的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要人，都不过是历史的垃圾，而不是什么塑造人类将来的人物。当1968年12月约翰逊总统宣布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开始的时候，人们并未能大大松一口气，因为下列思想顾虑还一直未能消除："真正的澳大利亚人"前途究竟会怎样？难道要把放弃保存一个欧洲社会的企图作为生存的代价？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就是因祖先的种族傲慢和自大而受到"报应"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呢？

看来好象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帝王时代也正在结束，而将由信使们的时代所代替，而这些信使们

又竭力在寻找帝王。过去的十年曾经是非常矛盾的十年。在澳大利亚终于出现了人类精神的一些伟大成就。帕特里克·怀特① 写出了他的小说，亚历克·霍普② 写出了《关于庇护第十二世死亡之歌》，道格拉斯·斯图尔特③ 和朱迪思·赖特④ 在他们的诗歌中唱出了赞美生命的伟大圣歌。西德
265 尼·诺兰⑤ 创作了题为《河曲》的画，赞美黄金色的生命之树⑥。无论大小城镇和乡村，富裕的外

① 帕特里克·怀特，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1912 年出生于英国。1939 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快活谷》，描写他当无业游民的生涯。——译者

② 亚历·霍普，堪培拉大学教授、心理学家，1907 年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著有《流浪群岛》等诗集。——译者

③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13 年出生于新西兰，是有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及评论家。著有《黄金爱侣》、《雪火》、《内德·凯利》等诗歌剧。——译者

④ 朱迪思·赖特，澳大利亚诗人，1915 年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在各大学讲授澳大利亚文学。著有诗集、文学评论、传记和儿童读物，其中以《浮象》诗集(1946年)为著名。——译者

⑤ 西德尼·诺兰，澳大利亚艺术家和诗人，1917 年出生于墨尔本。其画面题材包括大盗内德·凯利，探险家伯克及斯旺河等。——译者

⑥ 生命之树，见《圣经·创世纪》中所述的伊甸乐园。据称园内果树繁茂，其果实可吃，独其中有两棵，一名生命之树，一名善恶之树，其果实不能吃。——译者

表闪耀得比过去更加光辉灿烂。宗教教义和政治教义在道德上的权威却迅速衰落。这个十年将结束了，但至少还留下一个没有解答的重大问题：当在北方怒号的强大暴风雨扫荡澳大利亚以前，这种繁荣还能够维持多久？也许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如萨姆森①被剪掉了头发，被弄瞎了双眼，被遗弃在加沙那样，已被夺去了一切信仰的这一代是否也会孤单单地被遗弃在邦迪海滩上呢？

① 萨姆森是古代希伯莱的法官，有惊人的气力，在反抗犹太人的强敌中，扮演了英雄角色，但最后为敌人所擒，被挖去了眼睛。——译者

参 考 书 目

1. 一般参考书

«澳大利亚百科全书»。十卷。悉尼：安格斯—罗伯逊书店；蓝辛：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58 年。

(*Australian Encyclopedia*. 10 vols.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D・H・派克主编：«澳大利亚人名辞典»。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6 年。三卷。

(D. H. Pike, ed.,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 vols.)

珀西瓦尔・塞莱：«澳大利亚人名辞典»，二卷。安格斯—罗伯逊书店。

(Percival Serle, *Dictionary of Australian Biography*. 2 vols. Angus & Robertson.)

2. 文献集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史史料»。伦敦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 年。

(Manning Clark, *Sources of Australian History*. London an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凯思林·菲茨帕特里克：《澳大利亚探险家》。伦敦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 年。
(Kathleen Fitzpatrick, *Australian Explorer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3. 通史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史》(已出两卷)。墨尔本、伦敦和纽约：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
(Manning Clark, *A History of Australia*. (2 vols. to date). Melbourne, London and New York: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马克斯韦尔·克劳福特：《澳大利亚》。伦敦：哈钦森书店；纽约：朗曼斯—格林书店，1952 年。
(R. Maxwell Crawford, *Australia*. London: Hutchinson & Co.;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52.)
戈登·格林伍德编：《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悉尼：安格斯—罗伯逊书店；纽约：弗雷德里克·普雷格书店，1955年。
(Gordon Greenwood, ed., *Austra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 此书有中译本，北京编译社译，196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读物)。——译者

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55.)

W·K·汉考克：«澳大利亚»。伦敦：欧内斯特·本书店，1930年；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书店，1931年。

(W. K. Hancock, *Australia*. London: Ernest Benn, 193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1.)

D·H·派克：«澳大利亚：平静的大陆»。伦敦：朗曼斯书店，1962年。

(D. H. Pike, *Australia: The Quiet Continent*. London: 1962, Longmans.)

杰弗里·索尔：«澳大利亚联邦政治和法律»。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56年；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年。

(Geoffrey Sawer, *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 and Law*.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56;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艾伦·G·L·肖：«澳大利亚的故事»。伦敦：费伯—费伯书店；纽约：罗伊出版社，1955年。

(Alan G. L. Shaw, *The 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Faber & Faber;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55.)

拉塞尔·沃德：«澳大利亚»。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镇：普伦蒂斯·霍尔书店，1965年。

(Russel Ward, *Australi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65.)

艾伦·瓦特：«1938—1965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演变»。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

(Alan Watt,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1938—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4. 经济史

N·G·巴特林:«1861—1900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的投资»。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

(N. G. Butlin, *Investment in Australian Economic Growth, 1861—1900*.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英帝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40年;伦敦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

(Brian Fitzpatrick, *The British Empire in Australia*.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40;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英帝国主义和澳大利亚»。伦敦:乔治·爱伦—恩文书店,1939年。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1939.)

爱德华·O·C·香恩:«澳大利亚经济史»。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麦克米伦书店,1930年。

(Edward O. C. Shann, *An Economic Histroy of Austral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0.)

5. 社会史

马格丽特·基德尔:《历史上的人物》。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1年;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

(Margaret Kiddle, *Men of Yesterday*.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1;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拉塞尔·B·沃德:《澳大利亚外史》。伦敦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

(Russel B.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6. 文艺

罗宾·博伊德:《澳大利亚的住宅:起源、建筑师和住户》。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伦敦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

(Robin Boyd, *Australia's Home: Its Origins, Builders and Occupier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亨利·M·格林:《澳大利亚文学史》。两卷。悉尼:安格斯—罗伯逊书店,1961年。

(Henry M. Gree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2 vols.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61.)

塞西尔·哈德格拉夫特:《澳大利亚文学》。伦敦:威廉·海尼曼书店,1960年。

(Cecil Hadgraft, *Australian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60.)

B·史密斯:《澳大利亚的绘画,1788—1960年》。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2年。

(B. Smith, *Australian Painting, 1788—1960*.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2.)

索　　引*

（条目后所附数字为原书页码，与正文页边的数字相对应）

* 索引页码是按照原书排印的，对一些明显的错误作了更正。——译者

* 原书正文和索引均误为Mendona，现改正，并按 Mendana译出。——译者

* 原书索引误作J.Sorey，位置亦误，现改正。——译者

澳大利亚俚语和特殊词汇表

〔1〕ANZAC：澳新军团。是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的缩写词。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4月25日开始在加里波利登陆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部队，后泛指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主要指士兵)。

〔2〕Aussie：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

〔3〕Beardie：“长胡子”。原为澳大利亚所产的一种状似鳕鱼的鱼类 (Lotella Callarias)，唇下有长须，后来假借作采金人的绰号，指蓄有长须的人。

〔4〕Black-tracker：土著追踪者。英国殖民者从1820年开始雇用土著居民协助警察追踪犯人或搜索在丛林中失踪的人。这些土著居民被称为土著追踪者。

〔5〕Block：指各殖民区政府划分公地招人选领的地段。

〔6〕Bludger：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

〔7〕Boomerang：飞旋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常用的一种武器。形微弯，一端扁平，投掷后能飞旋回到原处。

〔8〕Booze：酒。澳大利亚俚语，醉后角斗称为 booze-up。

〔9〕Boundary-rider：牧场巡界员。澳大利亚牧场有篱笆分开，由巡界员担任巡视及修理，每一巡界员往往要负责八十至一百哩长的边界。

〔10〕Bowyang：工人用的紧腿裤带。

〔11〕Bunyip：骗子，招摇撞骗的人。

〔12〕Bunyip Aristocracy：冒牌贵族政治。

〔13〕 Bush：丛林，乡野。bush 相当于forest(丛林地带，森林)，通常亦指乡下、乡野，凡离开城市或市镇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称为 bush。

〔14〕 Bush-hut：乡野茅屋。

〔15〕 Bushman：丛林地带居民，林居生活者；也可称乡野居民。

〔16〕 Bush-ranger：潜伏丛林中的逃犯，丛林土匪，乡野歹徒。最初于 1806 年被使用，指逃入丛林的罪犯，以后含义扩大，指在丛林或乡野活动的劫匪、歹徒。

〔17〕 Bush Telegraph：(甲)口传电报，指组织完善的非正规口传通讯系统，用于警察通讯；(乙)谣言。本书所用系(甲)义。

〔18〕 Bush Worker：乡野工人。

〔19〕 Cabbage Patch："包心菜地"，维多利亚州的别名。

〔20〕 Chow："中国人"(含有轻蔑之意)。

〔21〕 Cocky：小农。约自 1860 年开始，把小农叫作 Cockatoo。Cockatoo 原义为美冠鹦鹉，因小农所领有的土地很少，一块田地上有很多小农，有如一群鸟，故有此名。以后缩写为cocky。

〔22〕 Cornstalk：原义是"玉米秆"，澳大利亚俚语中指(瘦长的)新南威尔士州居民。本书中用此字有双关意思。

〔23〕 Cradle：淘金槽。

〔24〕 Creek：小溪，河的支流。这个词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都指小溪，在英国则指海边小港湾。

〔25〕 Currency lad：土生小伙子。这个俗语在 1820 年开始使用。当时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流通的镑 (pound currency) 价值低于英镑 (pound sterling)，因此，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人被称为 "currency"，而在英国出生的英国人则称为"sterling"，以示有贵贱之分。

〔26〕Dago：对欧洲南部人的蔑称。这个用语初见于美国，稍后成为澳大利亚俚语。

〔27〕Digger：初指采金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称澳大利亚士兵（特别是步兵）为 digger 的用法逐渐流行。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休斯曾被人称为“澳大利亚小兵”（Little digger）。

〔28〕Dinkum：真正的，老老实实的。如 dinkum Aussie 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dinkum oil 是“真确消息”。

〔29〕Duffing：盗窃家畜。作案人往往把偷得的牲口原来的烙印改掉，然后赶往远地出卖。

〔30〕Dummy：用自己的名字替别人冒领土地。

〔31〕Emancipist：（甲）释放犯，主要指 1840 年以前被殖民区当局释放或赦免的犯人。假释犯在假释期间仍然是罪犯，不属于释放犯之列。（乙）解放论派，解放论者，亦称 Emancipationist，主张使释放犯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及法律上的各种权利。他们与排斥论派（者）处于对立的地位。

〔32〕Emu：鸸鹋（Dromiceius novae-hollandiae），产于澳大利亚，是仅次于驼鸟的世界第二大鸟，不能飞行，但善走，每小时能走三十哩。

〔33〕Exclusives（亦称 Exclusivists, Exclusionists）：排斥论派，排斥论者。指澳大利亚初期历史中一部分军人和自由移民，他们反对让释放犯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及法律上的各种权利。

〔34〕Fossicker：翻废矿寻金者。

〔35〕Grog：掺水的兰姆酒。原是水手用语，后在澳大利亚流行。1740年，英国海军上将弗农（绰号Old Grog）下令用掺水的兰姆酒供应海员，海员不满，把这种掺水的酒叫作 Grog。

〔36〕Gully：溪谷，沟渠。

〔37〕Gully-raking：盗窃迷路或未打烙印的牲口。

〔38〕Gum Tree：桉树属若干种树木的总名，其共同特征为树皮平滑。简译为桉树。

〔39〕Humpy：澳大利亚原始小屋。土著居民叫这种小屋为oompi，音转为humpy。

〔40〕Hun：指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行。

〔41〕Huon pine：澳洲泪杉(Dacrydium franklinii)，产于塔斯马尼亚岛西岸，用以造船，可防白蚁及虫蛀。

〔42〕Hutkeeper：牧场中守护茅屋的人。

〔43〕Kanaka：喀纳喀人，指被招募(或拐卖)到昆士兰蔗田、牧场劳动或在市镇充当奴仆的太平洋岛屿居民。原是夏威夷语，义为"人"。

〔44〕Kangaroo：袋鼠。俚语亦称澳大利亚人为Kangaroo。

〔45〕Kangaroo dog：袋鼠猎狗。是灵猩(Greyhound，一种长腿善跑的猎狗)和另一种猎狗的杂交种，擅长捕猎袋鼠。

〔46〕Kookaburra：澳洲产的大鱼狗鸟(Dacelo Gigas)，捕鱼及小爬虫等为食，鸣声与人笑声相似，因此又被称为Laughing jackass。

〔47〕Lag：原是英国俚语，指犯人、惯犯。在澳大利亚，这个词主要指因犯罪被流放来澳大利亚的人。

〔48〕Larrikin：青年流氓，不良少年，恶棍；亦指犯轻微罪的青年。这个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

〔49〕Mabel：原是澳大利亚作家Steele Rudd小说中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士兵的女友被称为Mabel。

〔50〕Mateship：平等的伙伴情谊。

〔51〕Mix it：搏斗，顽强斗争。

〔52〕Nardoo：蘋(蘋科)。是澳大利亚一种蕨类植物，盛产于内陆洼地，也见于近海河流和沼泽。干旱地区的土著居民将其孢子囊磨粉加水烘作粮食。

〔53〕 Opossum：负鼠。

〔54〕 Overland：赶着畜群作长途旅行，从一地移到另一地。这个词最初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使用，指人们从悉尼经内地迁往菲利普港地区。

〔55〕 Paddock：用篱笆围起来的一块土地，小牧场。

〔56〕 Pick the eye："挖眼睛"。原是英国俚语，指选得最好的东西，1900年左右很流行。在澳大利亚，指占用别人牧场里最好的牧地。

〔57〕 Pommy：指新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

〔58〕 Roll up：集合。

〔59〕 Rosella：长尾鹦鹉。盛产于新南威尔士北部和昆士兰东部。

〔60〕 Run：牧场，饲养场。

〔61〕 Scrub：矮树丛。

〔62〕 Selector：土地选领人。

〔63〕 Shanty：无执照的私设酒馆。

〔64〕 Slip-rail：活动围栏。指牧场围栏中可以拆开的一部分。

〔65〕 Squatter：牧地借用人。这个词原指新南威尔士殖民区非法占有皇家土地的人，这些人是比较穷苦的移民或前流放罪犯，通常用偷窃得来的牲口经营牧场。但到1829年以后，许多有社会地位的畜牧业者因占有皇家土地也被叫做牧地借用人。到1836年，牧地借用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执照费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66〕 Stagger juice：烈酒。

〔67〕 Station：牧场。

〔68〕 Stringy-Bark：（甲）有纤维质粗厚树皮的澳洲桉树；（乙）未开垦的（指土地），粗鲁未受教育的（指人）。

〔69〕 Stump-jump plough：避根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R·B·

史密斯和C·H·史密斯设计制造的农具。开垦荒地时犁头能避开树根，节省劳动力，故名。在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开垦桉树丛生的土地，避根犁起了巨大作用。

〔70〕 Stunt：花招，噱头，惊人技术。原是美国俚语，后在澳大利亚流行。

〔71〕 Swagman (Swag-man, Swaggie)：无业游民，流浪汉。这些人打起背包沿公路到处游荡，希望找寻季节性工作或充当临时工。“swag”是澳大利亚方言“背包”。

〔72〕 Tank：人工挖掘的蓄水池。用壕沟将雨水引入池内备用。

〔73〕 Township：城市规划区。

〔74〕 Trooper：骑警。

〔75〕 Walk：牧羊场。

〔76〕 Westralia：Western Australia 的缩写，指西澳大利亚。

〔77〕 Whaler：流浪汉，特别指在河岸上游荡的流浪汉。

基督教名词简释

九日祈祷：novena。天主教徒为祈求某事实现而作连续九日的祈祷。

卫斯理宗：Wesleyans。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以英国人约翰·卫斯理（1703—1791）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各教会的统称。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原为圣公会内的一派，后来成为独立的教会。着重在下层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标榜社会改良。主要分布于英、美等国，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信徒。

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是卫斯理宗的教会。

大主教：archbishop。基督教教会最高级职位之一。英国教会（圣公会）有两个大主教，即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会也有许多大主教。在澳大利亚，圣公会和天主教会都有身居大主教职位的神职人员。

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的一派，与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教徒称所信仰的神为天主，故名天主教。Catholic，义为公的（普世性的），又因奉罗马教皇为首，亦称为“罗马公教”。主要分布于意、法、比、西、葡、匈、波、美及拉丁美洲各国。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人数仅次于圣公会，占第二位。

不从（英国）国教者：dissenter。指拒绝接受英国国教教义并且脱离圣公会的基督教团体及其成员。英国的天主教徒以前也被归入“不从国教者”之列，但现在“不从国教者”一词主要指不接受英国国教的英国新教徒而言。

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基督教派别之一。属新教

喀尔文宗。由教徒推选长老治理教会，以此得名。十六世纪产生于苏格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老会属清教徒的温和派。在澳大利亚，长老会也有很多信徒。

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十六世纪中由英国人罗伯特·勃朗（1550—1633）创立，主张每一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故称为公理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公理会属清教徒的激进派。

主教：bishop。天主教会中管理一个教区的神职人员称为主教。原出拉丁文 episcopus，义为“监督者”。圣公会也设 bishop，一般多译为会督。

圣公会：Anglican Church，Church of England。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产生于英国。英王亨利八世于 1534 年宣布英国教会与罗马教皇脱离关系，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袭用了天主教的部分仪式和制度。在澳大利亚，圣公会是拥有信徒人数最多的教派。

本笃会：Benedictines。天主教最早的修道会。六世纪初由意大利人本笃（约 480—543）创立，以后发展到欧洲各地。标榜会士除参加宗教活动外，应注意读书和劳作。

自立派：Voluntarys。主张宗教应独立自主，不受国家控制和补助。在教育上，反对由国家拨款办学，主张由私人自由捐助维持学校。一译为“政教分离派”。

自然神论：deism。十七、十八世纪产生的一派宗教哲学思想。承认有神存在，但是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发展而让自然规律来支配一切了。因此，不承认超自然的神迹和神对人的任何“启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神论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中世纪宗教思想体系的理论武器之一。

低教会：Low Church。英国国教（圣公会）中的一派，与高

教会派对立。对主教和牧师的权威、宗教仪式都不重视。认为只有相信耶稣，灵魂才能得救，不能只靠宗教仪式。

牧师：parson, clergyman, minister。基督教（新教）大多数宗派中，称主持宗教仪式、管理教务的人员为牧师，一般是专职的宗教职业者。

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即圣公会。参见“圣公会”条。

英国国教祈祷文：Book of Common Prayer。英国议会于1549年通过《划一条例》，规定全国使用统一的祈祷文。用英语的祈祷文代替拉丁语被认为是英国教会史上的一件大事。

罗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即天主教。参见“天主教”条。

红衣主教：cardinal。天主教最高级的主教，由罗马教皇直接任命，分别掌握罗马教廷各部和许多国家重要教区的领导权，并有权选举教皇。

神父：father。天主教的一般神职人员，通常是一个教堂的负责人。

总主教：primate。圣公会高级神职人员的称号。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兼称为全英总主教，约克大主教兼称为英格兰总主教。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圣公会最高负责人也有总主教的称号。

浸信会：Baptist Church。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十七世纪产生于英国。主张成年后才可受洗，以后更主张受洗者须全身浸在水中，称为浸礼，因此得名。

高教会：High Church。英国国教（圣公会）中的一派，与低教会派对立。重视主教和牧师的权威，并强调宗教仪式在使人得救上的作用。

根本主义：fundamentalism。亦译为“原教旨主义”。相信

根本主义的人认为圣经所载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其真实性不容怀疑。他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持不接受的态度。

教皇通谕：encyclical。指罗马教皇向世界各地天主教徒发出的文告，一般是关于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的。教皇时常在通谕中发出对教徒的劝谕或禁令，强制教徒遵守。

教区：parish。基督教在主教或会督管理下的教务行政区称为主教教区(diocese)。每个主教教区再分为若干教区，分由教士管理教务，主持宗教仪式。

随军牧师：chaplain。陆、海、空军的随营牧师，工作上受军事长官领导，但仍属文职人员。参看本书第58、63页。

副会督：archdeacon。英国教会人员的一种职位。副会督辅助会督工作，并由会督任命。英国教会于1825年在澳大利亚设立副会督教区，隶属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会督。第一任副会督是托马斯·斯科特，第二任是威廉·布劳顿。1836年，布劳顿被提升为澳大利亚会督，澳大利亚的圣公会才在教务行政上脱离印度而独立。

副主教：co-adjutor bishop。罗马天主教会中主教的副手。在一般情况下，某一主教教区的副主教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多被提升为主教。例如曼尼克斯博士于1912年8月到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副主教(参看本书第335页)，到1917年即被提升。

清教徒：puritan。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要求清洗教会中的烦琐仪式和天主教残余影响，标榜俭朴清洁的生活，因而得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国王干预教会事务，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道德上要求自己严格的人也被称为“清教徒”。

喀尔文宗：Calvinism。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于瑞士。创始者是法国人喀尔文（1509—

1564)。反对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治理教会。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及高利贷辩护。初时以瑞士的日内瓦为中心，以后分布到法国、荷兰、英国等处。

路德宗：Lutherans。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以马丁·路德(1483—1546)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各教会的统称。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于德国。反对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否认教皇权威。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即人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不被定罪)，全凭信奉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规条。主要分布于德国和北欧各国。

最高会议：Presbyterian Assembly。长老会在一个地区内的最高机构，由该地区内各教堂选派代表参加，每年改选议长(moderator)一人。议长在任期内就是该地区长老会的首脑。

新教：Protestants。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脱离罗马公教而陆续产生的各个教派统称新教(在中国通常称为耶稣教)。主要分布于英、美、德、瑞士和北欧各国。在澳大利亚人口中也是新教徒占多数。

福音派：Evangelicals。基督教徒中，凡遵从福音说的均可称为福音派。他们主张只有相信耶稣是为赎罪而死，灵魂才能得救，否认单凭良好行为和圣礼可以得救。在英国，福音派常指圣公会低教会派。参看“低教会”条。

总会：synod, general synod。圣公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处分别设立总会，由各教区派代表参加，是一个地区圣公会的监督机构。

澳大利亚联邦历任总理表

1901—1903	埃德蒙·巴顿(保护关税派)
1903—1904	艾尔弗雷德·迪金(保护关税派)
1904	约翰·沃森(工党)
1904—1905	乔治·里德(自由贸易派)
1905—1908	艾尔弗雷德·迪金(保护关税派)
1908—1909	安德鲁·费希尔(工党)
1909—1910	艾尔弗雷德·迪金(保护关税派)
1910—1913	安德鲁·费希尔(工党)
1913—1914	约瑟夫·库克(自由党)
1914—1915	安德鲁·费希尔(工党)
1915—1923	威廉·M·休斯(工党，1917年后另组国民党)
1923—1929	斯坦利·M·布鲁斯(国民党)
1929—1931	詹姆斯·H·斯卡伦(工党)
1932—1939	约瑟夫·A·莱昂斯(澳大利亚统一党)
1939	厄尔·佩奇(乡村党)，任期仅十九日
1939—1941	罗伯特·G·孟席斯(澳大利亚统一党)
1941	阿瑟·法登(乡村党)，8月至10月任代总理
1941—1945	约翰·柯廷(工党)
1945	弗朗西斯·M·福德(工党)，任期仅七日
1945—1949	约瑟夫·B·奇夫利(工党)
1949—1966	罗伯特·G·孟席斯(自由党)
1966—1967	哈罗德·埃·霍尔特(自由党)

1967—1968	约翰・麦克尤恩(乡村党)
1968—1971	约翰・格雷・戈顿(自由党)
1971—1972	威廉・麦克马洪(自由党)
1972—	高夫・惠特拉姆(工党),1972年12月2日,工党在澳大利亚选举中获胜后就任总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澳大利亚简史　（上、下册）
作者＝［澳］曼宁·克拉克著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
页数＝４９７
ＳＳ号＝１０２９３６５９
出版日期＝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第１版